楚帛書研究（十一種）

李零 著

中西書局

楚帛書研究（十一種）

李零 著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楚帛書研究（十一種）/李零著. —上海：中西書局，2013.12

ISBN 978-7-5475-0396-6

Ⅰ. ①楚… Ⅱ. ①李… Ⅲ. ①帛書-長沙-戰國時代-文集 Ⅳ. ①K877.9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17628 號

本書出版得到
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
圖書出版專項基金資助

楚帛書研究（十一種）

李 零 著

責任編輯 秦志華 趙明怡
裝幀設計 梁業禮
出版發行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號榮科大廈 17F（200023）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圖宇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張 18.5
字 數 257 544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75-0396-6/K·079
定 價 90.00 元

安徽大学图书馆
藏书
lib.ahu.edu.cn

自序

中國最早的書是「書於竹帛」。甲骨文不是書，銅器銘文也不是書。中國書史，早期是簡帛古書，晚期是紙本古書。早期古書，寫在竹簡上的，截至目前，數量相當驚人，但寫在縑帛上的，却祇有兩次發現，一次是一九四二年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戰國楚帛書，一次是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帛書。長沙自古出絲綢，中國最早的帛書和帛畫都是和長沙的名字連在一起。

一九四六年，子彈庫帛書流失海外，圍繞它的討論，不但歷時長，而且參與討論者衆，具有真正的國際性。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批帛書其實不止一件，還有不少殘片，但通常所説的楚帛書，在很長時間裏，都是指蔡季襄首次發表於《晚周繒書考證》一書中的那件比較完整的楚帛書。

二十世紀是中國簡帛發現的黄金時代。其中真正可以稱之爲「書」的發現，最早一件就是通常所謂的楚帛書。竹簡的發現雖然比它早，但一九四九年以前，主要出土物幾乎全部是漢代邊塞出土的檔案文書，不但年代偏晚，而且除了零章碎句，没有像樣的書。研究簡帛古書也好，研究戰國文字也好，在很長時間裏，它是唯一的長篇。

子彈庫帛書非常難讀，一是文字難認，二是内容陌生。正是因爲難，才吸引了很多學界高手，一遍一遍，反復研讀，即使最優秀的學者也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我們必須承認，七十多年過去，直到今天，這篇古書仍有不少讀不懂的地方。

我的學術生涯是發端於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學習的七年（一九七七—一九八三年）。《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是我的處女作，對我來説，有特殊的紀念意義。

我讀楚帛書，集中閲讀，主要有七次：一次是一九八〇年，一次是一九八八年，一次是一九八

九—一九九〇年,一次是一九九三年,一次是二〇〇一年,一次是二〇〇七年,一次是二〇一〇年。前後長達三十年。本書是前四次研究的真實記録。

我一向認爲,學術的基礎是讀書,學術的本質是求知,寫書祇是把讀書心得系統化,總結給别人看,其實是幫助别人讀書。對我來説,書祇是個副産品。本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我的讀書筆記和認識過程。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目録

自序……一

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一

一、楚帛書研究概況……一

二、楚帛書的結構、内容與性質……二七

三、釋文考證……四三

索引……七五

後記……一一六

《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一一七

一、新作簡介……一一七

二、再論楚帛書的結構與性質……一二二

三、釋文考證……一三〇

四、行款與字數……一四八

楚帛書目驗記……一五一

一、行款……一五二

二、文字……一五三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and Shitu……一五五

楚帛書與「式圖」……一六三

一、楚帛書是一篇什麽樣的書？……一六三

二、應當怎樣理解楚帛書的結構？……一六四

三、楚帛書的方向是上南下北還是上北下南？……一六五

四、楚帛書的十二神代表了什麽？……一六七
五、楚帛書的行款是整齊的嗎？……一六八
六、楚帛書的文字辨識還能有新的突破嗎？……一六八
Reconsidering the Chu Silk Manuscripts……一七一
楚帛書的再認識……二〇五
一、引言……二〇五
二、楚帛書的來歷……二〇六
三、楚帛書的種類和形制……二一三
四、楚帛書的圖像……二二一
五、楚帛書的文字……二二七
六、附論：子彈庫帛畫……二三一
Translation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二四四
熱氣寒氣，以爲其序……二五二
一、第一字……二五二
二、第三字……二五四
三、第八字……二五四
中國古代的墓主畫像
——考古藝術史筆記……二五六
楚帛書與日書：古日者之説……二七三
一、楚帛書的出土與收藏……二七四
二、楚帛書的三種複製本和有關研究……二七五

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

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戰國楚帛書一向爲中外學者熱衷討論。它不僅是目前出土最早的古代帛書，作爲罕見的古代文物彌足珍重，而且全篇包括九百多字，內容豐富，對研究戰國楚文字以及當時的思想文化有重要參考價值。最近十多年來，楚帛書的紅外綫照片在國外發表，對楚帛書的研究起了推動作用。借助這套照片，有不少新字可以釋出，誤釋可以得到糾正。它爲我們重新檢討以往的帛書研究，繼續深入探討帛書的內容，提供了可靠依據。本文就是依據這套照片，對楚帛書所做的一次再討論。討論共分三個題目：

一、楚帛書研究概況；

二、楚帛書的結構、內容與性質；

三、釋文考證。

一、楚帛書研究概況

（一）出土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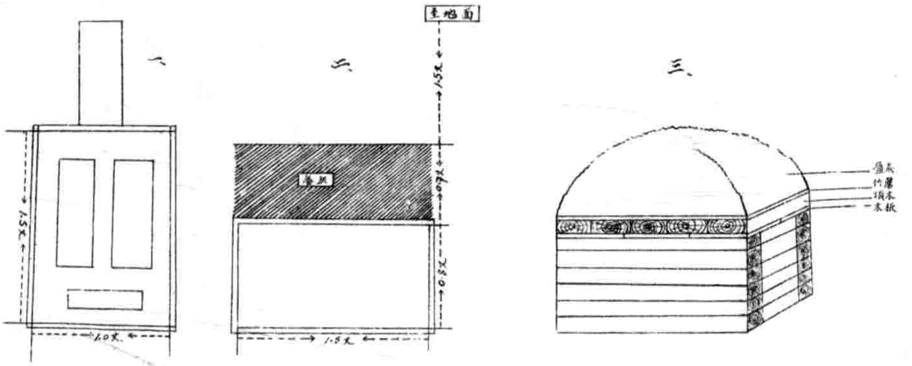
楚帛書，通常也叫楚繒書或楚絹書，係解放前在湖南長沙東郊盜掘出土。出土後不太久即落入一度在長沙雅禮中學任教的美國人考克斯(John Hadley Cox，即柯强)之手，被他帶到美國。其後，帛書在美國幾度易手，現存放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物主是亞瑟·M·賽克勒(Arthur M. Sackler)。

帛書因爲是出於盜掘，其流出國外，亦十分秘密，故經過情形向來不大爲人所知，已經發表

的一些消息每每相互矛盾。這裏，爲着讀者瞭解方便，我們先把幾種不同說法介紹一下（以下引文，除第三項外，均出於本文下題《論著簡目》開列諸書。這裏不再一一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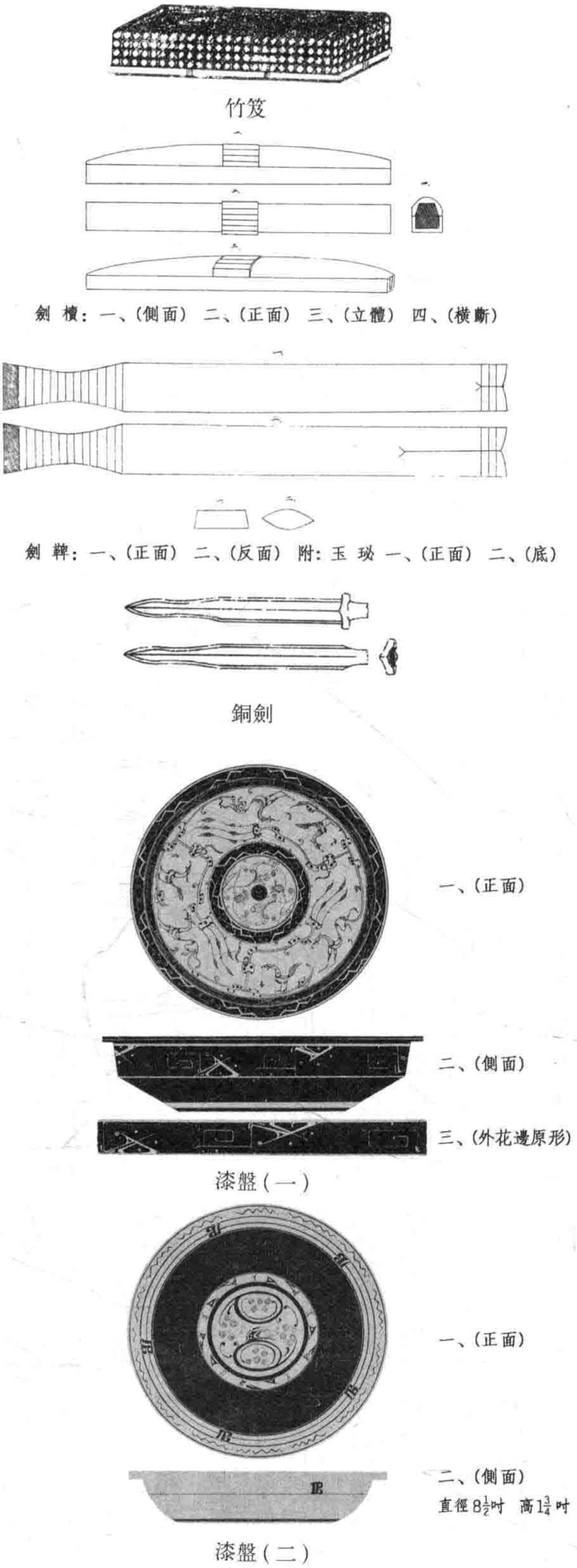
1. 蔡季襄。稱帛書是「近年」發現於（長沙）東郊晚周木槨墓中（圖一），「墓位於長沙東郊之杜家坡。因築路而發現。平面作凸形，前端狹長之巷即爲隧道，此項隧道由淺而深作斜坡狀，其用意蓋取其便於下棺也。後者爲墓室，橫長丈餘，縱長丈有五尺，深倍之，作長方形，四壁深峻若削，中實以黃土，黃土下層則爲蜃炭。……蜃炭之下，則係墓室，室頂架厚尺許、寬二尺之橫木五，上用竹席滿布，四周則以長與坑等之巨木叠砌，構成長方式。……棺則陳於墓室之東，大小與常禮等，惟蓋面平坦不隆起，棺外裏以褐色之絲帛，絲極匀細。棺之右側陳木櫝（零按：指邊箱）一，長度與棺相等，寬半倍之，其中滿貯明器，本書中所載之繒書竹笈、漆盤（零按：書中所記共兩件）、銅劍、劍鞞、劍櫝等物（零按：書中所記還有『木寓龍』一）即出自此櫝中（圖二）。因木櫝保存完好，故所貯明器絲毫無損，均能保持原有狀態（原注：按櫝中尚有黑陶如簋、鼎、壺、觴等物，惜均佚散）。」帛書發現時據說是放在一件「竹笈」內，「折叠端正，惜出土時土人不知愛護，致被損壞過半，故笈內殘繒斷片甚多，惟此書獨完整無闕，尚可展視。書係絲質，因入土年久，已呈深褐色，幾與文字相含混，從（縱）長十五吋，橫長十八吋，墨書（原注：按斷片中亦有朱書者）」。

2. 蔣玄佁。稱帛書出土時，「爲一裁縫（零按：即下商承祚文所說之唐



圖一　蔡季襄書中的長沙東郊晚周木槨墓圖

繒書墓葬：一、（平面）　二、（側面）　三、（墓室建築模形）



圖二　長沙東郊晚周木槨墓中出土的明器

鑒泉)所得，當時曾設法請國內蒐集家(零按：當指商承祚先生)收購，終於沒有成功，待我由廣東重去長沙，知道已由一美人付了點押金，把這絹畫借到美國去了，這位收藏者手中祇剩了一張洋文借據」。

3.《美帝掠奪我國文物一斑》(《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〇年十一期六十頁)：「最荒唐的是蔡季襄將長沙出土的戰國時代『繒書』一塊——這是我國最早的筆繪的畫與墨寫的字——賣給了耶魯大學的John Cox 學生，賣價美金一萬元。這個美國人祇拋下一千元就把這無價之寶帶走了。」

4. 梅原末治。稱帛書出土於「一九三〇年代後半期」。

5. 錢存訓(T. H. Tsien)。稱帛書「發現於一九三六—三七年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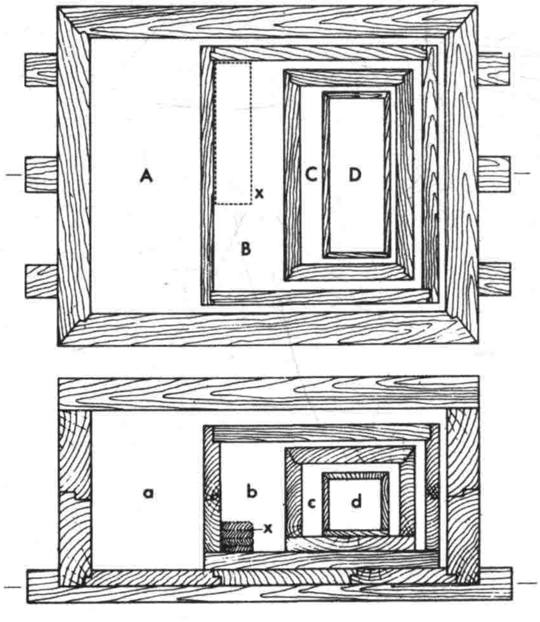
6. 商承祚。商氏據「解放後當事人」(他說「掘這墓的共四人」)所述，謂蔡氏所說帛書出於杜家

坡的説法並不可靠，稱「帛書發現的確實年月及地點爲一九四二年九月，墓地在東郊子彈庫的紙源冲(又名王家祖山)，是一座形制不大、棺槨完整的木槨墓。黑漆棺置於槨內一旁，『頭箱』與『邊箱』放置隨葬品，整個空間如曲尺形」。「帛書八摺(原注：帛書八摺並不等齊，當中部分摺迹縱約十七點五釐米，横約十一點五釐米)，放在一個竹匣中。匣長約二十三釐米，寬約十三釐米(原注：以帛書摺痕長度較蔡書所繪竹匣長度尺寸略符，而寬度則誤，以其寬不能容納帛書之寬)，匣面蓋有一方『土黄色』面有紅色『印花』的綢子，再上放着一條『三脚龍』。匣之一邊有黑色的冥幣泥版一堆，無文字。這些東西放置在南北向的『頭箱』中。『邊箱』在棺之右，有漆盤一(原注：蔡書第二件漆盤，從花紋看，年代較晚，當非一墓所出。其所謂『木寓龍』，蔡未要，故所記不詳)，漆耳杯四，皆木胎；銅劍一柄，盛以木櫝，另銅戈一；圓身木俑二十四個；陶質鼎、敦、壺各一(陶器及泥版皆未取出)」。「還有些殘帛書，徐楨立生前曾拿出給我看過，從殘帛斷片瞭解內容，仍然是些占辭術語。據徐老先生説，是得自蔡季襄手中的一部分。因此，我頗疑是那張匣上的覆帛殘片粘連在匣面而蔡氏將之揭存(原注：真實情況，祇有蔡氏自揭其謎。此殘帛文字，日後我另有文報道)。殘帛文字清晰可辨，有朱欄和墨欄兩款，字皆寫入欄內，字大於此帛書，從欄色的不同，知有兩張。掘墓人看見較爲明顯的朱欄，遂誤認綢子上的紅色是『印花』，『土黄色』實爲淺褐色」。另外，他還談到自己曾嘗試購買帛書一事，説是「一九四二年冬，於重慶接長沙唐鑒泉來信，以帛書求售，乃托友人沈筠蒼前往瞭解情況。覆信説：『唐裁縫(零按：即唐鑒泉)出視之時，是在白紙之外再用報紙將之松松卷起，大塊的不多，小塊的累累，將來拼復原樣恐不可能。』要正與唐反復議價之時，蔡季襄回長沙，遂爲所得」。帛書流出國外，據他説是一九四六年被考克斯從上海帶到美國。

7. 嚴一萍。稱「民國卅五年，抗戰已經勝利，蔡氏把繒書帶到上海，旋爲長沙湘雅學院教員美人柯克思(M. John Hadley Cox)所獲得。有人説他是『出重價購得』(怡生：饒宗頤於楚繒書一文後附録，摘自本齋著『楚帛書及其研究』)。有人説他是『騙取』(商錫永『戰國楚帛書述略』)。據李棪

齋先生見告：柯克思獲得蔡氏的繒書是代爲攜美『保管』，而非『重價購得』。這一段經過内幕，李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將另有撰述，此不贅」。

8. 諾埃爾・巴納(Noel Barnard)。曾於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兩次談到說，他也接觸到一個當年參加過帛書墓發掘而現在住在中國大陸之外的人，據這位隱名的當事者稱，帛書出土的時間是一九三四年，參加發掘者有九或十人，其中真正在墓内撈東西的是兩個男孩，而其中的一個就是他本人。巴納將他所述發現經過轉述如下：「爲了探到墓穴，他們打了一個非常深，深度大約十五至二十英尺的洞，並沿發掘範圍四周修有一條盤旋通道。據他回憶，他們所盗掘過的大多數墓都是位於黑土層中，上面表土是長沙地區特有的赭色土。然而帛書墓却主要是被灰土層所覆蓋。由於木料吃水變重，他們使用一些帶滑輪繩索的簡單機械來起動覆蓋墓頂的槨板。墓室係木結構，包括四個重疊相套的四方槨室，中心是墓主棺具(圖三)。槨板一被揭開，那兩個男孩便跳了進去。墓室的大小是據這兩個男孩的身高估算的。在空間A中發現了幾件倒扣在槨室地板上的陶毁，每件下面有一件陶猪，還有四件楚明器中樣式習見的木俑，但没有發現金屬製品。空間B和C中除去一大堆每根厚約三吋、長約四五英尺、寬約十二至十八吋的槨木外，顯然没有什麽隨葬品。在空間B中，這些槨木整齊地順墓壁疊砌。棺具内祇有殘存的齒髮。總而言之，這是一次極其令人失望的嘗試。」「然而那兩個男孩試圖掀起空間B中吃水變重的槨木，終於掀起了最上面的一根。在這根與下一根之間放着的就是所謂『折疊起來的皮子似的東西』。由



圖三　巴納繪製的出土帛書的木槨結構圖

於其若干部位粘著在貼近的槨木表面，當掀起上面的槨木和挪動折疊的這疊『羊皮』時——最初他們以爲是『羊皮』——結果某種程度的撕裂便發生了。不過，因發現上面有字迹和圖畫，他們還是把它取了出來，展開晾乾，加以驗視。出土時，那材料觸手粘滑而且異常脆弱。當時至少有三份不同的材料被看到，可是由於誰也不感興趣，所以没有一個人協助男孩們掀起剩下的槨木。據該當事者稱，由於發掘地點嗣後旋即回填，不久並於墓上蓋起一座房屋，因而那裏面很可能仍有一些毛筆書寫的帛書被遺留在槨木之間。」根據這一回憶，巴納氏對商承祚的上述説法提出若干異議，認爲：第一、帛書是一九三四年而不是一九四二年出土；第二、參加發掘的是九或十人而不是四人；第三、帛書是發現於槨木間而不是竹笥内。另外，他還提到説，考克斯曾於一九三九年三—五月在美國耶魯大學舉辦長沙出土中國古代文物展覽（帛書並未在這次展覽會上展出），就他所知，一九三九年後考克斯並未重到中國。因此他估計帛書可能是在一九三八年左右流出國外。他認爲帛書於一九四二年出土的説法與考克斯回到美國的時間也是有牴牾的。

上述幾種説法的主要分歧點是：

(1)出土時間。梅原末治説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半期，錢存訓説是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間，商承祚説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巴納説是一九三四年。

(2)出土地點。蔡季襄説是杜家坡，商承祚説是子彈庫。

(3)流出國外的時間。商承祚説是一九四六年，巴納説是當在一九三八年左右。

(4)帛書在墓中放置的情況。蔡季襄、蔣玄佁、商承祚説是放在頭箱中的一件竹笥（即竹笈或竹匣）内[二]，巴納説是放在槨木之間。

(5)出土帛書的件數。蔡季襄説竹笥内除去此件完整的帛書外，還有一些碎帛片，其中亦有朱書者。商承祚説殘帛有朱欄、墨欄兩種，當是兩張，原來是覆蓋在竹笥之上。巴納説掘墓者當時在墓中至少一共見到三份帛書，並未全部取出。

以上這些説法存在不少矛盾，有些地方因無直接的消息來源難以判斷，但也有些地方通過比較，似乎可以統一起來。

對於弄清帛書出土情況最重要的是，一九七三年五月湖南省博物館對帛書出土墓做了重新的調查和清理。這次清理從墓中發現了一幅珍貴帛畫，帛畫先以《新發現的長沙戰國楚墓帛畫》發表於《文物》一九七三年七期。嗣後，記録該墓發現的簡報《長沙子彈庫戰國木槨墓》發表於《文物》一九七四年二期。

這一報告證實，帛書的確實出土地點是在子彈庫（其實子彈庫也就在杜家坡一帶）。出土時間，報告記爲一九四二年九月，可能是根據與商承祚所述相同的來源。報告所記墓葬形制、棺槨結構和隨葬物與商承祚的描述最爲接近。此墓確爲一座形制不大、帶斜坡墓道的長方形竪穴墓，墓頂用青膏泥封存，屬於長沙特有的「火洞子墓」。槨室南北向，有頭箱和邊箱（在左側），内置雙棺，内棺髹黑漆。棺内墓主骨架保存完整（巴納説「衹有殘存的齒髮」是不對的），經鑒定，爲四十歲左右男性（圖四、五）。剩留的主要隨葬物有：

(1) 帛畫（圖六）。畫有危冠長袍、手擁長劍、乘風御龍之男子。「平放在槨蓋板下面的隔板上面」，位置正好在盜洞旁邊不遠（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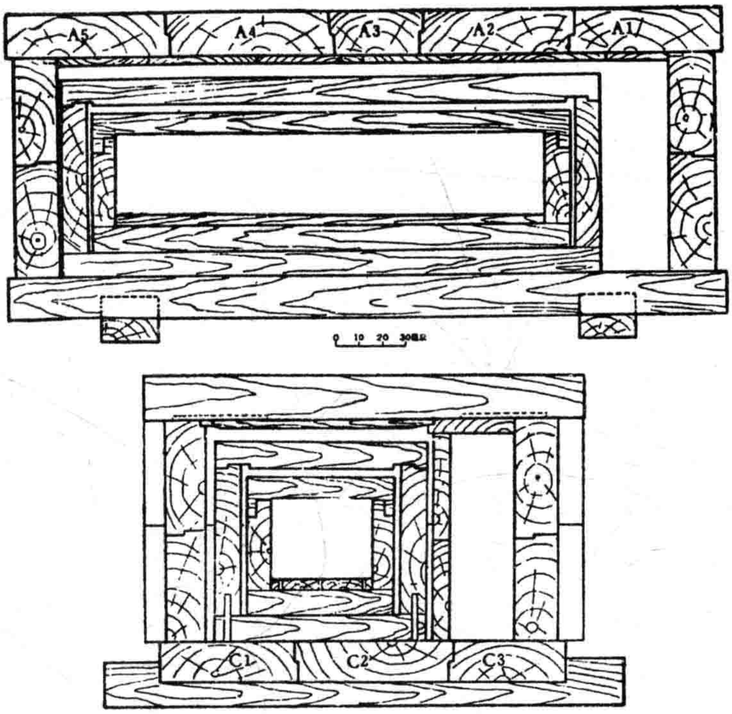
(2) 陶鼎三、陶敦二、陶壺二、陶匜一、陶勺一（圖八）。

另外，還有若干竹木漆器、玉器和絲麻織品（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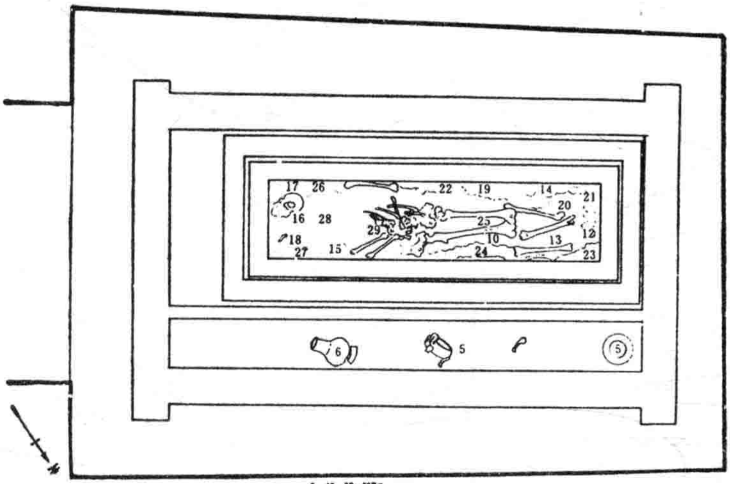
報告後附録有根據當年參加過該墓發掘的當事者回憶所録該墓隨葬物清單，計有：

(1) 頭箱内：「木寓龍」一，竹笥一（内盛泥金版數百塊），繒書一（「一端搭在三脚木寓龍尾部，一端搭在竹笥的蓋上」）；

(2) 邊箱内：漆耳杯四，木梳、木戈各一，皮帶一，陶鼎、陶敦、陶壺各四，陶匜、陶勺各一，漆盤一，木俑八，戈、矛、劍各一。



圖四　73長子MI棺槨縱橫剖面圖



圖五　73長子MI人骨架及隨葬器物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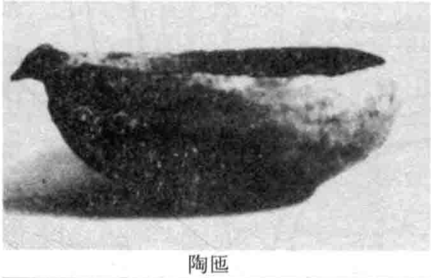
1. 帛畫　2. 麻帶　3. 竹片　4. 竹簽　5、8. 陶鼎　6. 陶壺　7. 玉璧　9. 陶敦
10. 絲織品　11. 麻鞋底　12—15、17、19、22. 殘絲織物　16、28. 幾何紋錦
18. 漆角狀物　20. 鐵質狀物　21. 絲帶、殘席　23、25、26. 絲織物、殘席
24. 殘絲帶　27. 殘織錦、殘席　29. 席片　30. 陶壺蓋　31. 陶匜　32. 陶勺
(1、4隔板上出土，2、3外棺蓋板上出土，7內棺蓋板上出土，8、9、30—32出土於盜洞或盜洞近椁蓋板處)

圖六　73長子MI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綫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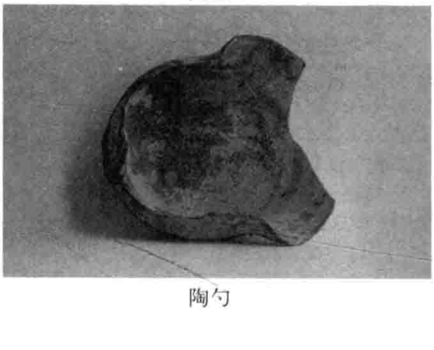
圖七　73長子M1隔板及帛畫出土情況——
箭頭所指處是帛畫出土位置

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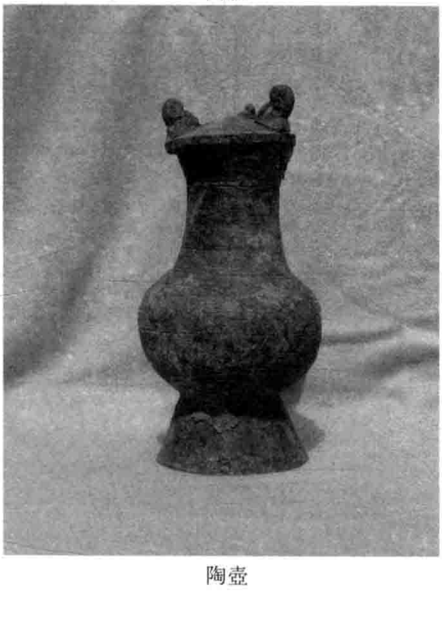
陶敦



陶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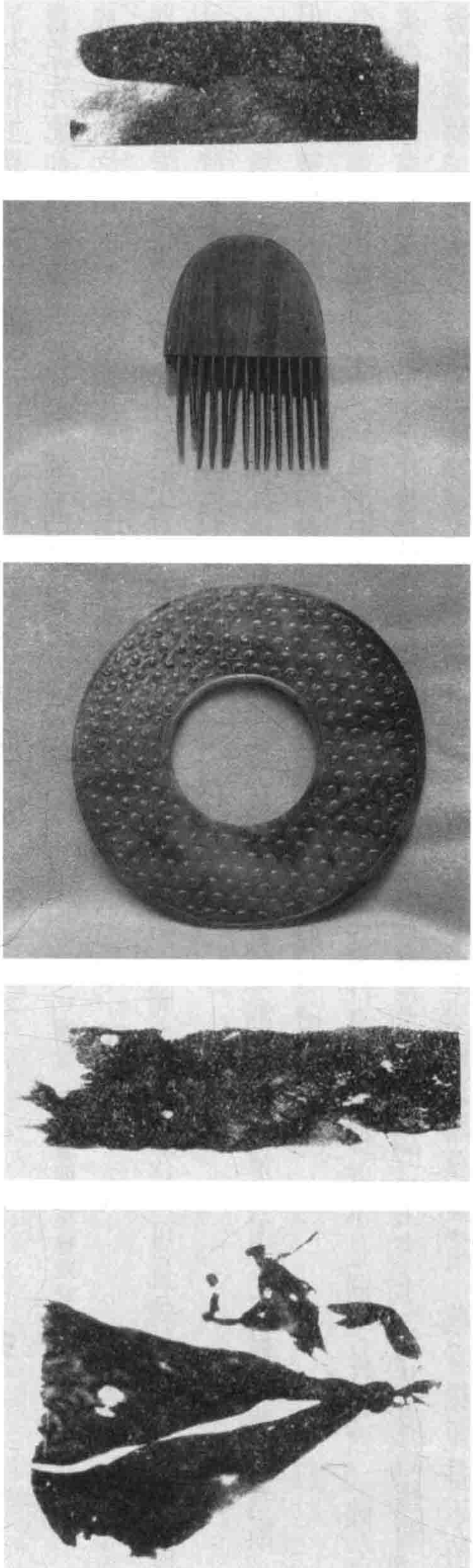


陶勺



陶壺

圖八　73長子M1出土的陶鼎、陶敦、陶壺、陶匜、陶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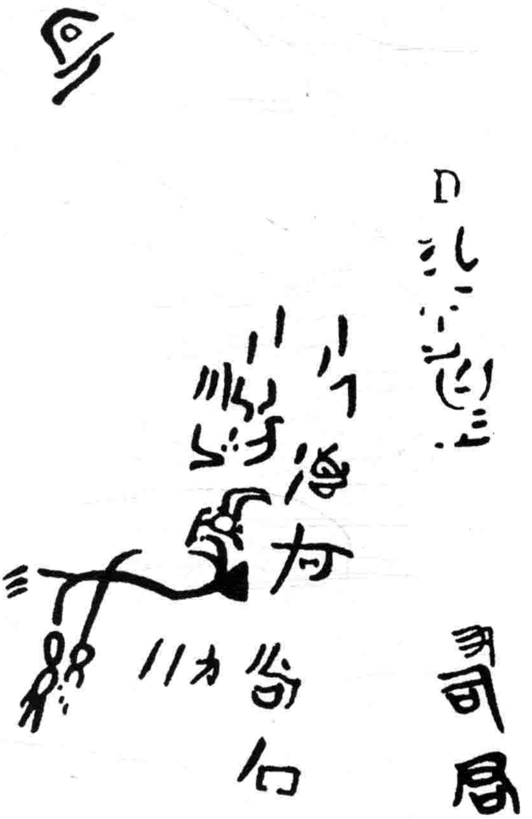


圖九　73長子M1出土的木器、玉器和絲麻織品

這一報告及附録在某些細節上可以訂正上述諸説。報告證實，墓中的陶器確實是按鼎、敦、壺（還有匜、勺）組合。關於這批陶器，蔡季襄説是散佚掉了，商承祚説是並未取出，現在看來其實是既有取出的，也有留下的，並且數量要比他們所説的多。它們對判斷墓葬年代是很有用的。可惜的是，商承祚所説留在墓中的泥金版並未發現，下落不明。而對帛書研究有直接關係的是，墓中出土了一幅帛畫。這幅帛畫，蔡、商二位都未提到，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與巴納的説法相合，即墓中至少有三份帛書，並未全部取出，墓回填後尚有帛書遺留在槨木間。這種説法我想大約就是由這幅放在盜洞附近、隔板與槨蓋板之間縫隙内的帛畫所誤傳。

上述整帛、殘帛外加新出土的帛畫至少有三份（其實殘帛還不止一件），這一點現在看來已很清楚。但問題是整帛與殘帛原先是怎麽放置的呢？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報告於上述説法外，又提出

了一種新的説法：整帛是放在竹笥的蓋上。這種説法，我想恐怕是不對的，它大概是把兩份不同的帛書弄混了。因爲很明顯，現在這幅完整的帛書有許多折斷之痕，尺寸適與蔡書所記之竹笥相適，可以判斷原先是作八摺放置，根本不可能是平攤在竹笥之上。平攤在竹笥上的帛書很可能如商承祚所説是一件「覆帛」，揭毀成爲碎片。因此，我的看法是，子彈庫楚墓出土的帛書、帛畫不僅件數不衹一件，而且放置亦各異，衹是由於當日盗掘者缺乏科學的分工和記録，遂致有上述混亂發生。其實他們衹是於匆忙混亂之中各見一斑。現在討論的這份帛書原先應如馬王堆三號漢墓隨葬書籍的方式是放在竹笥之中的，竹笥中原先肯定還有其他一些帛書（這些帛書中的一件有朱書殘迹印在這份帛書的表面（圖十），現在尚可見到），衹是出土時已經揭毀，取出後遂與「覆帛」殘片放在一起。



圖十　帛書表面的朱書殘迹

楚帛書出土後的收藏和流外經過，現在因無直接的消息來源，有些情況還不好做出明確判斷。但就以下情況來看，上述商文的介紹有些地方也許是存在問題的。

一是商文提到唐鑒泉收藏的帛書破碎成許多碎片，與這件帛書好像並不是同一件東西。陳公柔先生曾向我説起，當年他在長沙地區參加發掘，曾與親自發現帛書的「土夫子」龍某有過接觸。據龍某稱，帛書是一出土就歸了蔡季襄的。當時他們曾拿了東西去請蔡鑒定，蔡看後説是不值

錢，招待龍某等人吃了一頓茶點，東西即歸了蔡氏。這中間並没有唐鑒泉在內。二是帛書的出土時間，承李學勤先生見告，美國方面至今還保存着文字憑據，可以證明帛書是三十年代出土的。

關於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希望知情者今後能有更詳盡的報導。

在長沙子彈庫楚墓的出土物中，無疑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帛書和帛畫。

目前發現的帛書、帛畫，除此墓所出，尚有以下幾項：

1. 帛書。

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所出西漢早期帛書（二十六件）〔二〕。

2. 帛畫。

(1) 一九四九年湖南長沙陳家大山出土戰國帛畫（一幅）〔三〕；

(2) 一九七一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西漢早期帛畫（一幅）〔四〕；

(3) 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西漢早期帛畫（三幅）〔五〕；

(4) 一九七六年山東臨沂金雀山九號漢墓出土西漢早期帛畫（一幅）〔六〕。

上述帛書、帛畫，馬王堆帛書是折叠陳放在一件漆盒內，與子彈庫帛書陳放的方式類似，它們是屬於墓主的一批藏書，其中不少有圖，或者本身就是圖，這與子彈庫帛書也是類似的。陳家大山出土的戰國帛畫，形制與此相似，畫中人物爲一婦女，旁邊有一龍一鳳，當爲墓主形象，其陳放位置，傳説不一，或説是在一陶敦內，或説是在一竹筩內或竹笥上。其他幾幅西漢帛畫，畫面中心人物，一般也都認爲是墓主形象。馬王堆一號漢墓和金雀山九號漢墓所出，皆作T形，平鋪在棺蓋上，畫面中心人物皆爲女性。馬王堆三號漢墓所出的三幅，一幅也是作T形，平鋪在棺蓋上，畫面中心人物爲男性；但另外兩幅皆作長方形，張掛在棺室東西兩壁上，畫有車馬儀仗等，類似洞室墓四壁的壁畫。上述帛畫應當屬於同一性質，皆爲葬儀用具。它們的定名，一般有兩種

看法，一種認爲是銘旌，一種認爲是畫荒。我們認爲當以畫荒之説爲是。或者更確切地説，按照《禮記・喪大記》鄭玄注「在旁曰帷，在上曰荒」，應當把蓋在棺上的帛畫叫作畫荒。

隨葬帛書的長沙子彈庫楚墓，根據長沙楚墓發掘歷年積累的經驗，大體定在戰國中晚期之間是可信的。帛書、帛畫的年代當與之相去不遠。其墓主身份，據墓葬棺槨形制與隨葬品判斷，地位比較低，略相當於士一級。他用來隨葬的帛書，這件完整的，內容主要是講各月的禁忌(詳下第二節)，殘帛據商文介紹，「仍然是些占辭術語」，顯然都屬於數術之書，可見墓主是一位篤好數術之學的人物。帛畫所繪人物似乎是在作「仙遊」，則應當是墓主本人的形象。

(二) 論著簡目

長沙楚帛書的研究是一個學術界廣泛注意的論題。三十多年來國內外許多學者進行過專門研究。其中有些學者，如香港的饒宗頤和澳大利亞的巴納甚至對帛書進行再三再四的反復研究，從五十年代到現在，興致一直未減。但是我們應當看到，帛書的研究之所以這樣「反反復復」，與帛書的複製長期未能臻於完善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要對帛書的有關論著進行介紹，便勢必要對這些論著所依據的複製本的優劣進行評騭。這裏我們就按帛書複製本的種類以及發表先後對這些論著做一簡單介紹：

1. 以蔡修涣臨寫本爲基礎的論著。

這是帛書最初的複製本(本書圖版壹)，直接或間接採用這一複製本的主要有以下一些論著：

(1) 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石印本，一九四四年。此書原本印數極少，一九七二年臺灣藝文印書館重版了該書。

這是發表和研究帛書的第一部論著。作者是帛書流出國外以前的收藏者。書中對帛書出土情況做有比較詳細的介紹並附有墓葬形制和出土物的插圖，是研究帛書出土情況的主要原始材料之一。所附臨寫本完全是憑目驗原物寫繪而成，出於蔡氏長子蔡修涣之手，其中缺文概用方框表

示，邊圖是按原色彩繪而成〔七〕。書中並有帛書釋文及簡短的考證。

(2) 蔣玄佁《長沙（楚民族及其藝術）》第二卷，美術考古學社專刊之一，上海今古出版社一九五〇年。

此書原擬出五卷，結果僅出兩卷。帛書見於第二卷圖版二八A，蔣氏稱爲「絹畫」。該卷後有蔣氏所撰「編後附記」，述及帛書流外情形。所收帛書臨寫本係摹自蔡氏臨寫本，但將蔡氏用來表示缺字的方框略去，訛誤較多，無考證。

(3) 陳槃《先秦兩漢帛書考》附録《長沙楚墓絹質彩繪照片小記》，《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十四册，一九三—一九五頁，一九五三年三月。

作者是臺灣學者。五十年代，蔡氏書極爲難得，作者僅從旁人借得蔡氏臨寫本照片，所附即據此照片再摹之摹本。文章繼蔡氏之説，考證帛書邊圖若干圖像即《山海經》所描述的神物，文極簡略。《後記》摘録董作賓與書論帛書二則，其中一則云帛書「蓋本有五木，東青、南赤、中黃、西白、北黑。今止有四木，則中央黃木，既漫滅不見矣」。這一推測現在據帛書紅外綫攝影檢驗的結果是並不可靠的，帛書中央並没有黃木。

(4) 饒宗頤《長沙楚墓時占神物圖卷考釋》，《東方文化》(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一卷一期，六九—八四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一月。

作者是香港學者。所著此文是蔡氏書後的又一篇帛書考釋。作者認爲帛書文字記四時及月令出行宜忌，當是「楚巫占驗時月之用」，用於隨葬，是爲了「鎮壓邪魅」，故定其名爲「楚墓時占神物圖卷」。所附帛書臨寫本是據蔣氏本再摹。

(5) 董作賓《論長沙出土之繒書》，《大陸雜誌》十卷六期，一七三(七)—一七七(一一)頁，一九五五年三月。

作者是臺灣學者。原有蔡氏所贈《晚周繒書考證》，然撰寫此文時，書未在手，被封存於美國

芝加哥，僅託人將蔡氏臨寫本照片從美國郵來，即隨文刊出者。此文以饒文既出，不復釋文，僅就若干問題作簡短討論。其中最有價值的地方是，作者確定，帛書的放置方向應以中間十三行的一段的書寫方向爲正，並且此段在順序上先於八行的一段，帛書邊文應按春(東)、夏(南)、秋(西)、冬(北)的順序來讀，與蔡氏的置圖方向根本相反，中間兩段的讀圖順序也不同。這種讀圖法後來爲許多帛書研究者所採用，現在看來是完全正確的。

(6) 澤谷昭次《長沙楚墓時占神物圖卷》，河出孝雄《(定本)書道全集》第一卷一八三頁，河出書房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作者是日本學者。此文主要是據饒氏的上述文章對帛書所做的簡單介紹，故題目即取饒氏所定名稱。書中圖一三七所收帛書臨寫本也是採用饒氏本。

(7)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下)，《文物》一九五九年九期，五八—六一頁。

《戰國題銘概述》是作者研究戰國文字的一組稿子，分上、中、下連載在《文物》一九五九年七—九期。其中討論楚國文字的一節載於下篇，述及楚帛書。作者做有帛書的全部釋文，並對帛書內容做了概括介紹，認爲帛書中間十三行的一段是講天災禁忌及《月令》式的刑德思想，八行的一段是講四時形成的神話，邊文與《山海經》相似。其所據帛書複製本推測應爲《書道全集》(平凡社)所録蔣氏本(即下作者《補論》一文所刊)及梅原末治的局部新摹本，但此文僅將後者刊出。

(8) 錢存訓(T. H. Tsien)《書於竹帛——中國書籍與文字的起源》(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又中文版，名《中國古代書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三月)。

作者是華裔美國學者。所著此書是一部中國圖書史。其中第六章《用作書寫材料的絲綢》有「長沙帛書」一節(pp. 122—125)，對帛書做有簡單介紹。書中附有蔣氏本一幅(PL. XX)，無考證。

2. 以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全色照片爲基礎的論著。

大約在一九五二年前後，當時存放帛書的弗利爾美術館曾將帛書拍成全色照片，洗印副本，提供某些學者進行研究。例如梅原末治、巴納、饒宗頤、林巳奈夫和商承祚等許多人就都是根據這一照片寫成論文。這一照片比起蔡修渙臨寫本有很大優越性，但現在已經落後。

(1) 梅原末治《近時出現的文字資料》，下中彌三郎《書道全集》卷一，三四—三七頁，平凡社一九五四年九月。

作者是日本學者。此文第四節「長沙的布帛文書與竹簡」對楚帛書做有簡單介紹，稱帛書是三十年代後半期出土，與錢存訓説相同。《書道全集》此卷除收有蔣氏本一幅外（圖一二七—一二九），還發表了帛書的一個局部新摹本（插圖六一）。這個新摹本是據弗利爾美術館照片發表的第一個摹本，但摹本衹有中間八行一段開頭很少的一些字，並且未附照片。根據弗利爾美術館的照片，梅原氏肯定帛書最初是疊爲八摺，折疊後尺寸與蔡氏書中的竹笥大小相適，並指出帛書表面另有用白色或朱色寫成的三四行文字。

(2) 饒宗頤《長沙出土戰國繒書新釋》，《選堂叢書》之四，香港義友昌記印務公司一九五八年。

饒氏在日本京都梅原末治處借摹帛書照片，重新寫定釋文考證。摹本是按原狀摹出，較下巴納臨寫本更爲存真（本書圖版貳），所釋文字亦較前爲多，但釋文於帛書斷裂處每每不計缺字，對行款的理解不如巴納本。

(3) 諾埃爾·巴納（Noel Barnard）《楚帛書初探——新復原本》（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 A New Reconstruction of the Text, Monumenta Serica XVII, pp. 1—11, 1958）。

作者是澳大利亞學者。所撰此文純以發表帛書複製本爲主，無考釋。作者認爲復原帛書文字是研究帛書的基礎工作，衹有先將帛書文字做盡其可能的復原，才談得上做進一步研究，因此首

創網格式處理法，專門用以復原帛書行款。文章中共印有圖版六幅，其中PL. 1是蔣玄佁本照片；PL. 2，3是作者據弗利爾美術館照片所製臨寫本，這一臨寫本採用方形網格復原帛書行款，以空格表示缺字，以虛綫描摹殘字，中間兩大段均有表示行格的數字，邊文因無法確切估計，不附數字；PL. 4，5是作者用同樣網格將蔣本所摹字體填入相應位置製成的臨寫本，目的是用來與作者所製臨寫本對照。PL. 6是一個試用的隸定釋文，每字標有表示清晰程度的符號。作者所創用的網格式處理法後來被證明是一種十分有用的方法，但是，我們應當注意，這個複製本在行款的復原上仍有一些誤失。

(4) 李學勤《補論戰國題銘的一些問題》，《文物》一九六〇年七期，六七—六八頁。

此文是上述《概述》(下)的補正。《概述》(下)未附帛書複製本全文，此文始將前文未刊之蔣氏本印出(置圖方向與董氏同)，並稱「最近見到一種新摹本，雖因摹製者缺乏辨識戰國文字的能力而仍多脱誤，但在某些地方是較清晰的」。作者未將這一摹本印出，但據作者重做的釋文判斷，顯然就是指上述饒書的摹本。作者此文的一大發現是考定帛書邊文十二月即《爾雅・釋天》的十二月名。由此作者確定「絹書應如附圖那樣放置(即將蔣圖反置)，其四周十二神象徵十二個月，係依斗柄方位排列。各神像下注有神名及職司，並記載該月宜忌」。「……由月次方位可知絹書是用建寅的『夏正』」。

(5) 陳夢家《戰國楚帛書考》，一九六二年九—十月，考古所資料室藏作者手稿(《考古學報》一九八四年二期)。

這是我所已故陳夢家先生的一篇未完成的遺作。內容分「叙記」和「考釋」兩部分。「叙記」包括：

一、帛書的出土及其圖文的結構；

二、紀元前四百年間的「月令」；

三、帛書與「月令」內容的比較；

四、帛書的年代、國別與性質；

五、帛書的月名與三正。

「考釋」未完成，其中釋文是以巴納臨寫本爲底本，參以蔡氏、饒氏釋文，考證缺甲篇（十三行）、乙篇（八行）和丙篇（邊文）也僅僅完成很少的幾則。這篇文章雖未寫完，特別是考釋部分所據帛書複製本現在已相當落後，但「叙記」部分却基本完整，内容也非常重要。作者在「叙記」中確定帛書主要是與記古代「月令」的文獻如《管子・幼官》、《周書・月令》（佚文）、《王居明堂禮》（佚文）、《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禮記・月令》、《洪範五行傳下》（佚文）等書性質相近，認爲楚帛書應屬戰國中期的楚月令。是專門考證帛書性質，至今内容最爲全面的一部作品。

(6) 鄭德坤（Cheng Te-Kun）《中國考古》卷三：《周代》（Archaeology in China, Vol. 3: Chou China, W. Heffer & Sons Ltd, Cambridge, 1963）。

作者是香港學者。所著《中國考古》共三卷，第三卷是《周代》，其中的第十五章《文字材料》對楚帛書做有簡短介紹，並附有李棪（即李棪齋，也是香港學者）據弗利爾美術館照片所做臨寫本（Fig. 40）。在當時的帛書論著中，作者對李學勤發表於一九六〇年的文章最爲推重，故所做帛書内容介紹多採李文之説，順序亦全依李文。李棪臨寫本，書中題爲「寫在帛上的楚曆書」（Ch'u almanac on silk），可以代表作者對帛書性質的基本看法。

(7) 安志敏、陳公柔《長沙戰國繒書及其有關問題》，《文物》一九六三年九期，四八—六〇頁。

這是繼蔡、饒、李等人之後的又一篇長篇帛書考釋。作者對前此各家所做臨寫本和摹本詳加比較，選定巴納臨寫本爲底本，參以蔡氏臨寫本〔八〕，重爲複製寫定釋文（圖一—四）。其形式是仿效巴納臨寫本所創用的網格式行款處理法，行款同巴納本基本相同。此文對李學勤提出的「《爾雅》月名」説表示異議，認爲帛書十二神像，其形象可與《山海經》等書相互印證，並可能與漢代大儺的十二獸有關。作者認爲，帛書隨葬，「當是爲了呵護死者靈魂，借以辟除不祥」，墓葬年代，據

長沙楚墓的發掘經驗，應屬戰國中期。

(8) 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文物》一九六四年九期，八—二〇頁。

此文對帛書出土和流外的情況作有詳細介紹，是研究帛書出土和流外的重要材料。文章附有一套四幅叠印的帛書照片（圖版壹—肆）以及作者據此所做的摹本和釋文（附於文後）。作者公布的帛書照片據文章説是從一九四七年（？）就已得到，因爲長時間進行摹寫故一直未能發表。這套照片據巴納判斷，肯定就是弗利爾美術館的全色照片。它是當時發表的第一個帛書照片。作者的摹本（本書圖版叁），是用分色繪圖按原狀摹出，上面並覆以表示帛書拼對痕迹的透明紙輪廓圖，處理非常細緻。釋文，是採用巴納創用的網格式處理法，但行款有若干錯誤。

(9) 林巳奈夫《長沙出土戰國帛書考》，《東方學報》三十六卷，五三—九七頁，一九六四年。

作者是日本學者。這也是一篇帛書文字的長篇考釋，所附摹本（裝在封底紙袋内）也是按弗利爾美術館照片原式摹出。其特別之處是，摹本左上角「玄司秋」處用覆蓋的透明紙摹有另一帛書印在這一帛書上的朱書殘劃（即梅原氏所説）約三行，每行約六七字，字迹已大多不易辨認（僅「司君」等字可辨）。作者於帛書邊文的考證，贊同李學勤之「《爾雅》月名」説，但不同意帛書月名是按夏正排列，理由是：一、帛書所記各月宜忌與《月令》相比較，按之夏正皆不合，按之周正則大致相符（他特別舉帛書邊文「姑分長」章爲例）；二、帛書「秉司春」、「虞司夏」、「玄司秋」、「荼司冬」，按之夏正皆在各季節最末一月，不如按周正配在各季節最初一月更爲合適；三、帛書四木，按之夏正皆與四季分離，在各季之首，不如按周正配在各季節當中更爲合適。因此，他以爲帛書實際上是用周正。另外，作者還討論到帛書隨葬的意義，認爲帛書隨葬是作爲死者寶重之物而不是用來鎮壓邪魅。

(10) 饒宗頤《楚繒書十二月名覈論》，《大陸雜誌》三十卷一期（一）一—（五）五頁，一九六五年一月。

此文主要是據原物寫成，這裏不再單獨列爲一類，入於此類。作者赴美，於當時帛書主人戴潤齋(J. T. Tai)處獲見帛書原物，「反復勘讀，凡三小時」，發現「繒書面上有若干文字殘迹，在『玄司宿』(零按：『宿』應爲『秋』)句之側，似是從其他帶有文字之絲織物黏上。經攝影後，附著之殘文，如『君』字猶約略可覩(在哈佛時，楊蓮生教授曾出示照片共同辨認)」。「其四隅繪有樹木，原有顏色，已難審視。帛之中間，並無黃木痕迹」。並糾正了他原先由於使用黑白照片將章句號誤爲缺文號的錯誤。全文專爲討論帛書邊文十二月名而作。作者稱「惟繒書所記十二月名，與《爾雅·釋天》可互相考證，近已有人發其端(零按：指李學勤文)，其說不久又被否(零按：指安志敏、陳公柔文)」。「余曾取《爾雅》、《左傳》、《國語》、《史記》等書與繒書圖文細勘，益信其爲十二月名，確不可易」。

(11) 陳邦懷《戰國楚帛書文字考證》，油印本，一九六五年四月(一九八〇年二月刪改，發表於《古文字研究》第五輯)。

這是作者摘釋帛書文字的一篇舊稿，寫作時曾與商承祚進行討論，其釋「禹」字見於商文引用。考證凡三十四則，所據即商文所附摹本(刪改本參考了下述巴納摹本，凡二十八則)。

最後，於此類之末應附帶說明一下，上述帛書論著雖然祇有商承祚文發表了弗利爾美術館的照片，但在商文之後，還有過另一幅同類照片發表，並且製版效果要比前者更好。這就是一九六五年版《書道全集》(平凡社)所附的帛書照片。照片裝在一紙袋內，上面印有當時的帛書主人戴潤齋之名。

3. 以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紅外綫照片爲基礎的論著。

帛書於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曾爲戴潤齋氏所有，但一九六六年又易爲亞瑟·M·賽克勒(Arthur M. Sackler)之物。一九六六年一月，存放帛書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延請巴納爲指導，委託阿克托科學實驗公司(Acto Scientific Photographic Laboratory, Inc.)開始試驗用航空攝影的紅

外綫膠片攝製帛書照片。歷時數月，終於找到合適的攝製方法，以特殊選擇的相機、濾色鏡頭、燈光和洗印設備，拍成黑白和彩色兩種照片，字迹圖畫異常清晰，效果遠遠超過弗利爾美術館所攝之照片。採用這一照片的著作近來已經有不少：

(1) 林巳奈夫《長沙出土戰國帛書考補正》，《東方學報》三十七册，五〇九—五一四頁，一九六六年三月。

這是採用紅外綫照片的第一部著作。作者於《長沙出土戰國帛書考》發表後，見到商承祚文及饒宗頤的《覈論》，感到與舊作互有可以訂正之處，並且新近獲得大都會博物館試拍的紅外綫照片，發現有不少地方可以訂正舊摹舊釋之誤，因做補正凡二百一十七條，每條重摹原文單字，下附新做釋文，並附若干簡注，交待其釋字根據。但原書未發表帛書照片。

林巳奈夫的文章發表後，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五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史及考古系，由賽克勒促進中亞研究基金贊助，舉辦題名爲「古代中國藝術及其在太平洋地區之影響」的學術座談會。當時曾印發一種單頁帛書複製本：《楚帛書——賽克勒藏品》（Ch'u Silk Manuscript, From the Sackler Collections）。這種複製本作雙面印刷，正面是一幅彩色照片，底子呈深褐色，字迹目驗比較困難；反面是一幅紅外綫黑白照片和一個網格式臨寫本，並附有簡短介紹。這個臨寫本即出於巴納之手。後來巴納把它稱爲「臨時的」複製本。另外會議前，帛書主人賽克勒還將一套更爲清晰的紅外綫照片，包括全圖一幅，叠印的局部圖六幅，分送若干學者。會後，巴納主編出版了會議論文集《古代中國藝術及其在太平洋地區之影響》（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Intercultural Arts Press, New York, 1972，又臺灣泛美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七四年版）。卷首印有縮版的楚帛書紅外綫照片。其中專門討論楚帛書的論文一共有四篇，即：

(2) 諾埃爾·巴納《楚帛書及其他中國古代出土文書》（The Ch'u Silk Manuscript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of Ancient China)，該書七七—一〇一頁。

此文是作者正在寫作中的《楚帛書》一書的一部分，在會上先予發表。其内容係討論帛書的出土經過、隨葬意義及其字體特征，大部分同於其後來發表的《楚帛書》一書的第一章。文章附有作者據帛書紅外綫照片首次做成的臨寫本(Fig 4A、4B)，即上述單頁帛書複製本附印的網格式臨寫本，但上述臨寫本衹有文字没有圖像，此文則另外印有帛書圖像。其精審遠勝於前。

(3) 吉恩・E・梅雷(Jean E. Mailey)《從先秦兩漢絲織工藝推測楚帛書之質地》(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Ground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in Relation to Silk-Weaving in Pre-Han and Han China)，該書一〇三—一一一頁。

作者是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紡織研究室副主任。這篇論文主要是從紡織工藝的角度討論楚帛書。作者對帛書的尺寸、編織和折斷情況做了介紹，並考證楚帛書的寬度與古代文獻中的「匹」大略相符，認爲此帛書當是從一「匹」整帛上裁下的一段。

(4) 饒宗頤《從楚繒書所見楚人對於曆法、占星及宗教觀念》(Some Aspects of the Calendar, Astrology, and Religious Concepts of the Ch'u People as Revealed in The Ch'u Silk Manuscript)，該書一一四—一二二頁。

此文是一篇札記性質的短文，集録了作者研究楚帛書的若干心得。全文包括三個小題。一、曆法上的名詞術語。包括：「十日」；「四時」與「三時」；十二月；閏月；「乙則至」。二、緀(盈)絀(縮)的含義與彗孛的占驗。三、神民之關係。這三個小題中，有些内容是作者在其舊作中反復談到的，如第三個題目；也有些是作者提出的新見解，如作者以帛書「緀絀」爲《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之「贏縮」，以「天棓」爲同書之「天棓」等等。

(5) 林巳奈夫《長沙出土戰國帛書十二神考》(The Twelve Gods of the Chan-Kuo Period Silk Manuscript Excavated at Ch'ang-Sha)，該書一二三—一八六頁。

此文是作者最初研究帛書時就打算寫作的。提交會議討論時原先篇幅很長，收入該書時經巴納刪節，從日文譯成英文。它是作者以前發表的《長沙出土戰國帛書考》和《長沙出土戰國帛書考補正》的姊妹篇。在前兩篇文章中，作者着重對帛書的文字內容進行了探討，此文則着重考證帛書十二神像。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以往各家就帛書邊文圖像所作的考證提出異議，認爲這些考證很多都失之比附。按照他的設想，帛書十二月名最初並不是作爲十二月名而存在，而是起源於楚國的巫名，即《山海經》所提到的戊咸等等，每一巫名代表一職司某月的巫師集團。這些巫師及其巫術活動可以追溯到商代。爲此，作者還將帛書十二神像與商代以來的出土物和文字材料做了一系列比較，對帛書十二月神地方特色的淵源也進行了探討。

這次會議後，關於楚帛書還有若干文章和著作發表，它們是：

(6) 嚴一萍《楚繒書新考》(上、中、下)，《中國文字》二十六——二十八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月，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作者是臺灣學者。所撰此文是相當長的一篇帛書考釋，係一九六八年年初與李棪齋、金祥恆討論楚帛書後寫成。當時他參考的有關論文僅有陳槃一九五三年文、饒宗頤一九五四年文、商承祚一九六四年文幾種，但所據帛書複製本係上述大都會博物館一九六七年印發之單頁複製本，精確程度高，故所做考釋質量也較高。特別是作者首先指出帛書中間八行的一段開頭所見的兩個傳說人物就是伏羲和女媧，這是很重要的發現。

(7) 金祥恆《楚繒書「䨓虘」解》，《中國文字》二十八册，一九六八年六月。

作者是臺灣學者。此文專門考證帛書開頭的「䨓虘」二字，認爲其上字應爲一從雷勹聲之字，䨓即《說文》古文「雹(靁)」之省，勹即《說文》勹旁，讀與「包」同，應釋爲「雹」字，讀爲「包」；虘則讀爲「戲」，包戲也就是伏羲。

(8) 饒宗頤《楚繒書之摹本及圖像(三首神、肥遺與印度古神話之比較)》，《故宮季刊》三卷二

期，一—二六頁，一九六八年十月。

此文印有楚帛書的紅外綫照片和作者根據這一照片所做的摹本和釋文。其摹本完全是按原式摹出，最爲存真，是目前所見最好的帛書摹本（本書圖版肆）。文章前半部分是關於帛書照片和摹本的説明，作者除獲得賽克勒所贈之帛書原大照片外，還收到過從美國方面寄來的放大十二倍的帛書照片一百一十張，有些地方可用以校正巴納一九六七年發表的臨寫本，因作校勘若干則。文章的後半部分是關於帛書十二神像中「余取女」和「欱出睹」兩神像的考證，作者認爲前者就是「三首神」祝融，後者則是所謂「肥遺」，即一種一頭兩身的蛇。它們都與古印度神話可作對比。

(9) 饒宗頤《楚繒書疏證》，附陳槃《楚繒書疏證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十册上，一—三五頁，一九六八年十月。

這是作者關於帛書文字最詳盡的一篇考證，陳氏跋語評爲「勝義絡繹，深造有得，精思卓識，斯可謂難能矣」。在已經發表的帛書釋文考證中此文比較晚出，並且所據複製本相當精確，故能夠糾正過去的不少誤釋，並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質量較高。但作者所做釋文於帛書斷裂處仍堅持反對巴納的網格處理法，在斷讀上有不少地方讓人感到生硬。

(10) 唐健垣《楚繒書文字拾遺》，《中國文字》三十册，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作者當時是從香港到臺灣上大學的學生。所撰此文主要是對嚴一萍文所作考釋中個別未能釋定之字所做的再討論。初稿凡十六則，繼又做補正十六則。

(11) 諾埃爾·巴納《楚帛書韻律考》(Rhyme and Metre in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Text,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4,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Histor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71)。

此文未見。作者後來的《楚帛書》一書第四章即以此爲基礎。

(12) 諾埃爾·巴納《對一部中國古文書——楚帛書進行釋讀、翻譯和歷史考證之前的科學鑒定》

(Scientific Examination of an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 as a Prelude to Deciphermen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cal Assessment —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Revised and Enlarged, Studies on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Part 1, Monograph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4)。出版同上，一九七二年。

此書原爲作者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澳大利亞、新西蘭科學促進協會第四十三屆會議上宣讀的論文。該文曾在一九七一年出版，這是該文的增訂版。在這一著作中，作者從技術鑒定的角度對帛書的行款復原、字數統計、折疊放置、顏色以及紅外綫照相和紡織工藝等方面進行了探討。卷首印有帛書的紅外綫照片，書中印有許多插圖表格，其中包括修訂後的帛書臨寫本（對一九六七年的臨寫本做有若干修正，本書圖版伍）、字數統計表、行款復原圖、折疊放置情況復原圖、破損形狀圖、顏色鑒定表以及屬於絲織工藝鑒定的圖表和數據等等。書後並印有若干圖版以及一個記録攝影數據的附録。

(13) 諾埃爾・巴納《楚帛書——翻譯和箋注》(The Ch'u Silk Manuscript —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Studies on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Part 2, Monograph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5)。出版同上，一九七三年。

這是作者現已發表的楚帛書研究著作中觀點、材料最爲集中的一部書。全書共四個章節，其中有兩章是舊作改寫，第一章「楚帛書的發現」見於一九六七年論文，第四章「楚帛書韻律考」是據一九七一年論文改作；有兩章是新發表，即第二章「楚帛書的字體和書法」，第三章「翻譯和箋注」，後者占去全書主要篇幅。書後有兩個附録：一、帛書原文的各種主要複製本及其字體比較表；二、字體對勘表（其臨寫本字體與照片字體的對勘表）和帛書紅外綫照片（六幅疊印）。另外，卷尾還有一個書目。書的封底有一紙袋，內裝蔡修渙原色臨寫本，作者自己的臨寫本並釋文各一幅。書中附有大量插圖和表格。作者對於以往的帛書研究做了一些綜合概括的工作，資料詳備，頗便參考。

另外，據作者稱，他還準備出版一部《楚帛書及其補卷》（The Ch'u Silk Manuscript and Supplementary Volume），這部書是應現在的帛書主人賽克勒之請而作，其主體部分已於一九七○年十月交付出版，整部書是否已經出版不大清楚。

上述論著凡三十二種，一般都附有帛書的照片、摹寫本或釋文等。但是除去這些論著，還有一些並非專門討論帛書，但對帛書研究有所涉及並且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論文，也附記於此：

(1)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展》，《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一期，一—一三頁。對帛書的文字、內容和性質做有簡短介紹，提出帛書與《管子・玄宮》等古文獻性質相近。

(2) 曾憲通《楚月名初探》，《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年一期，九七—一○七頁。論及帛書月名及楚用夏正問題，附有帛書邊文釋文。

(3) 俞偉超《關於楚文化的新探索》，《江漢考古》一九八○年一期，一七—三○頁。論及楚帛書爲一部《明堂圖》性質的楚國書籍。

在以上的論著中，帛書的照片和行款復原以巴納的《楚帛書》爲最佳，摹寫以饒宗頤一九六八年發表之摹寫本爲最佳，考釋則推嚴一萍《新考》與饒宗頤《疏證》。李學勤「《爾雅》十二月名」說在帛書邊文研究中可稱定論，陳夢家引據文獻考證帛書性質，內容最爲全面。這些都是研究帛書必須最先參考的文獻。

二、楚帛書的結構、內容與性質

楚帛書是寫在一幅寬度略大於高度的方形絲織物上，整個幅面由三部分文字組成，即當中是書寫方向互相顛倒的兩大段文字，一段十三行，一段八行；四周是作旋轉狀排列的十二段邊文，其中每三段居於一方，四方交角用青、赤、白、黑四木相隔，每段各附有一神怪圖形。另外，帛書抄寫者還用一種朱色填實的方框作爲劃分章次的標記，將當中兩大段各分爲三章，邊文十二段分爲

十二章。由於整個帛書的三部分文字是按旋轉方式排列，因此閱讀帛書必先決定帛書的起訖。

以往各家採用的讀圖順序有以下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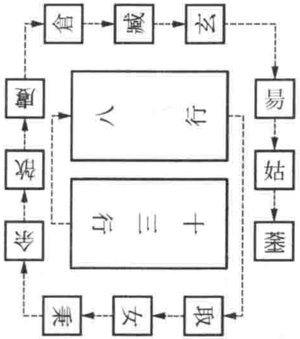
(1) 帛書放置的方向。前期和後期有兩種擺法，前期的擺法可以蔡季襄、蔣玄佁和饒宗頤的早期著作(一九五四和一九五八年)爲代表，是以上夏、下冬、左春、右秋的方向爲正。後期的擺法始於董作賓，他以中國古代的四方之序「是本於四時之原則」爲說，首先提出帛書應以上冬、下夏、左秋、右春的方向爲正。後來，李學勤又根據古代所說的斗建方位也提出同樣看法，遂使這一擺法成爲定論。自此以後，前期擺法基本上被否定，董、李二位的擺法被普遍採用。

(2) 帛書中間兩段文字的先後。一直是有兩種讀法，一種是以八行的一段爲先，這也是從蔡季襄開始的。直到現在，饒宗頤、巴納和林巳奈夫等人還都是採用這一讀法。另一種是以十三行的一段爲先，這也是從董作賓開始的。此後，李學勤、陳夢家、安志敏、陳公柔、商承祚和嚴一萍等都是採用這種讀法。

(3) 帛書邊文十二段的順序。現在一般都是從「取于下」章開始，這種讀法本來是從蔡季襄就開始了的，但蔡氏未做任何解釋。後來李學勤提出「《爾雅》十二月名」說，才證明帛書「取于下」章是相當於《爾雅》十二月名中的正月，以下各章就是正月以後的各月。這不僅確定了帛書邊文的閱讀順序，而且對帛書放置方向的判明也起了決定作用，證明帛書是以「取于下」等三章的書寫方向爲正。這種讀法現已爲一般學者所採用，但也有個別例外。例如巴納至今就仍然是以「姑分長」章爲始，他自稱是以饒宗頤早期著作的讀法爲據，其所謂「早期著作」即饒氏一九五四年的帛書釋文。但饒氏當時這樣讀，衹是因爲此章較爲完整，餘則「殘缺多不可解」，沒有什麼深義。真正提出以「姑分長」章爲始的實際上是林巳奈夫。他是以建子的周正來讀帛書，反對李學勤所說帛書是用建寅的夏正。這一理由本來是他在一九六四年的論文中就提出過的，但當時他寫定的釋文還是從「取于下」章開始，衹是到一九六七年，他再次專文考證帛書的邊文圖像，才正式採用以「姑分長」章開

始的順序。

關於帛書結構，我贊同董、李二人的讀法，即其放置方向應以上冬、下夏、左秋、右春爲正；中間兩段應以十三行者爲先，八行者爲後；而邊文十二段則是以代表春正月的「取于下」章爲始。這裏，帛書邊文應當從「取于下」章開始，而不是從「姑分長」章開始，牽涉到楚曆法用正的問題。但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解決，新出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證實了楚人確實是用夏正（參看曾憲通文）。因此，帛書邊文從「取于下」章開始讀也是没有問題的。這種讀圖順序可用圖示的方法表示如下：



上圖是按自内向外旋轉畫的。按這種順序，我們可以把當中十三行的一段定爲甲篇，把相反的一段定爲乙篇，而把邊文定爲丙篇。但這也不排斥帛書有可能是從邊文讀起，即自外向内旋轉。而照這種順序，我們也可以把邊文定爲甲篇，把十三行的一段定爲乙篇，而把八行的一段定爲丙篇（參看李學勤一九六〇年文）。這裏我們暫時採用第一種篇次。

下面我們就按這一篇次對帛書各篇的内容作一簡單介紹：

（一）甲篇

帛書甲篇文字最多，作者在此篇中特别强調的是「敬天順時」，他告誡人們：如果人們對上天的神帝祭祀不敬，違誤天時，如置閏失當、悖歲等等，上天便會降以凶咎，致使四季失序、星辰亂行、草木無常，在地上呈現種種災異之象，如下暴雨，山崩泉涌，雨土，兵禍等等。而這也就是作者在丙篇中爲人們設置種種禁忌規定的理論根據。作者用了一個術語來概括其思想，稱上天對人事的種種報應爲「德慝」。德者，就是上天所施之德；慝者，就是上天所降之罰。在帛書中，上天的神帝被描繪成具有施德降罰本領的主宰，所謂「惟天作福，神則格之；惟天

作妖，神則惠之」。這種思想顯然也就是戰國以來的「五行刑德」思想之所本。

(二) 乙篇

乙篇主要是講神話。但這個神話並不是孤立的，而是與甲篇互爲表裏，作爲甲篇所述神秘思想的背景來講的。它主要提到以下一些傳説人物：

1. 伏羲和女媧。他們在帛書中被描繪成一對起於漁獵時代的男女祖先，當他們所在之時，一切尚處於昏蒙未化的狀態。

2. 伏羲和女媧所生四子。在帛書中，這四子是主要角色。他們是四位從遠古一直到夏、商，世代相襲、掌守天地之職的神官，被稱爲「四神」。夏、商時，四神失其職守，致使天地隔絶，山陵不通，不得不由山川四海之神出來疏導山川。未有日月之時，他們曾分守四方、「步以爲歲」，授民以時。後來，過了很久，有了日月，但九州不平，他們又出來立極安天。從各方面看，他們顯然應當就是古書中的重、黎或羲、和四子。重、黎或羲、和四子是巫史之祖，古人説「數術家」是出於「羲、和史卜之職」(《漢書·藝文志·數術略》)，他們在帛書中有這樣重要的地位，與帛書出於數術家之手是分不開的。

3. 炎帝。

帛書提到「炎帝乃命祝融」，「非九天則大岟」，則不得上通於天。

4. 祝融。

炎帝在戰國時代的四方帝系統中是代表南方的帝，祝融在這個體系中被安排爲炎帝的帝佐，與帛書所見二者的身份關係相符。有些古書説重、黎二氏中的黎一度當過「祝融」，「祝融」據説也是一種世襲的神官，也就是火正。帛書記祝融受炎帝之命使下界不得上通於天，而古書却説是重、黎「絶地天通」，可見二者有密切關係。

5. 帝夋。

帛書説「帝夋乃爲日月之行」，是安排日月運行規律的傳説人物。

6. 共工。

帛書提到「共攻▢▢十日四時」，使一天之内「有宵有朝，有晝有夕」。

另外，帛書還提到夏禹和商契，但這兩個人物在帛書中祇是在講四神用事於夏、商時順便提到，是帛書所述神話系統之外的人物。

以上六項所包括的傳説人物在帛書中構成了一個關於日月四時形成的神話。帛書所提到的這些傳説人物經與古代文獻對證，可以清楚看出，它們是屬於南方、特别是楚民族系統的神話傳説，特别是其中的祝融，按古書記載是包括楚人在内的八個氏族（「祝融八姓」）的共同部落首領。這些我們在第三節還要作具體説明。帛書直接以重、黎或羲、和四子與伏羲、女媧相承續，這是可以補充現存神話傳説研究空白的重要材料。

（三）丙篇

丙篇分十二章，每章代表一個月份，略述該月宜忌，如某月可不可以嫁娶，某月可不可以行師用兵，某月可不可以營築屋室等等。章有章題，即該月月名，其中春正、二、三月居於右方，領於右上角的青木之下；夏四、五、六月居於下方，領於右下角的赤木之下；秋七、八、九月居於左方，領於左下角的白木之下；冬十、十一、十二月居於上方，領於左上角的黑木之下。各月均附有一神怪圖形。

帛書章題首字即《爾雅》十二月名，自李學勤首予揭明，除個别人外，已獲得一般公認，但關於月名的解釋，説者却甚少。陳夢家曾推測帛書月名「似本於天象」；林巳奈夫則推測帛書月名初非月名，乃是源於《山海經》所記之若干巫名。後説很難令人首肯。

帛書圖形，自蔡季襄始，説者多以爲即《山海經》等古書所記之某些古代神物，進行個別比證，零散不成系統。也有人推測它們或與漢代以來六壬所用之十二神或大儺中的十二神、十二獸以及十二生肖有關（參看安志敏、陳公柔文，饒宗頤《楚繒書之摹本及圖像》，曾憲通文）。另外古代還有與二十八宿相配的四獸以及與十二辰相配的三十六獸。但所有這些，名稱、形象均不能與帛書吻合。

我的看法是，帛書月名與所附神物圖像是不能分開考慮的。這十二神像，其形象雖與《山海經》等古書的某些描寫（這些形象大抵是用各種人或鳥獸蟲魚的身體組成部分進行拼合）容或相同或相似，但它們却絶對不是什麽個別神物，而是有一個系統，這個系統就是十二月本身。十二神就是十二月神，它們的名稱應當以各章章題來定，而無須遠涉他求。衹有確定這一點，我們才能進一步探討帛書章題的含義，以及它們與十二月神圖像的關係。但不幸的是，關於這一方面，目前我們還不能做任何肯定結論。

此篇雖然衹有短短的十二章，但却是帛書的用途所在。藉此，我們可以知道帛書是一部與古代流行的曆忌之書有關的著作。

帛書是一部與曆忌之書有關的著作，這一點是需要做一些討論的。

首先，我們應當確定一點，即帛書所代表的基本思想應當屬於漢初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説的「陰陽家」。關於「陰陽家」，他是這樣説的：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零按：即四季、八卦、十二月、二十四節氣）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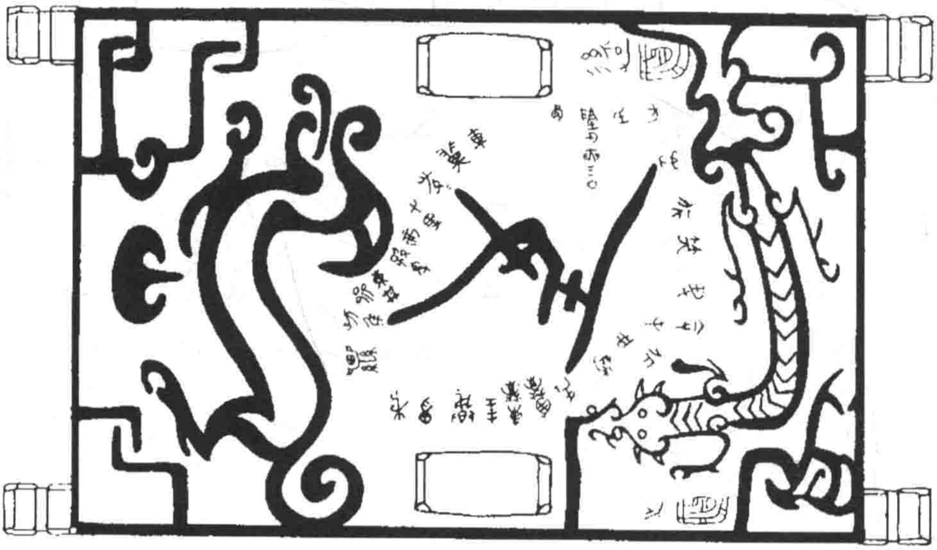
先秦兩漢的陰陽家説，可以分別爲兩種：一種是專營占星、堪輿、卜筮等迷信活動的術士歷代傳習的「數術」之學，司馬談所説的「陰陽家」主要就是指這一種，《漢書・藝文志》把它列爲《數

術略》。另一種是以齊魯稷下學子鄒衍、鄒奭等人代表的「五德終始」説，它實際上是按往舊造説，仍然是脱胎於數術之學，祇不過是把原始存在的數術之學哲學化了，提高爲類似儒、道等家的體系，《漢書・藝文志》把它列爲《諸子略》「陰陽家類」。我們討論的帛書應該屬於前者。

《漢書・藝文志》分《數術略》爲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類。其中天文曆數之學是最主要的，司馬談所説「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主要就是指天文曆數之學。帛書也是屬於這一類。

先秦兩漢屬於這種所謂「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的東西，現在還能見到，但並不很多，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地下出土的星圖、占盤和日晷等實用工具，一種是留傳至今的古代文獻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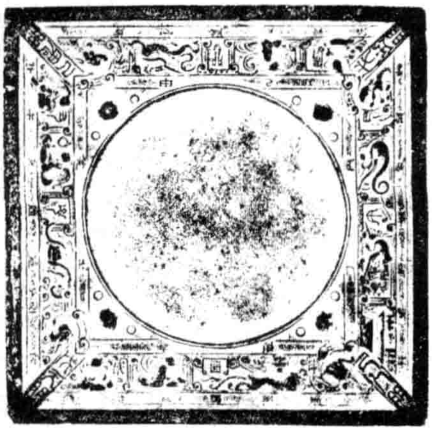
關於出土實物。星圖，我們可舉隨縣擂鼓墩曾侯墓出土漆箱蓋所繪青龍白虎二十八宿圖爲例〔九〕。這個圖中心是北斗，圍繞北斗是作右旋排列的二十八宿，並有表示東西方向的青龍、白虎二獸（圖十一）。占盤（式），現在所見都是漢代以來的，有銅、象牙、漆木等多種，其形式也都是中心爲北斗，但四周除二十八宿外，還配有八干、十二辰、四門等等，十二辰作左旋，二十八宿作右旋（圖十二）〔一〇〕。日晷，這裏主要是指平面日晷，現在所見最早也都是漢代的，一般都是石質，形式與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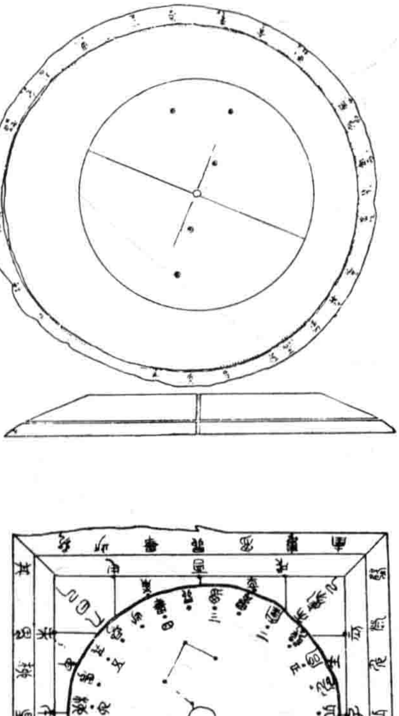
圖十一　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蓋摹本

盤相仿，但增加了刻度，中心立有銅表（圖十三）〔一一〕。另外，王振鐸嘗試根據出土占盤和文獻記載復原過古代的司南即羅盤儀，它是利用占盤、中心放上磁石做成的斗杓以代替占盤本來繪有的北斗做成（圖十四）〔一二〕。這些工具用途不同，星圖是用來記星；但記星要有坐標方位，占盤就是測定這種坐標方位的一種工具，因此其形式是仿自中心爲北斗、四周爲列星的「蓋圖」式天文投影圖；占盤分天盤和地盤，天盤叫作堪，地盤叫作輿，加上定向的磁針，可用於地形勘測，是堪輿家（也叫「形法家」）的工具；日晷則是用來測時的工具。這些工具因用途不同，有種種變通，但形式相仿，正是按照「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這一類系統做成。這類巧具心思的圖式在古代看來很時髦，除上述工具外，現在發現的古代六博棋局和習慣上稱作四獸十二辰的規矩鏡也都是採用這一圖式（圖十五、十六）〔一三〕。這對瞭解帛書的構圖形式很有啟發。藉此我們可以明白，帛書將十二月按上冬、下夏、左秋、右春分列四方，作右旋排列，推其源正是仿自所謂「蓋圖」式的天文投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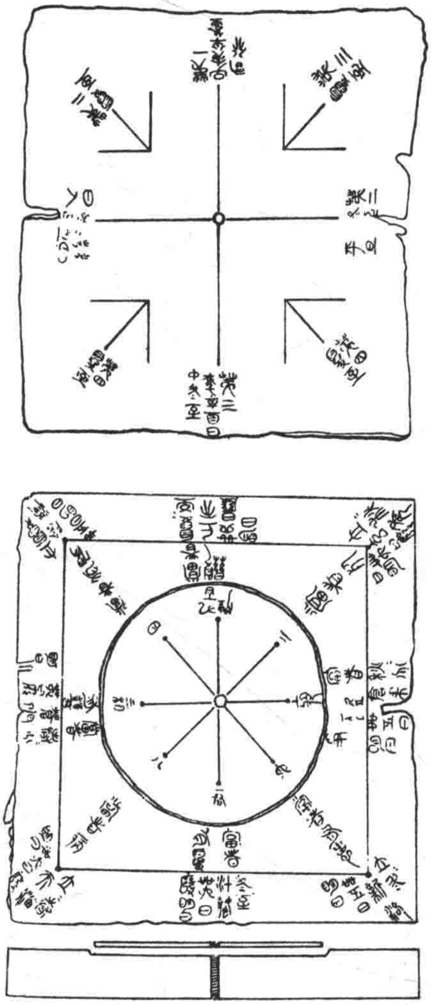
現在再來談談這一方面的古代文獻。現在除去一些零碎片斷外，比較完整的主要還有以下幾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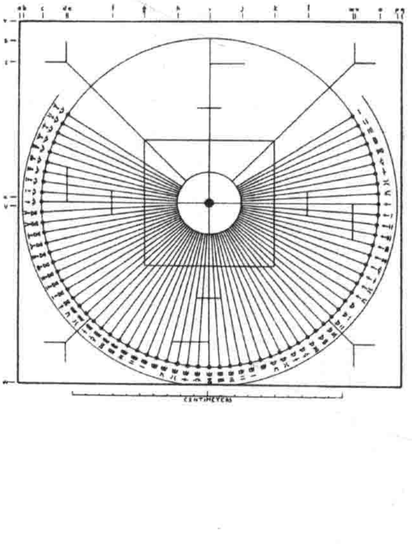
圖十二　漢代的栻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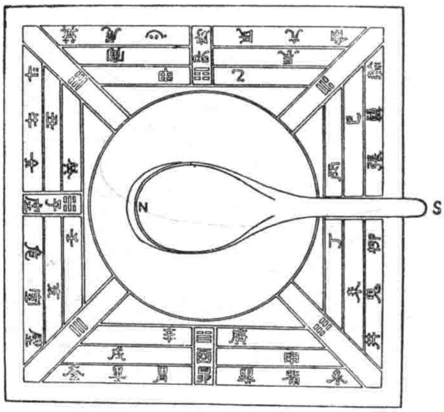
圖十二　漢代的栻盤（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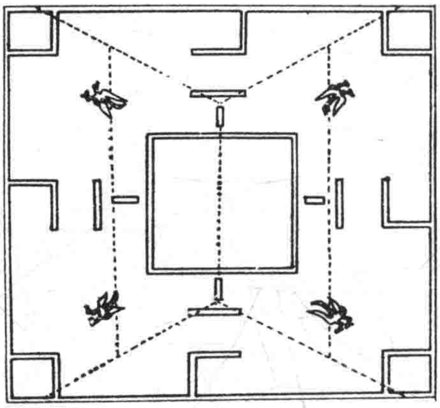
圖十二　漢代的栻盤（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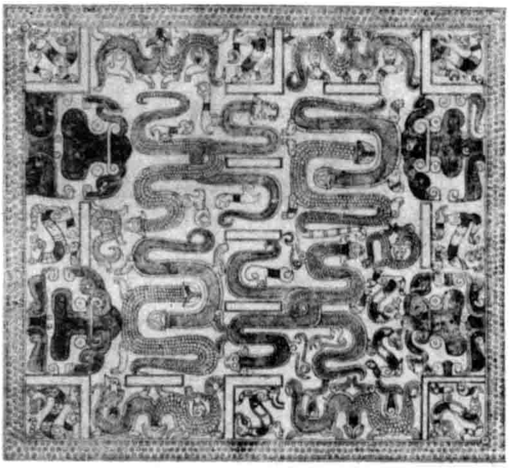
圖十三　漢代的日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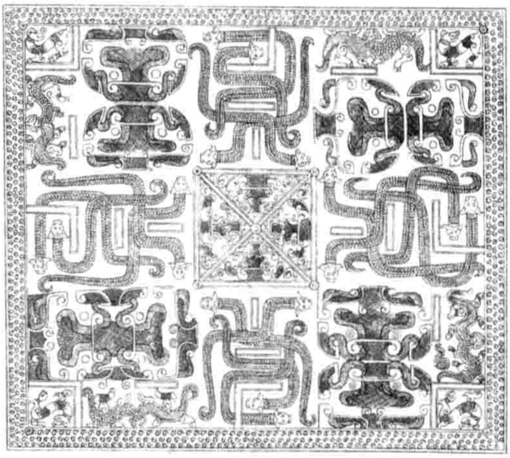


圖十四　王振鐸復原的古代司南



圖十五　六博棋局（一）





圖十五　六博棋局(二)

圖十六　漢四獸十二辰鏡

(1)《管子・玄宮》、《玄宮圖》(並可參看同書《四時》、《五行》、《版法解》等篇);

(2)《吕氏春秋》十二紀每紀之首章,《禮記・月令》、《逸周書・月令》、《淮南子・時則》;

(3)《大戴禮・夏小正》。

關於這些材料,這裏可以做一個簡單介紹:

其中(1)是講一種叫作玄宮的四方宮室,宮室由東方的青陽、南方的明堂、西方的總章、北方的玄宮這四宮連同中央的太室合在一起而組成[一四]。但是現在《玄宮》和《玄宮圖》,圖已經失傳,需要恢復。現存文字內容實際上是一套月令。這套月令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所謂「本圖」,「本圖」又分中、東、南、西、北五圖,其中的四方代表春、夏、秋、冬四時,四時不分月,但有節氣,如大暑、中暑、小暑,始寒、中寒、大寒等,每時有六至八個節氣,每個節氣皆記有該節氣所宜行之事,此外

並有按五行説爲四方中央所配的色、味、聲、氣、數、飲、火等項目。另一部分是所謂「副圖」，所記爲按五行説爲四方中央所配的旗物、兵器以及若干用兵原則。

其中(2)是通常所説的月令之書，這裏收録的各篇年代有早晚，但内容基本相同，可見是轉相抄用，來源是相同的。它們皆分春、夏、秋、冬四時，每時又分孟、仲、季三月，共十二月，每月除記該月物候外，還按五行説均匀地將中星（昏旦中星）、日干、帝、神、蟲、音、律、數、味、臭、祭、祀、居、乘、旗、衣、服、食、器等項目與四時十二月（及中央）相配。這幾部書現在所見雖然都是專講月令，但本來當是屬於「明堂陰陽」。《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禮類」載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班固注：「古明堂之遺事」），又《明堂陰陽説》五篇。鄭玄《三禮目録》（《禮記·月令》孔穎達疏引）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别録》屬《明堂陰陽記》」，可以證明這些月令之書本來是與明堂相配，與《玄宫》和《玄宫圖》類似。

其中(3)是《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即今《禮記》所收《月令》相當的一篇。此篇《史記·夏本紀》曾提到，可見漢武帝時已經流行。原書有經文有訓解，可惜現在經文已殘，所存者都是記物候，推測原來與上面各篇内容也是類似的。

我們引證上述各書是想説明帛書在大的範圍上與上述幾部書是相同的。這對判明帛書性質很重要。

在我以前，已經有人注意到帛書與這幾篇材料的比較。

首先是陳夢家。陳氏在上述各篇之間以及它們與帛書之間做了相當細緻的對比。根據對比，他認爲上述各篇都是月令，其中《玄宫》和《玄宫圖》是齊國的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紀各紀之首章是秦國的月令，其他各篇則是漢代的月令，而帛書則是戰國中期的楚月令。嚴一萍氏也有相似看法（見唐健垣文）。

另外是郭沫若。郭氏認爲帛書「有如今存《管子》書中的《玄宫圖》或者《五行篇》」。還有最

近俞偉超更明確提出說，帛書「是一部相當於《明堂圖》性質的楚國書籍」。

這些看法對楚帛書性質的探討無疑都很有啓發性，但是我以爲帛書與上述各篇之間以及上述各篇本身相互之間仍有一些區別應該指出來。而要弄清這些區別，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拿重新復原了的《管子・玄宮圖》與上述其他各篇以及帛書做一比較。

《管子・玄宮圖》的復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按《管子》舊有《幼官》和《幼官圖》兩篇，現在我們知道，其題篇「幼官」實際上是「玄宮」二字之訛。《玄宮》和《玄宮圖》兩篇題名相同(祇是後者多一「圖」字)，文字內容也大致相同。過去有人曾提出懷疑說，《玄宮圖》題名爲「圖」却沒有圖，文字也與《玄宮》無別，恐怕是圖佚失之後，後人重抄《玄宮》來頂數。有人甚至把《玄宮圖》的順序按照《玄宮》改過來。這都是不對的。

其實《玄宮》和《玄宮圖》雖然內容大致相同，但有一點差別是不能忽略的，這就是兩篇所記各圖的順序不同。下面是比較：

《玄宮圖》	《玄宮》
西方本圖	中方本圖
西方副圖	東方本圖
南方本圖	南方本圖
中方本圖	西方本圖
北方本圖	北方本圖
南方副圖	中方副圖
中方副圖	東方副圖
北方副圖	南方副圖
東方本圖	西方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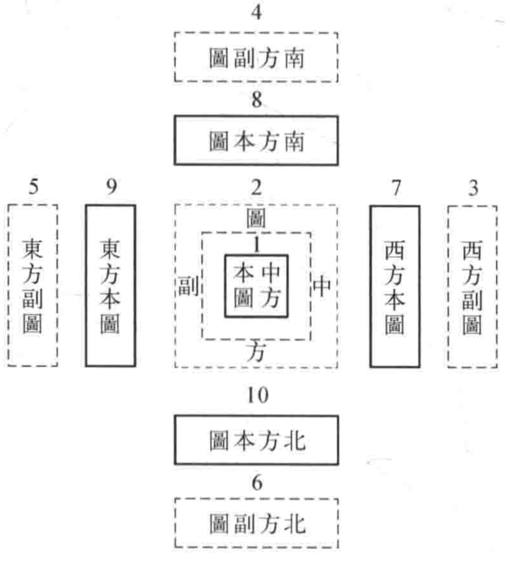
北方副圖
東方副圖

《玄宮》是先叙所有的本圖，再叙所有的副圖，而且本、副圖皆以中、東、南、西、北相次，這是《月令》一類書固有的讀法。它實際上是依斗柄所建十二辰的順序依次由春而夏而秋而冬。而《玄宮圖》本、副兩套圖雜錯，初看似乎没有一定規律。

過去，郭沫若曾在《管子集校》一書中試圖恢復《玄宮圖》。他所剪貼復原的《玄宮圖》，其式如下（見下圖，這裏略去了原圖録入的原書文字，圖中數字是原圖順序號）。

這個圖的畫法是，中央四方皆分内外兩層，本圖皆居内層，副圖皆居外層，順序是：

(1)中方，由内到外；(2)其他各方，由外到内，並且是按中、西、南、東、北排列。整個圖坐北面南。



我們把這個圖的順序與原書的上述兩種順序加以比較，很容易看出，它雖試圖折衷上述兩種順序，即一方面按《玄宮》儘量把本、副兩套圖分開來，另一方面按《玄宮圖》在四方之中先從四方開始布圖。由於此圖並未考慮到兩篇順序不同的原因，畫出的結果與兩篇順序都不相同。所以它還不是一個成功的復原圖。

現在我也畫了一張復原圖出來，其式如下（下頁右圖，圖中數字是布圖的順序號）。這個圖完全是按《玄宮圖》原書的順序布圖，整個圖也是坐北面南。順序是：(1)西方本圖、副圖；(2)南方、中方、北方本圖與南方、中方、北方副圖；(3)東方本圖、副圖。也就是説，是從右到中到左分三組雙行排列。圖畫出後，本圖一律居左，副圖一律居右，呈兩個交叠在一起的十字狀。

這個圖如果反過來看，按中、東、南、西、北的順序去讀，並且本、副圖分開讀，先讀本圖，再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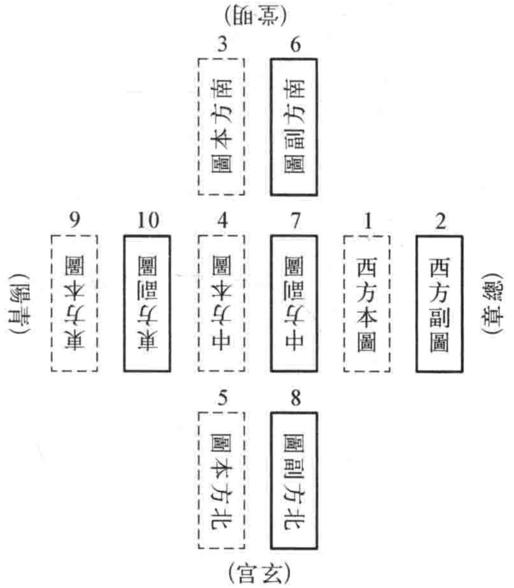
副圖，就和《玄宮》的順序完全一樣。我們將文字的書寫方向作旋轉方式排列，就是爲了使圖能够作兩面觀，正觀是「玄宮圖」，反過來讀就是一篇「月令」，這是受到帛書的啟發。由此我們可以明白，《管子》原書分《玄宮》和《玄宮圖》，兩篇順序不同，原因究竟在哪裏。另外，我們還可以由此推測，《明堂月令》之所以叫《明堂月令》，很可能就是因爲它是坐北面南，適與玄宮方向相反〔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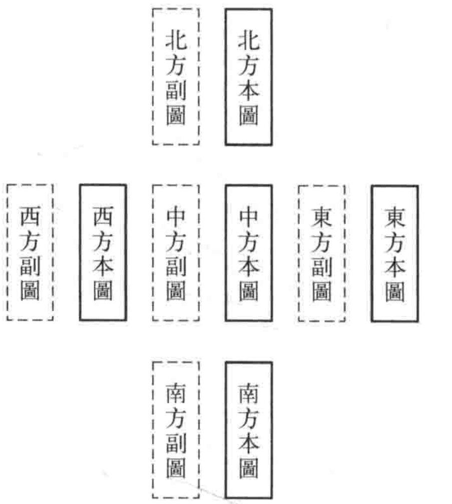
我的圖畫出後，後來又有機會見到陳夢家畫的一幅圖。最初我發現他在稿中採用的是一種類似於郭氏的復原圖，但後來又發現他在另外一張紙片上還畫了另外一幅不同的圖，其式如下(本頁左圖)：

這幅圖比起郭氏的那幅圖來，無疑是個很大進步。這首先表現在它是採用本、副圖並列而不是分內、外層的方式。但是這個圖和我們的圖仍然不同。第一，它的方向與帛書是相同的，但與《玄宮圖》所記正好相反，中間兩行是從下向上逆行布圖；第二，在三組雙行中，它的本圖都在右面，副圖都在左面，也與我們的圖相反。

這裏，爲什麼我們不採取陳氏的那種方式來安排本、副圖的位置呢(其實最初我也是把本圖排在右面，副圖排在左面)？這個理由也是應當略加説明的。

第一，我想説明一下，《玄宮圖》本、副兩套圖的主要





區別究竟在哪裏。在我看來，其主要區別是：它的本圖主要是講與祭祀或日常起居有關的一些事情，是所謂文事或吉事，副圖則主要是講兵刑，是所謂武事或凶事。把本圖畫在左面、副圖畫在右面，這正好就是古人所説的「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老子》），「吉禮左還，順天以立本；武禮右還，順地以利兵」（《逸周書・武順》）。此外，這樣布圖還可以從《管子》書中的《版法解》得到直接證明，《版法解》説：「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這段話把四時之位的前、後、左、右講得很清楚，同時也交待了文、武之事的位置〔一六〕。

第二，我們復原的《玄宫圖》是作兩面觀。《玄宫圖》所記祇是布圖順序，按照這個順序布出的圖祇有建築方位的意義（而這種方位也就是陰陽五行説一般採用的方位），但整個圖並不是從正面來讀的，其讀圖順序實際上祇有一種，就是按照《玄宫》。把本圖畫在左面，副圖畫在右面，雖然表面上看好像有些别扭，但反過來看却是順的。這樣做，正好可以把兩個方面都照顧到：正面是立於玄宫，坐北面南，文事居左，武事居右，如此始符合我國古代居民坐北面南起屋的習慣，以及由此發展而來的五行説之上下左右方位；反面是立於明堂，坐南面北，按書寫習慣，先讀右面的所有本圖，再讀左面的所有副圖，如此始符合我國古代天文曆數之學依斗柄建位的四時之序。

我國古代建築是以坐北面南爲正，這可以舉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圖》銅版爲證〔一七〕。同樣，我國古代的地圖也是採取這一方位，如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駐軍圖》〔一八〕。而我國古代的天文圖，除後起的所謂「横圖」外，所謂「蓋圖」一般有兩種：一種是仰視圖，如隨縣擂鼓墩曾侯墓出土漆箱蓋面所繪青龍白虎二十八宿圖，二十八宿是作右旋排列；另一種是投影圖，如出土占盤，十二辰都是作右旋，二十八宿都是作左旋，兩種圖的各個方位按投影關係可以叠合。投影圖的方向是上南下北左東右西，仰視圖的方向是上南下北左西右東，二者平視時祇是左右不同，南

北是一樣的，都是坐北面南。

根據上述《管子・玄宮圖》的復原和說明，我們可以更好地弄清楚帛書與「玄宮」和「明堂月令」的關係。

在我看來，它們在大類上是屬於性質相近的東西，特別是在圖示的方法上有共同之處，和上文所述占盤等工具是一樣的，但它們也還有以下一些區別：

(1)《玄宮圖》是一種兩面觀的文字圖，正面是個宮室圖，反面是個時令圖（即《玄宮》所記），而現存《月令》諸書却失去了宮室圖，衹有時令圖所記之文字，帛書也沒有宮室圖，衹有時令圖。

(2)按之司馬談所說「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書所記都並不完備，《玄宮圖》僅有四時和二十多個節氣（與二十四節氣不盡相同）而無八位、十二度，《月令》等書有四時、十二度而無八位、二十四節，帛書與《月令》等書相同也僅有四時、十二度。各書都缺八位〔一八〕。

(3)《玄宮圖》和《月令》等書都有較完備的五行系統，除四方之外還有中央，四方中央皆按五行說均勻分配有五聲、五色、五味等項目，而帛書却衹有四方而沒有與四方相配的中央：這不僅表現在帛書中央的兩段文字並不與四方對應，而且還可以從帛書中央沒有與四方青、赤、白、黑四木相配的黃木反映出來。另外，它的四時十二月也沒有與五行說的各要素相配。

(4)《玄宮圖》分本、副兩套圖，專門把「兵陰陽」獨立出來，本、副圖作雙行並行，文事居左，武事居右，以與春在左、秋在右相應。這說明《玄宮圖》還有嚴格的陰陽之別（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文爲陽，武爲陰）〔一九〕。這是他書所沒有的。

(5)《夏小正》特於物候所言較詳。

(6)帛書不僅不按五行說相配，而且也不談物候（僅「取于下」章有「乙則至」一語），而於各月禁忌獨詳。

根據這些區別，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帛書與「玄宮圖」不同，二者置圖方向正好相反；

第二，帛書也還不是「明堂圖」，因爲它不僅没四宫，而且也没有與四宫相配的太室〔二〇〕；

第三，帛書與「月令」性質相近，但形式較《月令》諸書更爲原始，没有複雜的五行系統；內容也比較單一，没有《月令》諸書那種説禮色彩，衹講各月禁忌。因此，我認爲其性質當與古代的曆忌之書相近，《月令》諸書應該就是從這種東西發展而來。

曆忌之書，《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類」録有《雜忌曆》二卷、《百忌大曆鈔》一卷（梁有《雜百忌》五卷，亡）、《百忌曆術》一卷、《百忌通曆法》一卷、《曆忌新書》十二卷、《太史百忌曆圖》一卷（梁有《太史百忌》一卷，亡）。《漢書·藝文志·數術略》「五行類」所收《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刑德》七卷等可能也都是同類之書。但這些書現在都散亡了，我們已無從得知其詳。要之，其內容當包括月諱和日禁兩種〔二一〕。月諱可以比較簡單，日禁則必然異常煩瑣。帛書有月無日，衹能算是月諱之書，並且是這種書中較爲簡略的本子。

三、釋文考證

楚帛書原物形狀大體完整，文字也保留得比較多，但仍有若干自然和人爲原因造成的損害。它們主要是：(1) 帛書出土後底子呈深褐色，與圖畫文字混融在一起，目驗很困難；(2) 帛書因長期疊放在竹笥內，表面留有四道（横一道、竪三道）大的折斷痕迹，使文字遭受損傷；(3) 帛書表面還有一些地方發生撕裂，經過裝裱，發生錯行錯位，有些字筆劃分了家，有些字整個被掩去；(4) 帛書邊緣，主要是上下緣不太完整，特别是上緣有比較嚴重的破損，有些碎帛片裝裱時被錯植（如「余取女」章、「荃司旮」章）。因此，我們要對帛書文字進行考釋，有兩項準備工作須要完成：一是儘可能準確地復原帛書文字本身，二是儘可能準確地復原帛書文字的行款。這裏，我們決定選用巴納《楚帛書》一書發表的紅外綫照片（本書圖版陸）作爲依據，經過仔細辨認照片，複製摹本

（本書圖版柒），同時採用坐標網格復原帛書文字的行款，填寫隸定釋文作爲對照（本書圖版捌）。

我們的摹本，方式同於饒宗頤一九六八年發表的摹本，是按原式摹出，但對饒本做有個別訂正。隸定釋文，主要是參考了巴納一九七二年發表的臨寫本，他的臨寫本對帛書行款的復原，經過兩個步驟，一是利用照相繪製帛書破損形狀的復原圖（本書圖版玖），二是在前者的基礎上用坐標點確定各個帛書文字的相對位置（本書圖版拾），其方法是科學的。但這個本子也有缺點，其中間兩篇文字行款雖然恢復得很正確，可是邊文有些地方却不够準確，如「荎司夅」章，行款即有明顯錯誤。此外這個本子中還有一些摹錯的字。這些現在也都做了訂正。

下面的釋文即以上述隸定釋文爲基礎，但做了標點斷句並括注有今字。爲了方便起見，我們採用了小號的阿拉伯數字表示原文行款，並用「□」號表示完全缺去的字，「⊠」號表示因殘泐較甚暫時難以隸定的字或偏旁，「［ ］」號括注的字表示原字已缺但據文義可以補出的字，在下面括注「?·」號表示該字已殘但懷疑可能是某字。斷句時，我們參考了原文押韻的韻脚，在押韻的字旁邊標注有△、○、◎等號。釋文分篇分章，每章後附以考證性的注釋。我們在寫作這一部分時，曾對以往各家的釋文做過全面校核，但爲避免煩瑣，這裏不再一一抉擇是非，僅在關鍵處做最必要的引述，餘請讀者參看本文所附《楚帛書索引》。

甲 篇

一

隹（惟）□□四（?·）月，則⿰糸呈（贏）絀不旻（得）亓（其）⿱尚示（當）△，春⿰足頁（夏）昧（秋）⿱夂日（冬），□又（有）⊠又尚（常）△，⿱日月＝（日月）星⿸辰日（辰），𤔔（亂）遊（逆）亓（其）行△①。⿰糸呈（贏）絀遊（逆）𤔔（?·亂），卉木亡「尚△（常），是（?·）［謂］宎（妖）②。天墬（地）乍（作）羕△（殃），天棓（鼓）⿰爿酉（將）乍（作）瀉△（湯），降

于亓（其）［四］方，山陵亓（其）𤔲（隓），又（有）泉氒湝（㬎、汨），是胃（謂）孛＝（悖③。悖）戠（歲），▨月內（朒）、月[2]吉＝（吉，吉）▨□又（有）電雹，雨土，不旻（得）亓（其）參職④。天雨▨𠮷＝，是遊（逆）月閏之勿行：冃（一月）、二月、三月，是胃（謂）遊（逆）終亡[3]，奉▨□亓（其）邦；四月、五月，是胃（謂）𠭁（亂）絽（紀）亡，亙▨望（？）⑤。亓（？其）戠（歲）：西𢧢（國）又（有）吝，女（如）肙＝（日月）既𠭁（亂），乃又（有）鼠（爽）▨；東𢧢（國）又（有）[4]吝，▨▨乃兵，▨于亓（其）王⑥。

△陽部，○物部。

注釋

①「四」字當中筆劃不晰，下爲「月」字，林巳奈夫（一九六六）、嚴一萍、饒宗頤（一九六八）釋「日」，巴納釋「四」。按帛書「日月」皆合書，釋「日」恐不妥，這裏暫從巴納釋「四」，疑原句或作「隹十又四月」，謂閏餘處理失當，於置閏後的十三個月之外又多出一月（戰國時代已無十四月），是以下文有「是逆月閏之勿行」等語。「絽絀」，《說文》「縕」字或體作「絽」，這裏假爲「贏」；「絀」與「詘」通，《說文》：「詘，詰詘也。」「贏絀」一詞古書多見，如《荀子·非相》「與世偃仰，緩急贏絀」，《國語·越語下》「贏絀變化，後將悔之」，馬王堆帛書《稱》「贏絀變化，後將反㐌」，是進退伸縮的意思。饒宗頤（一九七六）讀「絽絀」爲「贏縮」，「贏縮」見於《史記·天官書》，是指星辰躔度的進退，與這裏「贏絀」的意思是一樣的，但「絀」、「縮」是同義字不是通假字。「不得其祟」，帛書第一行適當一道縱的裂痕（此裂痕筆直，與字行不完全重合，當是裝裱後形成），「祟」字當中稍殘，林巳奈夫（一九六六）、嚴一萍、饒宗頤（一九六七）、唐健垣均隸定作「𢍜」，巴納隸定作「𢍜」，讀爲「常」（嚴一萍讀爲「掌」），其實原字當是「祟」字，從示，尚聲，壽縣朱家集、無錫前洲楚器均有

之，用爲「歲嘗」之「嘗」，這裏讀爲「當」。「春夏秋冬」，「秋」字寫法比較特殊，古璽文「千秋」，「秋」作「[illegible]」，從禾從炅，楚簡常見的「[illegible]」字，所從「秋」，有省形作「[illegible]」者，這裏的「秋」字則完全省去火字；「冬」字，寫法同於《說文》「冬」字的古文「[illegible]」，從夂(古文「終」)從日。「叏常」，大概是反常一類意思。「亂逆」，「亂」字寫法同於《正始石經》古文；「逆」字帛書從辵從屰，商承祚釋「達」，解釋爲「日月星辰不應達而先達」，饒宗頤(一九六八)從之，據《說文》釋爲「行不相遇」。今按帛書文例，此字在帛書中凡四見：(1)即此句，是與「亂」字連用；(2)作「絽絀遊亂(？)」；(3)作「是遊月閏之勿行」；(4)作「遊終亡」，與「亂紀亡」對文。巴納曾猜測此字與「亂」字連讀，是同義的合成詞，我則認爲它應當就是「逆」字，其所從「羊」，當係「屰」之訛變(參《漢印文字徵》2.12「逆」字)。這段的意思大約是說，置閏若有誤失(？)，會造成星辰躔度的進退失當，四季的變常，以及日月星辰運行紊亂(應當說是觀測系統的紊亂)。

②「逆」下一字殘，疑爲「亂」字。「絽絀逆亂」，是承上而言。「卉木亡常」，「卉」也就是「屮」，《說文》別「屮」、「艸」、「茻」爲三字(草、卉、莽)，但根據較早的文字材料，這三個字本來却是同源的，祇是繁簡不同，後來才漸漸分化開來。《方言》：「卉、莽，草也。東越、揚州之間曰卉，南楚曰莽。」《文選》卷五左太沖《吳都賦》「卉木跃蔓」，劉良注：「卉，百草總名，楚人語也。」皆楚人用「卉」爲「草」之證(東越、揚州亦楚地)。下二字，首字殘泐，似爲「是」字的上半，下字缺，疑爲「是謂」二字。「宎」，此字是經紅外綫照相才辨認清楚，帛書「宎」字舊多釋爲「灾」，臺灣學者龍宇純始爲更正(見嚴一萍文後語引用)，將此字隸定爲「宎」，讀爲「妖」。按「宎」字兩見於《莊子》：(1)《齊物論》「宎者」；(2)《徐無鬼》「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釋文》：「於宎，字又作窔。」又《楚辭·招魂》「冬有穾厦」，王逸注：「穾，複室也。」「穾」與「宎」是同一個字，皆假借爲「窔」，這裏帛書則假借「宎」字爲「妖」。「妖」字，除一般的灾異外，古人還有一些特定的解釋，如《左傳》宣公十五年「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說文》引以釋「祅」(即「妖」)字，又《說文》「蠥」字下引《衣服

歌謠》「艸木之怪謂之祅，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這裏帛書說「卉木亡常，是謂妖」，與《衣服歌謠》的說法正相吻合。這段話的意思大約是說，既有上述種種天變，則草木的生長也隨之出現種種怪異，而這些怪異也就叫作「妖」。

③「地」字的寫法值得注意，與《說文》「地」字的古文「墬」有別，從阤從土，應即後世「地」字所本。「地」字，過去我們在西周金文或更早的殷代文字材料中沒有發現過，見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字材料，例子也很有限（如《行氣銘》）。這些年來，新的材料有所增加，如《侯馬盟書》中「地」字出現很多，平山三器中也有「地」字出現。但這些「地」字的寫法都是採用《說文》「地」字古文的寫法，無與後世「地」字相同者。因此，這個「地」字是很重要的綫索。藉此，我們可以明白爲什麼近年出土的秦漢簡帛書籍往往都把「地」字寫成上「也」下「土」，其實這樣的寫法正是保留了它從「陛」字省形的痕迹。另外，由帛書「地」字，我們對「地」字的古音讀法也有新的瞭解。《說文》「地」字，古文從隊，「隊」所從得聲的「㒸」，《說文》說是「讀若弛」，最近出土的㝬毀銘文有「墬於四方」一語，張政烺師考爲《書·洛誥》「勤施於四方」的「施於四方」。「弛」、「地」等字本來都是從歌部的「也」字得聲，但在先秦兩漢韻文中却往往是與支部字叶韻，段玉裁因謂「地」字乃是介於今所謂支、歌二部之間。但帛書「地」字從土從阤聲，却說明「地」字在楚字中仍然是保留了歌部字的讀音，這與《楚辭·天問》以「歌」、「地」二字叶韻是一致的。「天鼓」，饒宗頤（一九六七）釋「天棓」，但「棓」字所從「咅」應當上從不，下從口，與此不合；嚴一萍釋「天根」，也不合。今按此字右邊上半乃楚文字中常見的「豆」字，應隸定爲「梪」，讀爲「鼓」。《北堂書鈔》卷一五二、《藝文類聚》卷二引《河圖帝通記》：「雷者，天地之鼓。」《初學記》卷一引《抱朴子》佚文：「雷，天之鼓也。」天鼓，也就是雷霆。雷霆發而有大雨，湯就是大雨，《書·堯典》序孔穎達疏引《謚法》：「雲行雨施曰湯。」下句，「其」下一字缺，應爲「四」字。「山陵其𡘐」，指山陵崩墮，「陵」作「陸」，是楚文字特殊的寫法，蔡季襄首先猜測此字應讀爲「陵」，現已爲許多出土文字所證實；「𡘐」，見於楚簡，

據江陵望山二號墓竹簡可知字乃從四「止」而非兩「癶」，因此並不是「癹」或「發」字，饒宗頤(一九六八)、唐健垣釋「發」是不對的，商承祚將此字釋爲「𤼷」讀「收」，字形也不對。今按此字象四「止」相聯，與此字形相近，過去我們在昜鼎中曾經見到一個「𧿹」字，文例作「弗敢×」，有些人根據此字與金文「喪」字結構相似，並且旂鼎有「弗敢喪」之語，把此字釋爲「喪」。但此字是從四「止」而非從四「口」，金文中相似銘例還有「弗敢沮」、「不敢豖」等等，現在看來應當就是帛書的「𨑊」字。古人講山陵崩壞，都是以崩或墮稱之，不見用其他字，故兩處似均以釋「墮」較爲合適。「有泉𠂤汩」，「泉」舊多釋爲「𣶒」，唯商承祚釋爲「泉」，今按下文「黄泉」句，應以釋「泉」爲是；「汩」從水從亘，「亘」疑即《説文》「𡿧」字，很多研究《説文》的學者都指出古書中用來形容水流急的「汩」字就是這個字，《莊子·達生》「與汩偕出」，郭象注：「回伏而涌出者，汩也。」與此正合。「汩」字，《説文》從曰聲，但其字與「淈」字通假，《楚辭·懷沙》並與「忽」、「慨」、「謂」等叶韻，可見實際上是物部字。此字饒宗頤(一九五八)、李學勤(一九六〇)釋「溜」，安志敏、陳公柔、商承祚、林巳奈夫(一九六五)釋「洄」。《説文》「溜」是青色的意思，與此文義不合，「洄」係摹寫錯誤。這裏山崩泉涌都是凶咎之象。「孛」舊多誤釋爲「季」，商承祚釋爲「孛」，近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一九七九年一期)提出新的看法，認爲釋「季」釋「孛」都不對，此字應據《正始石經》「殺(𣫞)」字的寫法釋爲「殺」，但《正始石經》「殺」字下半並不從子，釋「殺」於文義亦不甚安妥，這裏我們仍取商説爲釋。其字從宋從子，所從「宋」，我以爲即金文「迷」字(即「𨑊」，舊多釋「逑」)所從，與「孛」祇是繁簡二體，《説文》釋爲「艸木盛宋宋然，象形」。其實就是「孛」或「勃」的本字，這裏假借爲「悖」。

④「悖歲」，「歲」作「戠」，是楚文字特有的寫法。早在六十年代初，人們就已經從鄂君啟節上把這個字考證出來。「歲」是歲星，古人以歲星紀年，有迎歲背歲之説。「月内」，饒宗頤(一九六八)讀爲「月朒」，《説文》：「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朒。」過去研究《説文》的人都認爲「朒」應照

一般古書改爲「朒」，這也許不一定對，此從饒釋。「月吉」，「吉」字舊釋爲「一日」或「十日」的合文，李學勤曾據蔣玄佁摹本釋「吉」（一九五九），但後又從饒宗頤一九五八年摹本改釋爲「一日」（一九六〇）。其實饒本摹寫有誤，蔣本反而正確，嚴一萍後來也釋此字爲「吉」，釋「吉」其實是對的。「月吉」即「初吉」，見於令方彝，漢以來傳注多説「月吉」即每月朔日。「電⿱雨亡」，「⿱雨亡」舊或釋「震」，或釋「霆」，然以字形論，此字分明從雨從亡，與「震」、「霆」殊不合，且帛書此章上下文多以陽部字叶韻，故這裏仍從原形隸定。此字不見字書，也許是「震」、「霆」等字的同義字，或者「電⿱雨亡」別爲另一種物候，因爲下文講的是「雨土」。「雨土」，就是《詩・邶風・終風》「終風且霾」的「霾」，現代氣象學叫沙暴，出現時天空昏暗。《説文》：「霾，風雨土也。」《爾雅・釋天》：「風而雨土曰霾。」也是一種凶咎之象。「參職」，「參」，參驗、參稽；「職」，天職，即天運所主，謂參驗天道。《荀子・天論》：「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⑤「天雨」下二字皆殘，內容不詳，可能是承上而言的一句話。下面是説不可違逆月閏而行，若行之，則一、二、三月就會有凶咎，叫「逆終亡」；而且四、五月也會有凶咎，叫「亂紀亡」。語略近《史記・天官書》「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殆古建除家言。這段中，「遊」上一字殘，當爲「胃」字上半的殘劃。「逆終」，「終」是年終，即《左傳》文公元年「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的「終」（「歸餘」也就是置閏）。「亂紀」，《禮記・月令》「月窮於紀」，鄭玄注：「紀，會也」，謂日月交會。日月交會一年凡十二次，古人叫十二紀，《呂氏春秋》十二紀也就是這十二紀。逆終、亂紀是説違反閏法而造成年與月的混亂失序。「奉」下二字，首字殘，僅存上半一筆，下字缺，內容不詳。「四」字，帛書有兩種寫法，一種與今「四」字同，一種如今「囬」字，後一種寫法見郾孝子鼎銘。「⿸厂水」，饒宗頤（一九五四）釋

「砅」，字同「濿」、「厲」，其說可從，然下字殘，其讀不詳；再下一字也已殘損，似乎是個「壆」字。

⑥「歲」上一字存兩道略呈波狀的橫劃，林巳奈夫（一九六六）疑爲「水」，嚴一萍釋爲「之」，均不確。今按此字似「二」，但兩劃中間甚窄，與帛書所見「二」字不同，我以爲應是「亓」字的上半，字劃呈波狀是因帛書裝裱變形所致。下面的話仍然是講逆閏、悖歲所帶來的凶咎，上文是說「月」，這裏則是說「國」的方位。「吝」，悔吝之「吝」，占驗之辭。「鼠」，嚴一萍釋「豸」，饒宗頤（一九六八）、唐健垣釋「荒」，今從商承祚之說釋「鼠」。此字在帛書中凡三見：⑴即此句，是名詞；⑵「三恒墮，四興鼠」，是動詞；⑶「是則鼠至」，是名詞。三處商氏均讀爲癙憂之「癙」。我新近考慮，這個字也許讀爲「爽」更合適，「爽」與「鼠」是魚、陽兩部通轉字，「爽」古訓有差、忒、喪、亡等義，既可作名詞，也可作動詞，用在例⑴中正好接「日月既亂」而言，用在例⑵中與「墮」字互文，用在例⑶中與例⑴相同。「鼠」字下面一字殘，或即例⑶「鼠至」的「至」字。西國、東國，國之西、東，《史記・天官書》：「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是說上天之星與下野之國相應，與此文例相似。末句第一字殘去下半，上半似從「夭」。文末有朱色方框，與下文相隔，乃分章之號，下不再注明。

二

凡戢（歲）悳匿（慝），女（如）☐☐☐，隹（惟）邦所☐宎（妖）之△行，卉木民人，㠯☐四淺（踐）之[5]，△尚（常），☐☐上宎（妖），三寺（時）是△行①。隹（惟）悳匿（慝）之戢（歲），三寺（時）☐⿱☐日，⿱⿰叀糸女（繼）之㠯𢂋（霈）△降②。是月㠯⿱䀠女（數）曆（擬）爲之正，隹（唯）十又（有）[6]二月（？·）③。隹（惟）孛（悖）悳（？·）匿（慝），出自黃泉，土女亡⿰黽☐；出内（？·入）［空］○同，乍（作）亓（其）下○凶④。⿱日月=（日月）⿸虍日（皆）⿱㗊女（亂），星唇（辰）不○同（炯）。⿱日月=（日月）既⿱㗊女（亂），戢（歲）季[7]乃☐，寺（時）雨進退，亡又

（有）尚（常）死（恆）⑤。恭（恐）民未智（知），曆（擬）吕爲則母童（動）。羣民吕☐，三死（恆）斁（墮），四興鼠（爽），吕𨽸（？·亂）天尚（常）[8]。羣神五正，四興失羊（詳）⑥。建死（恆）褱（懷）民，五正乃明，百神是亯，是胃（謂）悳匿（慝），羣神乃悳⑦。帝曰：繇（繇、繇），敬（？·）之哉[9]！母弗或敬。隹（惟）天乍（作）福，神則各（格）之；隹（惟）天乍（作）宎（妖），神則惠之。欽（？·）敬隹（惟）備，天像是惻（則），戚（咸）隹（惟）天☐，下民[10]之𢦏（戒？·），敬之母戈（忒）⑧！

△陽部，○東部，◎之、職部。

注釋

①「凡」舊釋爲「戌」，「戌歲」無法理解，巴納據下文「風」字所從凡將此字釋爲「凡」，至確。「德慝」，德者善也、福也，慝者惡也、禍也，是個反義的合成詞。這裏德指天之慶賞，慝指天之刑罰，表示上天對人事的報施，故下文說「惟天作福，神則格之；惟天作妖，神則惠之」。古書中還有一個與此意義相同的詞是「德虐」，《國語·越語下》「德虐之行，因以爲常」，韋昭注：「昭謂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虐謂有所斬伐黜奪也。」其詞也見於馬王堆帛書《十六經》的《觀》、《果童》等篇。德慝、德虐也就是古書常見的德刑或刑德。《韓非子·二柄》：「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這是刑德的本義。另外刑德還用指陰陽，古書有「月刑日德」的說法，《管子·四時》：「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四踐」，「踐」與「躔」音義相通，《說文》：「躔，踐也。」指四時星辰的躔度，即下篇所說「天踐」和「天步」。「三時」，《國語·周語上》「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韋昭注：「三時，春夏秋。」這段話殘缺的字比較多，內容不大清楚，意思可能是說，凡歲若逢上天施德降罰，如行某事，邦國便會有妖異之行，草木的蓄息生長，民人的操持農

事，便會違反四時星辰的躔度，致使春、夏、秋三個農事季節出現妖異之祥。

②「三時□昌」，末字下從日，上殘，李學勤（一九六〇）、安志敏、陳公柔釋「皆」，似非是。「⿱髟女」，嚴一萍隸定爲「緐」，謂「繫」字省文。經與帛書照片對照，其字下半猶存「女」字殘劃，應正爲「⿱髟女」。此字從糸與「繫」同，從女與「⿱髟女」同，這裏似應讀爲「繼」。「帓」，嚴一萍釋「策」，饒宗頤（一九六八）釋「素」，字形文義均有未安。今按此字上從朩，下從巾，應即「紼」字，這裏借爲「霈」，《玉篇》：「霈，大雨。」這裏是說繼而降之以大雨。

③「⿱己日」下一字經仔細辨認作「𡢃」，與楚簡常見的「婁」字基本相同。楚簡「婁」字下半從「女」（或「女＝」），與從「如」同，這裏應讀爲「數」。「𣅀」，應即《說文》「昚」字，許慎說：「昚，盛貌，从孨从日，讀若薿薿，一曰若存。𣅜籀文昚，从二子，一曰昚即奇字𣅀。」此從「薿」音，讀爲「擬」，擬者，比度也。「二」下一字殘，似爲「月」字。這兩句大約是說，月之恒數祇有十二個月。

④「孛」下一字殘，殘劃像是「悳」字最上面的一筆。「黄泉」，地底深處的泉水，《荀子·勸學》：「（螾）上食埃土，下飲黄泉。」《左傳》隱公元年：「不及黄泉，無相見也。」「土夊」，「夊」爲帛書「夋」字所從，《說文》：「夊，行遲曳夊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夊」又與「綏」字相通，《詩·齊風·南山》「雄狐綏綏」，《玉篇》引作「雄狐夊夊」，這裏讀法不詳。「亡」下一字，左半從「県」（說詳丙篇），右半殘劃似爲「異」字，疑不敢定。這句可能是講農作之事。「出」下一字殘劃經仔細辨認是「內」字，這裏讀爲「入」，與上文「自」相對。「同」上一字缺，疑是「空」字。「空同」是古人所說斗極下的高山，《爾雅·釋地》：「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大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四極。」《釋文》：「空同，司馬云：當北斗下山也。」我國古代天文學上的蓋天說，認爲「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周髀算經》說：「極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萬里，滂沲四隤而下；天之中央亦高四旁六萬里。」空同當斗極下，是古人設想呈弧形的地面上曲度最大的地方，因而也是最高的地方，與黄泉正好相反。黄泉深在地底，是最低的地方。這句大約是說，如悖「德

慝」，則將有凶祟出自地底、登於空同而降臨人世。

⑤「〔古文字〕」，這個字過去各家釋法不同，其隸定往往先已錯誤，故所釋亦非。其中隸定準確的祇有巴納，但巴納没有能把這個字認出來。今按此字上從虎，有頭與兩足，下從曰，去掉虎頭（虍）剩下兩足（比），與「曰」合在一起，便與楚簡常見的「皆」字（〔古文字〕）没有分别，實際上就是「皆」字。我們在中山王方壺銘中也碰到過上從虎，下從曰的「皆」字，但那個「皆」字所從的「虎」没有象「比」字的兩足，不像這裏的「[虍/皆]」字更能説明「皆」字的演變。「星辰不同」，「同」字，嚴一萍、巴納誤爲「同」，今從林巳奈夫（一九六六）釋，讀爲「炯」，《説文》：「炯，光也。」「不炯」是説失去光亮。「歲季乃□」，「歲季」，當指農時；「乃□」，當指農時有誤。「時雨進退」，《禮記·月令》有「時雨將降」、「時雨不降」，這裏是説天象既亂，無法掌握農時，本來按節令應當降的雨水也與時令發生錯迕。

⑥「恭」，讀爲「恐」。這兩句是説，慮民不知天變，把已經不可靠的曆法當作定則，死守住不敢加以改易變通。「羣民已□」，末字殘，似從火，也許是「惑」一類意思。「三恆」，疑指日、月、星「三辰」；「四興」，疑指四時代興，《呂氏春秋·大樂》：「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以亂天尚」，「天尚」，讀爲「天常」，《管子·形勢解》：「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呂氏春秋·大樂》「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成兩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高誘注：「天之常道。」「亂」字，原文已殘泐，陳邦懷據《左傳》文公十八年「以亂天常」句補足，此從其説。「五正」，《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蔡墨之言：「故有五行之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四」下一字，下半殘，上半殘劃與「興」字同，據上文爲「興」字。「四興失詳」，謂羣神五正失考於四時之政。

⑦「建恒」，「建」字舊多釋「畫」，今從饒宗頤（一九六八）釋「建」，《説文》從「廴」旁，但我們在銅器銘文如蔡侯鎛、中山王鉞所見到的「建」字都是從「乚」旁，此字下似從「止」（右下角當裂痕，

裝裱時掩去)，則尚有可疑。「建恒」是指立上所謂「三恒」。「懷民」，懷柔其民。「五正」，這裏指五行之政，古代典政之官叫正，官所司政事也叫正。「百神」，衆神，寧毀：「其用格百神。」「是謂德慝，羣神乃德」，兩句疑互倒。「羣神乃德」是説民敬神，神乃德惠於民，應接在「百神是亯」後，「是謂德慝」是一句結語，應當放在最後。

⑧ 此段話，形式仿《尚書》。「繇」，字形與金文所見「繇」字基本相同，金文「繇」字作「□」(歷史讕鼎)、「□」(散氏盤)、「□」(師寰毀)等形，其基本結構是從言從一被縛之「豸」，下有與「□」字所從相同的「□」。此字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同時包含了今「繇」、「繇」二體，二體都是從同一個字省體而成：「繇」是省「豸」爲「爪」，與「言」相合作左旁，以縛豸的「系」作右旁；「繇」是省「豸」爲「爪」，與訛變爲「缶」的「□」相合作左旁，以縛豸的「系」作右旁。這裏的「繇」或「繇」是嘆詞或發語詞，《爾雅・釋詁》：「爰、粵、于、那、都、繇，於也。」《書・大誥》：「大誥繇爾多邦。」(《釋文》引馬融本)過去，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一)曾否認「繇」是個嘆詞或發語詞，楊樹達《詞詮》(卷七)從其説，把這個詞定成介詞，這是不對的。後來楊氏本人在《積微居金文説》(卷一)「彔伯㦰毀跋」中又恢復了「繇」是個嘆詞的説法，其所據即該毀銘文「王若曰：繇，自氒祖考有勳於周邦」。楊氏的後説才是正確的。「繇」下一字殘，陳邦懷據《尚書》文例，如《吕刑》「嗚呼，敬之哉」補「敬」字，可從。「毋弗或敬」，陳邦懷、郭沫若認爲應是「毋或弗敬」之倒，讀爲無有不敬，但原文讀爲無不有敬，亦通。「或」訓「有」，參楊樹達《詞詮》卷三。下面一段，「福」、「妖」對文，「格」、「惠」對文，意思是説，無論是福是禍，都是上天所加惠。這裏的福妖也就是上文的德慝。以下「敬」上一字殘，僅存左半殘劃，依稀可辨是一從金旁之字，應爲「欽」字。「備」，舊多釋爲「𠈇」，朱德熙釋爲「備」(李家浩《戰國㓚布考》引用其説，《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六〇—一六四頁)。今按此字右半與「兼」(參甲一一—八)顯然不同，「兼」字下半是從永。我初疑此字爲「㯹」，以楚簡「綠」字如長沙仰天湖竹簡作「□」、信陽長台關竹簡作「□」，右半寫法與此非常相似。但此字現在看來恐怕不是「㯹」，而應按朱説釋爲「備」。「備」字見於中

山王礜鼎作「𢔶」，與此相似，江陵望山一號墓竹簡有「大水𤔲玉」一詞，「𤔲」字也應是「備」字。「恖」，同「惻」，這裏借爲「則」。「戚」，《字彙補》收爲「感」字的古文，這裏疑讀爲「咸」。「𢦚」字，僅見於白𢦚鼎（Fruhe Chinesische Bronzen aus der Sammlung Oskar Trautman〔使華訪古録〕PL. Ⅶ 1—3），是疑是「戒」字的異寫。「戈」，安志敏、陳公柔讀「忒」，從文義上講極爲妥適，但「忒」字從弋不從戈，是一個疑問。近李家浩《戰國𨚕布考》始對古文字往往用「戈」爲「弋」的現象做了詳盡説明，可以證明釋「忒」是没有問題的。此從李説釋爲「忒」，正好與上文押韻。

三

民勿用𢓊𢓊百神，山川澫浴（谷），不欽敬（？）△行。民祀不㡭（歆），帝㴷（將）繇（䌛、繇）吕䌛（亂）遊（？·逆）之△行=①。民則又（有）穀，亡又（有）相𧐐（擾），不見陵▨②。是則鼠（爽）至，民人弗智（知）戠（歲），則無𦃃（攸）祭，▨則𢓊民，少又（有）▨，土事[12]勿從，凶[13]③。

△陽部

注釋

①「用」下二字殘，可辨皆從辵旁。「澫浴」，下字應讀爲「谷」，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上德若浴」，「江海所以能爲百浴［王者］」，假「浴」爲「谷」；上字，字書所無，唯見於《石鼓·汧沔》，作「澫又（有）小魚，其斿（游）𨔝𨔝」。這裏「澫」字與「谷」字連讀，下文「瀧汨凼（淵）澫」，則與「淵」字連讀，推測可能是個表示溪流或淵穴一類意思的字。我曾嘗試把它讀爲「㶇」字，《爾雅·釋山》「夏有水冬無水，㶇」，郭璞注：「有停潦。」邢昺疏：「潦，雨水也，言山上污下，夏有停泉，至冬竭涸者，名㶇。」是山間積水的地方。但這樣解釋現在尚無堅强證據。「不欽敬行」，「敬」

字殘去下半。「民祀不㫖」，「㫖」，商承祚釋「莊」，謂與趙亥鼎「莊」([illegible])字同字異形，兩字異形而云同字，可疑。今按此字見於一九六九年湖北枝江百里洲出土的考叔㫖父𠥄和寅公孫㫖父匜。這個字從「言」，據于省吾考證，「甲骨文有言無音，往往以言為音，讀為歆饗之歆，周代金文的言與音以及偏旁中從言從音，每互作無別」(《甲骨文字釋林》四五九頁)。這裏的「㫖」即應讀為歆饗之「歆」。《左傳》昭公元年：「神怒民叛，何以能久？……神怒，不歆舊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定公五年：「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歆」字的用法與此相同。《說文》：「歆，神食氣也。」「䌛」，同「由」，用也，《論語·泰伯》「民可使由之」，注：「由，用也。」《廣雅·釋詁四》、《小爾雅·廣詁》訓同。「亂」下一字殘，應為「逆」字。

②「民則有㝅」，「則」是設詞，猶「若」也，參楊樹達《詞詮》卷六；「㝅」，《說文》：「㝅，乳也」，《左傳》宣公四年「楚人謂乳穀」，假「穀」為「㝅」。按「㝅」與「穀」通，「穀」可訓養，《詩·小雅·甫田》「以穀我士女」，鄭玄箋：「我當以養士女也。」又可訓生，《爾雅·釋言》：「穀，生也。」《詩·王風·大車》：「穀則同室，死則異穴。」又可訓祿，《詩·小雅·正月》「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鄭玄箋：「穀，祿也。」數義轉相通，這裏應指養生之資。「⿱夏虫」，與《字彙補》所收「夒」字的古文「夓」略同，上從𦣻，即「夏」之本字，下從虫，仍是「夒」字。這裏的「⿱夏虫」應讀為擾亂的「擾」。「陵」，侵陵、陵犯，下字殘，應為攘奪欺虐一類意思。

③「是則鼠至」，「則」亦為設詞，「鼠」讀為「爽」。「䋤」，疑同「絹」，這裏讀為「攸」。「祭」下一字殘。「則」下一字從辵旁，中間不甚清晰，似作「𨒅」。「少又」，「少」猶「稍」，下一字殘，內容不詳。「土事」，《禮記·月令》「(仲冬之月)土事毋作」，是說冬十一月不宜動土，土事指農事。又《漢書·天文志》「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不乃得女子。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則是指土地得失。這裏是用前一義。

字數：全篇凡四〇九字，外加合文五字，重文三字。

乙篇

一

曰(粤)故(古)〼熧霝(雹=包)虘(戲)，出自〼霆，尻(居)於䍐〼。氒田(?)僬=(漁，漁)〼〼〼女，夢=(夢夢)墨=(墨墨)，亡章弼=(弼弼)，〼晏水〼風雨①。是於乃取(娶)ˡ虘〼□子之子，曰女蓌(媧)②。是生子四〼，是襄天埁(踐)，是各(格)参祟(化)。𧺆(?·廢)逃，爲禹爲萬(禼)吕司堵，襄咎(晷)天步③。𢓊²乃卡=(上下)朕𨗨(斷)，山陵不𢧢(𣏟)。乃命山川四𣫭(海)，〼寮既(氣)[illegible](害=豁)既(氣)，吕爲亓(其)𢧢(𣏟)④。吕涉山陵瀧沺𦉪(淵)澫，未又(有)昌=(日月)，四神³相戈(隔)，乃步吕爲𢧵(歲)。是隹(惟)四寺(時)⑤。

△魚部，○歌、月部。

注釋

①「曰故」，讀爲「曰古」或「粤古」。「〼熧」，上字僅存下半三劃，不詳；「熧」，原文作「[illegible]」，巴納隸定爲「㲈」，舊多釋「能」讀「熊」，連下字説爲楚先祖名。嚴一萍、唐健垣連上字讀爲「黄熊」(黄能是伏羲之號)，但上字殘劃與「黄」字不類。唯商承祚釋「羸」，較爲近是。按《詛楚文》「羸」字作「[illegible]」，與此相似，但所從「熧」右下從凡不從𠤎。「熧」字是否有從𠤎的呢?·過去一直不能肯定，衹是最近見到湖北出土的子季嬴青匿銘，其「嬴」字所從「熧」，從𠤎不從凡，正與此同，這才證明此字確實應釋爲「熧」。「霝虘」，嚴一萍、金祥恒、唐健垣並釋「伏羲」，其中嚴説最先出，但没有提供證明，金祥恒做專文考釋，才把問題解決。其上字，金祥恒釋爲「雹」，謂上半即《説文》

「雹」字的古文「□」，下從勹聲，「勹」即古「包」字；下字讀爲「戲」，雹戲也就是包戲、伏羲（古書異寫甚多，作伏戲、包犧、庖犧等），確爲卓識。「居」，原文作「凥」，《説文》居處之「居」作「凥」，蹲踞之「踞」作「居」，「凥」就是「居」的本字，不可讀爲「位」。「出自」、「居於」下皆爲地名，無可考。「毕田漁」，「毕」下一字殘，似爲「田」字的殘劃；「漁」下有重文號。《易·繫辭下》：「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漁」下三字皆殘，其中第二字似從木，其讀不詳。「夢夢墨墨」，《説文》：「夢，不明也。」《爾雅·釋訓》：「夢夢，亂也。」《詩·小雅·正月》：「視天夢夢。」《管子·四稱》「政令不善，墨墨若夜」，尹知章注：「其言昏闇之甚也。」夢夢墨墨猶茫茫昧昧，《文選》卷一六陸士衡《嘆逝賦》「何視天之芒芒」，李善注：「芒芒猶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淮南子·道應》「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莊子·知北遊》作「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媒」是之部字，則「墨」讀與「昧」同（《集韻》「墨」亦讀「昧」）。《淮南子·俶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正與此同。「亡章弼弼」，「弼弼」，嚴一萍、巴納釋「佪佪」，「亡章」殆指無法度，「弼」古通「拂」，是治的意思。下句，字缺不可讀，「風」寫法與《説文》古文略同，所從「凡」，右劃也有一斜筆。

②「是於」，猶言「是以」，「於」作「以」解，參楊樹達《詞詮》卷九。「虘☐☐子」，女□氏所出。「女□」，嚴一萍釋「女皇」，謂即女媧。按女媧，《藝文類聚》卷十一、《初學記》卷九引《帝王世紀》説是「一曰女希，是爲女皇」。嚴説女□即女媧，從帛書内容看是可信的，但「□」字在文字學上應該怎樣分析還值得考慮。我想這個字恐怕就是「媧」之本字，《帝王世紀》所説女希、女皇，希和皇可能都是此字的誤寫。另外，我們還注意到《古文四聲韻》卷一頁三八所收「完」字作「□」、「□」、「□」，與此字有些類似，或許帛書就是借「完」字爲「媧」，也有可能。伏羲和女媧傳説都是風姓，有些古書説兩人是兄妹，有些古書説兩人是夫婦，聞一多《伏羲考》據我國西南民族的神話傳説推證伏羲、女媧是以兄妹結爲夫婦，這與帛書所描述的故事是一致的。帛書此篇是講日月四時形成

的神話，一上來的兩個人物就是伏羲和女媧，這並不是偶然的。我們從漢畫像石和著名的高昌絹繪星圖都可見到伏羲和女媧是與日月星辰畫在一起，這説明伏羲和女媧與星曆家是有密切關係的。

③「是生子四囗」，當指生子四人。此四子也就是下文的「四神」。「襄」，襄理。「天戔」，「戔」字右半兩「戈」字的上一「戈」字殘，此從巴納釋，這裏讀爲「踐」，「天踐」即下文「天步」，指星曆推步。「格」，格致。「參化」，參天地造化。「⿰去廌逃」，這兩個字各家釋法極不統一，上字，商承祚、陳邦懷、饒宗頤（一九六八）釋「灋」，林巳奈夫（一九六五）釋「唬」；下字，商承祚、陳邦懷、巴納釋「逆」，林巳奈夫（一九六六）、饒宗頤（一九六八）釋「逃」，嚴一萍釋「徙」。今按此二字應釋爲「⿰去廌逃」，讀爲「廢逃」。「禹」，字殘，陳邦懷釋出爲「禹」，即夏禹。「萬」，商承祚、陳邦懷讀爲「禼」，即商契，「契」字本作「禼」，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及《漢書・古今人表》。「司堵」，「堵」，垣也，這裏指四方，嚴一萍釋「城」，饒宗頤（一九六八）釋「域」，字形均不合。「襄咎」，「咎」疑讀爲「晷」。天步，《詩・小雅・白華》：「天步維艱，之子不猶。」指天道所行。這段話大約是説四子失其職守，爲禹和契分守過四方，職司天曆推步。按帛書所記四子與《書・堯典》所記堯時分守四方，「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的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即所謂羲、和四子非常相像。《國語・楚語》：「及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書・堯典》孔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高辛氏以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按照這些古書記載的傳説，從顓頊以至於夏、商，一直都有世代相襲掌守天地四時的官守，他們在顓頊的時代叫作重、黎，在堯、舜以至於夏、商的時代叫作羲、和。並且《國語・鄭語》、《山海經・大荒西經》、《大戴禮・帝系》等許多古書還説，重、黎是顓頊之後、楚人之先。可見這裏代表的實際上是楚人的傳説系統。重、黎或羲、和四子其所職與帛書四子是相同的，所以二者應當是一

回事。但是帛書所記有一點是新鮮的，這就是它把四子的年代説得更早，直接以之爲伏羲、女媧之後。這使我們聯想到，羲、和二氏中的「羲」可能就是源自於伏羲，而「和」則是源自於女媧（和、媧均古歌部字，聲紐亦相近）。這裏帛書提到四子於夏商之際失其職守。《古文尚書·胤征》篇説「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於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保留的就是這一傳説。帛書全篇講羲、和四子最多，這不是偶然的。古人説「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帛書是數術家講曆忌之書，自宜爲其所祖。

④這是説由於羲、和四子失其職守，致使天地隔絶。「乃」上一字從辵，不清，可能是「適」一類意思。「上下」，「上」字下面的一横，底下還有殘劃，巴納補爲「上下」二字合文（參丙七：二一八），甚確。這裏「上下」指天地。「朕⿺辶叀」，「朕」，接縫處，《考工記·函人》：「視其朕，欲其直也。」「⿺辶叀」，稍殘，與乙七—三四爲同一字，即「傳」字，其字也見於所謂銅龍節，作「⿺辶叀」。《説文》：「斷，截也，从斤从𢇍。𢇍，古文絶。𣃔，古文斷，从皀。皀，古文叀字。《周書》曰：『䀡䀡猗無他技。』𣃔亦古文。」《説文》所收「斷」字的古文實際上是一個從刀叀聲的字。這裏「⿺辶叀」字從之，應讀爲「斷」，謂天地隔絶。「⿰犭武」，從武與從疋同（古音皆魚部），饒宗頤（一九六八）讀爲「疋」即「疏」，甚確。《國語·周語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韋昭注：「疏，通也。」古人認爲「國必依山川」，川原塞，國必亡（見《周語上》），「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周語下》）。「山陵不疋」，所以要開通川谷，以通其氣。「乃命山川四⿱母日」，「⿱母日」應即「晦」字的別體，這裏讀爲「海」，《書·考靈曜》：「海之言昏晦無所睹也。」《釋名·釋水》、《廣雅·釋水》並云：「海，晦也。」四海，古書中常用爲四方之義，但這裏既連山川而言，則應當是指百川所歸之海。「山川四海」作爲「命」的對象，這裏是指山川四海之神。「寮」，舊多釋「熏」，此從嚴一萍釋。按「熏」，當中不應作日形，又此所謂氣者，實際上是指地之氣脈，也就是水，不當云「熏」，其字應爲「寮」，同「寮」，《説文》：「寮，穿也。」「熙」下一字，饒宗頤

（一九六八）釋「金」，不確，疑爲「害」字，這裏讀爲「豁」，也是穿通的意思。二「既」字皆「氣」字，《汗簡》卷四頁三二所收「氣」字與此相同，《説文》：「㮣，氣或从既。」「氣」後世别體作「炁」，即從「既」省。饒宗頤（一九五八）最先釋出此字爲「氣」，此從之。

⑤「山陵瀧泔凼澫」，「瀧」，《説文》：「瀧，雨瀧瀧皃。」《廣韻·江部》：「瀧，南人名湍。」「泔」，商承祚、陳邦懷釋「洦」，嚴一萍釋「涿」，饒宗頤（一九六八）、巴納釋「汩」，均不確。今按此字右半上出兩筆甚長，應是「甘」字；「凼」，疑同《説文》「淵」字的古文「囦」；「澫」，讀與甲一一—一七「澫」字同。「未有日月」，下文云「夋乃爲日月之行」，此時日月尚未産生。「四神相戈」，「戈」字横筆右端有一彎，寫法與楚簡習見之「戈」字同，這裏疑讀爲「隔」。李家浩《戰國邙布考》認爲此字也是用爲「弋」字，讀爲「代」，亦通。「乃步以爲歲」，「歲」字從步戉聲，或即出於此義。「是惟四時」，「惟」猶「爲」也，參楊樹達《詞詮》卷八。這裏帛書所説四子相隔，乃步以爲歲，可與《堯典》所述羲、和四子被派駐四方、分掌四時的描述對觀。

二

倀（長）曰青榑△（榦），二曰未（朱）四單△（單），三曰習黄難△，四曰𦥑墨榑△（榦）①。千又（有）百歲（歲），𣅀=（日月）[4]夋（允）生○②，九州不坪○（平）。山陵備𡿪，四神乃（？）乍（？·作）至于𡕒（覆）。天旁（方）遵（動），攼（扞）𢿱（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精）[5]③。炎帝乃命祝𩁹（融）㠯四神降，奠三天；𢔎思敦，奠四亟（？·極）④。曰：非九天則大𡿪，則毋敢𢼸天霝○（靈）。帝夋乃[6]爲𣅀=（日月）之行⑤。

△元部，○耕部

注釋

① 當即帛書邊文所附圖形中之四木，亦即四神所立四方四時的標誌。「倀」同「長」，「長曰」猶言「一曰」。「青榦」，「青」字僅存上半殘劃，上疑奪一字；「榦」，舊釋「橼」是錯誤的，林巳奈夫（一九六五）隸定作「檝」，近是。按此字原文從木從□，「□」即《說文》隸定爲「倝」者，與戰國文字「□」（用爲「韓」字）同，但帛書此字既從木從倝，則實際上就是「榦」字，「榦」字別體作「幹」，即由此字右旁演化。《說文》：「榦，築牆耑木也。从木倝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按植於兩邊者曰榦，植於兩耑者曰楨。」《書・費誓》：「峙乃楨榦。」中山王圓壺銘：「惟邦之榦。」（參《詩・大雅・文王》「惟邦之楨」。）這裏的四木也就是四神所立的四根擎天柱。在帛書的布圖中，這四木的作用與古代出土占盤上面的四維相同（四獸鏡當中的四瓣花也是起同一作用）。馬王堆帛書《十六經・果童》：「夫天有榦，地有恒常。」《行守》：「天有恒榦，地有恒常。」四木也就是四天榦。「青榦」，即帛書右上角之青木，代表東方和春天，下領一至三月。「未四𠷎」，「未」應爲「朱」字之誤，「𠷎」，金文有兩種寫法，一種作「□」，一種作「□」，這裏是用後一寫法。楚王酓□鼎和酓忎鼎「戰」字所從「單」即用此，又《古文四聲韻》的「單」字和「禪」字所從的「單」，亦用「𠷎」爲「單」。這裏「𠷎」亦當讀「單」，巴納讀「單」，可從。「朱四單」，即帛書右下角之赤木，代表南方和夏天，下領四至六月。「習黃難」，「難」左半從「黃」，「黃」與「𦰩」相淆發生甚早，參唐蘭《殷虛文字記》六四頁，這裏仍釋爲「難」。「習黃難」當是黃木，但黃木不見於帛書，帛書左下角之木是用墨綫白描，恐所記有誤。帛書左下角白木代表西方和秋天，下領七至九月。「咮墨榦」，即帛書左上角黑木，代表北方和冬天，下領十至十二月。

② 「夋」，舊多以爲即下文帝夋，謂日月由夋而生，非是。按應讀爲「允」，在此作語中助詞，無義，參楊樹達《詞詮》卷九。

③「坪」，即楚字「平」，各家中祇有嚴一萍把此字讀對。這個字應釋爲「平」已爲許多出土材料所證實，參看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文物》一九七九年九期），舊釋「塝」、「埇」皆誤。「備蚄」，「備」與甲一〇—一二四同；「蚄」字並非從光或從天，而是從矢，「矢」是聲旁，其讀法不詳。這裏的「四神」就是上述四子。按我國古代神話，現存記天崩地裂的材料祇有《淮南子·天文訓》等書所記共工怒觸不周山的故事，説是「天柱折，地維絶，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其所描述的情景與帛書是類似的，但帛書没有將天傾地側歸之共工，下文所説立極安天的也不是女媧，而是伏羲、女媧所生四子。「乃乍至于覆」，晉姜鼎「乍疐爲極」，𣪘毁「毗（峻）在上，乍疐在下」，「疐」與「極」互文，應讀爲「至」，與「極」同義，「乍至」也就是立極；「于覆」，「于」猶「以」也，參楊樹達《詞詮》卷九；「覆」是天覆地載之「覆」，指立四極以承天覆。「天旁遈」，讀爲「天方動」。「攼斁」，「攼」同「扞」，毛公鼎：「攼（扞）敔（御）王身」；「斁」，永盂銘「錫畀」之「畀」作「臭」，唐蘭説此「臭」字即《周禮·夏官司馬》「司弓矢」所提到的痹矢（《永盂銘文解釋》，《文物》一九七二年一期）。今按此字實際上也就是《方言》所記之「錍」，所謂「（箭鏃）其廣長而薄鐮，謂之錍」。這裏「斁」字從攴臭聲，應讀爲「㪏」即「蔽」（金文中的「[illegible]」即應釋爲「蔽」）。下五木，即承天的五根柱子，其中黄木不見於帛書附圖。立五色木以承天覆的故事，古書没有明確記載，但納西族民間史詩《創世紀》（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却有相似的描寫，其「開天辟地」章講到神的九兄弟和七姊妹開天辟地，「把天開成峥嶸倒挂的」，「把地辟成坎坷不平的」，於是「東邊豎起白螺柱，南邊豎起碧玉柱，西邊豎起墨珠柱，北邊豎起黄金柱，中央豎起一根撑天大鐵柱」。五木之「精」，「精」同「精」。

④帛書提到炎帝、祝融，這很值得注意。《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説五紀之帝，以炎帝爲火師，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説五工正，《禮記·月令》和《吕氏春秋》更以炎帝爲代表南方和夏季的帝，以祝融爲代表南方和夏季的神，將二者相配。《山海經·海内經》以祝融爲炎帝之後，並稱祝

融生共工，而芈姓的楚人據《國語・鄭語》記史伯之言是所謂「祝融八姓」之一。這都說明帛書所記炎帝、祝融以及下文的共工等人也是反映楚人的傳說系統。「奚思」，與「四神降」互文，「奚思」應爲名詞，「敄」應爲動詞，其義不詳。這段話大約是說炎帝命祝融遣四神降於人間，安定日月星辰，建立四極以承天覆。「三天」，疑指日、月、星三辰。「四亟」，「亟」字殘，從林巳奈夫(一九六六)、饒宗頤(一九六八)、巴納釋。天傾則日、月、星、辰移，故須安定之。

⑤「非九天則大⿰皿夫」，「則」在這裏是「之」的意思，「則」訓「之」，參楊樹達《詞詮》卷六。「則毋敢叡天霝」，「敢」字原字作「[illegible]」，舊隸定多誤，今按應釋爲「敢」；「叡」，通也；「天霝」，讀爲「天靈」，指天神。這段話大約是說，若非九天傾側(?)，則不得上通於天神。《國語・楚語》有所謂重、黎「絕地天通」的神話，其中的火正黎，《國語・鄭語》說就是祝融(祝融是官名，即火正)，與帛書正相符合。「帝夋」，即《山海經》中的帝俊，也就是舜。舜傳爲顓頊之後，也是楚人傳說的祖先。《山海經・大荒南經》和《大荒西經》有帝俊之妻羲和生十日、十二月的傳說。《書・舜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這說明帝俊也與天文曆數之學有密切關係。

三

共攻(工)□步十日四寺(時)①，□□神則閏四□。毋思百神，風雨晨禕，𧮫(亂)乍(作)。乃逆昌=(日月)㠯⿺辶剸(轉)相□思(息)，又(有)宵又(有)朝，又(有)晝又(有)夕②。

注釋

①「共攻」，即共工。「共」字的寫法值得注意，嚴一萍說：「共，古璽作[illegible]，《說文》古文作[illegible]，蓋已譌變。」這裏大約是說共工推步十日四時。按十日的神話也是我國古代神話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這一傳說可分兩種：一種是「十日迭出」說，謂十日居暘谷扶桑木上，輪番出沒；另一種是

「十日並出」說，謂堯之時，十日並出，民不堪其熱，於是而有羿出，射其九日而餘其一日。後說即由前說演化。十日也就是後來的十干所本，參管東貴《中國古代十日神話之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三十三本）。四時，這裏可能不是指春、夏、秋、冬四時，而是指下文之「宵」、「朝」、「晝」、「夕」，參荀悦《申鑒》「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淮南子・天文訓》「禹以爲朝、晝、昏、夜」。

② 「閏」，疑讀爲「潤」，謂調節風雨以潤澤下民，但上下有缺文，意義不清楚。「風雨䨓禕」，《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風雨震晦」或即此。案上古音「禕」字屬微部，「晦」字屬之部，並不相通，但上古微部從西漢即已合併於脂部，在漢代韻文中經常與之部字通押（參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册），讀音相近。「亂作」，於是混亂發生。「乃𢓊日月以遡相▱思」，「遡」，這裏讀爲「轉」；「思」，疑借爲「息」，《詩・周南・漢廣》「不可休思」，《釋文》「本或作息」，惠棟《九經古義》云「思」與「息」通（阮氏《校勘記》以字誤說之，非是）；「思」上一字殘，疑與「息」反義，可能是「作」一類意思。「宵」，夜也；「朝」，早也；「晝」，從日不從旦，仍是「晝」字，指白天；夕，字殘，嚴一萍、饒宗頤（一九六八）、巴納均釋「夕」，可從，指傍晚。這段話的意思大約是說，共工推步（？）十日四時，命百神調節風雨以潤澤下民，不意百神没能正確掌握風雨的時辰，遂致亂生，於是决定讓日月轉相作息，在一天之内分出早晚四時。

字數：全篇凡二百五十八字，外加合文五字，重文四字。

丙 篇

取于下①

曰：取，乙（䰜）則至，不可㠯[1]𡆥殺②。壬子、酉（丙）子凶，乍（作）[2]▱北征，衒（帥）又（有）

咎，武⊠[3]□亓(其)畝[4]③。

注　釋

①「取」，即《爾雅·釋天》十二月名之「陬」，春正月。按帛書邊文章題皆取三字爲名，與漢代讖緯之書常以三字爲名相似(先秦子書中《莊子》内篇也是取三字爲名)。每一章題，第一字是月名，代表所附神像，下面二字，於每一季節最末一月，皆表示該神職司，如司春、司夏、司秋、司冬，其他各月，也與帛書各章内容有關，但有些還讀不很明白。此月神像作蛇首鳥身形。「于下」，不詳。

②「乙」，與甲乙之「乙」有别，《説文》：「乙，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或體作「鳦」。「乙」就是燕子，《詩·邶風·燕燕》「燕燕于飛」，傳：「燕燕，鳦也。」《釋文》：「鳦音乙，本又作乙。」《爾雅·釋鳥》：「巂周，燕燕，鳦。」《大戴禮·夏小正》：「二月……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又謂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内(納)也。」《禮記·月令》：「是月(仲春)也，玄鳥至。」皆記燕於二月始來，較帛書所記遲一個月。「殺」上一字殘，右半似是「又」旁或「攴」旁。「殺」，與《説文》「殺」字的古文「[illegible]」、「[illegible]」，特别是《侯馬盟書》的「殺」字([illegible])非常相像，這裏釋爲「殺」。我國古代月令之書皆以春正月爲養生之時，忌諱獵殺動物，帛書這句話可能是同樣意思。

③「壬子、丙子」，「壬」字當中横畫短，與帛書「王」字三横畫皆長不同；「丙」字下有「口」，仍是「丙」字，並不是「商」字。壬子、丙子是古人所謂「五子」中的兩種，《漢書·律曆志上》「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注：「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故有五子。」也就是説六十甲子中，除甲寅至癸亥十個干支無子出現外，其他五十個干支中皆有一子出現，是爲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五

子。《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易類」著録《古五子》十八篇，班固注：「自甲子至壬子，説《易》陰陽。」《初學記》卷二一引劉向《别録》原文，則説是「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複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以上《易》。」其書已佚。《管子・五行》略載古五子之説，分一年三百六十日爲五，説是「睹甲子木行……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七十二日而畢也。」類似説法也見於《淮南子・天文》。此章大約是説正月燕來，不可以殺生，壬子、丙子之日凶，若用兵北征，則其帥有咎，出師不利。

女（如）此武①

曰：女（如），可㠯出帀（師）簹（築）邑[1]，不可㠯豙（嫁）女取臣妾[2]，不夾（兼）㝵（得）不戚（慽）[3]②。

注釋

①「女」，即《爾雅・釋天》十二月名之「如」，春二月。「此」，舊不識，嚴一萍始疑爲「此」字。今按「此」字與楚簡及漢代簡帛書籍中的「此」字寫法相似，釋爲「此」是對的。「女此武」，似可借字連讀爲「如此武」，謂此月可舉武事。所附神像作四首兩身連體鳥形。

②此章文字完全，内容清楚。「簹邑」，「簹」，《説文》「築」字古文作「[illegible]」，《汗簡》卷五頁二三「築」作「[illegible]」，《古文四聲韻》卷五頁四「築」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嚴一萍據釋「築」，甚確。「豙」，曾憲通釋「家」，楚字「家」多如此作，如楚公豙鐘、戈，還有楚簡上所見到的「豙」字，上增一「爪」，仍是「家」字（楚簡中的「[illegible]」字上亦從爪），這裏讀爲「嫁」。「臣妾」，男女奴隸，見於卜辭與《周易》，均是經常卜問的對象，《史記・龜策列傳》所録龜卜之辭亦有「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以及

「可以娶婦嫁女」等語。「夾」，或釋爲「亦」（以「夾」所從兩「人」字爲起筆帶頓挫的兩點）。今按此字字形與中山王墓《兆域圖》銅版「闆閔（狹）」的「閔」字所從「夾」相同，應釋爲「夾」。「夾」，古音爲談部字，這裏應讀爲「兼」，謂可以出師、築邑則不可嫁女、取臣妾，二事不可兼而得之。「不戚」，應讀爲「不憾」，「戚」即古「感」字，説詳上文。

秉司春①

［曰：秉］▨▨……[1]妟畜生（牲）分▨□[2]②。

注　釋

①「秉」，即《爾雅·釋天》十二月名之「寎」，春三月。所附神像作方頭怪獸形。

②此章殘泐較甚。第一行開頭二字係據文例補，下估計約缺二字。第二行開頭估計也約缺二字。下一字上半不甚清晰，巴納釋爲「宴」。「畜生」，即「畜牲」。行末存一章號。

余取（娶）女①

曰：余，不可㠯乍（作）大事。少杲亓（其）[1]▨，▨龍亓（其）▨，取（娶）女爲邦芺（疑）[2]②。

注　釋

①「余」，與《爾雅·釋天》所記十二月名之夏四月名同。「取女」，即下文「取女」，謂是月可以娶女。所附神像作分尾蛇形，蛇之雙尾相絞。

②第一行「余」字僅存左半，下面的「不可」二字是在一塊碎帛片上，裝裱時被錯植在第二行上端，並且方向是橫過來的。「大事」，《禮記·月令》「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鄭玄注：「大事，

兵役之屬。」「少杲」，或以爲即少皞。「☐龍」，不詳。「取女」，《易經》多見，如《易・咸》：「取女吉。」《釋文》：「取本作娶。」娶女也是古人經常卜問的對象。「芺」，此字不見於一般字書，唯《集韻》收爲「疑」字的古文，今據釋爲「疑」。《詩・大雅・桑柔》「靡所止疑」，傳：「疑，定也。」或讀爲疑惑之「疑」，亦通。

欱出睹①

曰：欱，戤（盜）銜（帥）☐旻（得）㠯匿。不[1]見月才（在）昌☐，不可㠯亯[2]祀凶。取☐☐爲臣妾[3]②。

注　釋

①「欱」，從欠古聲，即《爾雅・釋天》十二月名之「皋」，夏五月。「出睹」，《說文》：「睹，旦明也。」恐非此義，疑當讀爲「出睹」，指下文所說「盜帥☐得以匿」。所附神像作三頭人形。

②「戤」，李學勤（一九六〇）、安志敏、陳公柔、商承祚釋「賊」，林巳奈夫（一九六五）釋「敗」，嚴一萍釋「貳」讀「忒」，饒宗頤（一九六八）釋「賊」讀「三」，巴納、曾憲通釋「濺」。今按此字左半象倒首形，可以隸定爲「県」，《說文》：「県，到（倒）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県字。」從戈象以戈梟首倒懸，這裏讀爲「盜」。「盜帥☐得以匿」，疑謂盜帥不得藏匿。「月在昌☐」，下二字也許是星名。

虞司頣（夏）①

曰：虞，不可出帀（師）。水帀（師）不䢔，亓（其）䢔（敗？）[1]亓（其）复（覆），至亏=（至于）亓（其）☐☐，不可㠯亯[2]②。

注　釋

①「虞」，即《爾雅・釋天》十二月名之「且」，夏六月。所附神像作獼猴形，兩臂長而柔軟，

並有尾在身後可見。疑月名「虘」應讀爲「狙」，《説文》：「狙，玃屬」，「玃，母猴」。《廣雅・釋獸》：「猱、狙，獮猴也。」（王念孫《廣雅疏證》謂古書中所説的母猴、沐猴其實就是獮猴。）與此圖形正相符合。由此考慮，似帛書其他月名與圖形均有類似的對應關係。

②「至于其⊠⊠」，「其⊠⊠」三字因帛書幅面走形，作斜行，必須側過來看。「水師」，楚地多水，宜用水師。這一章大約是説六月不可出師，特别是水師，出師則不利。

倉莫（？）旻（得）①

曰：倉，不可㠯川⊠，大不[1]訓（順）于邦，又（有）㬎（盗）内（入）于卡=（上下）[2]②。

注　釋

①「倉」，即《爾雅・釋天》十二月名之「相」，秋七月。所附神像作鳥身人首形，人首上戴角，鳥身僅一爪。

②「川⊠」，不詳。「訓」，讀爲「順」，其右半雖然衹有兩筆，像是「訢」字，但楚簡「尚自利訓（順）」，「訓」字的寫法與此相同，可以證明這個字仍然是「訓」字。「㬎」，林巳奈夫（一九六〇）、巴納釋「須」，李棪（嚴一萍文引）釋「梟」。今按應同上「㬎」字，釋爲「盗」。

臧杢⊠①

曰：［臧］，不可㠯筑（築）室，不[1]可［㠯］⊠，⊠脨不遉（復），亓（其）[2]邦又（有）大𤔔（亂）。取（娶）女，凶[3]②。

注　釋

①「臧」，即《爾雅・釋天》十二月名之「壯」，秋八月。第二字釋「杢」，與《説文》「社」字古

文所從相同，讀法不詳。所附神像作吐舌長毛獸形，兩足。

②第一行「臧」字缺，據文例補。「不」字僅存一橫畫。第二行「▨脨」，「脨」從肉從朿，「朿」帛書作「朿」，與《正始石經》「速」（迹）字所從相同。

玄司昧（秋）①

曰：玄，可㠯筥（箮＝築）室（？）……⌐可（？）▨□逾乃▨……²②。

注　釋

①「玄」，同於《爾雅・釋天》十二月名之秋九月。所附神像作一兩頭龜（？）形，或即玄龜。

②第一行，「筥」下一字殘，似是「室」字。以下估計約缺二至三字。第二行，首字參「姑分長」章1—6，也許是「可」字。「逾」，原文作「逾」，與信陽長台關一號墓遺冊「一楃（楃）」所從相同。

昜（陽）▨兼（？）①

曰：昜（陽），不毁（毀）事，可［㠯］……⌐折敓（除），故（去）不羛（義）于四……²②。

注　釋

①「昜」，同「陽」，即《爾雅・釋天》十二月名之「陽」，冬十月。第二字殘。末字嚴一萍、巴納釋「義」，然驗以帛書照片卻像是「兼」字，此從饒宗頤釋「兼」。所附神像爲歧冠鳥形。

②「可」下缺一字，應照補「㠯」字。下缺去字數不詳。「義」，《說文》「義」別體作「羛」，云「墨翟書義从弗，魏郡有羛陽鄉，讀若錡，今屬鄴，本內黃北二十里」。帛書「義」字，下所從與「弗」相近，據以隸定，但這個類似「弗」的偏旁也可能是「我」字的變體。此章因爲缺字太多，內容不大清楚。

姑分長①

曰：姑，利戠（侵）伐，可已攻成（城）[1]，可已聚衆，會者（諸）侯，型（刑）首[2]事，殍（戮）不義（義）[3]②。

注　釋

①「姑」，即《爾雅・釋天》十一月名之「辜」，冬十一月。所附神像作牛首人身。

②此章文字完整，内容清楚。「利戠伐」，「利」字一般都隸定作「杒」，經仔細辨認仍然是個從禾的字，「戠」同「侵」，《易・謙》：「利用侵伐。」這幾句，「侵伐」與「攻城」，「聚衆」與「會諸侯」，「刑首事」與「戮不義」都是意思上有關聯的話。「首」字殘，一般都釋爲「百」，筆劃與「百」不合，今從商承祚釋「首」，《吳越春秋》卷五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首事」即舉事。古人説春夏行德，秋冬行刑，此月看來是宜於行兵刑之事最主要的一個月。

荃司沓（冬）①

曰：敓，不可已攻……[1]▨□□□□㱙▨……[2]②。

注　釋

①「荃」，即《爾雅・釋天》十二月名之「涂」，冬十二月。所附神像作口吐長舌人形，頭上插有羽飾。

②月名「荃」，這裏作「敓」。此章第一行末與第二行末缺去字數難以估計，拼對也很混亂，貼近文字右旁有一對月牙形圖飾，並有字迹殘劃一，不知從何處移入。各家多以「曰敓不可以攻」爲第一行，第二行末有兩三字殘劃，但巴納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兩個臨寫本却作「曰荃不可以

攻吱⧄[1]，敎□□□□□□□□□□□[2]」，嚴一萍、曾憲通從之。看來他們是把月牙形飾物旁邊的殘劃當作第一行的「曰」字，而接此逕補「荃」字，再接左邊「不可以攻」四字，再接更左邊的「吱⧄」二字，然後直接以「不」上的「敎」字爲第二行，不計「敎」字上估計是「曰」字的殘劃，也不管這一行左邊的字迹殘劃一。今並爲正之。此章因缺字太多，內容不明。

字數：全篇凡二百三十三字，外加合文二字，章題三十六字。全書共計字數當在九百三十六字以上，外加合文十二字、重文七字，可得九百五十五字。

注釋

〔一〕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同樣形制的竹器，所繫木牌均自銘爲「笥」，過去有竹笈、竹匣、竹篋等異稱。

〔二〕、〔五〕《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四年七期三九—四八轉六三頁。

〔三〕熊傳新《對照新舊摹本談楚國人物龍鳳帛畫》，《江漢論壇》一九八一年一期九〇—九四頁。

〔四〕《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六〕《山東臨沂金雀山九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七年一一期二四—二七頁。

〔七〕採用這一臨寫本的還有鄭振鐸《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圖版十六：圖一〇〇，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〇年；《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五年七期圖版廿四；《抗議美帝掠奪我國文物》圖四四，文物出版社一九六〇年三月。

〔八〕此期《文物》封底內印有蔡氏本。

〔九〕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考古發掘隊《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王健民等《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龍白虎圖像》，《文物》一九七九年七期一—一四頁，四〇—四五頁。

〔一〇〕參看陳夢家《漢簡年曆表叙》（第三、漢代占時、測時的儀具：一、式；二、日），《考古學報》一九六五年二期一〇三—一四九頁；嚴敦傑《跋六壬式盤》，《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年七期二〇—二三頁；《關於西漢初期的式盤和占盤》，《考古》一九七八年五期三三四—三三七頁；殷滌非《西漢汝陰侯墓的占盤和天文儀器》，《考古》一九七八年五期三三八—三四三頁。

〔一一〕參看注〔九〕陳夢家文。

〔一二〕參看王振鐸《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上）（下），《中國考古學報》第三册一一九—二五九頁，第四册一八五—二二三頁。

〔一三〕參看熊傳新《談馬王堆三號西漢墓出土的陸博》，《文物》一九七九年四期三五—三九頁。按式與棊是同一種性質的東西，所以《史記·日者列傳》說「旋式正棊」，「規矩鏡」上的十二辰與式的排列也是一樣的。

〔一四〕漢代人推測古代明堂是四堂相背，四室相對，合抱一太室，與現在的四合院式建築正好相反。這恐怕並不符合古代明堂建築的實際情況。

〔一五〕按四宫之名見於古書稱引，惟明堂最著，其次是玄宫，他名則絶少見。明堂的出名當即由「月令」類圖式的流行所致。

〔一六〕古人是以南北東西爲前後左右，直到明清還是如此。明清時代的北京城，前門在南，後門在北，左安門在東，右安門在西。文華殿和武英殿、崇文門和宣武門東西對稱，這也是按「左文右武」的老規矩安排的。

〔一七〕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九年一期。

〔一八〕馬王堆漢墓帛書《古地圖》，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三月。

〔一九〕八位雖用了八卦的名稱，在這種圖式中却是從四方分化，後來出現的九宫也是這樣，八卦九宫本來都是屬於《易》學系統的東西，大概後來才被合併到這種圖式中來。

〔二〇〕《淮南子·天文》：「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冲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左前刑，右背德」也就是左前爲陰，右背爲陽，與春夏秋冬的陰陽是一樣的。兵家書常説「右背山陵，左前水澤」，也屬此類。

〔二一〕帛書衹有與「明堂」相配，才叫「明堂圖」，否則便不能叫「明堂圖」。因爲「明堂」也可以與其他東西相配。如《漢書·藝文志·數術略》還有《周易明堂》二十六卷，其書應當就是以八卦與明堂相配。

〔二二〕每日禁忌稱「日禁」，歲月禁忌稱「月諱」。《論衡·譏日》：「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荆楚歲時記》：「俗人月諱，何代無之？但尚矯之歸於正耳。」

索引

凡例

一、本索引是據作者所撰帛書釋文編寫，分單字、合文、未隸定的字及局部可隸定的字四項。凡疑似的殘字（括注？號者）均附入相同字例，無法辨識的殘字（作▨號者）和缺文（作□號者）均未收入。

一、字例以筆劃多少和筆形順序（一、丨、丿、丶、乛）爲先後。每字於字樣上冠以釋文，下注讀法與句例。

一、比較複雜難識之字均簡要注明最先釋出者的意見或作者新釋的理由。考釋各家僅録姓名，作品名稱不具，詳見正文「論著簡目」節。如一家兼有數篇之作，則以發表先後爲別。

一、句例以讀如本字者居先，假讀者列後分類條列，每一釋文編號各爲一條，用—號表示句中所見該字。

一、字樣凡形體相同者僅録一例，但別體及疑似的殘字則另爲録寫。

單字	文例
乙	同䖍　—則至 (丙1：1—3)
二	—月(甲3—26)、隹十又—月(?) (甲7—1)、—曰朱四嘼(乙4—16)
十	隹—又二月(?)(甲6—33)、共 攻☒步—日四寺(乙7—9)
乃	—又鼠☒(甲4—28)、☒☒—兵(甲5—4)、戠季—☒(甲8—1)、五 正—明(甲9—15)、羣神—悳(甲9—27)、是於—取虞☒□子之子(乙 —35)、𦣻☒—卡=朕遡(乙3—1)、—命山川四嗇(乙3—9)、—步言爲戠 (乙4—3)、炎帝—命祝融言四神降(乙6—3)、帝夋—爲昷=之行(乙6—35)、 —𦣻昷=言遡相☒恖(乙7—30)、……　殘　四神—乍(?)至 司☒□通—☒……(丙9：2—5)　:)　于復(乙5—13)
人	卉木民—(甲5—29)、民 —弗智戠(甲12—18)
九	—州不坪(乙5—3)、非 —天之大𡶶(乙6—22)
又	讀爲有　□—叜尚(甲1—18)、—泉𣳾淐(甲2—23)、吉☒□—電雩 (甲3—4)、西䧘—吝(甲4—22)、乃—鼠☒(甲4—29)、東䧘—吝

（甲4－34）、隹十－二月(?)（甲6－34）、亡－尚沍（甲8－8）、民則－穀（甲12－3）、亡－相𧖴（甲12－6）、少－☒（甲12－31）、未－肙(乙8－33）、千－百歲（乙4－32）、－宵又朝（乙8－3）、又宵－朝（乙8－5）、－晝又夕（乙8－7）、又晝－夕（乙8－9）、衛－咎（丙1:3－5）、－縣内于𠧪（丙7:2－4）、亓邦－大𧸖（丙8:3－2）、

于

降－亓［四］方（甲2－15）、☒－亓王（甲5－7）、凥－䥞☒（乙1－12）、四神乃(?)乍(?)至－𡿨（乙5－16）、取－下（丙1:㊂2）、大不訓－邦（丙7:2－2）、故不𦯧－四……（丙10:2－6）、又縣内－𠧪（丙7:2－7）

土

雨－（甲3－8）、－夂亡䣝（甲7－11）、－事勿從（甲12－33）

三

－月（甲3－28）、－寺是行（甲6－6）、－寺☒𦣻（甲6－15）－沍𡙭（甲8－25）、－曰𦐊黃難（乙4－21）、奠－天（乙6－12）

下

乍亓－凶（甲7－21）、－民之 𢦏(甲10－33）、取于－（丙1:㊂3）

大

非九天之－𧊒（乙6－25）、不可㠯乍－事（丙4:1－7）、－不訓于邦（丙7:1－8）、亓邦又－𧸖（丙8:3－3）

才

讀爲在　不見月－㠯☒（丙5:2－3）

山
—陵亓斁（甲2－19）、—川澫浴（甲二－15）、—陵不斌（乙3－5）、乃命—川四晉（乙3－11）、百涉—陵瀧汩凼澫（乙3－26）、—陵備䘙（乙5－7）

上
⧄⧄—实（甲6－4）

凡
巴納德釋凡　—歲悳匿（甲5－二）

文
饒宗頤（1968）釋文　土—亡鼎⧄（甲7－12）

川
山—澫浴（甲二－16）、乃命山—四晉（乙3－12）、不可已—⧄（丙7：1－6）

千
—又百歲（乙4－31）

夕
稍殘、嚴一萍釋夕　又晝又—（乙8－10）

亡
是胃遊終—（甲3－34）、是胃曖絽—（甲4－14）　又通無　卉木—尚（甲1－34）、土文—鼎⧄（甲7－13）、—又尚亙（甲8－7）、—又相䜌（甲12－5）、—章弼（乙1－24）

之

是遊月閏—勿行（甲3—22）、隹邦所☒実—行（甲5—24）、吕☒四淺—尚（甲5—34）、隹悳匿—歲（甲6—13）、㜸—吕䢔降（甲6—20）、是月吕䣝曆爲—正（甲6—30）、敬—哉（甲9—33）、神則各—（甲10—12）、神則惠—（甲10—20）、下民—䛫（甲11—1）、敬—毋弋（甲11—4）、帝䣝縊吕䣝遊（?:）—行（甲11—33）、是於乃取虞☒□子—子（乙2—5）、攼敷—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木之精（乙5—23）、攼數之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木—精（乙5—34）、非九天—大鉃（乙6—24）、帝夋乃爲月=—行（乙7—3）

女

僉☒☒☒女（乙1—21）、曰—鲞（乙2—8）、不可吕豪—取臣妾（丙2:2—5）、余取—（丙4:四3）、取—爲邦芙（丙4:2—7）、取—（丙8:3—6） 又讀爲如 —月=既䢐（甲4—24）、—☒☒☒（甲5—15）、—此武（丙2:四1）、—（丙2:1—2）

子

是於乃取虞☒□—之子（乙2—4）、是於乃取虞☒□子之—（乙2—6）、是生—四☒（乙2—12）、壬—酉子凶（丙1:2—4）、壬子酉—凶（丙1:2—6）

不

緈絀—旻亓鴬（甲1—9）、—旻亓參職（甲3—9）、星曆—同（甲7—28）、—欽敬行（甲11—19）、民祀—䊨（甲11—25）、—見陵☒（甲12—9）、山陵—斌（乙3—7）、九州—坪（乙5—5）、—可吕𡿨殺（丙1:1—6）、—可吕豪女取臣妾（丙2:2—1）、—夾旻不戚（丙2:3—1）、不夾旻—

戚(丙2:3−4)、一可㠯乍大事(丙4:1−3)、一見月才㠯☒(丙5:1−9)、一可㠯亯祀(丙5:2−6)、一可出帀(丙6:1−3)、水帀一𨑓(丙6:1−9)、一可㠯亯(丙6:2−7)、一可㠯川☒(丙7:1−3)、大一訓于邦(丙7:1−9)、一可㠯斂室(丙8:1−3)、一可[㠯]☒(丙8:1−8)、☒脿一逿(丙8:2−6)、一𪐯事(丙10:1−3)、故一兼于四……(丙10:2−4)、𣩵一菁(丙11:3−3)、一可㠯攻……(丙12:1−3)

亓

亓

同其 經絀不旻一棠(甲1:11)、䫄逰一行(甲1−26)、降于一[四]方(甲2−16)、山陵一𡐦(甲2−21)、不旻一參職(甲3−11)、奉☒口一邦(甲4−4)、☒于一王(甲5−8)、乍一下凶(甲7−20)、㠯為一斌(乙3−22)、武㠯☒一斂(丙1:4−2)、少杲一☒(丙4:1−11)、☒龍一☒(丙4:2−4)、一攺亓遉(丙6:1−11)、亓攺一遉(丙6:2−1)、箬一☒☒(丙6:2−4)、一邦又大變(丙8:2−8) 二十

殘 一戕(甲4−18)

木

木

𣎳一亡尚(甲1−33)、𣎳一民人(甲5−27)、玫數之青一赤木黃木白木墨木之精(乙5−25)、玫數之青木赤一黃木白木墨木之精(乙5−27)、玫數之青木赤木黃一白木墨木之精(乙5−29)、玫數之青木赤木黃木白一墨木之精(乙5−31)、玫數之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一之精(乙5−33)

天

天

一壁乍羕(甲2−5)、一棓㮚乍湯(甲2−9)、一雨☒☒(甲3−14)、㠯䫄一尚(甲8−33)、隹一乍福(甲10−6)、隹一乍宎(甲10−14)、一像

五王戈帀内曰

是恖（甲10—25）、戚隹—☐（甲10—31）、是襄—墥（乙2—17）、襄咎—步（乙2—34）、—旁違（乙5—18）、奠三—（乙6—13）、非九—之大鈌（乙6—23）、則毋敢㪤—需（乙6—31）

五

—月（甲4—8）、羣神—正（甲9—3）、—正乃明（甲9—13）

王

☐于亓—（甲5—9）

戈

李家浩《戰國邙布考》讀弌　敔之毋—（甲二—6）　又讀為隔、李家浩《戰國邙布考》讀代亦通　四神相—（乙4—2）

帀

讀為師　可㠯出—敍邑（丙2:1—6）、不可出—（丙6:1—6）、水—不廻（丙6:1—8）

内

饒宗頤（1968）讀肭　月—（甲2—33）、4、殘，讀為入　出—[空]

又讀為入　又㬎—于卡=（丙7:2—6）　同（甲7—16）

曰

帝—（甲9—30）、—女鲞（乙2—7）、倀—青榑（乙4—13）、二—未四嬰（乙4—17）、三—翏黃難（乙4—22）、四—𠯑墨榑（乙4—27）、—（乙6—20）、—（丙1:1—1）、—（丙2:1—1）、—（丙4:1—1）、—（丙5:1—1）、—（丙6:1—1）、—（丙7:1—1）、—（丙8:1—1）、—（丙9:1—1）、—（丙10:1—1）、—（丙11:1—1）、—（丙12:1—1）

又讀為粵，曰故即粵古　—故☐熊霝虘（乙1—1）

少　少
—又☒（甲12—30）—
杲亓☒（丙4：1—9）

日　日
共攻☒步十—四
寺（乙7—10）

月　月
隹□□四—（甲1—5）、—內（甲2—32）、—吉（甲2—34）、是遊—閏
之勿行（甲3—20）、二—（甲3—27）、三—（甲3—29）、四—（甲4—
7）、五—（甲4—9）、是—呂鄉曆爲之正（甲　⋯　殘　隹十又二—
6—25）、不見—才昌☒（丙5：2—2）　（甲7—2）

勿　勿
是遊月閏之—行（甲3—23）、民—用𨒅𨒅
百神（甲二—9）、土事—從（甲13—1）

凶　凶
乍亓下—（甲7—22）、—（甲13—3）、壬子酉子—（丙
1：2—7）、—（丙5：3—2）、—（丙8：3—7）

壬　壬
嚴—萍釋壬　—子酉
子凶（丙1：2—3）

方　方
降于亓［四］—
（甲2—18）

毋　毋
與毋無別　曆呂爲則—童（甲8—19）、—弗或敬（甲10—1）敬之
—戈（甲二—5）、則—敢𢾭天霝（乙6—28）、—思百神（乙7—20）

分　分
⋯⋯晏畜生—☒□（丙3：2
—4）、姑—長（丙二：曰2）

水 正 未 可 四

☐旻—☐風雨（乙1—29:）、—帀不䢔（丙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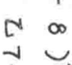
是月已䜌曆為之—（甲6—31）、羣神五—（甲9—4）、五—乃明（甲9—14）

恭民—智（甲8—13）、—又䏍（乙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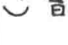
朱字之誤　二曰—四䰜（乙4—18）

不—已䢅殺（丙1:1—7）—已出帀籔邑（丙2:1—3）、不—已豪女取臣妾（丙2:2—2）、不—已乍大事（丙4:1—4）、不—已高祀（丙5:2—7）、不—出帀（丙6:1—4）、不—已高（丙6:1—8）、不—已川☐（丙7:1—4）、不—已籔室（丙8:1—4）、不—[已]☐（丙8:2—1）、—已笞室（?）……（丙9:1—3）、—[已]……（丙10:1—6）—已攻成（丙11:1—6）、—已聚眾（丙11:2—1）不—已攻……（丙12:1—4）

—興失羊（甲9—5）、是生子—☐（乙2—13）、—神相弋（乙3—35）、是隹—寺（乙4—10）、—曰咮墨檊（乙4—26）、—神乃（?）乍（?）至于邍（乙5—二）、炎帝乃命祝融已—神降（乙6—8）、共攻☐步十日—寺（乙7—二）、☐□神則閏—☐（乙7—18）



—月（甲4—6）、已☐—淺之尚（甲5—32）、—興鼠（甲8—28）、乃命山川—晉（乙3—13）、奠—亟（?）（乙6—18）、敓不蕎于—……（丙10:2—7）



殘、帛書日月皆合書，知非日字，巴納德釋四　隹口口—月（甲1—4）

殘　二曰未—䰜（乙4—19）

字	字形	辭例
出		一自黃泉（甲7—7）、一內(?)［空］同（甲7—15）、一自☒霆（乙1—7）、可吕一帀餤邑（丙2:1—5）、欱一睹（丙5:目2）、不可一帀（丙6:1—5）
同		林巳奈夫（1966）釋同讀炯　星唇不一（甲7—29）
用		民勿一起☒起☒百神（甲二—10）
田		殘　畢一魚（乙1—16）
北		乍☒一征（丙1:3—2）
乍		同作　天墜一羕（甲2—7）、天棓牺一蕩（甲2—12）、一亓下凶（甲7—19）、隹天一福（甲10—7）、隹天一宎（甲10—15）、嬰一（乙7—29）、一☒北征（丙1:2—8）、不可吕一大事（丙4:1—6）　殘　林巳奈夫（1964）釋乍　四神乃(?)一至于遉（乙5—14）
失		林巳奈夫（1966）釋失　四興一羊（甲9—7）
生		是一子四☒（乙2—二）、㫚奚一（乙5—2）　又讀爲牲　……妥畜一分☒□（丙3:2—3）

白

𢻱數之青木赤木黃木一木墨木之精(乙5-30)

玄

一司畩(丙9:目一)、一(丙9:一-2)

民

卉木一人(甲5-28)、恭一未智(甲8-12)、羣一㠯☐(甲8-22)、建巫褱一(甲9-12)、下一之祴(甲10-34)、一勿用𢼂𢼂百神(甲11-8)、一祀不牆(甲11-23)、上則又𣪘(甲12-1)、一人弗智歲(甲12-17)、☐則𢼂一(甲12-29)

㠯

一☐四淺之尚(甲5-30)、𤔔之一𢂋降(甲6-21)、是月一𦗻曆爲之正(甲6-26)、曆一爲則毋童(甲8-16)、羣民一☐(甲8-23)、一䝉(?)天尚(甲8-31)、帝𤵸繇一䝉遊(?)之行(甲11-30)、爲禹爲萬一司堵(乙2-29)、一爲亓䋣(乙3-20)、一涉山陵瀧汩凼澫(乙3-24)、乃步一爲歲(乙4-5)、炎帝乃命祝融一四神降(乙6-7)、乃𢼂𣇶一𨕖相☐思(乙7-33)、不可一𠭁殺(丙1:1-8)、可一出帀𥳑邑(丙2:1-4)、不可一豪女取臣妾(丙2:2-3)、不可一乍大事(丙4:1-5)、戝衛☐𡕒一匿(丙5:1-7)、不可一亯祀(丙5:2-8)、不可一亯(丙6:1-9)、不可一川☐(丙7:1-5)、不可一𥳑室(丙8:1-5)、可一筥室(?)……(丙9:1-4)、可一攻成(丙11:1-7)、可一聚衆(丙11:2-2)、不可一攻……(丙12:1-5)

字	辭例
弗	毋—或敬（甲10—2）、民人—智歲（甲12—19）
凥	《說文》居處之居作凥、林巳奈夫（1964）釋居　—于𩫖☒（乙1—11）
司	爲禹爲萬㠯—堵（乙2—30）、秉—春（丙3：目2）、虞—顕（丙6：目2）、玄—昧（丙9：目2）、荎—各（丙12：目2）
卉	楚人呼草爲卉　—木亡尚（甲1—32）、—木民人（甲5—26）
吉	重文、李學勤（1959）嚴—萍釋吉　月—☒口又雷雹（甲3—1）
庛	饒宗頤（1954）釋砅　—☒墬（?）（甲4—15）
西	—䰞又呇（甲4—20）
寺	讀爲時　三—是行（甲6—7）、三—☒冒（甲6—16）、—雨進退（甲8—3）、是隹四—（乙4—11）、共攻☒步十日四—（乙7—12）
百	—神是亯（甲9—17）、民勿用𧺆☒—神（甲11—13）、千又—歲（乙4—33）、毋思—神（乙7—22）
至	是則鼠—（甲12—16）、四神乃（?）乍（?）—于遉（乙5—15）、乙則—（丙1：1—5）

共臣成同此夅邦各自伐

共
一攻☐步十日四寺（乙7－5）

臣
不可㠯豪女取一妾（丙2:2－7）、取☐☐爲一妾（丙5:3－7）

成
讀爲城　可㠯攻一（丙二:1－9）

同
出内（?）［空］一（甲7－18）

此
嚴一萍釋此　女一武（丙2:田2）

夅
又泉一迴（甲2－25）、一田（?）僑（乙1－15）

邦
奉☐口亓一（甲4－5）、隹一所☐宎之行（甲5－20）、取女爲一英（丙4:2－9）、大不訓于一（丙7:2－3）、亓一又大蹊（丙8:3－1）

各
讀爲格　神則一之（甲10－二）、是一參柒（乙2－20）

自
出一黃泉（甲7－8）、出一☐霊（乙1－8）

伐
利戰一（丙二:1－5）

行

䢓遊亓一（甲1－27）、三寺是一（甲6－9）、是遊月閏之勿一（甲3－24）、隹邦所☐实之一（甲11－22）、帝𨟻繇（甲5－25）

吕䢓遊（?）之一（甲11－34）、帝夋乃爲肙之一（乙7－4）

羊

讀爲詳 四興失一（甲9－8）

州

九一不坪（乙5－4）

幽

《説文》𣶒字古文作𡆧、與此略同
吕涉山陵瀧汨一灕（乙3－30）

孛

商承祚釋孛 隹一𢡃匿（甲7－4）、
又重文 是胃一歲（甲2－29）

巫

同《説文》古文恒 亡又尚一:（甲8－10）、
三一𡕥（甲8－26）、建一褱民（甲9－10）

攸

同攸 讀爲杆或捍 一𢿱之青木赤
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乙5－21）

赤

攸𢿱之青木一木黄木白木
墨木之精（乙5－26）

攻

共一☐步十日四寺（乙7－6）、可吕一成（丙
二:一－8）、不可吕一……（丙12:1－6）

字	字形	說明
夾		同中山王墓《兆域圖》闊狹之狹（作闟）所从夾、讀爲兼　不一旻不戚（丙2:3—2）
芺		《集韻》古文疑作芺　取女爲邦一（丙4:2—10）
杢		《說文》社字古文从杢　臧一☐（丙8:四2）
折		一敓（丙10:2—1）
見		不一陵☐（甲12—10）、不一月才昌☐（丙5:2—1）
步		襄咎天一（乙2—35）、乃一吕爲歲（乙4—4）、共攻☐一十日四寺（乙7—8）
邑		可吕出帀籔一（丙2:1—8）
兵		☐☐乃一（甲5—5）
备		《說文》冬字古文作㫚、亦从夂从日、林巳奈夫（1964）釋冬　春頣眛一（甲1—16）、埜司一（丙12:四3）
余		一取女（丙4:四1）、一（丙4:1—2）

字	字形	文例
利		─戠伐（丙二：一─3）
宎		龍宇純釋宎讀妖、見嚴一萍文引用　是（?）［謂］─（甲2─4）、隹邦所☐─之行（甲5─23）、☐☐上─（甲6─5）、隹天乍─（甲10─16）
吝		西䶵又─、（甲4─23）、東䶵又─（甲5─1）
祀		民─不㝵（甲二─24）、不可㠯亯─（丙5：3─1）
妥		帝─乃爲肙＝之行（乙6─34）　又讀爲允　肙＝─生（乙5─1）
雨		─土（甲3─7）、天─☐昍＝（甲3─15）、寺─進退（甲8─4）、☐晏水☐風─（乙1─32）、風─㬪禕（乙7─25）
奉		─☐☐亓邦（甲4─1）
東		─䶵又吝（甲4─32）
或		毋弗─敬（甲10─3）
戚		巴納德釋慼、《字彙補》慼字古文作戚　讀爲慼　─隹天☐（甲10─29）　又讀爲慽　不夾旻不─（丙2：3─5）

字頭	帛書字形	辭例
事		土一勿從（甲12－34）、不可㠯作大一（丙4：1－8）、不經一（丙10：1－5）、型首一（丙11：3－1）
取		一于下（丙1：Ⅲ1）、一（丙1：1－2）、不可㠯冢女一臣妾（丙2：2－6）、一☒☒爲臣妾（丙5：3－3）、又讀爲娶 是於乃一虞☒□子之子（乙1－36）、余一女（丙4：Ⅲ2）、一女爲邦笑（丙4：2－6）、一女（丙8：3－5）
青		倀曰一槕（乙4－14）、攼數之一木赤木黃木白木墨木之精（乙5－24）
坪		嚴一萍釋平　九州不一（乙5－6）
非		一九天之大缺（乙6－12）
晉		嚴一萍釋丙　壬子一子凶（丙1：2－5）
武		一㠯☒亓斂（丙1：3－7）、女此一（丙2：Ⅲ3）
長		姑分一（丙11：Ⅲ3）
者		讀爲諸　會一侯（丙11：2－6）

尚

讀爲常　□又叟一（甲一—20）、井木亡一（甲2—1）、吕☐四淺之一（甲6—1）、亡又一豇（甲8—9）、吕嬰（？）天一（甲8—34）

帥

上从朮下从巾，應釋紼讀爲霈　變之吕一降（甲6—22）

明

五正乃一（甲9—16）

杲

步一亓☐（丙4：1—10）

隹

朱德熙《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釋隹讀惟　一□□四月（甲1—1）、一邦所☐実之行（甲5—19）、一悳匿之戢（甲6—10）、一孛悳（？）匿（甲7—3）、一天乍福（甲10—5）、一天乍実（甲10—13）、欽敬一備（甲10—23）、成一天☐（甲10—30）、是一四寺（乙4—9）、　又讀爲唯　一十又二月（甲6—32）

所

隹邦一☐実之行（甲5—21）

季

戢一乃☐（甲7—34）

咎

衡又一（丙1：3—6）　又讀爲晷　襄一天步（乙2—33）

索引八畫

字	文例
命	乃－山川四𣳠（乙3－10）、炎帝乃－祝融㠯四神降（乙6－4）
征	乍☐北－（丙一：3－3）
秉	－司春（丙3：四－）
於	是－乃取虞☐☐子之子（乙1－34）
泔	㠯涉瀧－凼澫（乙3－29）
炎	－帝乃命祝融㠯四神降（乙6－1）
妾	不可㠯象女取臣－（丙2:2－8）、取女爲臣－（丙5：3－8）
墬	林巳奈夫（1966）釋地 天－乍羕（甲2－6）
建	饒宗頤（1968）釋建 －㞷襄民（甲9－9）
亟	殘、讀爲極 冀四－（乙6－19）

姑
—分長（丙二:四—）、—（丙二:—+2）

春
—顕昧晋（甲—13）、秉司—（丙3:四3）

戠
見于白戠鼎、疑讀爲戒
下民之—（甲二—2）

哉
敬之—（甲9—34）

相
亡又—亹（甲12—7）、四神—弋（乙4—一）、乃𧺆月＝㠯𨔝—☐思（乙7—35）

故
讀爲古、曰故即粤古 曰
—☐嬴霝虘（乙一—2）

故
讀爲去 —不義于四
……（丙10:2—3）

型
讀爲刑 —首事
（丙二:2—8）

則
—經絀不旻亓常（甲一—6）、曆㠯爲—毋童（甲8—18）神—各之（甲10—10）、神—惪之（甲10—18）、民—又𣪍（甲12—2）、是—鼠至（甲12—14）、—無䌛祭（甲12—22）、☐—𧺆民（甲12—27）—毋敢𢽍天霝（乙6—27）、☐口神—閏四☐（乙7—16）、乙—至（丙1:一—4）

字頭	字形	釋文
旻		同得　經絀不一亓祟（甲1—10）、不一亓參職（甲3—10）、不夾一不戚（丙2:3—3）、戲衛☒一呂匿（丙5:1—6）、倉莫（?）一（丙7:Ⅲ3）
昧		古璽文千秋之秋作𥝌、此省去所从火　春頣一各（甲1—15）、玄司一（丙9:Ⅲ3）
星		昃=一曆（甲1—22）、一曆不同（甲7—26）
是		一胃孛（甲2—27）、一遊月閏之勿行（甲3—18）、一胃遊終亡（甲3—30）、一胃𧿍絽亡（甲4—10）、三寺一行（甲6—8）、一月已𧿍曆爲之正（甲6—24）、百神一高（甲9—19）、一胃悳匿（甲9—21）、天像一𢞁（甲10—27）、一則鼠至（甲12—13）、一於乃取虞☒口子之子（乙1—33）、一生子四☒（乙2—10）、一襄天埮（乙2—15）、一各參柒（乙2—19）、一隹四寺（乙4—8）　殘　一[謂]宊（甲2—2）
胃		讀爲謂　是一孛（甲2—28）、是一遊終亡（甲3—31）、是一𧿍絽亡（甲4—11）、是一悳匿（甲9—22）
思		𢝊一敄（乙6—15）、毋一百神（乙7—21）、又讀爲息　乃㓞員=己逷相☒一（乙8—2）
県		讀爲盜　又一內于卡=（丙7:2—5）
昜		同陽　一☒羕（?）（丙10:Ⅲ1）、一（丙10:1—2）

泉

商承祚釋泉　又一㝵洄（甲2－24）、出自黃一（甲7－10）

風

☒晏水☒一雨（乙1－31）
一雨𣄭禕（乙7－24）

柴

是各參一（乙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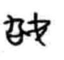
禹

陳邦懷釋禹　爲一爲萬
吕司堵（乙2－26）

蚨

林巳奈夫（1964）釋蚨　山陵備一（乙5－10）、非九天之大一（乙6－2）

欲



一出睹（丙5:目1）、
一（丙5：1－2）

侯

會者一（丙11:2－7）

洄

應即洄字、从水从㒼　又
泉㝵一（甲2－26）

神

羣一五正（甲9－2）、百一是亯（甲9－18）、羣一乃悳（甲9－26）、一則各之（甲10－9）、一則惠之（甲10－17）、民勿用𧺆☒𧺆☒百一（甲11－14）、四一相戈（乙3－36）、四一乃（?）乍（?）至于𡨦（乙5－12）、炎帝乃命祝𩁹吕四一降（乙6－9）、☒口一則閏四☒（乙7－15）、毋思百一（乙7－23）

帝
一曰（甲9－29）、一𣾘𧥳㠯䜌遊（?）之行（甲11－27）、炎一乃命祝融㠯四神降（乙6－2）、一夋乃爲日月之行（乙6－33）

逃
林巳奈夫（1966）釋逃
𡡞一（乙2－24）

祝
炎帝乃命一融㠯四神降（乙6－5）、

室
不可㠯籔一（丙8：1－7）
殘 可㠯笞一……（丙9：1－6）

首
型一事（丙11：2－9）

降
一于亓［四］方（甲2－14）、𤅊之㠯帥一（甲6－23）、炎帝乃命祝融㠯四神一（乙6－10）

既
女日月一䜌（甲4－26）、日月一䜌（甲7－31）

退
寺雨進一（甲8－6）

晉
饒宗頤（1958）釋晦讀海 乃命山川四一（乙3－14）

匿
戠衛☐旻㠯一（丙5：1－8） 又讀爲慝 凡戠悳一（甲5－14）、隹悳一之戠（甲6－12）、隹孛悳一（甲7－6）、是謂悳一（甲9－24）

字	字形	說明
恭		讀爲恐　—民未智（甲8—二）
莫		殘 倉—旻（丙7：四2）
朕		起☒乃卡⁼—遡（乙3—3）
倀		讀爲長　—曰青榑（乙4—12）
殺		與《說文》古文殺及《侯馬盟書》殺字略同　不可吕☒又—（丙1：2—2）
倉		—莫(?)旻（丙7：四二）、—（丙7：1—2）
脨		☒—不遉（丙8：2—5）
通		司☒□—乃□（丙9：2—4）
高		百神是—（甲9—20）、不可吕—祀（丙5：2—9）、不可吕—（丙6：1—10）
浴		讀爲谷　山川澫—（甲二—18）

涉
吕一山陵瀧汩凼瀵（乙3—25）

旁
讀爲方　天一違（乙5—19）

宵
又一又朝（乙8—4）

畜
……妥一生分☐□（丙3：2—2）

訓
讀爲順　大不一于邦（丙7：2—1）

陵
蔡季襄釋陵　山一亓䰕（甲2—20）、不見一☐（甲12—11）、山一不斌（乙3—6）、吕涉山一瀧汩凼瀵（乙3—27）、山一備䘏（乙5—8）

𣅀
同辰　𣅀星一（甲1—23）、星一不同（甲7—27）

雲
巴納德釋雲　吉☐□又電一（甲3—6）

黄
出自一泉（甲7—9）、三曰習一難（乙4—24）、攷數之青木赤木一木白木墨木之精（乙5—28）

𡎸
巴納德釋𡎸　讀爲踐　是襄天一（乙2—18）

堵
爲禹爲萬㠯司一（乙2－31）

戠
見鄂君啓節、郭沫若《關于鄂君啓節的研究》釋歲　孛一（甲2－30）、亓（?）一（甲4－19）、凡一悳匿（甲5－12）、隹悳匿之一（甲6－14）、一季乃▨（甲7－33）、民人弗智一（甲12－21）、乃步㠯爲一（乙4－7）、千又百一（乙4－34）

牿
見考甲牿父諸器、疑讀爲歆
民祀不一（甲11－26）

祭
則無鯀一（甲12－25）

從
土事勿一（甲13－2）

敎
㒸思一（乙6－16）

羕
讀爲殃　天墜作一（甲2－8）　殘　昜▨一（丙10：四2）

淺
讀爲踐　㠯▨四一之尚（甲5－33）

進
寺雨一退（甲8－5）

字	釋文
章	亡一弼。（乙一—25）
蒹	《說文》義字別體作蒹 敆不一于四……（丙10：2—5）、殘不一（丙二：3—4）
紿	則經一不旻亓棠（甲一—8）、經一遊鄹（?）（甲一—29）
牆	讀爲將 天梧一乍滂（甲2—二）、帝一譏㠯鄹遊（?）之行（甲二—28）
參	不旻亓一職（甲3—12）、是各一倸（乙2—21）
終	嚴一萍釋終 是胃遊一亡（甲3—33）
晝	从日不从旦 又一又夕（乙8—8）
悳	同德 凡戢一匿（甲5—13）、隹一匿之戢（甲6—二）、是胃一匿（甲9—23）、羣神乃一（甲9—28） 殘 隹孛一匿（甲7—5）
曆	讀爲擬 是月㠯鑾一爲之正（甲6—28）、一㠯爲則毋童（甲8—15）
敬	毋弗或一（甲10—4）、欽一隹備（甲10—22）、不欽一行（甲二—21） 陳邦懷據《尚書》文例補釋 一之毋弋（甲二—3）

字	釋文
惠	哉（甲9－32）
穀	神則－之（甲10－19）
絲	民則又－（甲12－4）
萬	讀爲攸　則無－祭（甲12－24）
遡	商承祚陳邦懷讀爲禼　爲禹爲－吕司堵（乙2－28）
精	見于銅龍節作遡　讀爲斷　㓤乃卡=朕－（乙3－4）　又讀爲轉　乃㓤㝵=吕－相☐思（乙7－34）
敢	讀爲精　攼數之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木之－（乙5－35）
朝	則毋－𣪊天霝（乙6－29）
晵	又宵又－（乙8－6）
	欲出－（丙5：四3）

為

是月吕𢿜曆—之正（甲6—29）、曆吕—則毋童（甲8—17）、—禹爲萬吕司堵（乙2—25）、爲禹—萬吕司堵（乙2—27）、吕—亓斌（乙3—21）、乃步吕—歲（乙4—6）、帝夋乃—𣇃之行（乙7—1）、取女—邦笑（丙4:2—8）、取☒☒—臣妾（丙5:3—6）

智

讀爲知　恭民未—（甲8—14）、民人弗—歲（甲12—20）

欽

不—敬行（甲　仒　殘　—敬隹備二—20）（甲10—21）

備

朱德熙釋備、見李家浩《戰國邙布考》引　欽敬隹—（甲10—24）、山陵—䖿（乙5—9）

無

則—𦃇祭（甲12—23）

⿰糹武

饒宗頤（1968）讀延、延同疏　山陵不—（乙3—8）、吕爲亓—（乙3—23）

⿺辶复

讀爲覆　四神乃（?）乍（?）至于—（乙5—17）、亓䟦亓—（丙6:2—2）　又讀爲復　☒脨不—（丙8:2—7）

衆

可吕聚—（丙二:2—4）

童

讀爲動　曆吕爲則毋—（甲8—20）

奠

一三天（乙6—二）、一四亟(?)（乙6—17）

閏

是逰月一之勿行（甲3—21）、☒口神則一四☒（乙7—17）

紹

同紀 是胃躙一亡（甲4—13）

弻

重文 亡章一（乙1—26）

戠

讀爲侵 利一伐（丙二：一—4）

電

吉☒口又一雲（甲3—5）

夢

重文 一墨（乙1—22）

荃

一司各（丙12：四一）

棠

此字當中有一道泐痕、原字應爲棠讀爲當 經絀不旻亓一（甲1—12）

恳

讀爲則 天像是一（甲10—28）

虘	讀爲戲、霝虘嚴一萍金祥恒考爲伏羲　曰故☐贏霝─（乙1─6）
虡	是於乃取─☐□子之子（乙2─1）、─司頭（丙6：皿─）、─（丙6：1─2）
戲	讀爲盜　─衛☐旻呂匿（丙5：1─3）
鼠	商承祚釋鼠　讀爲爽　乃又─☐（甲4─30）、四興─（甲8─30）、是則─至（甲12─15）
⿰亻魚	讀爲漁、重文　畢田（?）─（乙1─17）
衛	讀爲帥　─又咎（丙1：3─4）、戲─☐旻呂匿（丙5：1─4）
會	─者侯（丙11：2─5）
福	隹天乍─（甲10─8）
禕	風雨晷─（乙7─27）
綎	《說文》經或體作綎、經絀古書作贏絀　則─絀不旻亓棠（甲1─7）、─絀遊嬰（?）（甲1─28）

羣	一民㠯☒（甲8—21）、一神五正（甲9—1）、一神乃悳（甲9—25）
熙	同氣、饒宗頤（1958）釋氣　☒竂一䖒熙（乙3—17）、☒竂熙䖒一（乙3—19）
梧	讀爲鼓　天一牺作 㵿（甲2—10）
墅	殘、疑是墅字　𢇛 ☒一（甲4—17）
臧	一杢☒（（丙8：Ⅲ—）
聚	可㠯一衆（丙二：2—3）
像	天一是惻（甲10—26）
豙	讀爲嫁　不可㠯一女取臣妾（丙2：2—4）
敘	讀爲除　折一（丙10：2—2）、又讀與荃同　一（丙12：1—2）
嬴	从㠯不从丮　曰故☒一霝虐（乙1—4）

敔 霆 殄 䟅 𧇜 墨 署 數 曆 遊

敔	武□□亓一（丙一：4—3）
霆	出自□一（乙一—10）
殄	同戮 一不義（丙二：3—2）
䟅	同國 西一又咨（甲4—21）、東一又咨（甲4—33）
𧇜	巴納德隸定為𧇜，字从虎从曰，與中山王譽方壺銘皆字略同，應釋為皆 昌=一𨓬（甲7—24）
墨	四曰咮一𣘙（乙4—29），攺數之青木赤木黃木白木一木之精（乙5—32） 又重文 𡖊=一（乙1—23）
署	巴納德釋單，《古文四聲韻》單字作署，《正始石經》戰字从署，古器銘署字皆為單 二曰未四一（乙4—20）
數	讀為𦸗，所从𦥑見于永盂用為昇 攺一之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木之精（乙5—22）
曆	風雨一𧜼（乙7—26）
遊	疑同逆字 𨓬一亓行（甲1—25），經紿一𨓬（?）（甲1—30）是一月閏之勿行（甲3—19），是胃一終亡（甲3—32）

霝 榑 虩 龍 襄 與 違 寮 灉

殘 帝牺䜌已嬰—之行（甲二—32）

灉 疑是灉字 山川—浴（甲二—17）、已涉山陵瀧汨凼—（乙3—31）

寮 ☐—熙出熙（乙3—16）

違 讀爲動 天旁—（乙5—20）

與 四—鼠（甲8—29） 殘 四—失羊（甲9—6）

襄 同懷 建臸—民（甲9—二）

龍 ☐—亓☐（丙4：2—3）

虩 殘、讀爲廢 —逃（乙2—23）

榑 林巳奈夫（1964）釋㮣、即榦字 倀曰青—（乙4—15）、四曰咮墨—（乙4—30）

霝 讀爲靈 則毋敢叡天—（乙6—32）

顕	林巳奈夫（1964）釋夏　春一昧沓（甲一—14）、慶司一（丙6：四3）
㬎	讀爲毀　不一事（丙10：一—4）
襄	是一天埅（乙2—16）、一咎天步（乙2—32）
孌	嚴一萍釋㪇、應正爲孌、讀爲繼　一之邑㠓降（甲6—19）
憂	《字彙補》憂字古文作夒、讀爲擾　亡又相一（甲12—8）
䨓	金祥恒釋雹、䨓䖍嚴一萍金祥恒考爲伏羲　曰故☐贏一䖍（乙1—5）
㪤	則毋敢一天霝（乙6—30）
瀉	讀爲湯　天棓㮧作一（甲2—13）
職	不旻亓參一（甲3—13）
難	三曰習黃一（乙4—25）

瀧 㠯涉山陵一汫凼灘(乙3—28)

燮 昜鼎銘弗敢𤏗、𤏗字與此略同、疑讀爲墮　山陵亓一(甲2—22)、三死一(甲8—27)

婁 與楚簡婁字略同、讀爲數　是月㠯一曆爲之正(甲6—27)

籔 嚴一萍釋築　可㠯出帀一邑(丙2：1—7)、可㠯一室(丙8：1—6)

嬰 《正始石經》亂字作嬰　一遊亓行(甲1—24)、是胃一絽亡(甲4—12)、女冃＝既一(甲4—27)、冃＝㽕一(甲7—25)、冃＝既一(甲7—32)、帝䣙䜌㠯一遊(?)之行(甲二—31)、一乍(乙7—28)、亓邦又大一(丙8：3—4)

殘　絰絀遊一(甲1—31)

殘　㠯一天尚(甲8—32)

儇 尻于一☐(乙一—13)

䜌 从言从一被縛之豸、豸足作㕣與缶相近、後世䜌䜌二字皆從其省變　一(甲9—31)、帝䣙一㠯嬰遊(?)之行(甲二—29)

⿰亯蟲 邾公釛鐘銘陸終之終作⿰亯蟲、祝⿰亯蟲即祝融　炎帝乃命祝一㠯四神降(乙6—6)

未隸定的字

疑是嬀字　曰女一(乙2—9)

疑是害字讀為豁　☐寮熙一熙(乙3—18)

疑是可字　……一☐☐逾乃☐……(丙9：2—1)

合文	
一月	一（甲3－25）
上下	迎⊠乃一朕遡（乙3－2）、又昷內于一（丙7：2－8）
至于	一亓⊠⊠（丙6：2－3）
日月	一星曆（甲1－21）、女一既嬰（甲4－25）、一曆嬰（甲7－23）、一既嬰（甲7－30）、未又一（乙3－34）、一炎生（乙4－35）、帝炎乃為一之行（乙7－2）、乃迎⊠一呂遡相⊠思（乙7－32）

局部可隸定的字	字形	辭例
☒又		□又一尚（甲1—19）
☒攴		不可己一殺（丙1：2—1）
☒口		武一☒亓斂（丙1：3—8）
☒女		☒一水☒風雨（乙1—28）
☒女		……一畜生分☒□（丙3：2—1）
☒目		三寺☒一（甲6—18）
日☒		不見月才一☒（丙5：2—4）
☒支		疑是敗字　亓一亓復（丙6：1—12）
☒殳		……☒□□□□一☒ ……（12：2—6）

索引局部可隸定的字

字	釋文
笞	疑是簸即箕字　可吕一室（?）……（丙9：1－5）
□米	四曰咪墨榦（乙4－28）
習	三曰一黄難（乙4－23）
紊	一思敦（乙6－14）
起□	民勿用一起□百神（甲二一二）
起□	民勿用起□一百神（甲二一12）
起□	□則一民（甲12－28）
起□	一乃卡=朕𨘢（乙2－36）
起□	乃一昷=吕𨘢相□思（丁－31）
起□	水币不一（丙6：1－10）

索引局部可隸定的字

土文亡一（甲7－14）

後記

楚銅器是我近三年來的一個主要研究課題。研究楚銅器，勢必要對楚文字有所涉獵。楚帛書長達九百餘字，對熟悉掌握楚文字的特點再好不過，所以我對它格外下了一點力氣。以後將隨手寫成的札記匯集在一起，便成爲現在這本小書。

一九八〇年夏，我以本書的初稿送請張政烺師過目。先生以帛書新影本在國外發表，中國大陸迄無新作感慨不已，並鼓勵我蒐集有關材料整理發表。本書的出版與先生的關懷是分不開的。我體會，先生是想增添一個新的本子，並把過去發表的材料(大多不易尋找)綜合在一起，方便大家使用，所以首先應儘量注意材料的「全」。

誠然，我對帛書的文字和內容做了一些新的探討，但這些探討是在綜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楚帛書一向號稱難懂，它是用奇詭的戰國楚文字抄寫而成，並有不少殘缺，內容也十分怪誕，是失傳已久的古數術家言。我之所以敢去啃這個「硬核桃」，實在是因爲已有許多前輩在前面鋪路。楚帛書經三十多年來反復研討，現在雖仍存在不少問題，但已取得重大突破。這一研究的基礎無疑是由國內外許多學者各自傾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共同奠定的。

順便説明一下，作者爲行文方便，對各位前輩均直陳其名，於前輩成説間有異議，亦不加隱諱，絶無不敬之意。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許多師友幫助，尤其是日本東京大學平山久雄教授幫我查找有關資料，航郵遠惠，厚意可感，均此表示深摯的謝意。

李零　一九八二年八月

寫於一九八〇年夏，印於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七月。

《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

一九八〇年，我寫過一本題爲《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下簡稱《子彈庫》）的小書（已收入本書），搜集八十年代以前國内外的有關論著，折衷衆説，對楚帛書做重新探討。該書包括三部分：（一）研究概況；（二）結構、内容與性質；（三）釋文考證。全書初稿於當年夏天完成，由張政烺先生推薦中華書局出版，以後一直未能修改。

這裏應當説明的是，《子彈庫》一書的正式出版雖然是在一九八五年，但它的部分内容却是在一九八〇年就已發表。其中（一）的第二節《論著簡目》發表於中國考古學會第二屆年會。（二）和（三）的釋文部分發表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四屆年會。在一九八〇—一九八五這五年裏和最近三年裏，又有不少研究帛書的新作發表，往往參考或引用拙稿的上述部分，但均未見到正式出版的書〔一〕。這些新作對拙稿多所匡正，但也有不少地方是謬襲拙稿，我個人在自己的研究中也發現不少新問題，因草成此篇，作爲《子彈庫》一書的補正。

一、新作簡介

（一）李學勤《論楚帛書中的天象》，《湖南考古輯刊》第一集（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作者曾參考拙稿〔二〕和釋文。文章對帛書的放置方向和閱讀順序提出新解。過去，作者是按邊文順序定帛書方向，以上冬下夏爲正，但後來通過整理馬王堆帛書，發現「其古地圖，《胎産書》、禹藏圖和幾種陰陽五行家著作的圖，均以南爲上」，因此斷定「這應該是古圖，至少是楚地出現的古圖的傳統」，主張恢復蔡季襄説，即以上夏下冬爲正。作者把帛書分爲三篇，將中間十三行

的一篇題爲《天象》，八行的一篇題爲《四時》，邊文題爲《月忌》，著重考釋《天象》篇。通過考釋，作者斷定：「此篇所説天象災異，主要是側匿和彗星兩項，其餘均爲兩者所派生。」如該篇開頭至「亂逆其行」，主要是講月行盈縮，即側匿；而文中的「天棓」就是一種彗星，在帛書中也叫「孛」。內容與《洪範五行傳》有相近之處，有助於我們研究古代的陰陽家説。

（二）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第二十七章《帛書、帛畫》，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

書中對楚帛書有簡要介紹。作者認爲，帛書十二神像並非楚地特有，衹是其他國的材料比較罕見罷了。這些神像於文獻無徵，未必能用《楚辭》、《山海經》等古書去説明。作者還肯定了我對帛書性質的理解，即帛書與《月令》性質相近，但形式更爲原始，没有説禮色彩，專講各月禁忌。認爲月令類古書並不一定由此發展而來。

（三）李學勤《楚帛書中的古史與宇宙觀》，《楚史論叢》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

此文專論文（一）所定《四時》篇，內有個別段落的釋文。作者説，《四時》篇的第一章是講包犧，認爲包犧的配偶「女□」（下字不識）不是女媧；「是生子」不與「四」字連讀，並非下文「四神」；「是惟四時」下的章號可能位置有錯，或衹起分隔作用，下四神名當是本章注文。第二章是講千餘年後，由於「九州不坪，山陵備側」，炎帝命祝融率四神降世，奠立三天、四極，與女媧補天的故事相似。前人曾有炎帝在厲之説，祝融則是楚的遠祖，這是楚系統的傳説。第三章是講共工推步十日。十日即甲至癸十干。據《山海經·海內經》，共工與炎帝、祝融是一脉相承。除女媧，作者認爲前人所考禹、契、青陽、帝俊四人在帛書中也並不存在。「禹」、「契」之釋，核以清晰照片，有待商榷；「青陽」則是「青□榦」的誤讀，「帝俊」則是「帝允」的誤讀。最後，作者還提出説，帛書「以五木奠四極，意味着五行的空間分布；以四色名四神，又意味着五行的時間循環。以五行説爲原則的宇宙間架論，在帛書裏已經表現得相當完整」。這種宇宙間架的思想來源甚早，《堯典》、《山

海經・大荒經》和甲骨文均講到與四時有關的四方、四風，説明早在商代就不僅「已有四時觀念，而且形成了宇宙間架的雛型」。

（四）曹錦炎《楚帛書〈月令〉篇考釋》，《江漢考古》一九八五年一期。

此文是帛書邊文的考釋。作者認爲帛書內容不限「月忌」，近於《月令》。推測月令類古書是由《楚帛書》經《夏小正》和《呂氏春秋・十二紀》到《禮記・月令》，逐漸演變而成，故將帛書邊文定名爲《月令》。

（五）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一九八五年九月（案：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刊有曾憲通《神密的楚帛書》及經法《楚帛書》一文，介紹此書，可參看。）

作者曾索寄拙稿（一）（二）和釋文。全書包括：（一）《楚帛書新證》；（二）《楚帛書十二月名與《爾雅》》；（三）《帛書之內涵及性質試説》；（四）《楚帛書之書法藝術》；（五）《楚帛書研究四十年》；（六）《楚帛書文字編》。書後附帛書全圖（縮版47％）、疊印圖（縮版92％）、饒氏一九六七年原形摹本（改正本）及新臨寫本（附釋文）、分段放大照片（放大3.3倍）、局部放大照片（放大十二倍）。這六篇，（一）是饒氏舊作《楚繒書疏證》的改寫本，（二）是饒氏舊作《楚繒書十二月名覈論》的改寫本，（三）是饒氏新作，專論楚帛書的性質和結構。作者認爲帛書是楚國天官書的佚篇，而非曆忌之書，理由是：(1)拙稿所舉曆忌之書皆極晚出；(2)帛書不光講忌，也還講宜。並贊同李文以南方爲上，定八行爲甲篇，十三行爲乙篇，邊文爲丙篇，理由是：(1)甲篇以「曰故」二字發端，同於《堯典》，自當列首；(2)乙篇論王者失德，月有贏絀，故作倒書；(3)帛書午位三首神應即祝融，爲楚先祖，自宜居上。（四）亦饒氏新作，是講楚帛書的書法藝術。（五）出曾氏手，是介紹帛書研究概況，作者收集材料大體同於拙稿，但增出拙稿屬於一九八〇年以前的著作有：

(1)饒宗頤《帛書解題》，見平凡社《書道全集》第一卷（一九五四年）〔遺漏〕；

(2)金關丈夫《楚繒書上之神象》（一九六一年）〔未見〕；

(3) 李棪《楚國帛書中間兩段韻文試讀》(油印本，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未見〕；
(4) 李棪《楚國帛書諸家隸定句讀異同表》(稿本，一九六八年)〔未見〕；
(5) 莊富良《春秋戰國楚器文字研究》第七章《繒書》，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語言文學部碩士論文(稿本，一九七五年)〔未見〕；
(6) 許學仁《先秦楚文字研究》第二章《楚繒書》，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七九年六月，文字考釋部分又見《中國文字》新第七期)〔近始見之〕；
(7) 莊申《楚帛書上的繪畫》，香港《百姓》四一期(一九八三年二月)〔未見〕。
〔補注：大西正男《十干十二支の成立の研究》第一部第四節《帛書圖像形と十二支動物》(高松商業昭和三十二年卒業生大西先生論文發刊會，香川一九七五年)，亦論帛書，拙稿及此書均未收。〕

第六部分是帛書字表，以饒氏考釋爲主，兼採他説，亦出曾氏手。

(六) 高明《楚繒書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一九八五年十月)。

作者曾參考拙稿(一)(二)和釋文，但未見上述各書。文章涉及帛書研究概況、結構、性質和內容，附考釋。作者對帛書性質的看法近於饒氏，也認爲帛書「是一篇較原始的天文學著作」，而對帛書結構的理解亦贊同李文，定八行的一篇爲甲篇，十三行的一篇爲乙篇，邊文爲丙篇。讀法是從甲篇開始，按順時針方向轉圈讀，讀完乙篇，再按乙篇的方向接讀丙篇。

(七) 何琳儀《長沙帛書通釋》，《江漢考古》一九八六年一、二期。

作者曾參考拙稿(二)和李文第一種。此文是帛書全文的考釋，分篇順序同拙稿，並附有白話譯文。

(八) 朱德熙《長沙帛書考釋》(五篇)，一九七九年十月初稿，一九八六年九月發表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六次會議。

包括五篇考釋：⑴把「山陵備岆」讀爲「山陵崩弛」；⑵把「豪女」讀爲「致女」；⑶把「邦芙」讀爲「邦墓」；⑷把「腜不遉」讀爲「膌不復」；⑸釋「[?]」爲「敔」。該文後記附李家浩説，謂「豪女」仍當讀「嫁女」，「□是襄[?]戔是各」和「咎[?]步□」之「[?]」字應釋「而」；又引裘錫圭對睡虎地秦簡「𡕒」字的考釋，指出「□于亓(其)王」的第一字應釋「𡕒」，讀爲「害」。

(九)李學勤《再論帛書十二神》(案：「神」字誤鈔爲「種」)，《湖南考古輯刊》第四集(一九八七年十月)。

此文專論文(一)所定《月忌》篇，與上文(一)、(三)構成完整的一組。作者再次肯定我對帛書性質的理解，也認爲帛書是曆忌之書。(案：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簡》凡例已指出秦簡《日書》屬曆忌一類。)故取《月忌》作爲篇題。文章附全篇考釋，並討論了帛書的圖像(十二月神和四色木)，提出：⑴邊文章題，第一字與第二、三字不連讀，第一字與星象有關(至少正月名「取」是如此)，第二、三字則是神名；⑵此篇雖與月令類古書相似，但並不屬於這一系統，月令類古書是供王者使用的禮書，而帛書是供一般人使用的數術書，特點是講各月宜忌，並以忌諱爲主；⑶帛書十二神與六壬式的十二神可能有關。

(十)李學勤《長沙楚帛書通論》，《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集，荊楚書社一九八七年一月。

此文是作者對文(一)、(三)、(九)的總結。其中論及陰陽家的源流。作者認爲陰陽家與數術之學密不可分，《漢書・藝文志》把其中偏於理論的書列入陰陽家，而把專供實用的書列入《數術略》。楚帛書的《四時》、《天象》屬於前者，《月忌》屬於後者。古陰陽數術之書大多亡佚，近年發現的秦漢簡帛有不少數術書，但皆不如楚帛書早。楚帛書的思想特點是，它有發達的五行説、天人感應説和自然規律性的概念。帛書與鄒衍學説有明顯差異，反映了楚陰陽家與齊、燕陰陽家的不同。這對古代陰陽家的研究，以及晚周到漢初學術文化史的研究，皆有重要意義。

此外，一九八〇年以來還有一些文章對楚帛書也有所涉及，如：

(1) 楊寬《戰國史》第十一章第六節《月令的五行相生説》（一九八〇年七月）。認爲帛書是一種簡單的月曆，與《月令》性質相近；

(2) 周世榮《湖南楚墓出土文字叢考》，《湖南考古輯刊》第一集（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述及帛書字體。

(3) 吴九龍《簡牘帛書中的「夭」字》，《出土文獻研究》（一九八五年六月）。對銀雀山漢簡、馬王堆帛書、楚帛書和古璽文字中的「夭」字做比較研究。

(4) 林澐《釋古璽中從「朿」的兩個字》（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六屆年會論文，一九八六年九月）。涉及帛書「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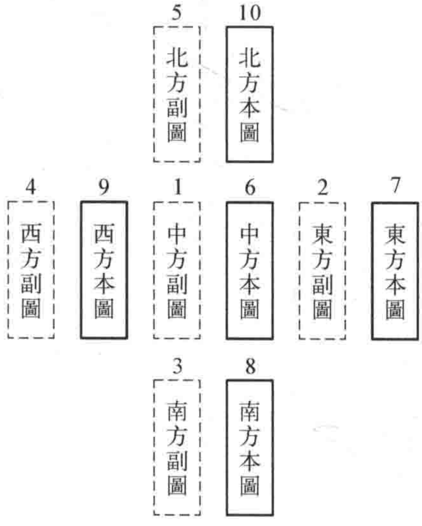
〔補注：一九八八年以來，又有一些研究帛書的新作發表，如蔡成鼎《〈帛書・四時篇〉讀後》（《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一期）、陳秉新《長沙楚帛書文字考釋之辨正》（《文物研究》總四期（一九八八年））、何琳儀《長沙帛書通釋校補》（《江漢考古》一九八九年四期）、連劭名《長沙楚帛書與卦氣説》（《考古》一九九〇年九期）、徐山《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行款問題質疑》（《考古與文物》一九九〇年五期）、李零《楚帛書目驗記》（《文物天地》一九九〇年六期）。〕

二、再論楚帛書的結構與性質

在以往的帛書研究中，楚帛書的放置方向和閱讀順序一直是引起争論的問題。一種意見是以上南下北爲正，八行的一篇爲甲篇，十三行的一篇爲乙篇，邊文爲丙篇（蔡季襄説）；一種意見是以上北下南爲正，十三行的一篇爲甲篇，八行的一篇爲乙篇，邊文爲丙篇（董作賓説）。前説最初並未提出明確理由，而後説是按東、南、西、北配春、夏、秋、冬。六十年代，由於帛書十二月名的釋出，後説逐漸占上風。但近年來，很多研究者（李學勤、饒宗頤、曾憲通、高明等）都主張重新恢復蔡説，放棄董説。其主要理由是馬王堆出土古圖一般是取上南下北爲正。最近，我們仔細研究了上

述二說，感到這兩種看法都有一定片面性，正確的理解是應當把二者統一起來。

在拙作中，我們曾比較楚帛書與《管子》的《玄宮》（原作《幼官》）和《玄宮圖》（原作《幼官圖》），指出郭沫若在《管子集校》一書中所做的復原是錯誤的，陳夢家所做的復原已接近成功，但對圖的方向和本、副圖的位置仍理解有誤（案：拙作介紹陳文是據手稿，括號內出處是編輯所加。近檢正式印出的該文，發現並未將陳氏畫在另一紙片上的草圖印出）。我們的看法是，《玄宮》和《玄宮圖》方向相反，前者是按中、東、南、西、北，先本圖後副圖而排列，與月令類古書相似，代表的是「四時之序」（圖一）；而後者則是從右到中到左，按西（右）、南、中、北（中）、東（左）排列，是一種布圖順序，與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圖》和馬王堆出土的《駐軍圖》方向相同，代表的是「四方之位」（圖二）。〔補注：近見臺灣學者王夢鷗《鄒衍遺說考》（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六年）也有近於正確的復原。〕整個圖是按左旋轉圈讀，有兩個方向。但是由於我們過於拘泥「玄宮」和「明堂」方向相反，上南下北之圖爲「玄宮」，上北下南之圖爲「明堂」，以爲帛書既然不與四宮十二室相配，自然衹有「時令圖」的意義，當屬後一類。所以是從一個正確的前提得出了一個片面的結論。



圖一

最近查有關資料，我們發現古代的方位概念一直是有兩種，茲舉例如下：

（一）甲骨卜辭。有「四土」、「四方」、「四戈」、「四奠」、「四鄙」、「四單」等方位詞，其名同時見於一版，一般是按東、南、西、北排列，屬「上北下南」類。

（二）銅器銘文。有按北、東、南、西排列者（如衛鼎「履田」銘文），亦屬「上北下南」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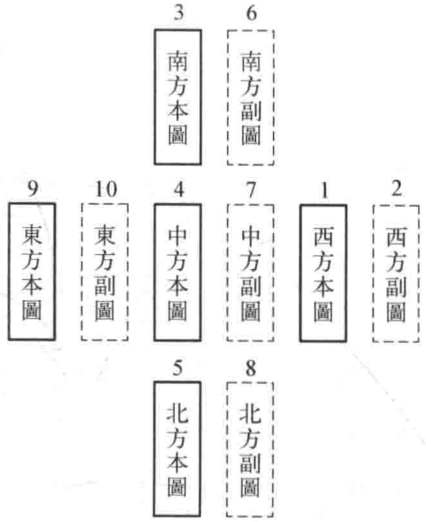
（三）《左傳》。有兩種排列，一種是作東、西、南、北（如僖公四年管仲語、襄公二十九年子展

語)；一種是作西、東、南、北(如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兩者均應屬於「上南下北」類〔前者是後者的變形，參(五)〕。

(四)《國語·齊語》記管仲述齊境，作南、西、北、東排列，屬於「上南下北」類。

(五)《戰國策·魏一》「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章。記吳起述「三苗」、「夏桀」、「殷紂」之疆域作左(東)、右(西)、南、北，或左(東)、右(西)、北、南，或左(東)、右(西)、前(南)、後(北)排列，應屬於「上南下北」類。

(六)《山海經》。《漢志》列在《數術略》「形法類」，屬於古代的「相地形」書，原來應配有表示方位層次的示意圖。研



圖二

究者一般認爲，它的前十三篇是一個系統，後五篇是一個系統。可能是兩種本子。前十三篇分《山經》和《海經》，《海經》又分《海外》、《海內》。《山經》在內圈，分兩層，外層按南、西、北、東排列，內層是《中山經》；《海經》在外圈，也分兩層，外層是按南、西、北、東排列，內層是按南、西、北、東排列。其方位概念是南、西、北、東、中(圖三)，屬於「上南下北」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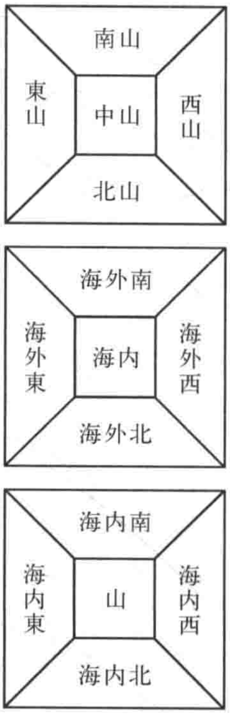
其後五篇與前十三篇相仿，也分內外兩圈，外圈是《大荒經》，相當《海外》，但方向相反，作「上北下南」；《海內》，相當上述《海內》，不再細分(圖四)。

(七)《淮南子》。《淮南子》有《天文》、《墬形》、《時則》三篇，分別講天文、地形和時令，是內容相關的一組。其方位概念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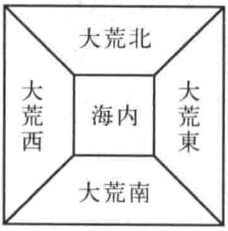
(1)《天文》。

九野(與「九天」相對)、二十八宿：中、東、東北、北、西北、西、西南、南、東南；

《山經》 《海外經》 《海內經》



圖三



圖四

五星、五官：東、南、中、西、北；

八風：東北、東、東南、南、西南、西、西北、北；

二繩：北南（子午）、東西（卯酉）。

(2)《墬形》。

九州：東南、南、西南、西、中、西北、北、東北、東；

八風（一種同《天文》，一種同《呂氏春秋·有始》）、八殥、八紘、八極：東北、東、東南、南、西南、西、西北、北；

海外三十六國（採《山海經·海外經》）：西南至西北（西）、西南至東南（南）、東南至東北（東）、東北至西北（北）；

五海：中、東、南、西、北。

(3)《時則》。

十二月：東、南、西、北；

五位：東、南、中、西、北。

上述三篇,《天文》與《時則》是講天道,大多是按東、南、中、西、北左旋排列(天道左旋),屬「上北下南」類,其中祇有「九野」、「二十八宿」因代表星野,是按右旋排列(地道右旋),但方向仍然是以北爲上。《墬形》是講地道,所見方向有兩種,一種是上南下北,如「九州」和「海外三十六國」。這兩項是講地形本身,所以是取地形圖的方位。「九州」相當《山海經》的《山經》,二者方向相同。「海外三十六國」相當《山海經》的《海外經》而稍有差異,每一方向上的順序相同(但《海外經》「西南至西北」應是「西北至西南」之誤),但四方之序相反,《海外經》是左旋,《墬形》是右旋。儘管如此,兩者都是以南爲上。《墬形》的另一種順序同於《天文》和《時則》,如「八風」、「八殥」、「八紘」、「八極」、「五海」。這些概念與《天文》的「八風」和「五星」是對應的,自然比較相似。

歸納以上七例,我們可以看出,古代的兩種方位,「上北下南」主要是天文、時令所用,「上南下北」主要是地形所用。它們來源都很早。

上述概念,從根本上講,是來源於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這一模式最充分地體現在古代「日者」所用的工具即式上面。式是以蓋天説爲基礎,把天穹看作覆碗狀,而把大地看作沿「子午」、「卯酉」二繩爲坐標向四方延伸的平面(中國古地圖無曲率)。天穹以斗極爲中心,上布列星,與地平面相切,可按投影關係,視爲疊合的兩個平面,二者具有共同的坐標體系。中國古代的天文圖、時令圖和地形圖都是以這一模式爲依據,但因實際需要的不同,上下位置正好相反。天文圖和時令圖强調的是「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淮南子·天文》),即以春、夏、秋、冬配東、南、西、北,所以是以上北下南爲正;而地形圖則强調的是「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漢書·藝文志》「形法類」小序),是按中國所處緯度形成的日照方向來定陰陽向背,所以是以上南下北爲正。

中國古代地圖以上北下南爲正,據碑圖實物,至少是唐以來的傳統〔二〕。李約瑟曾認爲「以上方爲南,似乎並不是起源於中國,而是起源於阿拉伯各國,而且似乎較晚才爲中國所知悉」〔三〕。

這種看法現已被出土發現所否定。但是這裏仍有一個問題值得研究，即上北下南的地圖究竟始於何時。這一點，現在看來也應做重新認識。因爲第一，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就已有這種方向；第二，《山海經》的後五篇，和唐以來的地圖方向是一樣的，其年代當不晚於西漢。它是把「四方之位」和「四時之序」統一了起來。〔補注：最近發表的放馬灘秦墓出土的古地圖就是以北爲上，參看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的古地圖初探》（《文物》一九八九年二期）、曹婉如《有關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地圖的幾個問題》（《文物》一九八九年十二期）。〕

關於帛書的方向，有一點本來很清楚，這就是既然帛書的邊文是轉圈讀，中間兩篇也方向相反，那麼它自然就有兩種方向。所謂「上南下北」說與「上北下南」説完全可以統一起來。這個問題與帛書的閱讀順序應有所區别。

關於帛書的閱讀順序，關鍵主要是中間十三行和八行的先後；對邊文順序的理解，現在大家没有分歧。拙作曾提出過「轉圈」讀，其根據是中國古代時令書一向强調陰陽二氣的消長和流轉。比如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管子·玄宫》中的「三十時節」，其時節名大多是以風名（風也是氣）、氣名而定，就是著眼於陰陽二氣的消長〔四〕。古人把四時十二月看作陰陽消長，這是理解帛書圖式的關鍵。而帛書既然是轉圈讀，就有一個由内向外轉還是由外向内轉的問題。過去，我們對這個問題持保留態度，即認爲兩種可能都有。原因是古人述五位順序，既有先中央後四方，也有先四方後中央，甚至還有將中央夾叙在四方之中的情况。但《玄宫》、《山海經》和《淮南子》所見圖式有一個特點，即如果内圈或外圈祇有一層，往往都是先講内圈，再講外圈；如果内圈或外圈有兩層，則順序是先内圈外層，再内圈内層，然後是外圈外層，再外圈内層。所以這裏採取由内向外轉圈讀。這樣轉圈讀，現在也有兩種理解：(1) 先讀十三行，然後顛倒方向接讀八行，再顛倒方向接讀邊文，裏面轉一圈，外面再轉一圈，兩圈作螺旋形，連在一起；(2) 先讀八行，然後顛倒方向接讀十三行，再順讀邊文，内外圈不銜接。這裏是採取第一種讀法。另外，應當説明一

下，有些研究者想以中間兩篇開頭的形式（「唯」或「曰故」）決定孰先孰後，這是不足爲據的。因爲帛書三篇在内容上並不銜接，每篇的章與章聯繫也並不緊密。先秦古書多以單篇流行，篇與篇、章與章相對獨立，分合無定，並不能以後人理解的「義理」去要求。

下面再談帛書的性質問題。

曾憲通在《楚帛書》一書中曾把有關意見歸納爲六説：(1)文告説（蔡季襄、陳槃、董作賓）；(2)巫術品説（郭沫若、安志敏、陳公柔）；(3)月令説（陳夢家、俞偉超、楊寬説近之）；(4)曆書、曆忌説（前者：李棪，其説不詳；後者：李零）；(5)陰陽家説（李學勤）；(6)天官書説（饒宗頤）。

上述六説，其實應做進一步歸納。因爲第一，上述(1)説是錯誤的，已無人贊同；第二，上述(2)、(5)兩説並不是特殊的一類，帛書與巫術有關，大家都公認，而帛書屬於廣義的陰陽家説，拙作也先已發之；第三，如上所述，李學勤亦持曆忌説，所以這些説法，最主要的還是「月令説」、「曆忌説」和「天官書説」三種。

按此三説，前兩説比較接近。我們主張「曆忌説」，主要是據帛書較少説禮色彩，形式比較原始而已，並非把它與月令類古書視爲截然不同的兩類。相反我們認爲，兩類書有密不可分的聯繫。這兩説，都是著眼於有圖相配的邊文。而「天官書説」則看重帛書中間的兩篇，認爲這兩篇是講天文。我們認爲帛書中間兩篇與天文有關，是没有問題的，但它們與《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這類書有一點是不大相同的，就是它並不著眼於具體的天文觀察和曆術推步，而主要强調的是時令順逆與人事休咎的關係。這與屬於時日占驗的式法和從式法派生的曆忌之書關係更接近。後者於史志著録屬「五行」類，與「天文」、「曆算」兩類是有區别的。

饒宗頤曾批評拙作，以爲我所舉曆忌之書皆極晚出，並以帛書兼言宜忌，證明帛書不屬曆忌之書。我想更詳細地講一下自己的理解，向饒先生請教。

第一，帛書是數術家言，這點大家可以認同。數術之學不僅包括天文曆算（即《漢書・藝文

志·數術略》的「天文」、「曆譜」兩類），也包括從天文曆算派生的各種占卜（即《數術略》的「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四類）。劉向、劉歆把古陰陽家一分爲二，有撰人可考者歸入《諸子略》「陰陽家」類，無撰人可考的歸入《數術略》「五行」類。帛書顯然與《數術略》的「五行」類而不是「天文」、「曆譜」兩類更接近。李學勤指出帛書與陰陽五行之説有關，帛書十二神與六壬十二神有關，都是非常正確的。

第二，古代的時令書，是以式所代表的宇宙模式爲基礎，依照它的圖式而來。這種書，過去大家注意較多的衹是《月令》等古書。但最近我們已經弄清，中國古代的時令書還可細分爲兩種：一種是「四時時令」，嚴格按四時十二月分配二十四節氣；另一種是「五行時令」，則是以實際曆法牽合五行配數，配有一種特殊的「三十時節」。二者有一定的對應關係，但又不盡相同〔五〕。《月令》等類古書屬於前者，《玄宫》屬於後者。帛書衹有四方，與中央不配套，性質近於前者。

第三，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是一種模擬系統。它用「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即十二辰）、二十四節」等一系列概念（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數字（八卦也屬於數字系統），把宇宙和人世間的一切皆納入其中。因此可以有各種複雜的組合，並用這些組合和計算進行占卜。特别是古人還把人的生命周期和歷史循環也納入其中，把這個體系看作一個大以年計，小以月、日計的「時間表」，並與各種禁忌相配。禁忌也是原始思維的一大特點，對古代的社會行爲有莫大約束力。司馬談《六家要旨》説「陰陽家」「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實際上這是數術家言的普遍特點。中國古代的各種禁忌，不僅體現在時令書中，也體現在各種占卜之中，包含許多相似術語。其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是無法截然分開的，衹講宜或衹講忌的書是没有的。古人所講的「曆忌」衹是一種籠統的稱謂。

第四，根據《論衡·譏日》和《荆楚歲時記》，曆忌之書可分「月諱」和「日禁」兩種。楚帛書屬於前者，出土日書屬於後者。二者性質不僅相近，許多行文格式和術語也是相同的。

第五，我們説楚帛書是月諱之書，主要是據上述各點，而並不是《隋志》中的書名。我們舉這些書名祇是説帛書應與這類書性質相近，而並不涉及其年代早晚的問題。古代的數術方技之書要比一般子書更强調職業傳統，往往内容不斷沉積，傳本反復淘汰，在分類上有很大沿襲性。

最後，我們可以把帛書三篇的要點概括如下：

（一）甲篇（十三行）。側重講知歲、順令的重要性和不知歲、逆令帶來的凶咎。

（二）乙篇（八行）。側重講四時的起源（即初由四神相代分四時，後由日月之行分四時）。

（三）丙篇（邊文）。側重講各月禁忌（宜忌）。每章皆有三字標題和神物圖像。

細節詳見下文考證。

三、釋文考證

以下釋文是經重新核對而寫定。凡引用各家考釋，均簡稱「某氏文」。屬於八十年代以前者，請看舊作「研究概况」；八十年代以後者，請看本文「新作簡介」。其中李學勤的四篇文章，可視爲一組，這裏統稱「李文」；饒宗頤、曾憲通合著的專書，因祇引饒宗頤的考釋，這裏稱爲「饒文」。引用順序是按發表先後。凡字迹不清，缺乏把握的字括注「?·」號，「□」號表示缺文，「▨」號表示殘文，並用「[　]」號補字。注釋限於訂正補充，餘請參看舊作。

甲篇

一

隹（惟）□□▨①，月則緹（贏）絀②，不旻（得）亓（其）祟（當）③；春頭（夏）昧（秋）各（冬），□又（有）叓尚（常）④；月〃（日月）星唇（辰），䜌（亂）遊（逆）亓（其）行⑤。緹（贏）絀遊（逆）▨（亂?·），卉木亡「尚（常），是（?·）[謂]夭（妖）⑥。天陛（地）乍（作）羕（祥）⑦，天梧（棓）牆（將）乍（作）澫

（湯）⑧，降于亓（其）［四］方⑨。山陵亓（其）𤅩（廢）⑩，又（有）淵氒淈（汩）⑪，是胃（謂）孛〓（悖⑫。悖）散（歲）▨月，內（入）月[2]七日〓（七日）、▨（八日）⑬，□又（有）電、雹（霜）、雨土⑭，不旻（得）亓（其）參職⑮。天雨▨呂〓⑯，是遊（逆）月；閏之勿行⑰：一月（一月）、二月、三月，是胃（謂）遊（逆）終亡⑱[3]，奉▨□亓（其）邦；四月、五月，是胃（謂）𦋊（亂）絽（紀）亡⑲，㫃▨▨⑳。亓（?·其）散（歲）：西䶵（國）又（有）吝，女（汝）昌〓（日月）既𦋊（亂），乃又（有）兒（霓）方（?·傍）㉑；東䶵（國）又（有）[4]吝，▨（天?·）▨（下?·）乃兵㉒，𥎦（害）于亓（其）王㉓。

△陽部，○月部合韻。

注釋

① 李文謂此句是講月行贏絀的原因，於第四字下斷句，可從。

② 「⿰糸呈絀」，讀爲「贏絀」，超舍叫贏，退舍叫絀（參看《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管子·玄宮》的三十時節有「小郢」，讀爲「小贏」，相當二十四節氣的「小滿」。「郢」亦「⿰糸呈」字（通假字或錯字）。

③ 「祟」，適當一道泐痕。此泐痕將示旁一分爲二，切斷橫劃，並將中間的竪劃掩去，但從放大照片看，還微露痕迹。此字，各家多釋「豈」，但下半橫劃平直，有通連之意，與同書「共」字、「奉」字和「與」字所從的「収」有別，似非「収」。

④ 第三字也可能是「㝸（變）」字。饒文「又」上無缺文。「尚」字，饒文作重文，但核以放大照片，饒文所謂重文號乃右側下垂之筆的殘劃。

⑤ 「遊」，漢印中的「逆」字往往作「⿺辶羊」，應屬形譌，拙作釋「逆」，李文同。《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是相近文例。何文亦指出漢隸「逆」字往往作「⿺辶羊」，但以音近相假爲說，仍從林巳奈夫釋「⿺辶羊」。（補注：何氏新近亦取形譌說，見所作《校補》文。）「逆行」

又叫「反道」或「返逆行」（《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天文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東行」即左旋，「西行」即右旋。

⑥「夭」，龍宇純釋「宊」。其實此字並不從宀，乃是「夭」字的變體，詳見吴文考證。

⑦「羕」，饒文引中山王壺「不羕（祥）莫大焉」，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黄爲大羕（祥）」，讀爲「祥」。《洪範五行傳》有「五色之眚」和「五色之祥」，鄭玄注：「眚生於此，祥自外來也。」是一種外來的災禍。

⑧「天棓」，饒文引《説文》「音」字或體作「欯」，證明此字應釋爲「天棓」。「[illegible]」，饒文引《漢書・天文志》「四星若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晉灼注：「湯，猶盪滌也。」），湯也是一種凶咎。

⑨饒文「亓」下無缺文，讀爲「降于其旁」。

⑩「[illegible]」，屢見於楚簡和曾簡，字或從弓，蓋即「發」字。

⑪「[illegible]」，何文同拙作，釋「[illegible]」或「汩」。李文亦釋「[illegible]」，但以爲「頮」字，讀爲「潰」。按「頮」是「沬」字的異體。「沬」字，《説文》古文作「湏」，金文作「[illegible]」或「[illegible]」（參看《金文編》六一七頁），與此不同。

⑫「孛」，李文、饒文並以爲彗孛之「孛」，但帛書重文，下一「孛」字是連「歲」字而讀，可見是動詞。這裏仍讀爲悖逆之「悖」。

⑬「入月七日八日」，睡虎地秦簡《日書》有相似文例。「八日」應是合文。

⑭「電」，何文以爲「電」從申聲，而此字下半與「申」不類，而與中山王方壺「[illegible]」字所從的「田」寫法相同，因從安志敏、陳公柔之舊説，改釋爲「雷」。但「雷」字並不從田，我們考慮，即使此字從田，亦以讀「電」更合適（「田」與「電」都是定母真部字）。「陳」字，《説文》古文作「[illegible]」，古書則多作「田」；「申」字，古文作「[illegible]」，字亦從田得聲，皆申、田古音相近之證。「[illegible]」，李文引《白虎通

義・災變》「霜之言亡也」，讀「霜」，何文並引《古文四聲韻》「霜」字作「□」（出《義雲章》），似從亡，確不可易。

⑮「參職」，何文引《漢書・丙吉傳》、《後漢書・竇融傳》、《通典・職官二》，以爲是燮理陰陽之義。

⑯「□□＝」，饒文合爲一字，釋爲「喜＝」。今按應是兩字。

⑰「逆月」，蓋指月行反道、退舍、過緩。「閏」，則爲動詞，含義不詳。

⑱「逆終亡」，一、二、三月失政，是因年終置閏失當而造成。「終」指年終，見拙作。

⑲「亂紀亡」，四、五月失政，則造成四時之序的紊亂。「亂紀」見《漢書・天文志》，饒文、何文引之。「紀」，指日、月交會，見拙作。

⑳第三字，似爲「朢」。

㉑「皃」，今從高文、何文釋「皃」。但高文讀「敗」，以爲毀敗之義；何文讀「鬩」，以爲忿争之義，則可商。疑應讀爲「霓」。「霓」，字亦作「蜺」，也是一種凶咎。《説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以「蜺、蒙、霧」爲陰雲之類，説「蜺，日旁氣也」，詳記蜺氣之占，有「赤蜺」、「白蜺」、「黑蜺」之名，可參看。《古微書》引《河圖稽耀鉤》，謂「蜺者，氣也，在日側，其色青、赤、白、黄」；又引《尚書璇璣鈐》謂「日旁赤黄者爲蜺」，蓋霓有五色之異。《楚辭・離騷》「帥雲霓而來御」，注：「雲霓，惡氣。」「方」，原作殘文，饒文釋「宎」，但從放大照片辨認，字亦作「□」，應是「方」字，疑讀爲「傍」，指雲霓傍日。

㉒殘文第一字存一横劃，第二字存一竪劃，疑是「天下」二字。

㉓「𧊒」，見於秦簡《日書》，字亦作「憂」或「踽」，裘錫圭《釋𧊒》（香港中文大學《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八三年）謂與甲骨文「□」爲同一字，讀爲「害」。《開元占經》引《甘氏歲星法》「其國有誅，必害其王」，是相同之例。以上爲第一章，主要講歲月贏絀。

二

凡歲(歲)惪(德)匿(慝)①，女(如)⧄昌⧄隹(？)邦所五(？)天之行②，卉木民人㠯⧄四淺(踐)之[5]尚(常)，⧄⧄上天，三寺(時)是行。隹(惟)惪(德)匿(慝)之歲(歲)，三寺(時)既(？)㫚③，鼕之㠯𢆶降④。是月㠯數(數)曆(擬)爲之正⑤，隹(惟)十又(有)[6]二⧄。隹(惟)孛(悖)惪(德)匿(慝)⑥，出自黃淵⑦，土身亡翼⑧；出內(入？)□同⑨，乍(作)亓(其)下凶。冃=(日月)皆(皆)亂(亂)，星曆(辰)不同(炯)。冃=(日月)既亂(亂)，歲(歲)季[7]乃⧄，寺(時)雨進退，亡又(有)尚(常)𠄞(恒)。恭(恐)民未智(知)，曆(擬)㠯爲則毋童(動)。羣民㠯叜⑩，三𠄞(恒)發(廢)，四興兒(兌)⑪，㠯⧄天尚(常)[8]。羣神五正，四興(？)失羊⑫。建𠄞(恒)襡民⑬，五正乃明，百神是亯，是胃(謂)惪(德)匿(慝)⑭，羣神乃惪⑮。帝曰：「繇(繇)，⧄(敬？)之哉[9]，毋弗或敬。隹(惟)天乍(作)福，神則各(格)之；隹(惟)天乍(作)夭(妖)，神則惠之。欽(？)敬隹(惟)備，天像是惻(則)⑯。成隹(惟)天⧄⑰，下民[10]之戒(式)⑱，敬之毋戈(忒)！」

△陽部，○東部(同，耕部合韻；𠄞，蒸部合韻)，◬之、職部通韻。

注釋

①「惪匿」，各家多從商承祚讀爲「側慝」(屬於退舍)。但側慝應有凶咎，下文所述反是，可見這一讀法是有問題的。

②「如」下殘文，饒文作兩字，釋爲「曰亥」。今按饒文所釋「曰」字，上面還有筆劃，應是兩字，第一字衹存上半的一筆，第二字殘存下半「曰」字；所釋「亥」字，原文作「□」，亦非「亥」字。「所」下殘文，饒文釋「五」，形似。這段話文義不清，似應包含兩句。

③「時」下第一字，僅存旡旁，疑是「既」字；第二字作「□」，二字因裱裝錯位而誤合在一起。

④「□」，李文釋「縛」，字形不合；饒文釋「鯀」，近是，但忽去下半殘存的「女」旁。「□」，下從市。

⑤「□」，李文同拙作。饒文釋「遷」，字形不合。

⑥以上講「德慝」本身，似乎並無凶咎。而以下講違反「德慝」，反而皆屬凶咎。可見「德慝」並非「側慝」。

⑦「黃𣶒」，疑指黃泉。《淮南子・墬形》有黃、青、赤、白、玄五色之泉，各相應於「正土之氣」、「偏土之氣」、「壯土之氣」、「弱土之氣」、「牝土之氣」。

⑧「土身」，疑與《淮南子・墬形》所説「正土之氣」有關。第四字，左半從「□」，原隸定作「□」，饒文、高文同，不一定對；右半似從異。（補注：何琳儀《校補》引曾憲通説釋「□」。）

⑨「出入」下缺文，原補「空」字，不能肯定。

⑩第四字從放大照片看，下半從火。

⑪「兒」這裏從高文讀「敓」。《説文》：「敓，斁也。」「斁，毀也。」

⑫「□」，李文、饒文、何文釋「尭」（《説文》「堯」字古文作「□」）。（補注：漢簡「无」作「□」，李家浩釋「无」。）

⑬「□」，原文如此，各家多釋「建」，何文以爲此字下從止，與「建」字從乚不同，應是「律」（或作「建」）字。「襡」，舊釋「懷」，李文釋「褱」，讀「懌」，何文釋「襡」，讀「屬」。按二説應以何説爲是。李文釋「褱」，蓋以其字所從的「□」爲「□」字（「臭」字，金文借爲「斁」），字形不合。此句似指調合律曆，敬授民時。

⑭這是原文對「德慝」的解釋，諸家皆以「側慝」爲解，與此不合。高文已注意及此，因謂此句非衍即誤。其實此句適可反證「德慝」與「側慝」含義有別。

⑮「羣神乃德」，人享神，故神德之。這是「德慝」一詞中「德」的含義。

⑯「惻」，拙作讀「則」，李文同。饒文、高文、何文讀如本字，以爲敬慎之義。

⑰「戚」，拙作讀「戚」，李文、何文以爲「成」字，但與帛書邊文「城」字所從的「成」字不合。饒文以爲「戕」字，讀爲「虔」。

⑱「戜」，李文讀爲「示」。以上爲第二章，主要講歲月德慝。

三

民勿用𢓊𢓊百神，山川澫（瀨）浴（谷）①，不欽敬行。民祀不㫄，帝𤈦（將）繇（繇）㠯䜌（亂）遊（逆）之行[11]。民則又（有）穀，亡又（有）相𧀗（擾）。不見陵☐，是則兒（霓）至。民人弗智（知）𢧢（歲），則無𢀗祭②。☐則返民③，少又（有）☐。土事[12]勿從，凶[13]。

△陽部，○月部，△東部。

注釋

①「澫」，見於《石鼓・汧沔》，即「濿」字，讀爲「瀨」。前人考釋石鼓，多已發之（如宋楊文昺《周秦刻石釋音》、清吳東發《石鼓讀》），參看拙作《古文字雜識》（待刊）（補注：見《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李文、饒文讀「漫」，是據鄭樵誤釋，唯何文得之。

②「𢀗」，何文指出此字並非從有是對的，但隸定作「䌛」則可商。

③第一字，李文釋「祀」。第三字，李文釋「返」。（補注：經目驗帛書，第一字非「祀」，第三字爲「返」。）以上爲第三章，主要講「知歲」的重要性。

乙篇

一

曰（粵）故（古）☐熊雹（包）䖒（戲）①，出身帀𩁹②，凥（居）於𦊆𨾊☐③。氒☐僬＝，☐☐☐女④，夢＝

(夢夢)墨=(墨墨)，亡章弼=(弼弼)，▨妟水▨，風雨是於⑤。乃取(娶)[1]虞遅□子之子⑥，曰女[illegible]⑦，是生子四▨⑧，是(?)襄而㙂(踐)⑨，是各(格)參祡(化)。𧑮(?)逃⑩，爲思爲萬𠂇司堵⑪，襄咎(晷)而步⑫。廼[2]乃卡=(上下)朕遖(斷)⑬，山陵不㳄(𣳚)。乃命山川四𠀠(海)⑭，▨熏既(氣)[illegible]既(氣)⑮，𠂇爲亓(其)㳄(𣳚)。𠂇涉山陵，瀧汩凼澫(瀨)⑯。未又(有)昌=(日月)，四神[3]相戈(代)，乃步𠂇爲𢧵(歲)。是隹(惟)四寺(時)⑰。

△魚部，○歌、月、元部通韻。

注　釋

①「故」下殘文，李文、何文從金祥恒説釋「黄」，饒文釋「大」，字形不合。「𦏧」，原文作「[illegible]」，與子季嬴青匿(湖北襄陽山灣 M33 出土)「嬴」字(作「[illegible]」)所從的「𦏧」相同，拙作據以隸定。李文、饒文從巴納説隸定爲「奞」是不對的。嬴字從𦏧，《説文》：「𦏧，或曰嘼名，象形，闕。」已不明其義，其實此字乃是嬴(蝸牛)的本字。方濬益根據金文字形指出，此字「象嬴出首負殼，其紋重叠之形，而嬴與熊亦以形近相通，《左》文公十八傳『敬嬴』，《公》、《穀》作『頃熊』，又宣公八年『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熊』與『能』古又相通，《左》昭公七年傳『今夢黄熊入於寢門』，《國語·晉語》作『黄能』。《爾雅·釋魚》：『鱉三足，能。』《説文》：『鱉，甲蟲也。』正從背有甲，與嬴同形」(《綴遺齋彝器考釋》卷十二第二十六頁)。此字並不從大，所謂從大，以金文字形看，顯然是由嬴蟲之足訛變(如嬴霝德鼎「嬴」作「[illegible]」)。「𦏧」與「能」形體、讀音均有關，參看于省吾《釋「能」和「𦏧」以及「從𦏧」的字》(《古文字研究》第八輯)。

②「帀霆」，饒文認爲此二字是指包戲的世系所出。

③「𥉻▨」，地名，上字從何文隸定。

④第一字上半作「[illegible]」，第二字下半似從「木」。這兩句，含義不清。

⑤「風雨是於」，饒文、何文引《山海經·大荒北經》「風雨是謁」，謂「於」通「謁」。高文則讀「風雨是越」。但「謁」、「越」是月部字，「於」則是魚部字。

⑥「虘遲□子之子」，待考。「虘」下之字原作殘文，今從放大照片辨認，實作「𢓊」，應釋「遲」字。

⑦「女㞷」，多以爲女媧，但釋字均有未安，李文懷疑非女媧。

⑧或於「四」下斷句。

⑨第三字，應從李家浩説釋「而」。

⑩第一字不清，是否爲「螭」，尚有疑問，但右半並非從「虍」。

⑪第二字，李文、何文以爲非「禹」字(補注：經目驗帛書，應釋「思」)。第七字，作「垎」，與丙篇「欱出睹」之「睹」字所從相同。李文不釋，饒文同拙作，高文、何文釋「域」。按此字不是「域」字，帛書有「或」字，驗之可明。此句文義不清。

⑫第三字，應從李家浩説釋「而」。

⑬第一字，似作「緦」。

⑭「乃命山川四海」，《書·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潛夫論·五德志》：「(禹)主平水土，命山川。」饒文讀「命」爲「名」，至確。此句是説爲山川四海命名。

⑮第二字，應從饒文釋「熏」，但饒文謂此字「於宀內從中從炅」則誤(補注：李家浩説此字所從熏與番生簋同)。第四字，原釋「害」，李文、高文同。今從放大照片辨認，實作「𦣞」，中間筆劃並不通連，可見釋「害」是有問題的。

⑯第六字，原釋「沺」，李文、高文同，但「沺」字當中一筆不應與兩邊相連，今從饒文、何文改正。

⑰「戈」，應讀「代」。以上爲第一章，是講四神相代，步以爲歲，以分四時。

二

倀(長)曰青□榑(榦)①，二曰未(朱)四(?)嘼(單)②，三曰翏黃難③，四曰淋墨榑(榦)④。千又(有)百戢(歲)，肙[=](日月)⁴夋(允)生，九州不坪(平)，山陵備(垘)岆⑤，四神乃乍(作)□至于復(覆)⑥。天旁(方)𨗨(動)⑦，攼(扞)敝(蔽)之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木之精(楨)[5]⑧。炎帝乃命祝𩘷(融)㠯四神降奠三天⑨，[㠯] 㬎思敄(敷)奠四亟(?·極)⑩，曰：非九天則大岆⑪，則毋▢𧾤天霝(靈)⑫。帝夋乃[6]爲肙[=](日月)之行⑬。

△元部，○耕部。

注　釋

① 李文以爲「青」下適當帛書撕裂處，裝裱時缺去一字，可從。

② 第四字殘泐，是否爲「四」尚有疑問。「單」，饒文讀「檀」。

③ 第三字似是「翏」字。（補注：經目驗帛書，確是「翏」字。）「難」，饒文讀「橪」，以爲棗木。這裏祇有四木，按四色配四方，應作青、朱、白、墨排列，但這裏却是黃木，疑帛書原作五木，與下文同，脱去白木。

④ 第三字，多以爲右半從水，但從放大照片辨認，中間似有一短橫。（補注：經目驗帛書，字作「淋」。）

⑤ 「山陵備岆」，朱文讀爲「山陵崩弛」，以爲「備」、「崩」爲之、蒸二部對轉字，「岆」從血，「血」與「益」作爲偏旁常常通用，字實從「益」聲，「益」屬支部，可借讀爲「弛」，並引《漢書·劉向傳》、《新序·雜事二》「山陵崩弛」爲證。這是富於啓發性的。但《史記·天官書》有相似文例，作「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漢書·天文志》「徙」作「阤」），徐廣曰：「土雍曰垘。」孟康曰：「垘，崩也。」

蘇林曰：「伏，流也。」（《漢書》如淳注：「埶，填塞不通也。」）是指山陵崩壞、滑坡，川流和溪谷壅塞不通，也就是今之所謂泥石流。按「備」是並母之部字，「埶」是並母職部字，屬陰、入對轉（馬王堆帛書《養生方》「茯苓」作「備零」）；「峡」從益，是支部或錫部字，「徙」是心母支部字，亦屬同部。而「陁」與「弛」是歌部字，與從益聲之字不同部。則此句讀爲「山陵埶徙」也許更合適。

⑥李文認爲「乍」下當帛書撕裂處，應補一字，可從。「□至」，也許是「四至」，即下文「四極」。「覆」，疑指天覆地載之「覆」，即天穹。帛書「至于」一詞一般作合文，而此分書可見這裏的「至」、「于」不是一個詞。

⑦「天旁遣」，拙作讀「天方動」，高文從之。

⑧「攼敷」，饒文同拙作。「精」，舊多讀「精」，疑非是。《玉篇》：「精，木名。」亦非所當之義。這裏「精」指五根擎天柱，疑讀爲「楨榦」之「楨」。「楨」爲端母耕部字，「精」爲精母耕部字，讀音相近。

⑨「[illegible]」，左半下部從「[illegible]」，非「辠」或「臬」。「降奠」，指降定。

⑩李文認爲「天」字下當帛書撕裂處，應補一字，可從。此字從文義看，似應爲「㠯」字。下「系思」應是一詞。「敦奠」，應從饒文，讀爲「敷奠」，是布定的意思。

⑪「九天」，古書多見。在《孫子·形》中是與「九地」相對，在《淮南子·原道》中是與「九野」相對，二者都是按四方八位加中央作九宮式分布。「九天」各天的具體名稱，見《呂氏春秋·有始覽》和《淮南子·天文》，這種概念應與式法有關。今遁甲式亦有「九天」、「九地」。「大峡」，疑指大動。

⑫「[illegible]」，右從攴旁，商承祚釋「斂」，饒文釋「蕺」，曹文、何文釋「冒」。（補注：第三字，各家多從拙作釋「敢」，經目驗帛書，非「敢」字。）

⑬「帝夋」，李文以爲「曰」字以下是祝融所說，當讀爲「帝允」，以爲是炎帝許之之義。但從文

義看，「曰」字的主語還是以解釋爲炎帝更好，這裏仍作「帝夋」解。以上爲第二章，是講祝融命四神以四木（或五木）承天和帝夋按日月之行定四時。

三

共攻（工）夸步十日四寺（時）①，▨□▨神則閏四▨毋思（息）②，百神風雨晨（辰）禕（違）𤔔（亂）乍（作）③，乃⿺廴▨⿱日月=（日月）㠯⿺辶叀（轉）相土（?）思（息）④。又（有）宵又（有）朝，又（有）晝又（有）夕⑤⑧。

△之部（夕，鐸部合韻）。

注　釋

① 「夸」，饒文釋「夸」。此句是指共工推步十日四時。十日指分一月爲三旬。四時，既可指一年分爲春、夏、秋、冬四時，也可指一日分爲宵、朝、晝、夕四時。據馬王堆帛書《禹藏圖》，月亦可四分。

② 李文以爲第一字下當帛書撕裂處，應補一字，可從。「神」上疑是「百」字。「毋思」，原斷在下句，今按帛書此章有韻，「思」字是韻脚，應連此句爲讀。此句含義不清，似指共工命百神「則閏四▨」，不可停歇。「閏」亦動詞。

③ 「晨禕」，饒文讀爲「辰違」。

④ 以上，各家多以爲是四字句，李文斷爲「共攻□步十日，四時□□，□神則閏，四□毋思，百神風雨，晨禕𤔔乍，乃▨⿱日月=，㠯傳□思」，何文同。饒文斷爲「共工夸步，十日四寺，▨▨神則閏……（餘同李文）」。（補注：「相」下原作殘文，經目驗原書，似是「土」字。）

⑤ 以上爲第三章，是講共工推步十日四時和分一日爲宵、朝、晝、夕。

丙篇

取于下①

曰：取，乙則至②，不可㠯[1]亯殺③。壬子、丙(丙)子凶。乍(作)[2]□北征，銜(率)又(有)咎④，

武㠯[3]□亓(其)敺(歇)[4]⑤。

注釋

①李文認爲本篇各章題目，祇有本章可以連讀，其他皆應分讀，第一字爲月名，第二、三字爲神名。我們則認爲，章題第一字是月名兼神名，第二、三字不是神名，而與各章内容有關，一種是表示月神職司，如「秉司春」、「虘司夏」、「玄司秋」、「荼司冬」；一種是隱括原文内容，如下章涉及「出師」，題目作「如此武」，第四章講「取女」，題目作「余取女」，三字仍應連讀。「取于下」，疑即攝提之義。

②「乙」原釋「乙」，讀「鳦」，但月令類古書記鳦至是在二月。何文釋「㔾」，讀「範」；朱文釋「云」，無説；李文亦釋「㔾」，讀「犯」。

③「不可㠯亯殺」，月令類古書每於春正月强調「毋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呂氏春秋·孟春紀》)。李文引雲夢秦簡《日書》甲種：春三月甲乙、夏三月丙丁、秋三月庚辛、冬三月壬癸皆「不可以殺，無所以張生」(七九四、七九三、七九二、七九一)，也提到「不可以殺」。

④「銜有咎」，饒文認爲是指北征則太歲當衝，李文則認爲楚在南方，常出兵北向。按古代兵陰陽家有順斗逆斗之説。《漢書·藝文志》「兵陰陽」類小序：「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正月由北向南擊爲隨斗，北征則是逆斗而擊，犯其忌諱，所以説「銜有咎」。「銜」指軍銜。

⑤「武」，《淮南子·時則》「還乃賞軍率武」，注：「軍率，軍將也；武，勇者功名也。」「畝」，此從饒文、朱文隸定。朱文考爲「歇」字，但文字殘缺，讀法不詳。

女此武①

曰：女，可㠯出帀（師）䈞（築）邑[1]。不可㠯豙（嫁）女取臣妾[2]②，不夾（兼）得不戚[3]③。

注　釋

①讀爲「如此武」，指下文「可㠯出師」。

②「豙女」，睡虎地秦簡《日書》和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經常提到「取（娶）婦家（嫁）女」，可以證明「嫁女」之讀是對的。

③「戚」，拙作讀爲「憾」，高文同。

秉司春

［曰：秉，］□□□□□[1]妾畜生（牲）分□□[2]①。

注　釋

①此章行款，第二行有章號，可以判斷衹有六字。第一行應與章號對齊，衹有七字。何文兩行均非七字，是誤將章號計入。此章文義難曉，第二行第一字，饒文引曾憲通說釋「妻」，讀爲「棲」；何文亦云此字與《古文四聲韻》引《古孝經》「妻」字同。「畜生」，即畜牲，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及畜畜生。」（七六一）

余取（娶）女①

曰：余，不可㠯乍（作）大事。少杲亓（其）[1]☒②，☒龍亓（其）☒，取（娶）女，爲邦芺[2]③。

注釋

①「娶女」，應與下文「娶女」有關。

②「杲」，字形與帛書「榑」字所從相同，朱文釋「杲」。

③「芺」，何文釋「莽」，讀「亡」。朱文亦釋「莽」，讀「墓」。按帛書「爲邦芺」，含義還有待研究。

欱出睹

曰：欱，戱衛（率）☒旻（得）㠯匿①。不[1]見月才（在）㠯☒，不可㠯亯[2]祀，凶。取☒☒爲臣妾[3]。

注釋

①「戱」，原釋「戲」，饒文、高文、李文同，不一定對。（補注：何琳儀《校補》引曾憲通説釋「鳶」。）

虘司顕（夏）

曰：虘，不可出帀（師）。水帀（師）不㕛☒①，亓（其）敀（敗？）[1]亓（其）復（覆），至[=]（至于）亓（其）下☒②，不可㠯亯[2]。

注釋

①「水師不㕛」下似作「㘝」。（補注：經目驗帛書，似作兩字，第一字似從「又」，第二字不清。）

②「亓下」，「亓」字原文斜置且扭曲，作「[illegible]」，拙作釋「亓」，饒文、高文、何文同，李文釋「乜」，蓋以爲原文作「仌」；「下」亦斜置，作「[illegible]」，原作殘文，饒文釋「下」，何文釋「大」，應以釋「下」爲是。

倉莫（？·）㝵（得）①

曰：倉，不可㠯川（穿）▨②，大不²訓（順）于邦，又（有）[illegible]内（入）于卡＝（上下）²③。

注　釋

①「莫得」，應指下文「大不順于邦」。

②「川」，饒文、何文、李文讀「穿」，可從。

③「[illegible]」，原釋「県」，饒文、高文同（但饒文又以爲同「梟」字，李文直接釋「梟」），不一定對。（補注：何琳儀《校補》引曾憲通説釋「梟」，但寫法實與上甲篇七行十四字和丙篇五章一行三字所從相同。）

臧杢▨①

曰：臧②，不可㠯籔（築）室，不²可㠯乍（作），不脨不復③，亓（其）²邦又（有）大𤔔（亂）。取（娶）女，凶³。

注　釋

①章題含義不清。

②字不清，可據文義補「臧」字。（補注：經目驗帛書，確是「臧」字。）

③「脨」，原讀「疾」，饒文引之，但正式稿删去。其實這一讀法是不對的（「疾」爲質部字，「朿」爲錫部字）。何文、朱文讀「膌」或「瘠」（古文作「瘷」），以爲疫病之義。（補注：原作「可［目］〼，〼脨（瘠）不復（復）」，經目驗帛書，應作「可目乍（作），不脨不復」，「作」即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作事」。）

玄司昧（秋）

曰：玄，可目笞（築）室（？）□□□ᒾ吁〼遲（徙）①，乃〼□□□ᒾ②。

注　釋

①「遲」，從饒文隸定。按此字當是「徙」字的古文。《説文》「徙」古文作「屎」，叔夷鐘、鎛和陳肪毁「敞」字從之，皆作「屎」。秦簡《日書》甲種提到「東徙」、「南徙」、「西徙」、「北徙」（七八八—七九一）。

②帛書下緣殘去，估計兩行缺字不會超過三字，第一行應爲九字，第二行應爲八字，外加章號一。

昜〼羕①

曰：昜，不［可］毀（毁）事②，可［目］□ᒾ折③，敘（除）故（去）不羕（義）于四［方］ᒾ④。

注　釋

①章題含義不清。

②「不」下從行款推斷，還應有一字，此從高文補「可」字。「毁事」，《周禮·地官·牧人》

「凡外祭毀事」，杜注：「毀謂齵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孫詒讓《正義》以爲杜説未當，毀事當指毀折牲體。饒文、何文引之。

③「□折」，「折」字饒文讀爲「誓」，何文謂指毀折牲體。但這裏「□折」上爲「可以」，「毀事」上爲「不可」，二者顯然含義不同。

④「敍故」，饒文、李文讀「除去」，何文讀「捨去」。按本章似與磔攘之事有關。《禮記・月令》「（季春之月）九門磔攘」，孫希旦《集解》：「磔，磔裂牲體也。九門磔攘者，逐疫於國外，因磔牲以祭國門之神，欲其攘除凶災，禁止疫鬼，勿使復入也。」《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十二諸侯年表》「（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皆其事，但與此時間不合。這裏應讀「除去不義于四方」。「不義」，應指不宜，即凶災。這兩行的行款字數，原未敢定。今從照片看，兩行缺文距下章圖像甚近，僅可容二字，第一行應爲九字，第二行應爲八字，外加章號一。

姑分長①

曰：姑，利戢（侵）伐，可吕攻城[1]②，可吕聚衆，會者（諸）侯，型（刑）首（？·）[2]事③，殍（戮）不羛（義）[3]④。

注　釋

①「分長」，疑指下文張軍舉兵之事。何文讀爲「分張」，以爲分布之義。

②「城」，原釋「成」，饒文同，以爲從戊從壬。其實此字上半從成，下半從土，應從高文、何文、李文直接釋「城」。

③「首」字，不清，也可能是「百」字。

荃司备（冬）

曰：敍①，不可㠯攻［城］，□[1]▨□□□□毁▨[2]②。

注釋

①「敍」，高文、何文、李文並以爲是下行第一字，此處應補「荃」字。饒文云：「古本《爾雅》作荼。《周禮·哲族氏》注云：『從陬至荃。』阮氏校勘記引，一作除。」則認爲「敍」是「荃」的異寫。

②此章拼接混亂，行款似乎是作雙行行八字，第一行八字，第二行七字，外加章號一。

四、行款與字數

這個問題，目前仍有一定分歧。希望將來國外學者能對帛書裝裱加以科學鑒定。這裏把我們的理解説明一下：

（一）甲篇。

巴納摹本作十三行，第一—十二行均爲三十四字，第十三行爲四字（包括章號）。饒、曾二氏之書則認爲第一、二行的第十七字，第三、五行的第十六字並不存在。按後者所釋第一行「又□尚尚」，「尚」字非重文；第五行「四」上有殘劃，均可疑之處，又所舉空字距離是據肉眼判斷。帛書幅面經裝裱，有很大變形，同樣情況還有很多處，這個問題須經鑒定原物才能解決，從文義判斷，似以巴納所定行款爲優。

（二）乙篇。

巴納摹本作八行，第一—三行爲三十六字，第四—七行爲三十五字，第八行爲十一字（包括章號）。饒、曾二氏之書無異辭。但李文提出第四—七行字數應同一—三行，也作三十六字，第四行第十八字下、第五行第十四字下、第六行第十三字下、第七行第十三字下適當帛書撕裂處，均掩去一

字。拙作原採巴納本，此從李文補字。

（三）丙篇。

各家理解不盡一致。共同的是一、二、四—八、十一章，有分歧的是三、九、十、十二章。今按帛書邊文雙行者儘量對齊，章號亦佔一字。第三章可定是雙行行七字，第九章估計是雙行行九字，第十章可定是雙行行九字，第十二章估計是雙行行八字。

字數統計（減去佔字的章號，加上章題）：

甲篇：$34\times12+4-3=409$ 字

乙篇：$36\times7+11-1=262$ 字

丙篇：章一：$8\times3+4+3-1=30$ 字

章二：$8\times2+6+3-1=24$ 字

章三：$7\times2+3-1=16$ 字

章四：$11\times2+3-1=24$ 字

章五：$9\times3+3-1=29$ 字

章六：$13+11+3-1=26$ 字

章七：$9\times2+3-1=20$ 字

章八：$8\times3+3-1=26$ 字

章九：$9\times2+3-1=20$ 字

章十：$9\times2+3-1=20$ 字

章十一：$9\times2+5+3-1=25$ 字

章十二：$8\times2+3-1=18$ 字

總計：九百四十九字。外加合文十二字，重文七字，可得九百六十八字。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二日初稿，發表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一九九一年二月廿五日修訂。

〔附記〕

拙作原有若干引誤和編輯上的疏忽，應予更正：

一、原書題簽是出張政烺先生之手。

二、原書注〔二〇〕引《淮南子·天文》是講「凡用太陰」，當以左前爲陰，右背爲陽，下文解釋正好相反。

三、原書釋文是請陳平先生鈔寫。

注釋

〔一〕拙作在書店發行又遲一年，而這些新作的發表也都有「滯後性」，故出現這種現象。

〔二〕參看金應春、丘富科《中國地圖史話》（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三〕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地學》第一分册（科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一三六頁。

〔四〕〔五〕李零《〈管子〉三十時節與二十四節氣》，《管子學刊》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寫於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提交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十届年會（長春，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二至二十八日），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輯，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三月，第一五四至一七八頁。

楚帛書目驗記

楚帛書是現已發現年代最早的古書，夙爲學者珍重，但原物早在二十世紀三十或四十年代就已流出國外，見之不易。我雖兩次討論楚帛書，一九八〇年夏寫成《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下簡稱《子彈庫》），一九八八年春寫成《〈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下簡稱《補正》），但遺憾的是，却從未見過帛書原物。

楚帛書流出國外後曾幾度易手，一九六六年始歸美國著名收藏家賽克勒（Dr. Arthur M. Sackler）。我在《子彈庫》一書中曾説，帛書是存放於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但實際上，在我寫書的前一年，即一九七九年，華盛頓的史密森尼研究所在弗利爾美術館東側增設賽克勒博物館，其時就已將帛書借來華盛頓。它的存放地點已變成賽克勒美術館。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二十八日，賽克勒美術館舉辦了一次東周楚文化討論會，邀我參加。會議特意展出了一些與楚文化有關的文物，包括賽克勒收藏的楚帛書和美國另一著名收藏家辛格（Dr. Paul Singer）的藏品。借便開會，我纔終於看到帛書原物。

這件帛書是陳放在地下展室的一層，陳放帛書的設備看上去很簡單，衹是一個固定在小方桌上的安有玻璃的扁平方盒，但實際上却有控制温度、濕度的裝置和警鈴。方盒旁邊的桌面上是澳大利亞學者巴納（Dr. Noel Barnard）的摹本。

我看帛書是分兩次，第一次是在開會之前的二十七日上午，第二次是在會議閉幕後又隔了一個星期天的三十日上午。頭一次，因爲人來人往，寒暄介紹，難以集中精神，看得比較馬虎，所

以又補看一次，特意拿了放大鏡，一字一字核對。看到後來，居然有些新的收穫。

在未見帛書之前，説實話，我根本没抱太大希望。因爲有些見過原物的學者告訴我，看看原物也就是「意思意思」，真要還想認出什麽字，恐怕不可能。我過去也見過帛書的彩色照片和紅外綫照片。前者一片深褐色，字迹很不清楚，使我以爲原物也不過如此。後者字迹比較清楚，但我不相信自己的眼力比紅外綫還强。所以這次真的見到原物，我的印象反而要好得多，不但整個比想象中要清楚一點，而且有相當大的一塊簡直可以説很清楚。

帛書原件，現在比較清楚的地方主要在上南下北方向的右半幅，即我稱之爲甲、乙、丙三篇中的乙篇（以「曰故」開頭）和丙篇（邊文）的六、七、八、九這四章（虘、倉、臧、玄），但甲篇（以「隹」字開頭）的左下角也比較清楚。這一大塊幅面，底色略呈灰白，使字迹顯得格外清晰。但它的由褐變白實在是「因禍得福」：一九七九年，當帛書從大都會博物館轉來賽克勒美術館時，帛書的這一部分曾不幸發霉，後來霉迹脱落，字迹反而變得清晰起來。二十七日上午，香港的饒宗頤先生來看帛書，曾開玩笑説，若能掌握這種發霉技術，但願帛書能「重開二度梅」（「梅」諧音「霉」）。

下面是我目驗帛書的一個簡短札記，録之以饗同好：

一、行款

甲篇：《補正》從巴納《楚帛書》（The Ch'u Silk Manuscript, Canberra 1973）定爲十三行行三十四字，末行衹有四字，減去佔字的章號，共爲四〇九字。乙篇：《補正》從李學勤《楚帛書中的古史與宇宙觀》（《楚史論叢》初集）定爲八行行三十六字，末行衹有十一字，減去佔字的章號，共爲二百六十二字。丙篇：《補正》定爲二百七十八字。全書共九百四十九字，外加合文十二字，重文七字，可得九百六十八字。現經目驗，大體正確。

二、文字

甲篇：

（一）十二行第二十六字，似作「[illegible]」。

案：《子彈庫》不釋，《補正》從李學勤《論楚帛書中的天象》（《湖南考古輯刊》第一輯）釋「祀」，經目驗，非「祀」字。

（二）十二行第二十八字，作「[illegible]」。

案：《補正》從上李文釋「返」，經目驗，確是「返」字。

乙篇：

（一）二行第二十六字，作「[illegible]」。

案：舊釋「禹」，李學勤《楚帛書中的古史與宇宙觀》、何琳儀《長沙帛書通釋》（《江漢考古》一九八六年第一、二期）以爲非「禹」字，經目驗，應是「思」字之殘（比較帛書「思」字可知）。

（二）四行第二十四字，作「[illegible]」。

案：《補正》疑是「翏」字，經目驗，確是「翏」字。

（三）四行第二十九字，似作「[illegible]」。

案：《子彈庫》釋「咪」，經目驗，應隸定作「[illegible]」。

（四）六行第三十字，似作「[illegible]」。

案：舊釋「敢」，經目驗，非「敢」字。

（五）八行第一字。

案：原不清，現可見是一「土」字。

丙篇：

（一）六章第一行第十字。

案：《子彈庫》釋「⿺辶□」，經目驗，似是兩字，第一字似右邊從「又」，第二字看不清是否從「辵」。

（二）八章第一行第二字。

案：原不清，《子彈庫》據上下文意補「臧」字，現可見清晰的「臧」字。

（三）八章第二行第二、三、四字。

案：原不清，現可見是作「㠯乍（作）不」三字。據此，第一行第八字至第二行第七字，應讀爲「不可以乍（作），不脨不逡」。

原載《文物天地》一九九一年第六期，二十九至三十頁。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and Shitu

（東周楚文化討論會〔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
1990年4月27—28日〕筆談稿，蘇芳淑譯）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is the oldest manuscript on *shushu* 數術 (numerals and skills) discovered to date. While the modern reader obviously finds such a text bewildering, it must, however, have been widely read in ancient times. It belongs in the same category as the large numbers of excavated *rishu* 日書, or almanacs.[1] Although only the *rishu* from the Qin burials at Shuihudi 睡虎地 have been published, they will nevertheless become a special topic of study as the many other excavated texts of a similar nature are systematically published. We shall be able to see clearly, then, that the study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it all.

In my past studies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2] I have always felt that there is an underlying facet that requires further study, and that is the manuscript's connection with the *shitu* 式圖, a diagram of *shi* 式 (or cosmic model). I have devoted much thought to this problem during my recent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ve, just before my coming to Washington, D. C., completed a long article on the subject.[3] That is why I would like to look at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smic model here.

The first question to ask is, "What kind of text is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Some say that the rise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in China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in ancient Greece are "standard breakthroughs" that normally accompany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s at certain stages of their development.[4] But then, what were the thoughts and philosophies of those civilizations before these "breakthroughs?" This is clearly an important question. In my view, ideas on *shushu* and *fangji* 方技 (prescriptions and techniques) are the two best reflections of prototypical

thought. The systematic texts of *shushu* and *fangji* are perhaps already a relatively late phenomenon but ideas contained in these texts were formulated much earlier. *Shushu* is primarily related to the universal order (hence, the cosmos), while *fangji* is primarily related to the human order (hence, the human body). Both include a variety of subjects and activities. ⑤

Shushu not only includes astronomy and the calendrical and mathematical sciences, but also the various related areas in divination (based on deduction) and physiognomy (based on observation). Among the two major types of divination practices, the first corresponds to that described in the "Ri Zhe Liezhuan 日者列傳" section of the *Shi ji*, and the second corresponds to that described in the "Gui Ce Liezhuan 龜策列傳" section of the *Shi ji*.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is primarily related to the first practice, and is a text that discusses the calendrical taboos based on the operating methods for the cosmic model.

This tex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describing the forbidden and permissible activities for the months, and one for each of the days.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is one such text for the months, while the numerous excavated *rishu* belong to the latter. While the two types of texts are both based on knowledge of astronomy and calendrical and mathematical systems, they are,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books, different from texts of the *tianwen* 天文 (astronomy) or *lisuan* 曆算 (calendar and mathematics) categories and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wuxing* 五行 (five elements).

A second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is the meaning of its unusual layout, which appears to follow a set scheme with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s in prescribed locations (Fig. 1). This kind of scheme, described in the *Liu jia yao chi* 六家要旨 by Sima Tan 司馬談 as "*sishi* 四時, *bawei* 八位, *shi'erdu* 十二度, *ershisijie* 二十四節" (the four seasons, the eight positions, the twelve degrees, and twenty-four solar terms) is actually derived from the *shitu*. On the Silk Manuscript, the four sides marking east, south, west, and north represent the "Four Seasons;" the four trees in green, red, white and black at the corners, and each of the four central figures on each side represent the "Eight Positions," while the twelve figures represent the "Twelve Degrees." Many different diagrammatic versions of the cosmic model were used in ancient times, but the most widespread version is that known as the *liuren* 六壬 type, and it is on this that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was based. The layout of the *liuren shitu* (also called *shipan* 式盤) is based on numerical divisions of 4, 8,

and 12, accompanied by twelve gods; other types of *shitu* were organized around the numbers 9 and 18, accompanied by nine or sixteen go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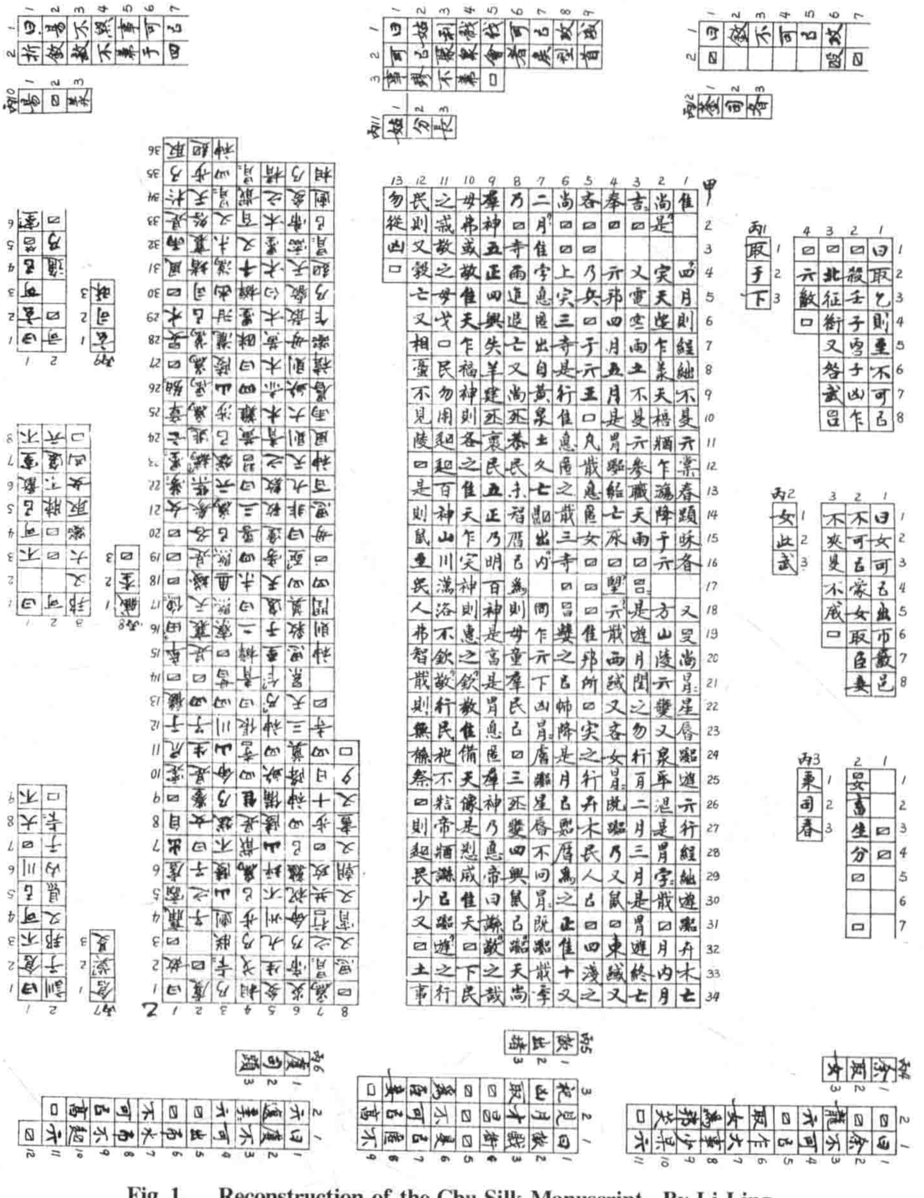


Fig. 1.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By Li Ling.

Although the earliest excavated examples date from early Han (Fig. 2),[⑥] cosmic models must have been in existence before the Qin and Han periods. We now have two excavated pieces of evidence for their existence before the Han period. The first is the painted diagram on top of a lacquered garment box from the tomb of Marquis Yi of Zeng 曾侯乙墓 at Sui Xian, and the second is the stone board for the game *liubo* 六博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the Zhongshan

king 中山王 at Pingshan 平山 in Hebei (Fig. 3). The top of the painted garment box shows the Great Dipper in the center surrounded by a green dragon, white tiger, and the lunar mansions, and is clearly derived from the *shitu*. ⑦ The board is based on the *liubo* game which is ultimately derived from the cosmic model. ⑧ Two even more recent finds also have major bearing on this subject: one is the diagram with dragon and tiger laid out in Tomb No. 45 at the Yangshao site at Puyang 濮陽, Xishuipo 西水坡, Henan (Fig. 4), and the other is the jade plaque from Tomb No. 4 at the late neolithic site at Lingjiatan, 凌家灘, Hanshan 含山, Anhui (Fig. 5). The Puyang configuration relates to the diagram on the lacquer garment box from Sui Xian, while the jade plaque closely resembles the *shitu* (Fig. 2). Both are much earlier in date, reaching about 4,000 years back in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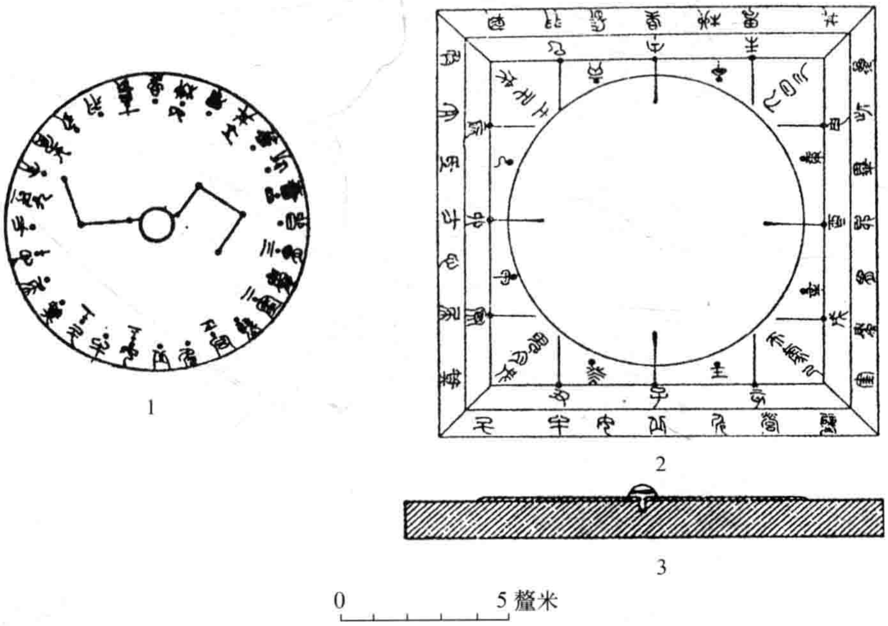


Fig. 2. ***Liuren shipan*** **from Shuanggudui, Fuyang, Anhui**
1. The front of Liuren Shipan 2. The back of Liuren Shipan

A long-standing problem related to the layout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is the alternately upright and inverted placements of the two central sections of the text. There are traditionally two theories on this problem. One reads the manuscript with the top pointing south; the other reads it as pointing north. After the names of the gods of the twelve months had been deciphered in the sixties, the north-south theory seems to have taken precedence. But many opinions were reversed with the more recent discoveries of the Han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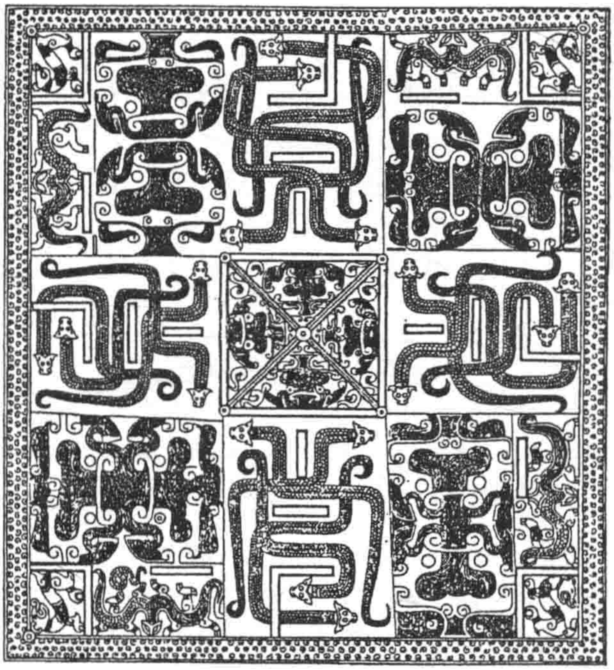


Fig. 3. Stone *liubo* board from tomb of Zhongshan Wang, Hebei. Eastern Zhou. After *WW* 1979. 1, p. 26, fig. 33.

Fig. 4. Section of Tomb No. 45 at Xishuipo, Puyang Xian, Henan. After *WW* 1988. 3, pl.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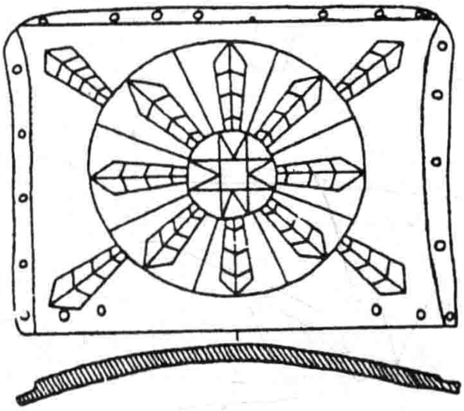


Fig. 5. Jade plaque from Tomb No. 4 at Ling Jiatan, Hanshan, Anhui. After *WW* 1989. 4, p. 15, fig. 2.

maps at Mawangdui and the palace plans from the tombs of the Zhongshan kings at Pingshan, Hebei.

Professor Jao has just offered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alternate arrangement of these texts; I would like to offer mine for consideration. I looked at this proble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Xuangong 玄宫" and "Xuangong tu 玄宫圖" sections of *Guan Zi* 管子 in my first publication on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⑨ My conclusion there was that these texts can be arranged in both south-north and north-south directions, although I still decided in favor of a single orientation for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At a slightly later date, ⑩ I re-examined this problem in the light of orientation as documented in oracle 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as well as in ancient texts, and found that there actually existed two different modes of orientation in ancient writings. The south-north orientation used the sun as guide (with the face or back to the sun); the other used the Pole Star and clockwise rotation of the Big Dipper to guide its orientation. The former method of orientation was used mainly in geography, while the latter was used mainly in astronomy and calendars. For example, the "Dixing 地形" section in *Huainan Zi* 淮南子 used the south-north orientation, and its "Tianwen 天文" and "Shiling 時令" sections followed the north-south orientation. The recent find of late Warring States maps in ancient Qin territory near Tianshui 天水 in Gansu province, which showed the character *shang* 上 in many locations, indicates that the orientation is from north to south. ⑪ This confirms my theory that both orientations can be used side-by-side.

As to the ques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twelve gods painted around the

edge of the manuscript,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the discovery of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gods of the twelve months in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and those recorded in the *Er ya* 爾雅 was a major contribution by Professor Li Xueqin. But this still does not answer the question of their identity. In my previous publication,[12] I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twelve gods belong as a systematic grouping and therefore should not be explained by randomly identifying them with mythological figures recorded in ancient texts. I still feel the same way today.

In a recent article, Professor Li Xueqin suggested that the twelve gods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should perhaps be linked to the celestial gods of the twelve months represented on the *liuren* version of the cosmic model.[13] This equation between two systematic groupings of figures makes a great deal of sense. Differences in schools of thought, time,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may result in differences in the choice of gods on the cosmic models. So while the names of the twelve gods in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and the *liuren* cosmic model may not be the same, their functions as indicators in the rotation of the heaven plate over the earth plate of the *shi* remain essentially the same. Now, I have strong evidence to support Professor Li's idea: on the earliest example of the cosmic model from Fuyang (Fig. 2), the twelve gods of *liuren shitu* are represented directly by the names of the twelve months just like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Of course, there is still dis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reading of the three characters beside each figure. I read the first character as the name of the month; the following two characters should be read together with the first, and are related to the activities described in the caption that accompanies each of the figures.

原載 *New perspectives on Chu Culture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edited by Thomas Lawton, Washington, D. C.: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1, pp. 178—183.

Notes

① The Chu bamboo strips from Jiudian 九店(unpublished), the Qin bamboo strips from Shuihudi 睡虎地(*Yunmeng* 1981) and Fangmatan 放馬灘(*WW* 1989. 2, pp. 23－31), and the Han strips from Bajiaolang 八角廊(*WW* 1981. 8, pp. 11－13), Shuanggudui 雙古堆(*WW* 1983. 2, pp. 21－23), and Zhangjiashan 張家山(*WW* 1981. 1, pp. 9－15) all contain *rishu*. In addition, the

silk manuscript of *Yin yang Wuxing* 陰陽五行 from Mawangdui 馬王堆 (*WW* 1979. 11, pp. 71 - 73) and the bamboo strips from Yinqueshan 銀雀山 (*Yinqueshan* 1985) are similar.

② Li Ling 1985 and 1988.

③ Li Ling forthcoming.

④ Jaspers 1953; Hsu Cho-yun 1984.

⑤ These can be tabulated as follows:

-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 *Shushu* 數術 (Numerals and Skills)
    - *Tianwen* 天文, *Lisuan* 曆算 Astronomy, Calendar and Mathematics
    - *Zhanshu* 占術 Divination
      - By cosmic models (*shitu*)
      - By tortoise shell or alpine yarrow
      - Others
    - *Xiangshu* 相術 Physiognomy
  - *Fangji* 方技 (Prescriptions and Techniques)
    - *Yishu* 醫術 Medical Sciences
    - *Tangsheng* 養生 Nourishing Life
      - *Fangzhong* 房中 (Art of the Bedchamber)
      - *Daoyin* 導引 (Gymnastics)
      - *Fushi* 服食 (Dietetics)
      - Others

⑥ From the tomb of the Marquis of Ruyin 汝陰侯 at Shuanggudui, Fuyang 阜陽, in Anhui (*WW* 1978. 8, pp. 12 - 31); see also discussions of the *shipan* in *KG* 1978. 5, pp. 334 - 337 and pp. 338- 343.

⑦ Yan Dunjie 1985.

⑧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LV mirrors (i. e. mirror designs based on the *liubo* game board) has already been suggested (Kaplan 1937). The relationship is discussed in even greater detail in Loewe 1979.

⑨ Li Ling 1985.

⑩ Li Ling 1988.

⑪ *WW* 1989. 12, pp. 78 - 85.

⑫ See note 2.

⑬ Li Xueqin 1987.

楚帛書與「式圖」

楚帛書是現已發現最古老的數術書。這種書讓現在的人讀起來當然莫名其妙，但在古代却是流行讀物。它與地下出土的大批日書是同一類〔一〕。後者雖然現在祇有睡虎地秦簡《日書》發表，但將來陸續公布，勢必會形成一種專題研究。那時我們將會看得很清楚，楚帛書的研究是它的開端。

過去我對楚帛書做過一點研究：一九八〇年寫成《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下簡稱《子彈庫》），一九八八年寫成《〈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十周年研討會論文，一九八八年七月，下簡稱《補正》），但總覺得楚帛書的背後有一種東西還須做進一步研究，這就是由式所代表的圖式（下簡稱「式圖」）。近來我在美國訪問，集中思考的就是這一問題，來華盛頓之前剛剛寫成一篇題爲《「式圖」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的長文。所以，這裏我想從「式圖」的角度講一下我對帛書的看法。

一、楚帛書是一篇什麼樣的書？

有人講，先秦諸子和希臘哲學是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普遍性突破」〔二〕。那麼在這以前人們的思維是什麼樣呢？這個問題當然很重要。在我看來，中國古代最能反映原始思維的東西要算「數術」和「方技」。數術方技之學，書也許是晚的，但傳統却相當古老。「數術」主要與「天道」（宇宙）有關，「方技」主要與「人道」（人體）有關，都包含許多種類，可以下表示意〔三〕。前者不僅包括天文曆算之學本身，也包括與天文曆算之學有關的各種占術（偏於推理）和相術（偏於觀察）。其中占術的前兩種，第一種即《史記·日者列傳》所述，第二種即《龜策列傳》所述。楚帛書主要與前者有

關，是一種以式法爲依據，講時令禁忌的書。這種書可分「月諱」（月的禁忌）和「日禁」（日的禁忌）兩種（注意：古代所謂「禁忌」都是兼言宜忌），楚帛書屬於前者，而大量的日書則屬於後者。它們是以天文曆算之學爲基礎，但與狹義的天文曆算之學還有區別，在圖書分類上是屬於五行類。

中國古代的原始思維
- 數術
  - 天文、曆算
  - 占術
    - 與時令禁忌有關的占術（式法）
    - 龜卜和筮占
    - 其他
  - 相術
- 方技
  - 醫學
  - 養生
    - 房中
    - 導引
    - 服食
    - 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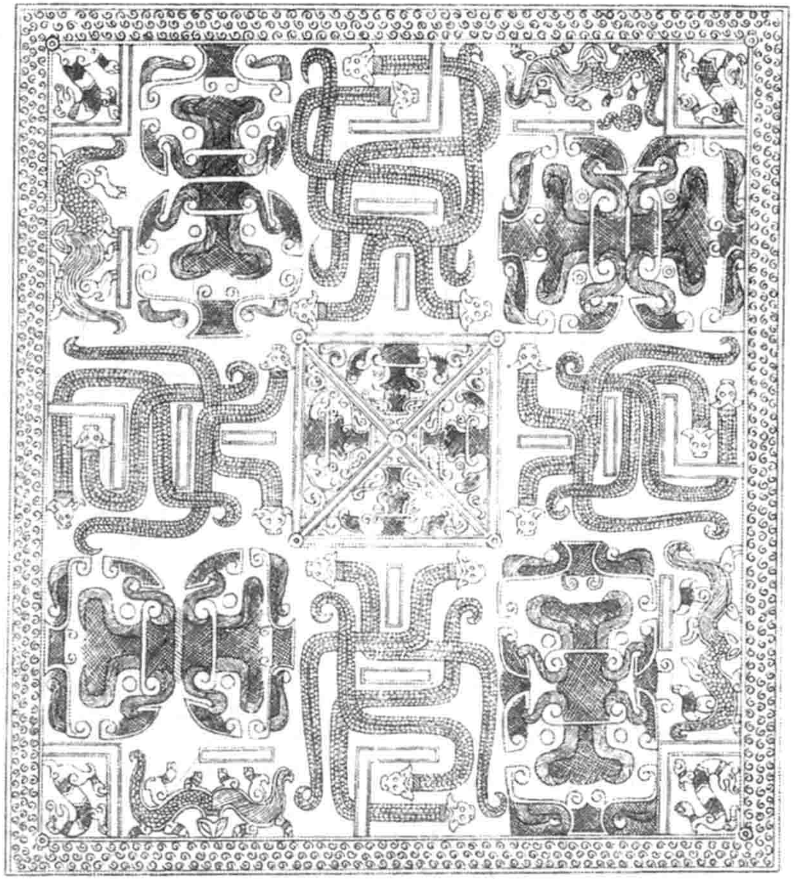
二、應當怎樣理解楚帛書的結構？

楚帛書不是一般的書，而是按一定的圖式結構來鈔寫，並與一定的圖像相配的書。這種圖式，司馬談《六家要旨》稱爲「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實際上就是來源於「式圖」。帛書以東、南、西、北代表「四時」，姑、女、欯、臧四位和用青、赤、白、黑四木表示的四維代表「八位」，十二月代表「十二度」。古代的「式圖」很像表盤，上面有用北斗、招摇、太一等表示的「指針」和用干支、星宿表示的「刻度」。古代的式有很多種類，唐代是以雷公、太乙、六壬爲主，宋代是以太乙、遁甲、六壬爲主，其中尤以六壬式使用最廣。帛書所據「式圖」就是六壬式的「式圖」。六壬式是以四分、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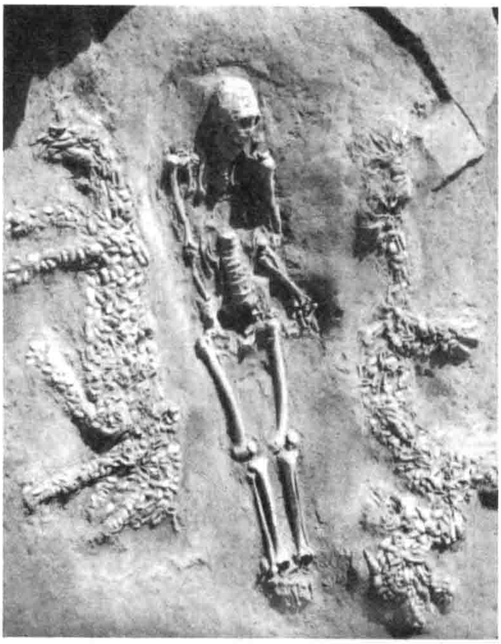
十二分的圖式爲主，配十二神；其他幾類則是以九宫爲特點，配九神和十六神。古代的十二時制、十六時制和十八時制當與這種配神有關。雖然目前出土的式，年代最早是在西漢初年（阜陽雙古堆汝陰侯墓所出），但我們可以肯定它在先秦時代就已存在。除學者多已指出，《周禮·春官·太史》提到的「天時」就是式的早期名稱，現在還有兩條出土證據，一是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蓋圖，二是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盤（圖一）。前者中心有北斗，四周有青龍、白虎和二十八宿，自是「式圖」無疑〔四〕；而後者是仿自於式，有六博，當然也就有式〔五〕。特别是近來還有兩條重要發現，一是河南濮陽西水坡 M45 的青龍白虎圖，二是安徽含山凌家灘 M4 出土的帶四方八位圖案的玉片（圖二）。前者可使我們聯想到曾侯乙墓的漆箱蓋圖，而後者則與「式圖」酷爲相似。它們的年代更早，要遠在四千年以前。

三、楚帛書的方向是上南下北還是上北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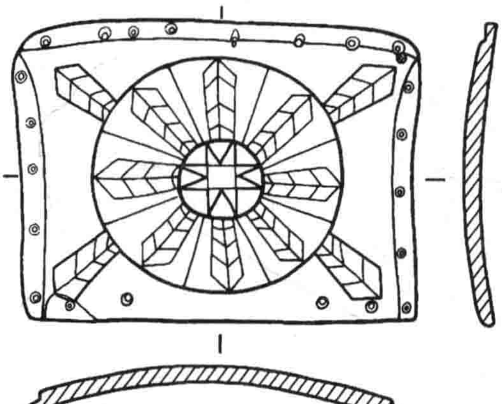
這是楚帛書研究上的老問題。上南下北説始自蔡季襄，上北下南説始自董作賓。六十年代，由於十二月名的釋出，後説一度占上風，但近年來由於馬王堆漢墓出土了一些古地圖，平山中山王墓出土了《兆域圖》，前説又壓倒後説。我在《子彈庫》一書中曾復原過《管子》中《玄宫》和《玄宫圖》兩篇的順序，指出它們是兩種方向，但在確定帛書的方向時，却祇取一種，是一不足。後來我在《補正》一文中重新考慮這一問題，排比甲骨文、金文和文獻中的方向概念，發現古代的方向確實一直就有兩種，一種是按日照而取的方向（背陰向陽），即上南下北；一種是按斗極和斗旋順序而取的方向，即上北下南。前者主要用於地形，後者主要用於天文、時令。如《淮南子》的《天文》、《墬形》、《時令》三篇，《墬形》即以上南下北爲主，《天文》、《時令》即以上北下南爲主。近來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晚期秦墓出土了一件標有「上」字的古地圖，據考證，就是以上北下南爲正〔六〕。這一發現證實了我的「兩種方向」説。



圖一：1.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漆箱蓋圖　2.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六博棋盤



圖二二：1. 河南濮陽西水坡 M45 的青龍白虎圖



2. 安徽含山凌家灘 M4 出土的帶四方八位圖案的玉片示意圖

四、楚帛書的十二神代表了什麼？

帛書十二月合於《爾雅・釋天》，這是李學勤先生的一大發現。但帛書十二神到底代表什麼，一直存在爭論。我在《子彈庫》一書中曾説，十二神是一個系統，不能拆開來與文獻上不成系統的材料作對比，今天我仍然這樣看。近來，李學勤先生有個推測，認爲帛書十二神可能與六壬式的十二神相似〔七〕，使我深受啓發。這種對比就是有系統的。

六壬式的十二神與太乙、遁甲等式的配神有相似性，都是以星名爲主：一類是與斗星有關，如天魁、從魁、天剛；一類是與歲星有關，如天一、青龍、太陰。但六壬式的十二神有兩種，一種是徽明等神，一種是青龍、白虎等神。《淮南子・天文》衹提到後一種十二神。由於式的配神種類極

繁，除家法不同，時代不同和地區不同，可能也會造成許多差異，所以儘管帛書十二神與六壬十二神名稱並不相同，但它們都是用以表示「轉位」（旋轉天盤之位）和「加辰」（對準地盤上的干支）的概念，功能還是一樣的。

當然，關於帛書邊文的章題，現在還有不同看法。我的看法，它的第一字是月名，帛書用月名做月將（即配神），這和汝陰侯墓出土的六壬式以正月到十二月表示月將其實是一樣的；下面兩字應與第一字連讀，則與各章所述宜忌有關。

五、楚帛書的行款是整齊的嗎？

帛書中間兩篇因有若干撕裂之處，裝裱後錯位，致啓疑竇，一種意見認爲這兩篇都是整齊的，當裂痕處應補字；一種意見認爲這兩篇並不整齊，當裂痕處不必補字。我是贊成前説的，即甲篇（以「隹」字開頭）應從巴納（Dr. Noel Barnard）定爲十三行行三十四字，共四〇九字（減去占字的章號）〔八〕；乙篇（以「曰故」開頭）應從李學勤定爲八行行三十六字，共二百六十二字（減去占字的章號）〔九〕。至於丙篇（邊文），以往分歧主要是在三、九、十、十三這四章，《補正》原定爲二百七十七字（減去占字的章號）。這次目驗原物，我發現丙篇第六章還應增加一字。全書共九百四十九字，外加合文十二字，重文七字，可得九百六十八字。我建議賽克勒美術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能對帛書裝裱進行科學檢驗，以確定上述分析是否可靠。

六、楚帛書的文字辨識還能有新的突破嗎？

《子彈庫》一書寫於一九八〇年，這以後有不少新作發表，《補正》從中吸取了不少好的見解，並且認出一些新字。這次目驗原物，於霉迹脱落之處，我又有一些新發現，如：甲篇十二行二十六字或釋「祀」，經目驗，非「祀」字；十二行二十八字或釋「返」，經目驗，確是「返」字。乙篇

二行二十六字，經目驗，應是「思」字之殘；四行二十四字，《補正》疑是「翏」字，經目驗，確是「翏」字；四行二十九字，《子彈庫》隸定作「咪」，經目驗，應隸定作「淋」；六行三十字，舊釋「敢」，經目驗，非「敢」字；八行一字，原不清，現可見是「土」字。丙篇六章一行十字，《子彈庫》隸定作「𧺆」，經目驗，應是兩字，第一字似右邊從「又」，第二字看不清是否從「辵」；八章一行二字，原不清，《子彈庫》據文意補「臧」字，現可見清晰的「臧」字；八章二行二、三、四字，原不清，現可見是作「㠯乍不」三字。如果再有同樣的奇迹發生，我想肯定還會有新的字可以認出。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日寫於美國西雅圖

注釋

〔一〕九店楚簡、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八角廊漢簡、雙古堆漢簡、張家山漢簡均包含日書。另外，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是講式法的書（承整理者李學勤先生告），銀雀山漢簡《陰陽五行時令占候之類》是講三十節氣和八風等內容，也是同類之書。

〔二〕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許倬云《論雅斯培樞軸時代的背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五本第一分。

〔三〕參看《漢書·藝文志》中《數術略》和《方技略》的分類。《漢志》把司馬談所說的陰陽家分爲兩類，有家法可考和偏於思想的入於《諸子略》「陰陽家」，無家法可考和偏於實用的入於《數術略》「五行」類。「五行」在漢初衹是各種時令占驗中的一種，但《漢志》却把它當作這類占驗的總名，《隋志》以下承之。歷代講式法的書都在這一類。

〔四〕嚴敦杰《式盤綜述》，《考古學報》一九八五年四期。青龍、白虎等四獸是代表六壬十二神，見陳夢家《漢簡年曆表叙》（《考古學報》一九六五年二期）。

〔五〕S. M. Kaplan, *On the Origin of the TLV Mirror*（收入 *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 II. 1, 1937 年）已提出 TLV 鏡（即博局鏡）與式有關，M. A. N. Loewe, *Ways to Paradise*（London，1979）則對式與六博和博局鏡的關係有更詳細的論述。

〔六〕曹婉如《有關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地圖的幾個問題》，《文物》一九八九年十二期。

〔七〕李學勤《再論帛書十二神》，《湖南考古輯刊》第四輯（一九八七年十月）。

〔八〕Noel Barnard,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Canberra 1973.

〔九〕李學勤《楚帛書中的古史與宇宙觀》，《楚史論叢》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原載《江漢考古》一九九一年第一期，五十九至六十二頁。

Reconsidering the Chu Silk Manuscripts

Written at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Washington D. C.
First Draft, April 7, 1993; Revision, May 15, 1993.

ACKNOWLEDGEMENT

This dissertation is dedicated to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I am very grateful to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or giving me a good opportunity to come here, at these two beautiful museums doing some research work on my favorite subject: the Chu Silk Manuscripts.

After the "century snow", Spring in Washington DC looks more charming: blooming everywhere. Five months passed soon. I feel tired, but have enjoyed daily life in Washington very much.

I am very fortunate.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se two gallery's staffs, everything's going smoothly. Especially Dr. Thomas Lawton, Dr. Jenny F. So, Mr. Tom Chase, Dr. John Winter, Ms. Mary Ballard, Ms. Gu Xiangmei, Ms. Lily Kecskes, Ms. Colleen Hennessey, Mr. Rocky Korr, Ms. Jane Norman, Ms. Louise Cort, Mr. Luyi Shao, without their help, all of these will be impossible.

I hope they would like to share my ideas on the CSM and put their questions and criticism forward to me.

I. Prologue: "Bringing a Dead Horse to Life"

Our knowledge of ancient China is very limited. In my opinion, how to combine two different finds — scientific excavation or accidental discovery, is very important to both archaeologists and scholars, who engage in the study of antiquities and art history.

Perhaps you are aware that in China, about ten years ago, nearly all local museums began dividing into two parts. Their archaeological team have broken away from the museums and established independent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s

one after another, and original museums are limited in collecting objects. Before this, most of the excavations were undertaken by local museums except for the so-called "initiative diggings" by 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ASS), and the Beijing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rchaeology is regarded as a historical science and nearly all museums are "historical museums". Their staffs are mainly educated in the archaeology or history department; their collections are mainly derived from excavations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y also had an interest in archaeology or history but not arts or crafts; they differ from their American colleagues educated in the field of art history.

In 1977—1983, I worked and studi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CASS. As a young student, I was warned frequently that don't go along with the old way of the "jinshixue". Jinshixue also study objects as works of art and appreciate them like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pite of several Chinese archaeologists dislike for the phrase "cultural relics" and they refuse to give the same title to both excavated and collected objects, but "scientific archaeology" in China is too young (about 60 years) so that much more time has been spent on collecting artifacts than on excavating them. These collected objects occupy "extensive territories" in many fields, such as oracle bone, bronze vessel, jade, porcelai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nd even when you have finished an archaeological report,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isolate the individual object from its excavated context for further study. If the reason to give up these objects is the lack of archaeological context, it would be a pity.

In fact, the collected artifact is often an important cross-reference for the "scientific excavation" (e. g. the finding of Shang cemetery at Yidu was traced from collected artifacts) and the latter also is a key to explain the former frequently (e. g. Yu bo's bronze vessels excavated from Baoji have contributed to understand Duan Fang's collections and Dang Yukun's collections). ①

In Chinese, we have a saying "give medical treatment to a dead horse as if it were a live horse", which means "even when it is hopeless, don't give up a last try". Before 1949 in China, there were many famous grave robberies (Liyucun, Hunyuan; Lijialou, Xinzheng; Jincun, Luoyang; Zhujiaji, Shouxian). Even now, these "dead horses" have continued to be resurrected to help us understand new finds. I plan to speak about a similar case, an invaluable treasure kept here in Washington — the Chu Silk Manuscripts.

II. From Changsha to America

Where is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from? How did it come here? This story has unfolded in two parts: half in China, half in America.

Because the CSM is from a grave robbery, many details are unclear and links are still missing. Most scholars have avoided this problem. Before the 1970s, there was a wide gulf separating China and America, and this story was used to illustrate America's criminal behavior in China with the headline — "American Imperialists plunder Chinese cultural relics."[②] Because of this, the story's two major characters, Cai Jixiang and John Hadley Cox preferred to remain silent. So that when we read about it from a Changsha newspaper as recent as 1991, story has become almost a fantasy.[③]

About the finding of the CSM and their journey to America,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nd even contradictory views. After comparing them, however, I find that they come from two main sources. One is the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 tomb-robbers, the earliest collectors, and the local archaeologists in Changsha; the other is the guesswork or hearsay of foreign scholars.

In an early publication on the CSM, written by Cai Jixiang in 1945,[④] he did not mention which year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was found. By the 1950s, foreign scholars such as Umehara Sueji and T. H. Tsien believe the CSM was found in the late 1930s, by connecting it with 1935—1937, when Cox taught at the Yali Middle School in Changsha.[⑤]

In 1964, Shang Chengzuo firmly said that the CSM was unearthed at Zidanku in September 1942 and carried by Cox to America from Shanghai in 1946.[⑥] In 1972, Noel Barnard argued Shang's description brimming with patriotism and cited an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an anonymous participant of the actual tomb robbery who now lives outside China. He stated that the CSM was unearthed in 1934, and not 1942, and that there were nine or ten people involved and not just four as Shang described.[⑦] Barnard also denied that the CSM left China in 1946 since he believed that Cox never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1939, the year when his collection was exhibited at Yale.[⑧]

In view of Barnard's story, as published in his two famous monographs on the CSM,[⑨] it was important that the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reopened the tomb from which the CSM came, under the guidance of four of its original robbers.[⑩] The excavation site locates at present Linkanyuan, originally named

"Zidanku" (Fig. 1). The excavated objects, including a piece of rare silk painting (which was found between the ceiling of wooden chamber and the spacer-board, see Fig. 2—3), can be dated to about 300 B. C. [11] An appendix attached to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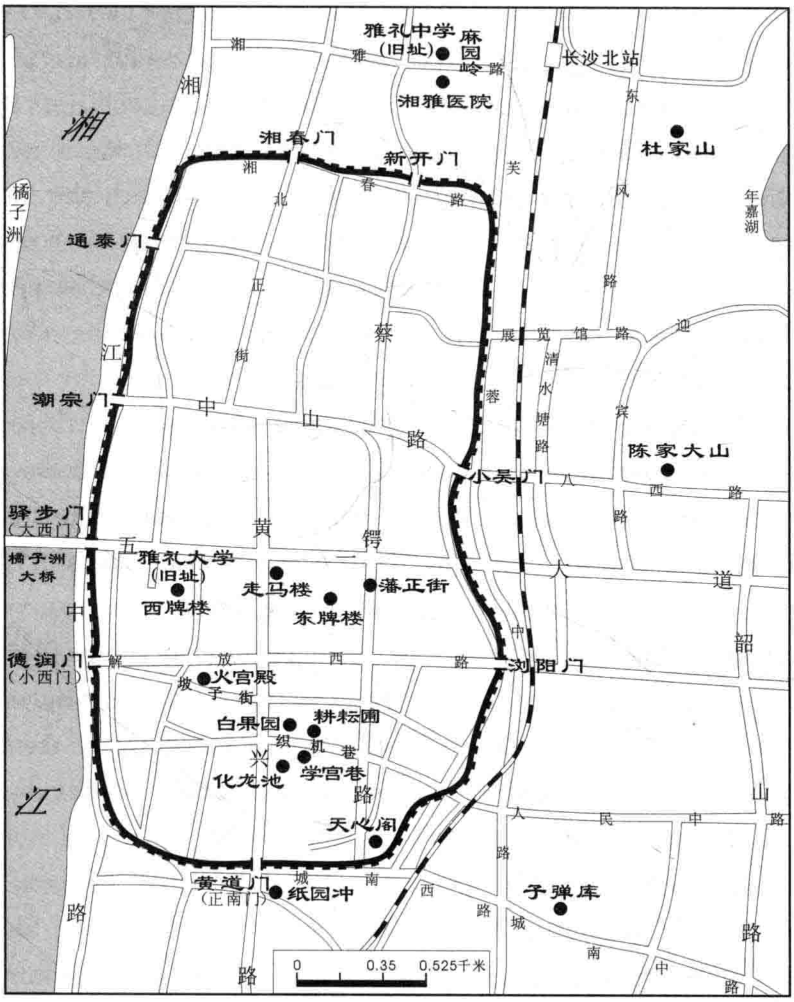


Fig. 1. The excavation site of the Zidanku Chu Tom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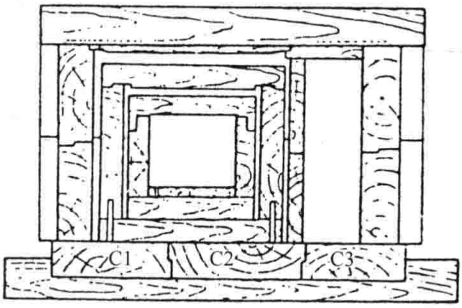


Fig. 2. The coffins of the Zidanku Chu Tomb: the top plunk is the cover of the wooden chamber, beneath which there is a thin wooden spac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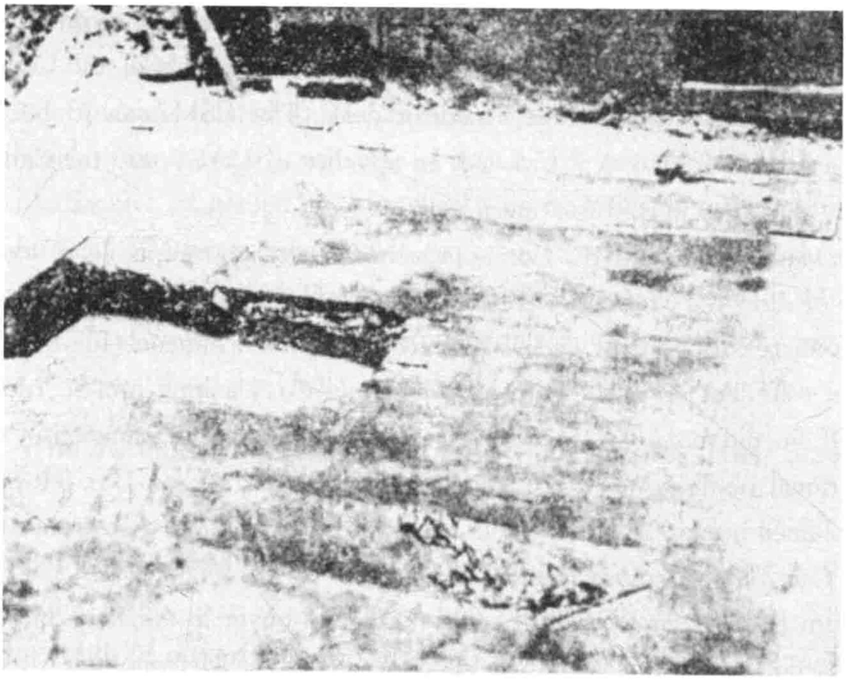


Fig. 3. The location of the Zidanku Silk Painting in the tomb: as indicated by the arrow. At the left is the hole dug by tomb-robbers.

brief archaeological report supplies the details of the activities in 1942 based on the tomb robbers' recounting of the events.[12] To find out more, I did some investigation in Changsha, Seattle, New Jersey, and Washington. D. C.[13]

Below, let me list basic facts about the finding of the CSM:

In 1935—1937, Cox taught at the Yali Middle School in Changsha.[14] During this period, many tomb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Qin-Han Dynasties were opened and plundered, as a resul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s for military defence. Cox's collection of artifacts came from these tombs; none of them were connected with the CSM.

Between 1937 and 1945, war broke out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and Cox returned to America. In 1938, Yali moved to Yuanling. In 1941, the Japanese army attacked Changsha and set fire to the school. By the beginning of 1942, the Japanese army had withdrawn from Changsha. This was followed by another period of grave robbery, led by Ren Quansheng. The CSM was excavated during this second round, in September 1942. Two years later, in 1944, when the Japanese seized Changsha again, Cai's wife and daughter committed suicide.[15] It was then that Cai wrote his book on the CSM and published it in memory of his wife and daughter the following spring.[16] This

tragedy of the CSM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had nothing to do with Cox.

In 1946, one year after the surrender of the Japanese, Cai and Cox finally met in Shanghai.[17] There, they made a deal. The CSM was to be sold in America for US＄10,000.[18] Cox left an advance of US＄1,000 for Cai. From here on, the story moved to America.

Between 1946 and 1949, Cox approached several museums (e. g.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etc.) in the US with the CSM. But he was not successful. At the end of 1947, Cai asked Wu Zhucun (his friend's son and Cox's student at Yali) to bring a letter to Cox, asking him to return the CSM. If he did not, Cai threatened to sue Cox in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When Wu translated this letter for Cox, Cox felt betrayed and explained his predicament in his reply to cai, which Wu also translated and sent to Cai. But, no answer came from Cai.

From 1949—1964: Cox still could not find a buyer in America, but he also did not send the CSM back to Cai. He offered it to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Correspondence dated from 1949—1953 (see the copies kept in the Archives of SMAG/FGA) between Cox and Alan Priest, the curator at the MMA, showed that Cox's asking price was US＄7,500, ＄1,500 short of Cai's ＄9,000.[19] However, Priest could not persuade the MMA to buy it.[20] In a letter written in January of 1950, Cox also mentioned photographs of the CSM (taken by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the "gauze container (tao) containing unmounted fragments of two other manuscripts" and a sword. At this time, we can see that Cox not only insisted that "I have absolutely no financial interest in one penny's profit from the piece" and refused Priest's suggestion "to package the manuscript with the bronzes for one sum",[21] but also he asked Wu to take another letter to Cai in 1950, promising that he would help Cai to realize his dream, to purchase a set of the best pressing equipment for him once he disposed of his manuscript. Moreover, he told Cai that he prepared to pay Cai in advance in Hong Kong. It was, of course, impossible for Cai to go to Hong Kong at that time.

From 1964—1966: The CSM finally found a buyer, Mr. J. T. Tai, a dealer in New York. Two years later, Dr. Paul Singer saw it by accident in Tai's storage and called Dr. Sackler, saying, "If you were to dump your entire collection into the Hudson, it would not matter as long as you own this piece".[22] So, as you now know, Cinderella became a princess.

When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opened in 1987, the manuscript was

lent to the museum. It was not presented as part of the gift to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Dr. Sackler had hoped to return it to China one day. [23]

Most of persons related to the CSM, such as Ren Quansheng, Cai Jixiang, Tang Jianquan (another early collector of the CSM), Alan Priest, J. T. Tai and Arthur M. Sackler all passed away in the 1970s or 1980s. I am grateful to the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the Hun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Professor Wu Zucun, Mr. Wang Zongshi, Dr. Paul Singer who all provided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my research. It is a pity, however, that John Hadley Cox would not allow me to visit him.

III. The Various Texts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s, Their Sizes, and Storage

Actually, the CSM (from here on called CSM No. 1) is not the only example, but forms part of a group of four or five different texts. 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 of my present trip to the US is to find out the whereabouts of the other texts. Except for the few still in Shang Chengzuo's collection published recently by his son (Fig. 4—5), [24] it appears that all of the remaining fragments and the container for them were carried by Cox to the US and never published. But as of last year, they have been finally reunited with the CSM No. 1, at the Sackler Gallery. Preliminary findings based on these rediscovered fragments include (Fig. 6):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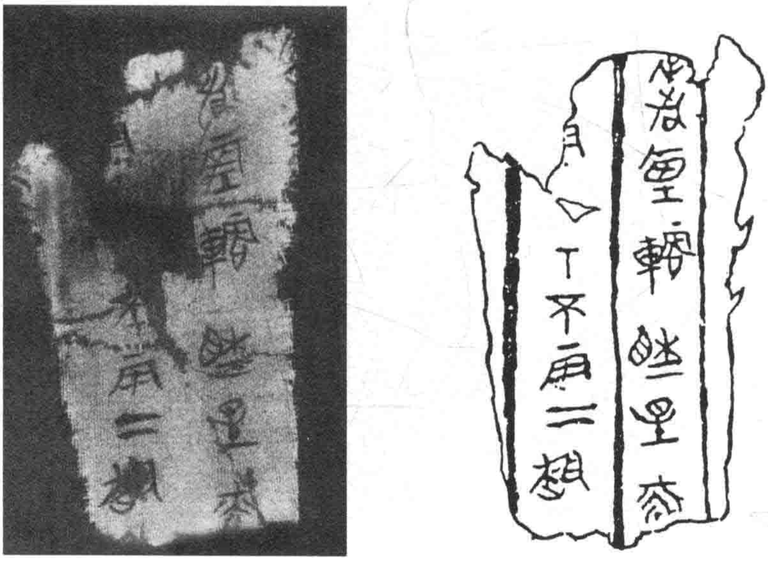


Fig. 4. The largest fragment of the Zidanku CSM in Shang Chengzuo's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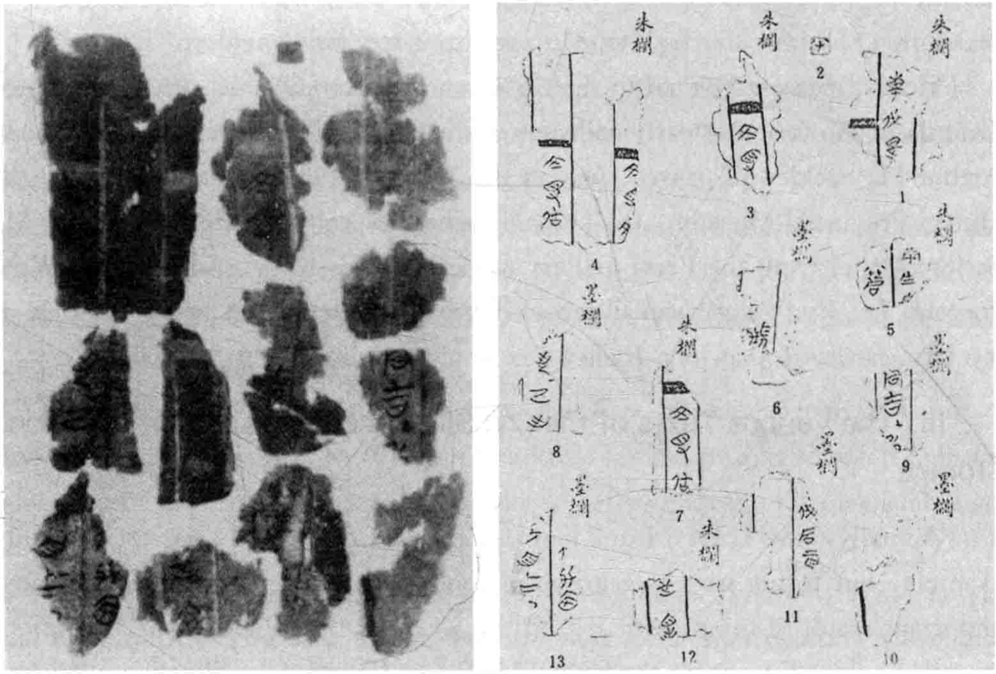


Fig. 5. Other fragments of the Zidanku CSM in Shang Chengzuo's collection.

Fig. 6. Fragments of the Zidanku CSM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s collection.

1) Fragments of a manuscript written in big red characters, on the top layers.

2) Fragments of a manuscript written in small black characters with red columns in the middle layers. The decipherable characters suggest that it is a monthly calendar similar to the Yueling section in the Liji, with a diagram of two circles each containing names of the twelve months according to the Chu Kingdom. The circles are drawn in two colors, black and red. In Shang Chengzuo's collection, there are seven fragments that appears to be related to this.

3) Fragments of a manuscript in the bottom layers, written in big black characters, not on columns, but shows right angles drawn in red, with names of the Heavenly Stems written inside.

4) Fragments of a manuscript written in smaller black characters with black columns. Only tiny bits of this remain. In Shang's collection, there are six similar fragments.

Now, a word on format. Ancient texts were often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But among excavated samples, bamboo far outnumbered silk. [26] What we know of texts written on silk is very little.

So far, silk manuscripts have been found at Zidanku and Mawangdui, both in Changsha. [27] The Zidanku manuscripts can be dated to about 300 B. C. and the Mawangdui manuscripts to around 200 B. C. [28] Comparing their formats is very illuminating.

First, the container: Both of them were placed inside a container which seems to fit the size of the folded manuscripts. The CSM No. 1 was inside a bamboo box (Fig. 7, L: 20. 32, W: 10. 16/11. 43, H: 3. 81/5. 08 cm), described by Cai as follows: "bamboo box, called a ji or gie, is the container of the manuscripts. It has a cover, which is one inch high, three inches thick and eight inches long and four and a half inches wide. Both the cover and bottom are made of bamboo strips, woven in a hexagonal pattern. Inside pasted a thin she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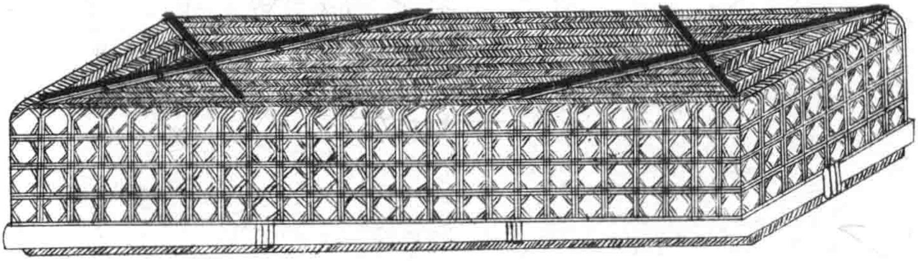


Fig. 7. The bamboo container of the Zidanku CSM.

of silk. But this object has been smashed and has lost its original shape and has been damaged on four sides and the corners. The bamboo have darkened from being soaked for long periods in water. Now only a few traces of red can be seen."[29]

This description is very close to the original. It is obvious that the damage occurred very early and that Cai's drawing is a reconstruction. Whether the thin silk is the lining for the box or fragments of the manuscripts is hard to tell. There are also bits of leather (remains of a slip-case or a spacer?) in the box that Cai did not mention.

The container of the Mawangdui manuscripts is a lacquer box (Fig. 8, L: 59.8, W: 37, H: 21.2 cm), larger than the one from Zidanku.[30] The distribution shown as photograph is: the top space holds a half-width or f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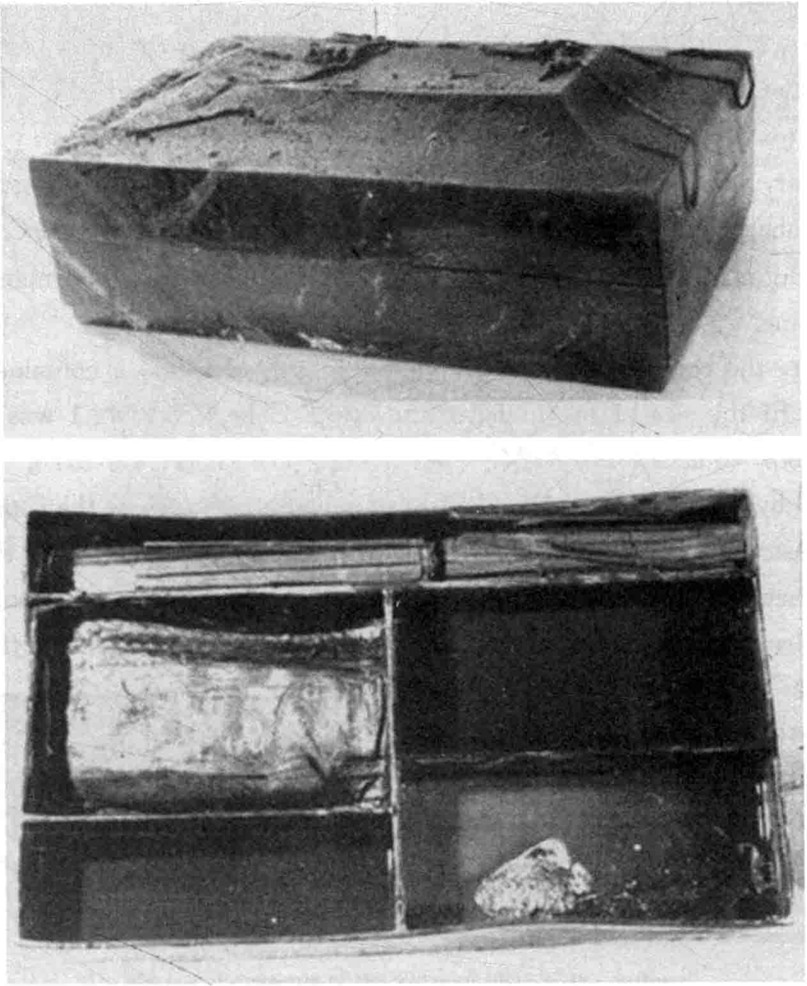


Fig. 8. The lacquer container of the Mawangdui Silk Manuscript.

manuscript (24 cm wide) wound around a bamboo or wooden strip about 2—3 cm wide, and two rolls of bamboo slips and two flutes; the compartment in the middle left holds a folded full-width or <u>fu</u> manuscript (48 cm wide); in the middle-right are oyster shells; the lower-left compartment is empty; and in the lower-right are plant branches.[31] The space for the manuscript in the middle-left is about 29×18.5 cm, slightly larger than the Zidanku box.[32]

Second, the manuscripts (Fig. 9): the Zidanku manuscripts are similar to the Mawangdui manuscripts in size. The CSM No. 1 from Zidanku is 47×38.7 cm in its present condition. There are two set of creases that can be seen (Fig. 10; the second set, not clear in this diagram, cf. Fig. 9). They divide the fabric into eight sections or twelve sections, which folding method appears to be first, top to bottom, then left to right twice or three times. All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top, right, and bottom are close to the edges, but there is a plain area of about 8.2cm wide on the left side.[33] I estimate that the original is 48×40cm, with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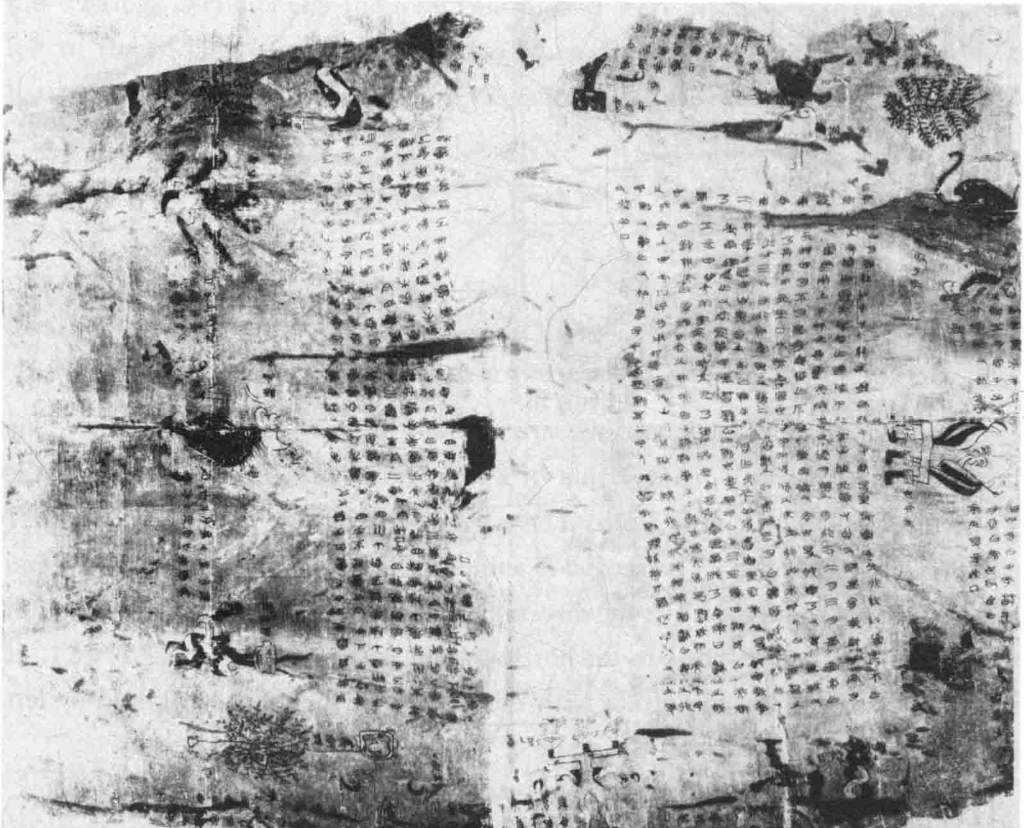


Fig. 9. The Zidanku CSM No. 1.

folded size of 20 × 13. 4cm (or 20 × 10cm).[34] As for the other texts in the bamboo container, all we know is that the largest fragment is 19×10cm, which is very close to the second folded size of the CSM No.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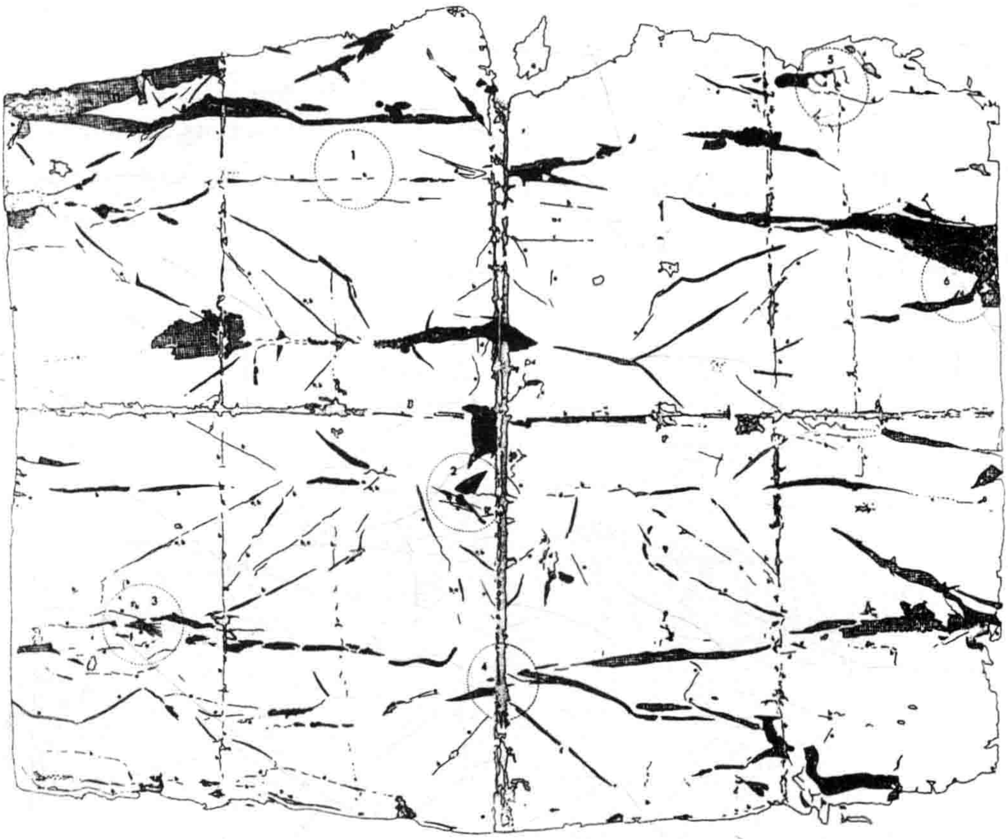


Fig. 10. The Folding creases of the Zidanku CSM No. 1.

The Mawangdui manuscripts are stored in two different ways. One method, for half-width manuscripts of 24cm wide, wraps the silk around the wooden tablets like a bolt of cloth. These texts are narrower than the CSM No. 1 and they are not folded. The second is similar to the CSM No. 1 both in size and storing method. The width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weft is 48 cm, equal to the full width of the bolt, very close to the horizontal measurement of the CSM No. 1. It is folded like this: top to bottom with the fold along the warp; followed by left to right, with the fold along the weft.

There was apparently a standard width (fu) for fabric in ancient China. According to the Hanshu, a unit of bulk cloth is called a pi, which is 2. 2×40 chi (a Han foot, about 23—24 cm). The fu length equals the warp measurement, and the fu width equals the weft measurement. Usually, the writing follows top to bottom and

right to left in imitation of bamboo slips. The excavated bamboo slips are in two sizes, 2.4 and 1—1.2 Han chi; the Mawangdui silk manuscripts also come in the similar two sizes: 2 and 1 Han chi.[36] The Mawangdui manuscripts have columns and upper and lower margins like the bamboo strips. These dimensions and layouts are based on bamboo slips and used in paper books.[37]

Jean Mailey has suggested that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of the CSM No. 1 is very similar to the pi of the Han Dynasty.[38] At first, it sounded like a good idea. However, the width of the Han pi corresponds to the vertical and not the horizontal measurement (the weft), and 47 cm does not match the size of a Han pi.[39] I recently asked Ms. Mary Ballard and Ms. Gu Xiangmei to examine the directions of the warp and weft of the CSM No. 1. As I suspected, Jean Mailey's "horizontal length" is actually the vertical weave (the weft) of the fabric. With their help, I was able to reconstruct the writing sequence for the Manuscript. I find that, according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horizontal warps and vertical wefts, the "Spring" sections and the long central text were written first on top, from left to right. Next comes the "Summer" sections on the right, from top to bottom, followed by "Autumn" and the short central text on the bottom, fr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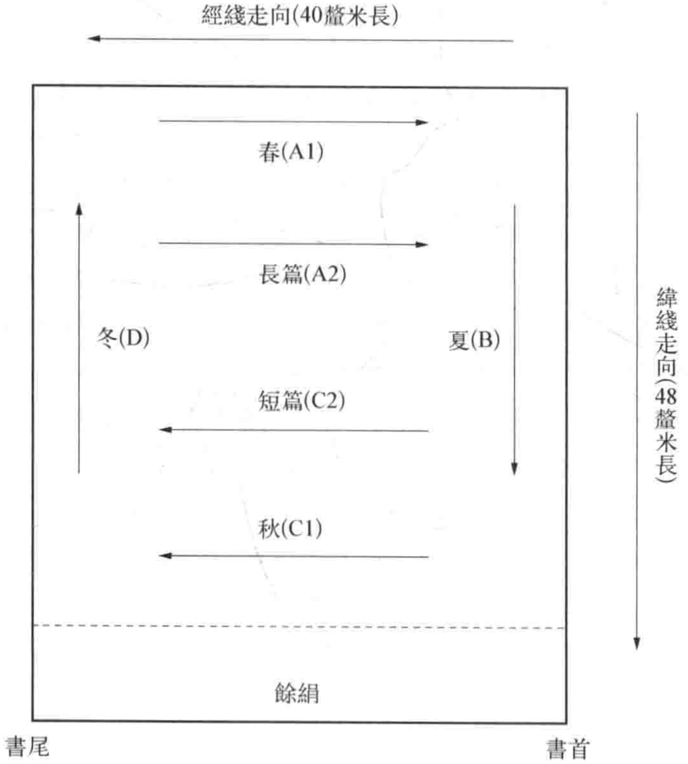


Fig. 11. The Writing sequence of the CSM No. 1.

right to left. Finally, "Winter" is filled in from bottom to top (Fig. 11). Since writing as order of from top to bottom, the plain area or bottom margin was arranged on the bottom of fu.

Ancient books can therefore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is rolled; and this includes bamboo slips, rolled silk manuscripts,[40] paper scrolls, scroll-paintings (even modern film and audio/video tapes also belong to this type). The second type folded, like the folded silk manuscripts, folded paper books (e. g. jingzhe zhuang or xuanfeng zhuang book), album leaves, traditionally bounded books, maps (even modern newspapers and books also belong to this type). The Zidanku MSS belongs to the latter group, but the Mawangdui texts include both types. Although we still do not know the origins of the silk manuscripts, it is clear from these two groups of early texts that, by the third century B. C., they have already reached a high level of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to bamboo slips, they seem to b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later paper books.

IV. Explanation of the Design of the CSM No. 1

In modern Chinese "tu-shu" means book, but in classical Chinese, "tu" means "drawing" or "painting" while "shu" means "writing" or "book". Books of the Han Dynasty, such as recorded in Bielu qilue and Hanshu yiwen zhi, include many drawings, especially in military, medical and divination texts.

Usually, excavated bamboo slips do not have any drawings. However, the almanacs excavated from a Qin tomb at Shuihudi which have a few illustrations on bamboo are exceptions.[41] Also, early maps were drawn on wooden tablets, called "bantu",[42] but they cannot compare to the colorful and exquisite illustrations of the silk manuscripts excavated from such sites as Zidanku and Mawangdui. The "Mawangdui tushu" may be characterized as follows:

1) Drawings only, no character.[43]

2) Text only, without any illustrations.[44]

3) A combination of writing and drawing, with the majority being text, illustrations just as a graphic explanation attached to it.[45]

4) A combination of writing and drawing, with the majority being illustrations, characters just as a title or note of illustrations.[46]

5) An equal balance of illustrations and text which explain each other and can not be separated.[47]

I will now give my explanation of the design of the CSM No. 1.

1. This piece belongs to the fifth kind of the "Mawangdui tushu" which drawing and writing can not be separated. Its design is divided into the four directions/seasons, the eight positions (the four directions + the four corners) and twelve months. The three texts also talk respectively about: how to correspond with the calendar year,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four seasons, and a taboo in each month (reading in order of from the central long one to the central short one, then peripheral text). The character distribution of the peripheral text represents the clockwise rotation of the Big Dipper in opposition to the four trees, which represent the counter-clockwise rotation of Taiyi. The central two texts are upside down and also represent the Big Dipper and the Taiyi.

2. The design of the CSM No. 1 is based on the shi, an instrument of divination imitating the cosmic model, which consists of two boards. The top board, called the "Heaven Board", is round, and the bottom one, called the "Earth Board", is square (Dunjia shi, has a "Human Board" between these two boards else). The former can rotate around an axle which is fixed in a hole located at the center of the latter.

The design of the shi (Fig. 12—13), which is quite similar to that of a clock, includes two basic types. One has a dial plate, which is divided into four directions, eight positions with a centerpiece (called "nine palace"), allowing nine celestial gods to be arranged in position; another one, besides four directions and eight positions, there are twelve degrees representing twelve phases such as months, hours and so on, matched twelve gods. Their indicators are different as well, the former being employed by the Taiyi and the latter by the Big Dipper. Moreover, the clock not only indicates the months of the year, but also the hours as well. Sometimes, the arrangement is shown as a big clock containing twelve small clocks (Fig. 14). [48]

The CSM No. 1 has twelve gods representing the months of the year. They a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which represent the seasons. The positions of the second month of each season were called the "four right places" in ancient China. The positions of the four trees were called the "four corners"; they constituted the eight positions, while the twelve gods made up the twelve degrees. All of these are similar to the design of the shi (Fig. 15). Although in the CSM No. 1, instead of the Big Dipper on the Taiyi, there are only two upside-down texts bu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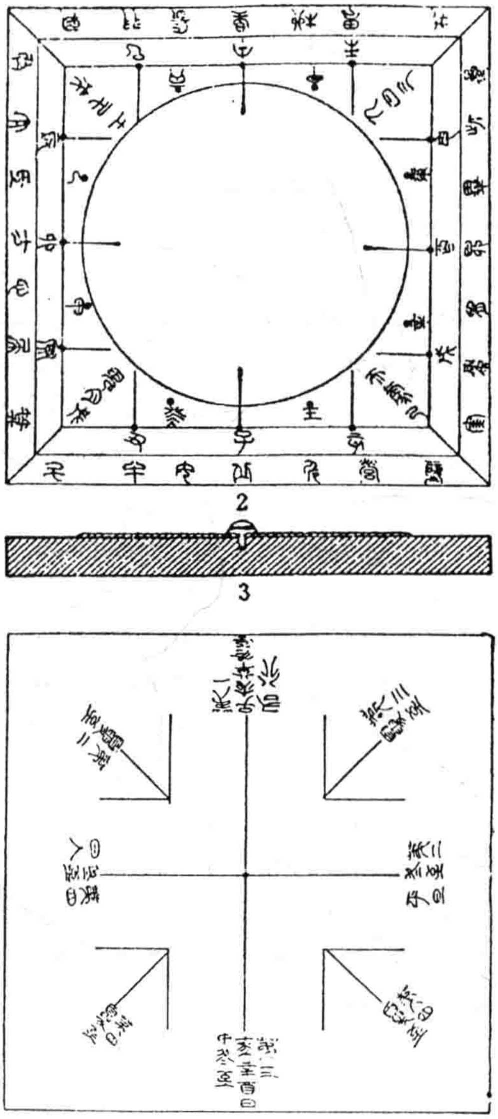


Fig. 12. Two examples of <u>shi</u>: at the top is the face of the Earth board of one example; on below is the back of the Earth board of another example.

we can find their image on other excavated objects. For example, besides the <u>Liuren shi</u>, the Big Dipper is in its central position on the "Heaven board", wecan find the Taiyi on the dagger axe with the "<u>Bingbi Taisui</u>" inscription (Fig. 16) and the Mawangdui Han silk manuscript "<u>Bibing Tu</u>" (Fig. 17) and the Big Dipper on the lacquer box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Marquis Yi of Zeng (Fig. 18).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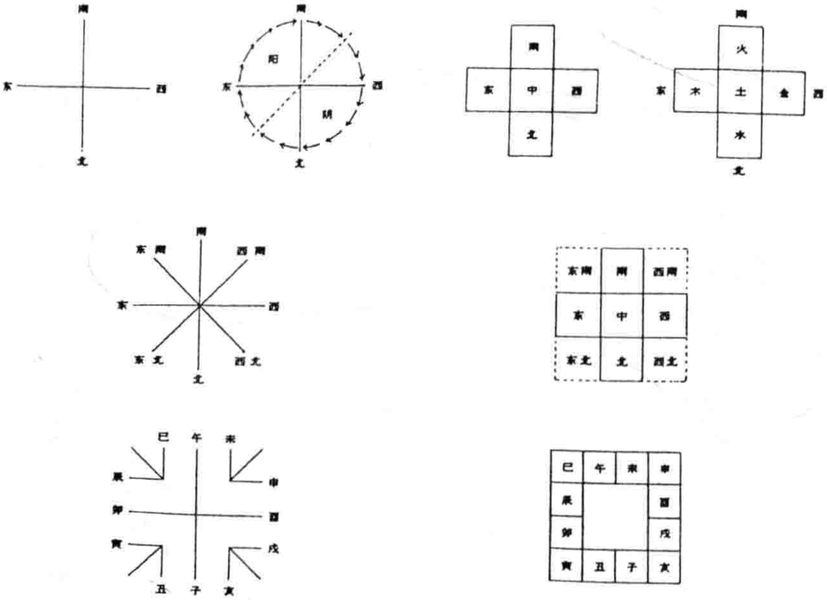


Fig. 13. Analysis of the design of shi: four or five positions, eight or nine positions, and twelve posi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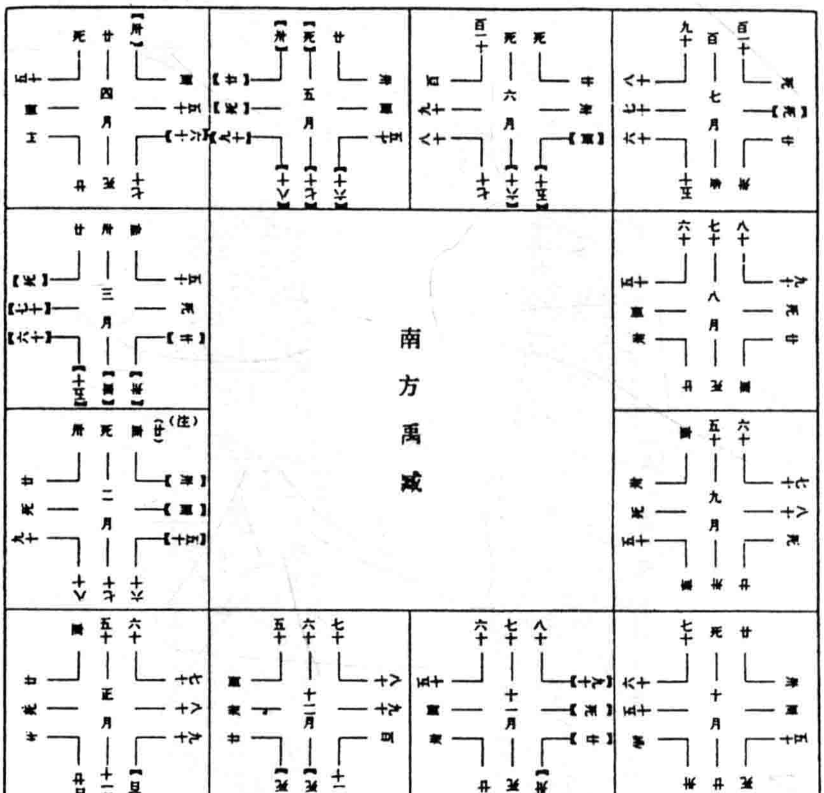


Fig. 14. The Mawangdui Silk Manuscript "Yucang t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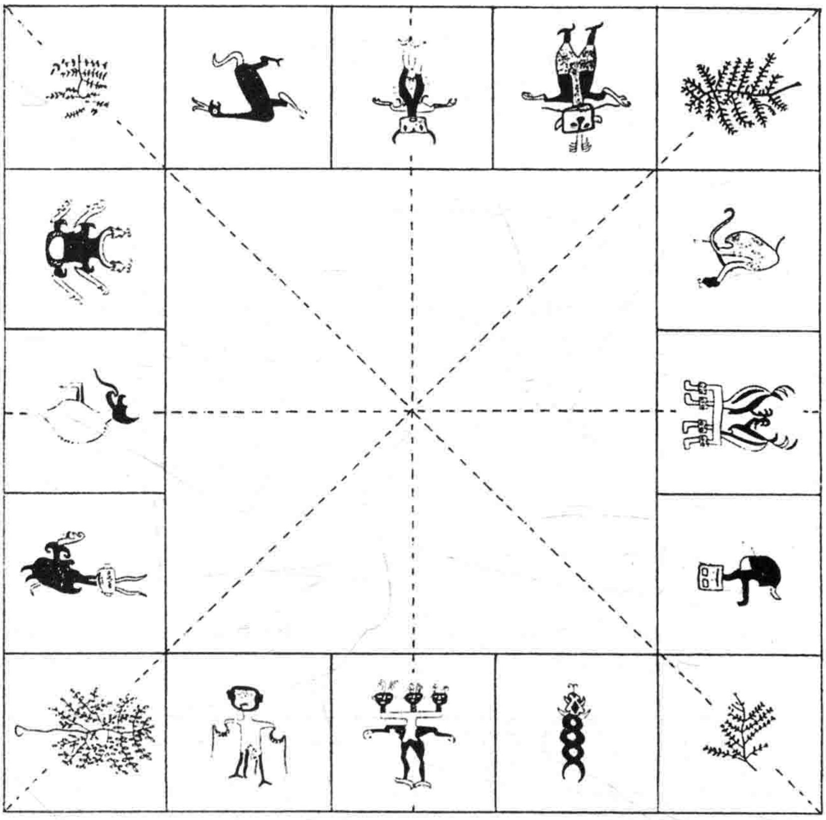


Fig. 15. The twelve gods representing the months of the ye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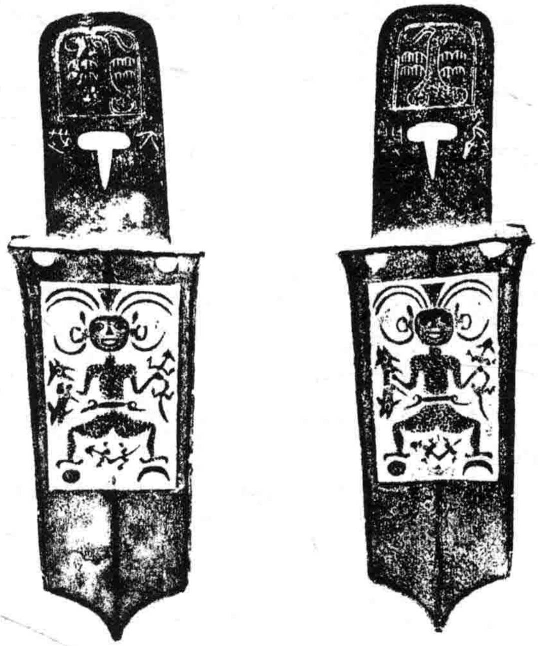


Fig. 16. Bronze Dagger-Axe with the inscription of the "Bing bi Taisui".

Fig. 17. The Mawangdui Silk Manuscript "Bibing t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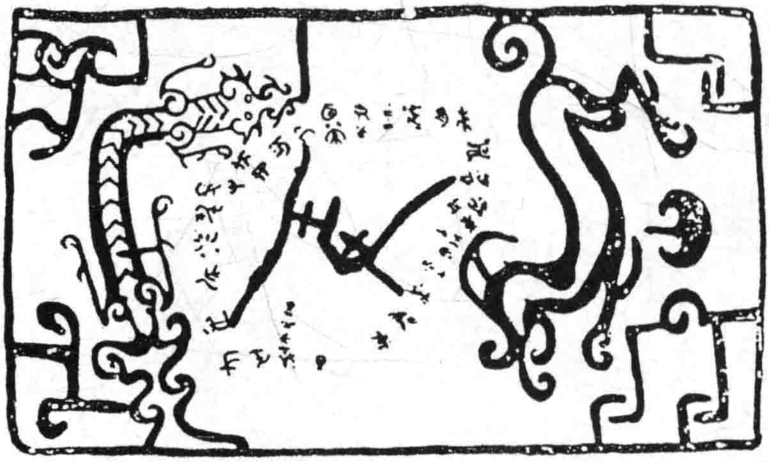


Fig. 18. The design on the cover of the lacquer box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Marquis Yi of Zeng.

3. The twelve gods of the CSM No. 1 have a certain relation to the gods and animals involved in the design of the shi. Different shi have different matching gods. But the Liuren shi has two sets of twelve gods matched with the twelve months and twelve or thirty-six animals. The Almanacs of the Qin bamboo slips from Shuihudi also have several different sets of twelve terms matched with the Earthly Branches.

The name of the shi gods are derived from the stars, some of them from the seven stars of the Big Dipper and some from the four stars of Taiyi (the rear one is Taiyi itself, the front three are Tianyi or Taisui), and the others are their neighboring stars. All of them are located in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universe and control the twenty-eight stars of the lunar motions and other surrounding stars.

The gods in the CSM No. 1 are shown as exaggerated animal forms. January is depicted as a rat (?), February as a four-headed bird, March a dog (?), April a snake, May a man, June a monkey, July a deer (?), August a pig, September a dragon or turtle with two heads, October a cock (?), November an ox with a human body, and December also as a man. Similarly, the shi also has a twelve-animal format, i. e. the famous Animals of the Chinese Zodiac (Fig. 19). They are: rat, ox, tiger, rabbit, dragon, snake, horse, sheep, monkey, cock, dog, and pig. They are all aligned to the Earthly Branches to symbolize the year, months, days, and hours.

Though their arrangements are not the same in detail, this system was complicated in early times, as the Qin Almanacs contain both the twelve animal set

Fig. 19. The twelve animals representing the Earth Branches.

and other ones may be related to the thirty-six animal set. Some animals can replace othe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rule "chong po" and have a striking similarity. [50]

Matching the animals to the shi resembles astrology in Western countries. Both systems use animals to symbolize the stars and use them in fortune telling. According to ancient Chinese texts, the twelve animals are derived from the seven stars of the Big Dipper. This also has relations to the shi gods.

V. Meaning of the CSM No. 1 and the So-called "second Manuscript"

There are about seventy publication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on the CSM No. 1. Through the efforts of many scholars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we have been able to understand its basic meaning.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recent analysis with you.

The central long part of the documen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cycle of movement of the Sui (i. e. Taisui, representing yea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lendar. This section states that every month has its regular length, movement and speed. If the movement becomes faster or slower, it will result in an unusual rise in the seasons and stars and bring bad omens and disorder. Also, the growth of grass and trees will be irregular, the Tianpou (an ominous star) will haunt everywhere, the mountains will collapse, springs will gush forth, and frost and dust will fall with thunder and lighting, the sun will be encircled by cloud and rainbow. This section also states that the Sui has a power called the "De-te", which distributes rewards or punishment to the people. If the people understand the movement cycle of the Sui, the heavens will give good fortune to them; if not, bad fortune will be dealt to them. Finally, section three states that the people ought to pay full respect to Heaven, Earth, mountains, rivers, and to other gods. They should obey these gods and give sacrifices to them in accordance to the demands of the calendar. If not, the gods will start natural disasters and ruin the people's harvests.

The central short part of the manuscript describes a myth about the creation of the "four terms" (dividing a year, month, or day into four parts). Section one states that long, long ago, there was no sun and no moon and that the measurement of the seasons depended on walking. Fu Xi married Nu X, a granddaughter of Zu Wei X, and they bore four children. They remained in the east, west, north, and south and replace each other in turn. Due to this cycle, the seasons emerged. Next section states that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had

passed, there was the sun and the moon; the Heaven was not peaceful and the Earth was not smooth. Emperor Yan ordered Zhu Rong to stabilize the "three heavens" and "four extremes", and rebuild the cosmic harmony. Henceforth, new seasons developed from the motion of the sun and moon. Finally, section three states that the four terms divide the year, while the day is also divided into four "terms" — morning, day, evening and night.

In the peripheral text, the main topic is the months. According to this, in every month, there are some activities that one can or cannot do. For example, in January, the renzi and bingzi days are taboo. One should not start new affairs and should not attack towards the north. In February, armies can be sent to attack, but one should not give one's daughter in marriage or purchase slaves.

In the CSM No. 1, it is obvious that the year, seasons and months are all part of an integral whole.

As to so-called "second Manuscript", which means another MSS character vestiges on the CSM No. 1, I would like to make some clarification. These characters are in red and are not clear. As far as the effect of visual sense, the photographs prepared by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re better than those made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51] Hayashi Minao made a facsimile based on the FGA photo (Fig. 20).[52] From this facsimile, we are able to recognize three characters: "sijun" and "si". However, when Li Xueqin published an article to discuss these vestiges, to my surprise, he not only transcribed each character, but also indicated that they are similar to those on Chu divination bamboo slips.[53]

Fig. 20. The facsimile of the "Second MSS" by Hayashi Minao.

Li Xuequn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o this field. He is my teacher in the study of paleography; I have great respect for him and often follow his ideas in my own research. In April of 1990, Professor Li and I participated in a symposium on Chu culture held here in Washington. He asked Dr. Jenny So whether the "original Second Manuscript" was in the Sackler Gallery; the answer was no. In July of the same year, I returned to the Sackler Gallery and examined the FGA photo, but found that I was unable to read Li's transcription

from the photo. Later, the editor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nual invited me to write 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bamboo and silk texts in recent years. When I got to Professor Li's article, I did not know what to say. I telephoned Professor Li and he said that it was a simple deduction on his part and I was too embarrassed to press the question. I even thought then, that my eyes were failing me.

Recently, when I came to the Sackler Gallery again, I read Dr. Barnard's monographs repeatedly. One day, I suddenly realized that Li Xueqin's transcription was based on Barnard's reconstruction of the "Second Manuscript" in his book (1971, p. 13, Fig. 4: 5).

Barnard assembled this figure with three types of characters, besides original three characters of "sijun" and "si", and seven characters from the CSM No. 1, most of them (25 characters) being derived from the divination bamboo slips excavated from the Chu tomb No. 1 at Wangshan in Jiangling, Hubei (Fig. 21—22).[54] Because Barnard believed that the vestiges included two sets of characters (one set reads normally, while the other is in reverse order), hespecially wrote the character "zi" in reverse order. Barnard did not mention the original source of these characters, so that Li believed that this reconstruction was an original "Second Manuscript". Now t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Barnard how this reconstruction was mad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Li believed the "Second Manuscript" to be the same text as the Chu divination bamboo slips.

I would also like to mention here that Barnard's theory about the folding method, with the two pieces of manuscript back to back, and the characters in reverse order, is open to question.

VI. Related Topic: the Silk Painting from Zidanku

The skeletons of the occupant of the tomb at Zidanku indicate that he was a man about 40 years old.[55] He appears vividly in the silk painting from his tomb, a handsome man (Fig. 23). Similar to this portrait, there are two other silk paintings. One is from the Chu tomb at Chenjia Dashan, also in Changsha, which shows a lady (Fig. 24, its finding place is not clear);[56] another from the Tomb No. 1 at Mashan in Jiangling,[57] which was damaged and found on the cover of the inner coffin (Fig. 25). All of them have a square format with a thin upper-rod made of wooden or bamboo, employed in hanging (except for the piece from Chenjia Dashan which lost it probab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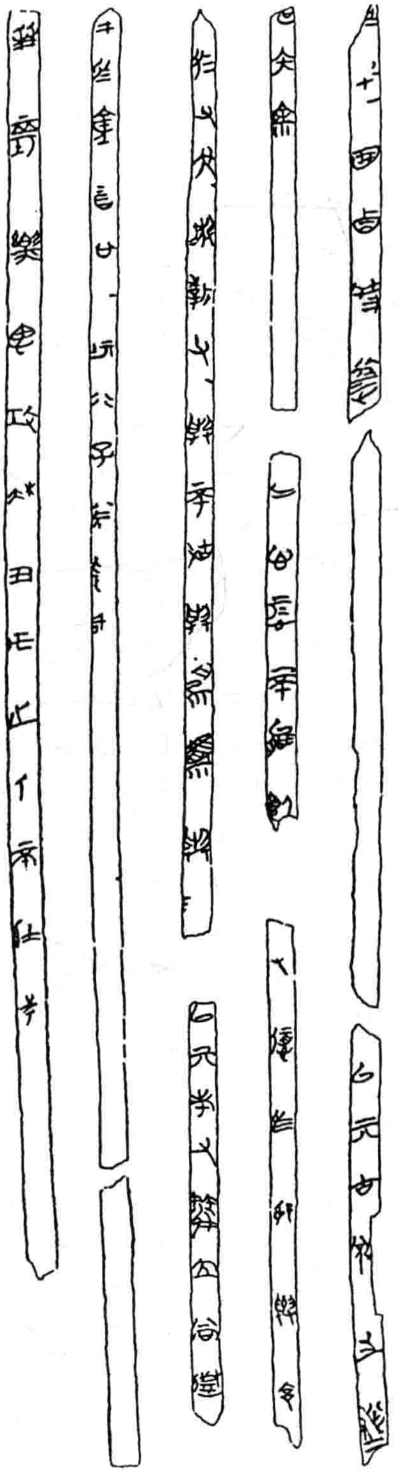


Fig. 21. The facsimile of the Chu Divination Bamboo Slips excavated from the Wangshan Chu Tomb No.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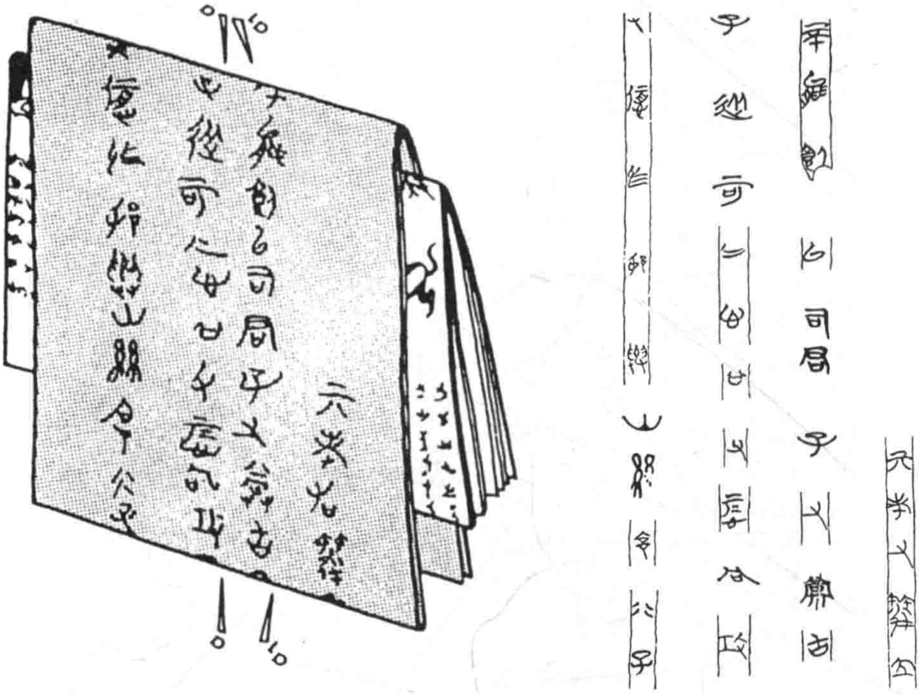


Fig. 22.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aracters on Barnard's drawing of the "Second MSS".

Fig. 23. The Zidanku Silk Painting.

Fig. 24. The Chenjiadashan Silk Pain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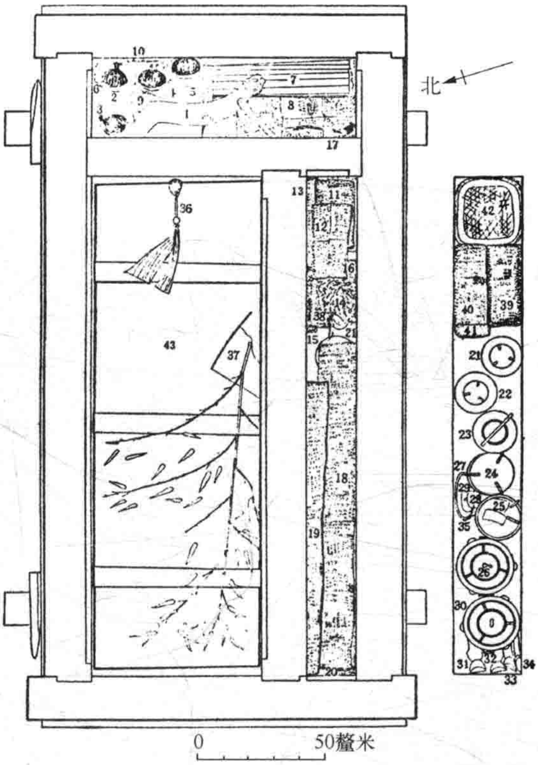


Fig. 25. **The Silk Painting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No. 1 at Mashan: placed on the cover of the inner coffin.**

Three similar late examples have been excavated from the second century B. C. tombs at Mawangdui in Changsha and Jinqueshan in Shandong,[58] which were found on the cover of the inner coffin as the Mashan painting. They also contain the dead's portrait, but appear in T-shape and the focal distance far more than the earlier paintings and the background is more complicated. Especially interesting is the fact that Tomb No. 3 at Mawangdui contained not only a T-shaped painting (Fig. 26), but also two other paintings showing festivities and games (Fig. 27). These two were apparently hung on the walls of the tomb-chamber, which makes us associate them with the wall painting of the brick tombs from subsequent periods.

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brick tombs underwent constant changes for over 2,000 years since the Qin Dynasty, they shared a common basic idea in their design: a dome with celestial phenomena symbolizing the round heavens, the four walls symbolizing the square earth, decorated with scenes depicting activities of the four seasons (such as festivals, hunting, harvest, etc.). The twelve animals representing the Earthly Branches are also often found on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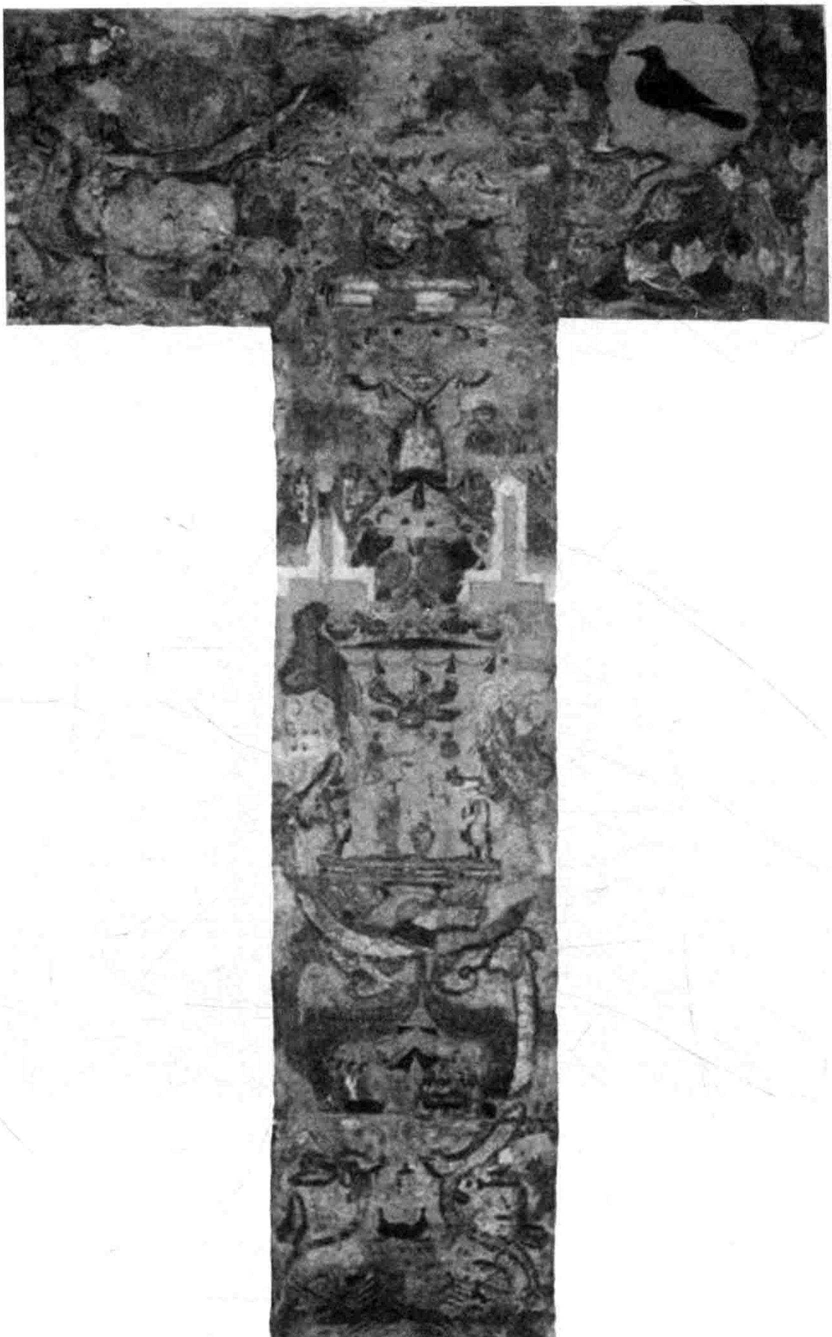


Fig. 26. The Silk Painting excavated from the Mawangdui Tomb No. 3: placed on the cover of the inner coffin.

Fig. 27. **The Silk Painting excavated from the Mawangdui Tomb No. 3: hanging on the wooden chamber wal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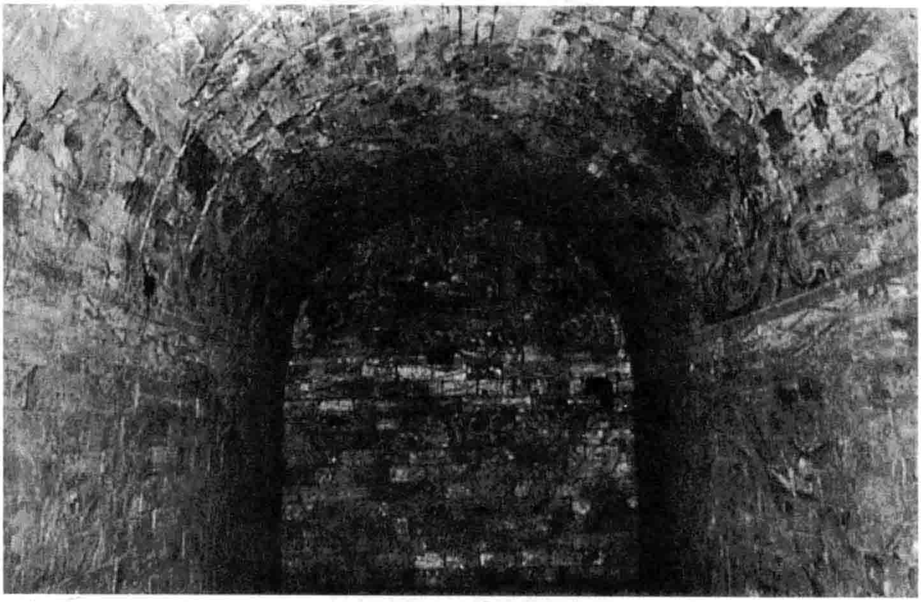


Fig. 28. **A painted tomb discovered at the Traffic University of Xian**

tomb walls, memorial tablets, mirrors, or as burial figures emerged.

We do not yet know when such tomb designs began. In the Qin Shihuangdi's biography of the <u>Shiji</u>, the emperor's mausoleum has a "top with celestial phenomena and bottom with geographical features", but there is yet no proof as his tomb has not been opened. The best early example is a painted tomb discovered at the Traffic University of Xian, where the sun and moon are represented in a circle of the dome, just like the Mawangdui paintings, surrounded by the 28 lunar mansions in the form of figures and animals.[59] In my

opinion, above portraits are not only similar to later "Mingjing" (dated from the end of Western Han and the Eastern Han) in function, which is a long square banner like silk paintings mentioned above but uses the dead's name instead of his image, but also as a special decoration on top of a wooden chamber (as of Zidanku) or a coffin (as of Mashan and Han examples) which functions similarly to the dome painting of brick tombs (Fig. 28). ⑩

The occupant of the Zidanku tomb is low-ranking, as he was not buried with ritual bronze vessels. But the silk paintings and manuscripts from the tomb are highly important. Not only are the Zidanku silk manuscripts forerunners of the almanac of the Qin and Han periods, the silk painting is also a precursor to similar silk paintings of the Han period. They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rial customs in ancient China.

Notes

① Cf. Qi Yanpei, "Shangdong Yidu Sufutun chutu tongqi diaocha ji," Zhongguo kaogu xuebao: Vol. 2, pp. 167-168; Lu Liancheng and Hu Zhisheng, Baoji Yuguo mudi, Beijing: Wenwu Press, 1988.

② See "Meidi lueduo woguo wenwu zuixing yiban," Wenwu cankao ziliao: 1950: 11, pp. 60-64; Shang Chengzuo, "Zhanguo Chu boshu shulue," Wenwu: 1964: 9, pp. 8-20.

③ Jin Shi, "Zengshu, deertushi de guobao," Hunan ribao: November 23, 1991, p. 3.

④ See Cai Jixiang, Wanzhou zengshu kaozheng, first edition, Changsha 1945; reprint, Yiwen Yinshu Guan, Taibei 1972.

⑤ Umehara Sueji, "Kinji shutsugen no Sengoku shiryo," included in Shudo zenshu, vol. 1, Heibonsha, Tokyo 1954, pp. 32-37; T. H. Tsien,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 122.

⑥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2: Shang's article, p. 8. His information is from Cai and local tomb-robbers.

⑦ See Noel Barnard,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73, pp. 1-4.

⑧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7; John H. Cox, 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ntiquities from Changsha, lent by John Hadley Cox (March 26 — May 7, 1939), Gallery of Arts,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1939.

⑨ One is: Noel Barnard, Scientific examination of an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 as a prelude to deciphermen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cal assessment —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71; another reference in note 7.

⑩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Changsha Zidanku Zhanguo muguo mu," Wenwu: 1974: 2, pp. 36-40.

⑪ See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Xin faxian de Changsha Zhanguo Chumu bohua,"

Wenwu: 1973: 7, pp. 3-4; Changsha Chumu bohua, Wenwu Press, Beijing 1973; Zhongguo meishu quanji: Painting: Vol. 1, Renmin Meishu Press, Beijing 1986, pl. 51.

⑫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10, p. 40.

⑬ Who I interviewed include: Hunan archaeologists, Gao Zhixi, Fu Juyou and He Jiejun (Fu and He are excavators of the Zidanku Chu Tomb); retired teacher of the Yali Middle School, Wang Zongshi; tomb robbers of the 1940s, Qi Xiaozhong and Hu Dexing (above in Changsha); Professor Wu Zhucun (in Seattle); Dr. Paul Singer (in New Jersey).

⑭ Cf. Reuben Holdden, Yale-in-China, the Mainland, 1901—1950, 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 New Haven 1964; Lanlin ji, Xiange Press Ltd., Changsha 1937; the Yali Schoolmate Association ed., Yali Zhongxue jianxiao bashi zhounian jiniance, Changsha 1986.

⑮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4, last section: "Changsha Cai liefu zhuan".

⑯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4, Cai's Preface.

⑰ Based on an unpublished letter written by Cai Jixiang to Shang Chengzuo (August 1974), which was mentioned in Shang Zhitan, "Shang Chengzuo jiaoshou cang Changsha Zidanku Chu boshu canpian," Wenwu tiandi: 1992: 6, pp. 29-30. My information is from Wang Shimin who read this letter. Moreover, Cox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time of his second visiting China is 1945 before the Japanese surrender and the place is Shanghai in his letter to Dr. Lawton recently (April 30, 1993).

⑱ The receipt of this deposit was mentioned by some early publications, such as Jiang Xuanyi, Changsha, vol. 2, Shanghai: Jingu Press, 1950; and Wenwu cankao ziliao: 1950: 11, pp. 60-61.

⑲ See the letter that Cox sent to Priest on October 25 of 1949.

⑳ See the letters that Priest sent to Cox on October 28 of 1949 and June 26 of 1963.

㉑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19 and the letter that Priest sent to Cox on October 28 of 1949.

㉒ See a draft that Paul Singer presented to the author,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prepared for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r. Arthur M. Sackler, 1987.

㉓ See Studio, vol. 200, supplement 1, 1987 (Dr. Arthur M. Sackler special issue): Lois Katz,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p. 36-61; Miranda McClintic,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t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pp. 70-76; and the reference in note 22.

㉔ See Shang Zhitan, "Ji Shang Chengzuo jiaoshou cang Changsha Zidanku Chuguo can boshu"; Rao Zongyi, "Changsha Zidanku canbo wenzi xiaoji"; Li Xueqin, "Shilun Changsha Zidanku Chu boshu canpian," Wenwu: 1992: 11, pp. 32-39. And the reference in note 17.

㉕ Since February of this year, an expert on textile, Ms. Mary Ballard, has been unfolding and examining these fragments in the Conservation Laboratory of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㉖ Cf. Chen Mengjia, "You shiwu suo jian Handai jiance zhidu," included in Wuwei Hanjian, Wenwu Press, Beijing 1964, pp. 53-57.

㉗ As to the finding of the Mawangdui MSS, see the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and 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the CASS, "Changsha Mawangdui er, san hao mu fajue jianbao," Wenwu: 1974: 7, pp. 39-40.

㉘ As to the chronology of the Zidanku Chu tomb, cf. the reference in note 10; the Mawangdui Han Tomb No. 3 of the MSS came is not later than 168 B. C. and some of these works were transcribed earlier, even up to the end of Qin and the beginning of Han.

㉙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4, the section: "Zengshu shuji". It is different from Cai's information that the tomb-robber mentioned the CSM No. 1 is unfolded and put on both of the cover of bamboo box and an "wooden tiger with three legs"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10, p. 40).

㉚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27, pl. 7: 1.

㉛ The details of this box have not been published. My description here 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Mr. Chen Songchang of the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in a letter sent to the author recently.

㉜ The width of the folded MSS in this space is 18 cm,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26, p. 42.

㉝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9: Barnard's book (1971), p. 11. He says, "there is plain area of the original fabric of approximately 124 mm width as measured from the first lines of the Peripheral figure caption-texts to the edge of the fabric," but real "plain area" is just about 8. 2 cm based on our recent measuring.

㉞ Measured by Ms. Jane Norman. The width here is based on the largest one of eight or twelve sections.

㉟ Measured by Ms. Ballard.

㊱ Cf. the writing group of 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CASS and the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Mawangdui er, san hao mu fajue de zhuyao shouhuo," Kaogu: 1975: 1, pp. 45-57, 61.

㊲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5: Tsien's book, pp. 153-155. In the terms used in the late paper books, top and lower margins are called "tiantou" and "dijiao", and the columns is "jie-lan".

㊳ Jean Mailey,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ground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in relation to the silk-weaving in Pre-Han and Han China," included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Vol. 1, Intercultural Arts Press, New York 1972, pp. 103-112.

㊴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8: Barnard's book (1971), p. 25. He argued that this measure can not be claimed to be actually identical with the Han pi, but he did not touch on the crucial point, i. e. Mailey ignored the direction of warps and wefts.

㊵ An earliest example of the scroll-painting was mentioned in Shang Chengzuo's book: Changsha guwu wenjian ji (Jinling daxue Zhongguo wenhua congkan jiazhong), Chongqing 1939, p. 40.

㊶ Cf. Shuihudi Qinmu zhujian, Wenwu Press, Beijing 1990.

㊷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5: Tsien's book, pp. 128-129.

㊸ E. g. "Chengyi tu" and "Guaxiang tu", see Mawangdui Hanmu wenwu, Hunan Press, Changsha 1992, pp. 153, 162.

㊹ E. g. "Laozi", "Chunqiu shiyu" and "Zhanguo zonghengjia shu", see Mawangdui Hanmu boshu, Vol. 1, 3, Wenwu Press, 1980, Beijing 1983; "Zhouyi", see Mawangdui Hanmu wenwu, pp. 106-117.

㊺ E. g. "Pinhu tu" (named by the author) attached to "Yangsheng fang"; "Renzi tu" and "Yucang tu" attached to "Taichan shu", see Mawangdui Hanmu boshu, Vol. 4, Wenwu Press,

Beijing 1985.

㊻ E. g. "Daoyin tu", see Mawangdui Hanmu boshu, Vol. 4; "Dixing tu" and "Zhujun tu", see Gu ditu, Wenwu Press, Beijing 1977.

㊼ "Bibing tu" (named by the author, originally called "Sheshen tu"), "Sangzhi tu", "Xingde", "Yinyang wuxing" and "Tianwen qixiang zazhan", see Mawangdui Hanmu wenwu, pp. 35, 36, 132-145, 154-160.

㊽ Cf. Li Ling, "Shi yu Zhongguo gudai de yuzhou," Vol. 4 (1991 spring), pp. 1-40.

㊾ Cf. Li Ling, "Hubei Jingmen Bingbi Taisui ge," Wenwu tiandi: 1992: 3, pp. 22-24; "Mawangdui boshu Shenqi tu ying shu bibing tu," Kaoku: 1991: 10, pp. 940-942; and Wang Jianmin, Liang Zhu and Wang Shengli, "Zenghou Yi mu chutu de ershibaxiu qinglong baihu tuxiang," Wenwu: 1979: 7, pp. 40-45.

㊿ Cf. Li Ling, Zhongguo fangshu kao, Chapter 3: 3, Sanlian Shudian, Shanghai (forthcoming).

51 The FGA photo, see Shodo zenshu, Vol. 1, Heibonsha, Tyoko 1965; the MMA photo,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7.

52 Hayashi Minao, "Chosa shutsudo Sengoku Hakusho ko," Toho gakuho, Vol. 136 (1964), pp. 53-97.

53 Li Xueqin, "Changsha Zidanku dier boshu tanyao," Jianghan kaogu: 1990: 1, pp. 58-61, also included in his recent work, Zhouyi jingzhuan suyuan, Changchun Press 1992, pp. 197-203.

54 The Cultural Relics Team of Hubei Cultural Bureau, "Hubei Jiangling san zuo Chumu chutu dapi zhongyao wenwu," Wenwu: 1966: 5, pp. 33-55, pl. 4, p. 51: Fig. 23.

55 See the reference in note 10, pp. 37-38.

56 See Zhongguo meishu quanji: Painting: vol. 1, pl. 50.

57 See Jiangling Mashan yihao Chumu, Wenwu Press, Beijing 1985, p. 9, p. 10: Fig. 12, P1. 4: 2.

58 See Mawangdui Hanmu wenwu, pp. 26-34; "Shandong Linyi Jinqueshan jiuhao Hanmu fajue jianbao", Wenwu: 1977: 11, pp. 24-27.

59 See Xian Jiaotong Daxue Xihan bihua mu, Xian Traffic University Press, Xian 1991.

60 See Wuwei Hanjian, Wenwu Press, Beijing 1964, pl. 23. It is noticeable that there is a piece on this plate which has the sun and moon on the top of banner like Western Han silk paintings.

楚帛書的再認識

一、引　言

我們對古代的知識太可憐，從前祇有書本上的，當然很不够，近代加上考古發現是進了一大步，王國維叫「二重史證」。但現存歷史資料，無論「地下」所出，還是「地上」所存，都已殘破不全，需要串聯、整合，根據一定綫索去「復原」，難度很大。正像文獻有傳本和佚文之别，地下出土物也分兩類：一類是經科學發掘的出土物，一類是有意盜掘或無意發現的傳世品。在我看來，如何把二者結合起來，無論對考古學家也好，還是對文物和藝術史的研究者來説，都很重要。

大家也許知道，在中國，博物館「分家」——即分成以考古爲主的研究所和以收藏爲主的博物館兩個系統——祇是近十年左右的事情。最初的考古發掘，除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歸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現獨立爲考古系）進行的「主動發掘」外，真正屬於一綫搶救性質的發掘幾乎都是由博物館來承擔[一]。考古在中國是歷史學的組成部分。中國的博物館也幾乎是清一色的「歷史博物館」，它們的工作人員很多是畢業於歷史系，特别是其中的考古專業，館藏也是以發掘品爲主體。這同美國的博物館多以傳世品爲對象，側重藝術史和工藝史的研究是不大一樣的。

過去，我在考古所學習和工作過六年。在那裏，作爲一個年輕人，我時時被告誡：千萬不要走「金石學老路」。中國的金石學，除重視文字和利用文字考證歷史之外，主要也是把古物當藝術

鑒賞的對象。這種研究，眼裏衹有孤立的傳世品，缺陷是明顯的。但「科學的」考古發掘在西方衹有一百七十年左右，在中國也衹有六十多年，更大的時間跨度是由纍世所積的「古物」所占據。有的考古學家很討厭「文物」這個詞，覺得把發掘品和傳世品擺在同一個字眼下是有辱「科學」，但在歷代著録和現存藏品中，傳世品除陶器外，在許多方面（如甲骨、銅器、玉器、瓷器、碑版、書畫）都是「泱泱大國」；即使是發掘品，寫完報告，也還得超離「坑」、「群」做進一步研究。如果我們以傳世品「庶出非嫡」而把它們拒之門外，那是非常可惜的。

對於考古發掘，傳世品常常是重要綫索和背景參考。如著名的益都蘇埠屯商代方國墓地，就是通過祁延霈先生對傳世品的追踪調查纔發現[一]。而同樣，大量如珠子離綫，散存於公私藏家之手的傳世品（包括見於著録而失傳者），也往往要到考古發現中去尋根，纔能被理解。如寶鷄強伯墓地的發掘對研究寶鷄斗鷄臺所出端方和黨玉昆舊藏的兩套帶銅禁的酒器就頗有啓發[二]。特別是我們不能忽視，中國有那麼多的農民（盜墓者即産生於這塊土壤），他們挖土不止，發現古物的幾率最大，不僅過去，就是現在，也還常常是考古學家的先導。

中國近代有些盜掘，如渾源李峪村、新鄭李家樓、洛陽金村和壽縣朱家集的發現，都是千載難逢，少了這種個例還真不行。很多都得「死馬當作活馬醫」（根據一定綫索做搶救調查和參照考古發現進行復原）。現在我們要談的正是這樣一個例子，它就是美國賽克勒美術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保存的無價之寶——楚帛書。

二、楚帛書的來歷

楚帛書的出土與收藏，過去是一筆糊涂賬。這對瞭解楚帛書是很大的不幸。因爲古物流散的大問題，一是「離坑」，二是「失群」。整合的先決條件，是從收藏源流入手，順藤摸瓜，找到它的「坑」和它的「群」。

由於楚帛書是盜掘出土，出土後又輾轉易手，從盜墓者到收藏家，從收藏家甲到收藏家乙，很多環節都銜接不上，很多細節都模糊不清，所以學者一直是在「五里霧」中。特別是七十年代以前，美中之間橫着一大鴻溝，楚帛書的故事在中國一直是作爲「美帝國主義劫掠中國文物」最出名的罪證之一〔四〕。爲此，與楚帛書有關的兩個當事人蔡季襄（帛書的最初收藏者）和柯强（John Hadley Cox，携帛書入美者），一個在國内擔驚受怕，一個在海外屈辱莫名，似乎都有難言之隱。他們的沉默也增加了人們的好奇。結果正像我們從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湖南日報》上所讀到的〔五〕，這個故事現在已經變得更加離奇，也更加廣爲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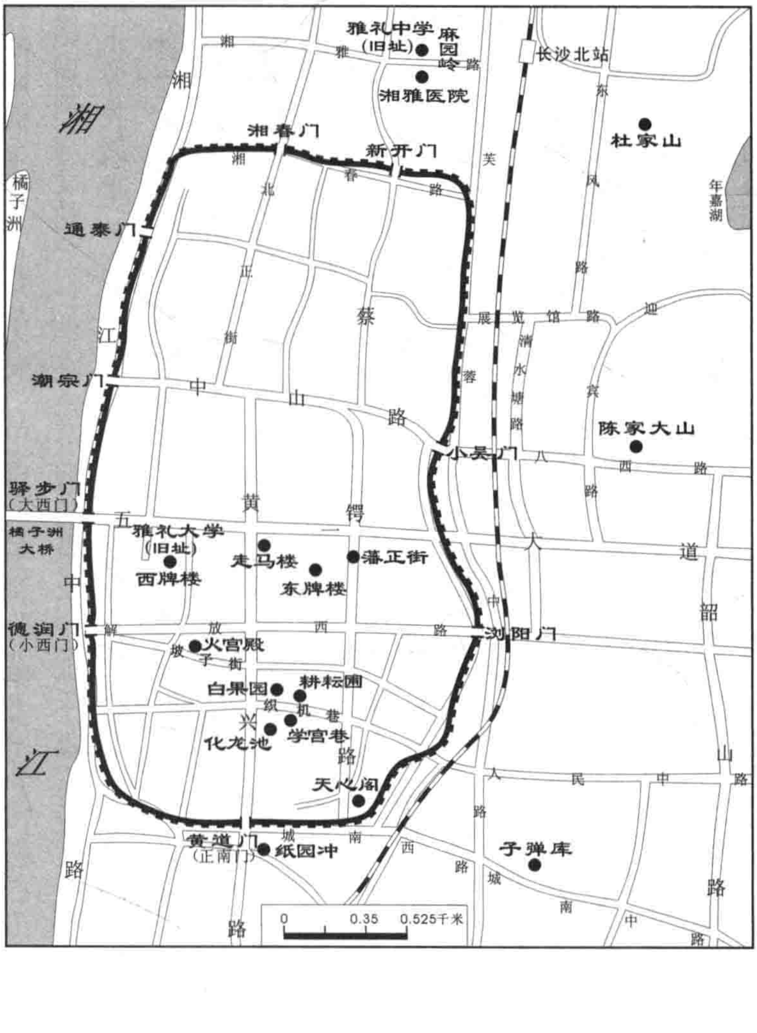
對楚帛書的出土收藏，我所關心的祇是歷史事實，而不是政治宣傳和商業秘密。比如帛書的出土時間是什麽，盜掘者是誰，出土情况如何，以及它流入美國的時間、保存經過和拍過哪些照片、做過哪些檢驗等等。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我不希望這些基本事實竟被當作政治宣傳和商業秘密的殉葬品，永遠從歷史上抹掉。

研究楚帛書的來歷，儘管傳聞異辭，頗多矛盾，但仔細爬梳整理，基本講法是兩種。一種是來自湖南當地。如盜墓者（當地叫「土夫子」）、蔡季襄、商承祚，還有湖南省的考古學家，他們都很肯定地説，楚帛書是一九四二年盜掘，一九四六年流美〔六〕。另一種是來自海外的傳聞和推測。如梅原末治、錢存訓和巴納，他們都認爲帛書應是三十年代後期柯强任教長沙的前後出土，並且流美時間合理地應在一九三七年柯强返國之後〔七〕。特別是巴納引用了據説是移居海外，隱姓埋名的另一盜墓者提供的消息〔八〕。按照這一消息，帛書的出土時間是一九三四年。他們對出土情况的描述也很不一樣。如盜墓者説「《繒書》一端搭在三脚木寓龍尾部，一端搭在竹笥的蓋上」〔九〕，蔡季襄説「書用竹笈貯藏，摺疊端正」〔一〇〕，巴納引述的説法則是塞在椁木間〔一一〕。其他差異還有很多。

對於弄清楚帛書出土的「坑」有重要意義的是，一九七三年湖南省博物館在當年盜墓的「土夫

子」引導下，重新發掘了出土帛書的墓葬，地點在舊長沙城東南郊一個叫子彈庫的小地方，位置在今省林勘院內（圖一）〔一二〕。這一發掘除找到楚帛書的出土地點〔一三〕，還有不少收穫：一是通過器物組合確定的墓葬年代，可知楚帛書大約是戰國中晚期之交的古物；二是墓中出土了一件罕見的戰國帛畫〔一四〕；三是其他出土物亦可與「土夫子」、蔡季襄、商承祚等人的描述相互印證和相互補充。

楚帛書之出土流散，故事的一半在中國，一半在美國，非做跨國研究不能璧合。過去我没條件研究這一問題，在拙作中衹能兼收異説，不下結論〔一五〕。一九九〇年四月，羅覃博士（Dr. Thomas Lawton）和蘇芳淑博士邀我參加由賽克勒美術館舉辦的東周楚文化討論會，使我得見帛書原物，一償心願；七月東遊，再到此地，又詳驗了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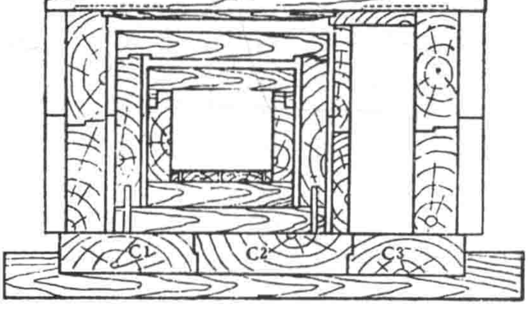


圖一　長沙城區圖

of Art）拍攝的早期帛書照片，也是大飽眼福。但因爲時間倉促，茫無頭緒，兩次都没能調查這一問題。祇是回國後，受蘇博士鼓勵，我纔下决心來賽克勒美術館「刨根問底」，希望通過這一研究，可以把新的消息帶給學術界。

這次來美國之前，作爲必要的準備，我先在國内摸了一下底。一九九二年八月，我利用到長沙參加馬王堆國際學術討論會之便在當地做過一次調查，採訪了高至喜（湖南省博物館名譽館長）、傅舉有（湖南省博物館副館長，子彈庫楚墓的發掘者）、漆孝忠（湖南省博物館退休的發掘技工，當年的「土夫子」）、何介鈞（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子彈庫楚墓的發掘者）、胡德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發掘技工，當年的「土夫子」）和王宗石（雅禮中學的退休教員，柯强的學生），並在王先生的引導下，參觀了雅禮中學的舊址。

據高至喜説，上述《湖南日報》刊載的故事很多細節都不可靠。他曾整理過蔡季襄的交待材料。事實上，帛書並非簡單被「騙走」，而是蔡氏本人也想把它賣掉。他托柯强在美拍照和兜售〔一六〕，要價一萬美元，預付押金一千美元，留下收據〔一七〕。後來蔡托同鄉吴柱存（詳下）帶信到美，同柯有争執。傅舉有和何介鈞也向我介紹了子彈庫楚墓的發掘情況，並帶我見了漆孝忠和胡德興。據他們講，長沙盜墓有不同的團夥，其中與帛書有關，主要是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以任全生爲首的盜墓集團，成員包括漆孝忠、李光遠、何炳初、胡德興、楊再興、龍云如、王菊生等人（任、楊、龍已去世）。這些「土夫子」，解放以後多被湖南省博物館接收，「分家」後也是兩邊都有。一九四二年挖子彈庫楚墓是任全生等四人，一九七三年重掘此墓也是由任、漆、李、胡四人帶着找墓，目的是想同剛剛發掘的馬王堆漢墓做



圖二　子彈庫楚墓的棺槨（圖中最上一層爲棺蓋，其下的薄板即隔板）

一比較（二者都是當地所説的「火洞子墓」，即用白膏泥或青膏泥封墓）。簡報後的附録就是出自任全生所述。過去我曾推測此墓所出帛畫或即巴納引盜墓者説提到的留在墓中没有取出的另一「帛書」〔一八〕。這次當面請教，他們説絶不可能。因爲雖然帛畫是發現於槨蓋板和隔板之間的盜洞旁邊（圖二），但這兩層板是卡死的，根本没有移動過的痕迹，既拿不出也插不進任何東西。可見帛畫是下葬時就放入。

對巴納提供的時間，現在我有一個感覺：他似乎主要是想把它與柯强在雅禮中學任教的時間銜接起來。因爲按耶魯中國學會（Yale-in-China Association）保存的派遣記録〔一九〕，這一時間是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四年正好在其前。而且巴納還特别提到，柯强返美後在耶魯大學舉辦過他所獲長沙文物的展覽，時間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五月七日（案：柯强自撰的展覽説明書也提到，這些文物是他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在長沙任教時得到，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没有提到楚帛書）〔二〇〕，没有任何記録可以證明，此年以後他還第二次到達過中國〔二一〕。但最近商志䃅先生（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公布了其父商承祚先生生前收藏的子彈庫帛書的殘片〔二二〕。他在遺物中發現了一封蔡氏寫給商氏的信（寫於一九七四年八月），述及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與柯强會面，謀售帛書之事〔二三〕。而不久前，柯强本人在一封致羅覃博士的信中也承認，他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到達上海〔二四〕。這些都説明柯强還有第二次來華。可見把帛書出土流美的時間定在四十年代，與柯强居長沙的時間其實並無矛盾。

現在按中國方面的消息，我們可以列一個更合理的時間表：

(1) 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柯强居長沙，任教於雅禮中學〔二五〕。這期間，因長沙城外修築要塞公路（用於對付日本人），發現大批古墓，柯强所收古物即這批墓中出土。事情在抗戰之前，與楚帛書無關。

(2)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柯强返美。次年，雅禮遷沅陵。一九四一年日軍攻長沙，燒毀原雅

禮校舍。一九四二年元月日軍撤走，這以後到一九四四年，是任全生等人在長沙盜墓的時期。帛書出土是一九四二年九月，物歸蔡季襄而整理成書是一九四四年秋〔二六〕。蔡書出版於一九四五年春，序言提到一九四四年夏日軍攻陷長沙，妻女被難，是書即作於避難途中〔二七〕。此皆抗戰中事，與柯强無關。

(3)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蔡、柯纔有可能在上海見面。故次年，二人有滬上之議，帛書因而到美。

總之，從各方面看，長沙來源的消息要比海外的傳聞和推測更爲可信。這是故事的前一半。

關於故事的後一半，這次我在美國也做了初步調查。

首先，我到美國的第一站是西雅圖，在那裏我拜訪了高至喜先生提到的那位「信使」——吴柱存先生（原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現定居西雅圖）。吴父與蔡季襄是朋友，本人是柯强的學生，並與王宗石同學。他也説《湖南日報》文頗多誤記。關於帶信到美和蔡、柯之争，他回憶説，一九四七年底，他離長沙赴美求學帶蔡信致柯，責問柯何以久無音信，説如果再無消息就上海牙國際法庭告柯。到美後，信由吴譯成英文寄柯。柯回信大訴其苦，抱怨蔡太不够朋友，説我帶帛書來美，東西是放在有特殊設備的倉庫，極爲小心；祇要哪兒有大的展覽，我都到處兜售，花了大量時間和金錢，你知不知？信也是由吴譯成中文覆蔡，但蔡並未回信。一九五〇年，吴回國，柯寫信托吴轉告蔡，説蔡先生不是想在長沙建個現代化的印刷廠嗎？祇要東西脱手，我會在這兒買最好的設備送去。但吴回國後留在北京任教，未同蔡聯繫，信一直留在手中。前後三信，第一封信的回憶稿和其他兩封信的原稿均於「文革」中（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被抄走。

其次，蒙賽克勒美術館慨允和亨尼塞（Colleen Hennessey）先生幫助，我還參閲了其檔案中保存的柯强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遠東部主任普瑞斯特（Alan R. Priest）的通信（一九四九—一九五一年，複製本）和柯强從大都會博物館提取楚帛書的文件（一九六

四年四月，複製本)〔二八〕。從中瞭解到：

(1) 最初柯氏明確表示，他求售帛書是受朋友之托，分文無取，拒絕把帛書與他在長沙獲得的其他文物搭在一起出售〔二九〕。

(2) 儘管柯氏把價錢壓到七千五百美元(不足蔡氏所求的九千美元)，並且反復廣告此物如何重要，聲稱無人購買，就得歸還中國，或到倫敦和斯德哥爾摩去賣，但普瑞斯特却無法説服大都會博物館買下此物，衹同意留供檢驗。故一九四九—一九六四年帛書是以檢驗爲名而寄存於大都會博物館，當時是處於「無主」狀態〔三〇〕。

(3) 帛書在寄存大都會博物館之前，曾向許多博物館兜售，但都未成功〔三一〕。

(4) 帛書於一九五〇年就已攝成照片(案：這一照片應即弗利爾美術館攝製的第一個帛書照片，照片是用於兜售帛書)〔三二〕。

(5) 除上述帛書，一九五〇年前後，柯氏還曾把從中國帶來的「未經裝裱的」其他帛書和盛放帛書的書笈送福格博物館(Fogg Art Museum)檢驗〔三三〕。

最後，關於帛書從大都會博物館提出後如何易手於紐約古董商戴潤齋(福保)先生和賽克勒醫生(Dr. Arthur M. Sackler)，三月一日我還到新澤西拜訪了美國著名的古物收藏家辛格醫生(Dr. Paul Singer)。他送我一篇待刊之作，對這一過程有生動描述〔三四〕。從中可知，帛書入藏戴氏是在一九六四年柯氏提取帛書之後，時間很短。一九六六年，由於辛格醫生慧眼獨具，力勸賽氏購入此物，從此楚帛書纔聲名大噪〔三五〕。一九六六年後，它一直是賽氏藏品，並於一九八七年賽克勒美術館建成後從紐約移存該館。賽氏現已謝世，但他生前曾明確表示，總有一天他會把此物歸還中國〔三六〕。

現在，與楚帛書有關的當事人，中國的任全生、蔡季襄、唐鑒泉〔三七〕，美國的普瑞斯特、戴潤齋、賽克勒都已作古。我很感謝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賽克勒美術館，以及王宗

石、吴柱存、辛格等各位先生的幫助，使我能在帛書出土半個世紀後尚能綱羅逸聞，挽救若干史實於不墜。但遺憾的是，這故事後一半的中心人物柯强，他却拒絶了我的拜訪〔三八〕。

三、楚帛書的種類和形制

通常人們所説的「楚帛書」是指賽克勒醫生收藏的那件楚帛書，但蔡氏和商氏還提到與這件楚帛書同出的一件竹笈和笈中所存的其他帛書殘片〔三九〕，林巳奈夫、巴納和李學勤也討論過這件帛書上殘存的另一帛書的印痕，即所謂「第二帛書」〔四〇〕。可見子彈庫帛書也像馬王堆帛書一樣，實際上是一批而不是一件，衹不過人們對其他帛書的下落毫無所知罷了。這次我來美國的另一收穫是找到了子彈庫帛書的「群」。現在我們纔知道，除去年商志𩡝公布的商承祚收藏的十三片殘帛〔四一〕，其他帛書和書笈其實是與通常所説的楚帛書一起由柯强帶入美國，長期未能售出（案：完書尚無買主，殘帛可想而知），衹是一九九二年纔成爲賽克勒美術館的藏品。這也就是説，子彈庫帛書的「群」，其主體和絶大部分現在都在賽克勒美術館。

關於子彈庫帛書的「群」，因爲揭開和整理的工作仍在進行〔四二〕，這裏衹能講一點很不成熟的印象。它包括用墨和硃砂兩種顔料書寫的若干不同種類的帛書或帛書殘片〔四三〕：

(1) 通常所説的楚帛書。這是一部講各月舉事宜忌的書，繪有四時十二月之神和青、赤、白、黑四木，大體完整。下稱「第一帛書」。

(2) 硃書殘帛。字體較大，有些殘片可見硃欄。通常所説的「第二帛書」可能與此有關。

(3) 硃欄墨書殘帛。字體很小，其中提到按五行之位，居水如何，居土如何，以及各月的改火之木和服色等等，與月令相似。附圖，畫有大小兩個圓圈，圓綫是用内紅外黑兩色畫成，各沿圈内一周標注楚十二月之名。商氏藏片中也有硃欄墨書的一種，似與此有關。

(4) 墨書殘帛。字體較大，無欄綫，其中提到各種方向和「生氣」、「死氣」等詞，並有一種用紅

綫畫成的摺角，摺角内書「丙」、「壬」等日干。

(5) 墨欄墨書殘帛。衹見個别殘片，字體較小。商氏藏片中也有墨欄墨書的一種，或與此有關。

另外，商氏藏片據説得自徐楨立，徐楨立得自唐鑒泉〔四四〕。徐、唐手中是否還有其他殘片，仍須做進一步瞭解。

下面讓我們談一下楚帛書的形制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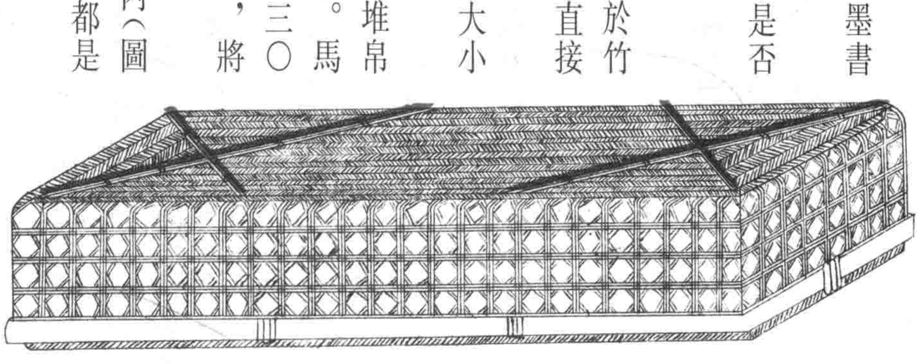
在古代書寫材料中，簡、帛是最主要的兩種。《墨子・天志》説「書於竹帛」，錢存訓先生的中國書史名著就是以它題名，認爲書的概念是與竹帛直接有關〔四五〕。

在竹簡和帛書二者中，竹簡出土實例較多，學者對其修治、編聯、尺寸大小和書寫方式討論比較充分〔四六〕；而對帛書，我們的知識却很可憐。

現已出土的帛書，到目前爲止，其實衹有兩批：一批是著名的馬王堆帛書〔四七〕，一批就是這裏討論的子彈庫帛書。而且巧得很，它們都出在長沙。馬王堆帛書是約公元前二〇〇年左右的帛書〔四八〕，而子彈庫帛書是約公元前三〇〇年左右的帛書〔四九〕，比前者要早，但後者在形制特點上與前者仍有聯繫，將二者加以對比是非常有趣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楚帛書原先是叠放在一件竹篾編織的書笈之内（圖三）〔五〇〕。與之相似，馬王堆帛書的盛放物則是一件漆盒（圖四）〔五一〕，兩者都是帛書的出土單元。

子彈庫書笈，在蔡書中有插圖和描述，十分珍貴。其描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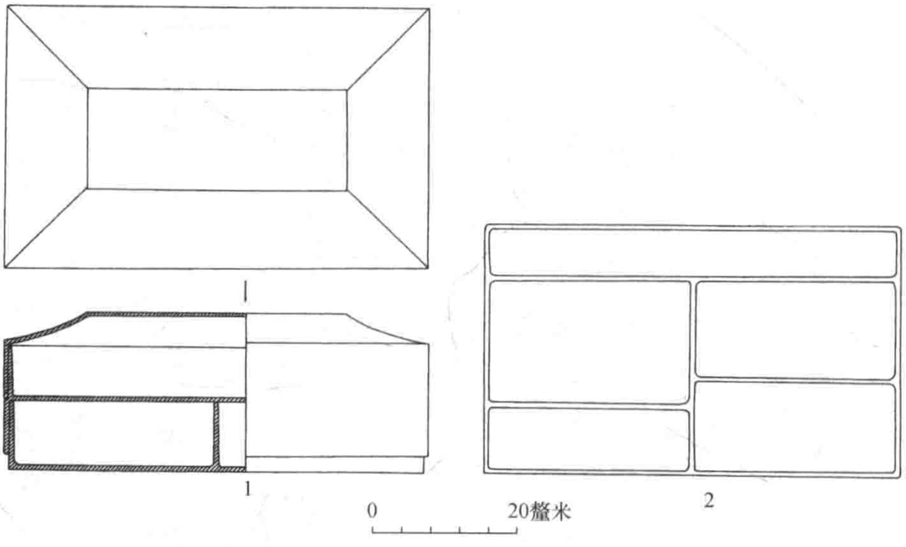
圖三　子彈庫書笈

竹笈，又名簏，即貯藏繒書者，亦木椁墓出土。有蓋，高吋有半（器、蓋相同），縱長八吋，橫長四吋半。器蓋及底均用竹絲編成人字紋樣。四周則作六棱孔狀，內糊薄絹，工極精巧。但此項竹笈出土，物質腐敗，無法保存，故四周均已破損，不成器形，且竹絲被水所浸蝕，已成黑色，致原有色澤不明，惟其中間有硃色者，尚隱約可辨（案：蔡氏復原圖所記尺寸，長相同；寬作四吋，略小；高作二吋，略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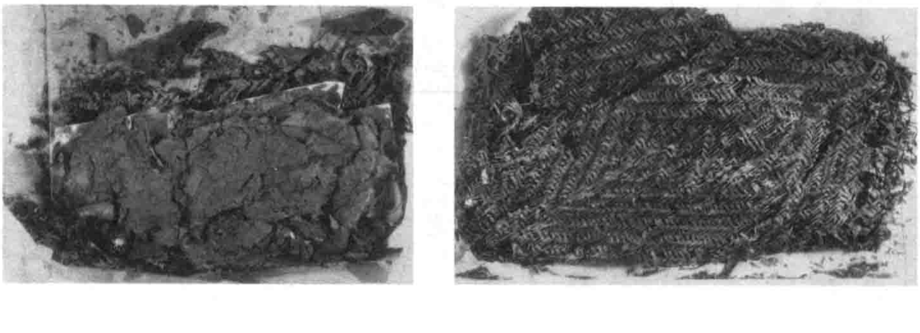
最近，承弗利爾美術館實驗室齊思（W. T. Chase）先生見示，我們終於目睹了這一實物（圖五）。同實物比較，上述描述有幾點值得注意：

(1) 其尺寸大小和編織方式與實物大體接近。

(2) 他提到「內糊薄絹」，實物在篋絲間可見若干經緯疏鬆、沒有字迹的帛片，



圖四 三號漢墓雙層長方漆奩（東57）



圖五 子彈庫竹笈（實物）

蓋即所指。但這些帛片也有可能是帛書殘片，還應檢驗。

(3) 他指出此物出土後即破損嚴重，可見原書圖像是帶有想象意味的復原圖。這件竹笈因出土後未經脱水處理或用清水浸泡，變黑變朽，現在蓋面起支撑作用的兩組十字交叉狀的粗篾已斷離蓋面，蓋器的四壁也已塌陷，尤以邊緣和四角損害更爲嚴重。對照蔡氏所説，足證這些損壞並不都是後來纔發生。

(4) 蔡氏説「原有色澤不明，惟其中間有硃色者，尚隱約可辨」，現可見蓋面紋飾是以墨緑色的方塊紋層層相套，間以黄色，粗篾所覆之處則作暗紅色。

另外，有一點蔡氏没有提到，笈中所出還有一些皮革碎片，上面黏有殘帛（屬於上述硃欄墨書的一種），推測可能是用以保護帛書的書帙或用於隔潮的墊片。

蔡書之後，關於竹笈尺寸還有一些不同説法，應該解釋一下。如：

(1) 長23、寬13 釐米（商承祚）〔五二〕；

(2) 長40、寬20 釐米（任全生）〔五三〕；

(3) 長22、寬10、高5 釐米（陳夢家）〔五四〕。

這三種記載，(2)與實物相差懸殊，擴大一倍，應屬誤記。(1)是據帛書摺疊後的尺寸（嚴格説是第一套摺痕的尺寸，詳下）反推，並非實測，故長寬都略大。(3)是據蔡書换算，蔡書所記，按米制换算，應爲長20.32、寬10.16（或11.43）、高3.81（或5.08）釐米，陳氏除酌增長度，餘大體相同。

同子彈庫竹笈相比，馬王堆漆盒的體積要大得多（長59.8、寬37、高21.2 釐米）。這件漆盒有五個格子，上方的方格是放半幅的帛書（纏在寬2—3 釐米的竹、木條上）和竹書（兩卷）、竹笛（兩支），中間靠左的方格是放整幅的帛書（摺叠放置），中間靠右的方格是放牡蠣殼，下邊靠左的方格是空格，下邊靠右的方格是放植物枝莖。其中放整幅帛書的方格和子彈庫竹笈比較接近，但尺寸

略大，從照片推算，約爲29×18.5釐米〔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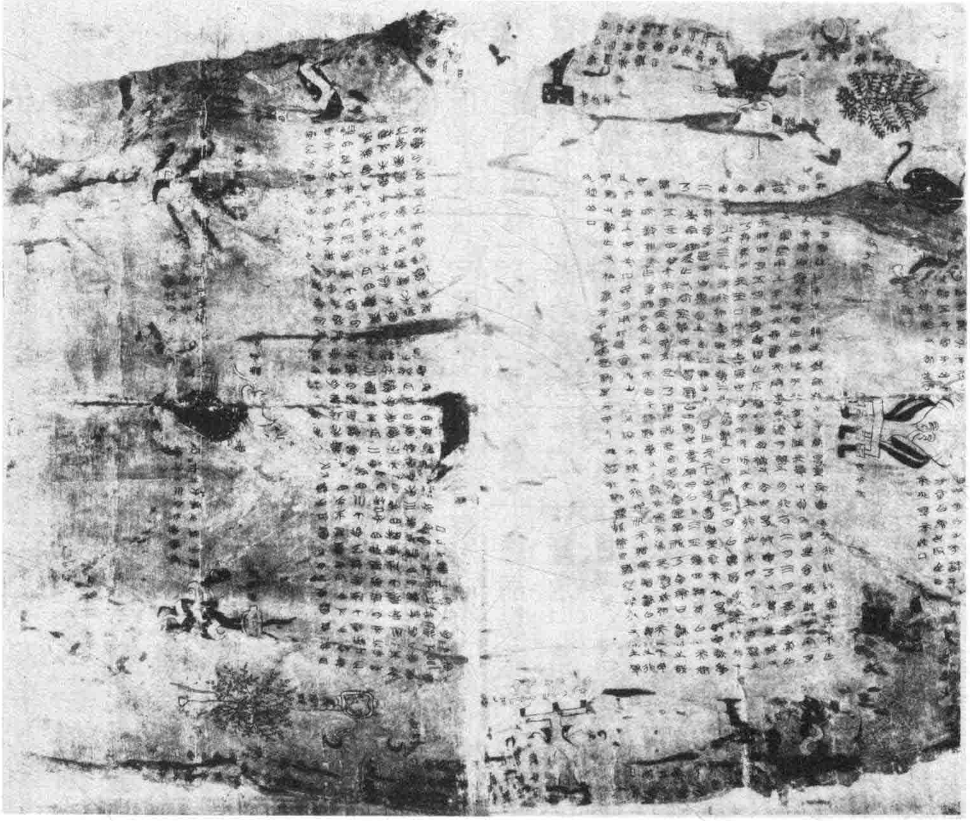
子彈庫帛書，衹有第一帛書(圖六)保存比較完整，可介紹如下：

(1) 第一帛書的尺寸。蔡書記爲18×15吋〔五六〕，折合米制約爲45.72×38.1釐米，比實物略小，可能是未經裝裱時的尺寸。商文所記是據弗利爾美術館的照片推算，作44.1×37.75釐米〔五七〕，比實物更小。陳文所記是從蔡書的尺寸換算，作46×38釐米〔五八〕，取其約數。這些都不太準確。比較可靠的還是巴納書的尺寸，即47×38.7釐米〔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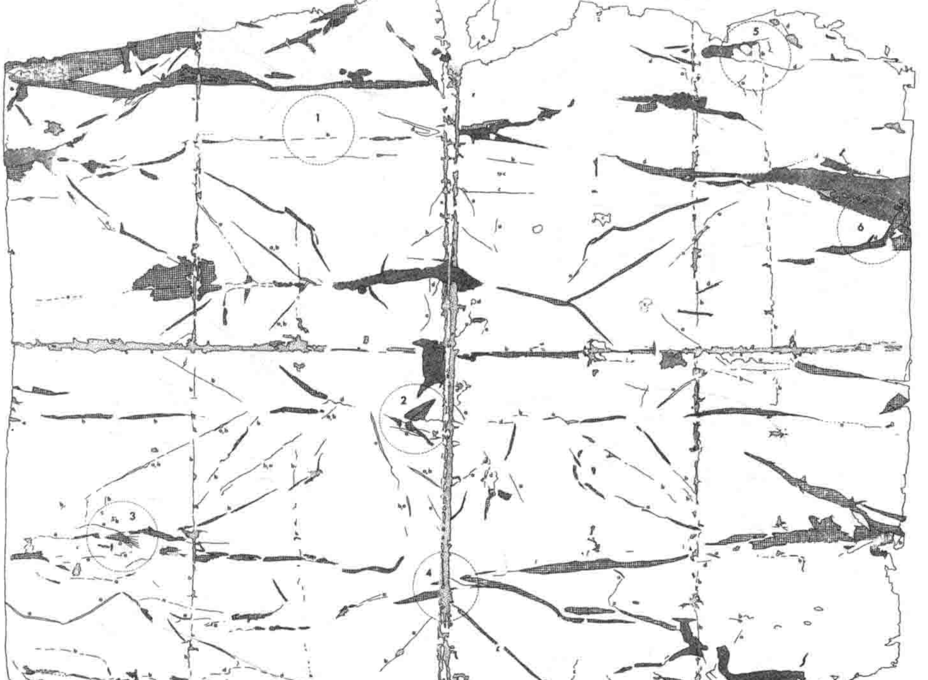
(2) 第一帛書的摺疊方式。據巴納研究，是上下對摺一次，左右對摺兩次，留下橫摺痕迹一道，縱摺痕迹三道，將帛書分爲八區(圖七)〔六〇〕。但最近驗視帛書，我發現，除上述摺痕，帛書表面還有另一組不太明顯的摺痕，上下對摺一次，摺痕相同；但左右對摺三次，留下縱摺痕迹五道，把帛書分爲十二區。其尺寸經測量，左半寬23.1釐米，右半寬24.1釐米；上半長19.1釐米，下半長19.6釐米。兩組摺痕，第一組，左上二區約寬10＋13.2釐米(應減誤差0.1釐米)，右上二區約寬12.6＋11.3釐米(應加誤差0.2釐米)，左下二區約寬9.8＋13.4釐米(應減誤差0.1釐米)，右下二區約寬13＋11.1釐米；第二組的十二區，左上三區約寬6＋9.2＋8.1釐米(應減誤差0.2釐米)，右上三區約寬7.6＋9＋7.6釐米(應減誤差0.1釐米)，左下三區約寬5.5＋10＋7.8釐米(應減誤差0.2釐米)，右下三區約寬7.7＋9.6＋6.6釐米(應加誤差0.2釐米)〔六一〕。另外，巴納還指出，帛書四邊，上下和右邊字迹都貼邊，似乎還應略有餘地，並且左邊留有一段餘絹〔六二〕。我們估計，帛書原來的尺寸似乎應酌增，大約爲48×40釐米。餘絹，現經測量，約寬8.2釐米。

子彈庫出土的其他帛書，殘損嚴重，最大殘片，長寬約爲19×10釐米〔六三〕，大小與上述第二套摺痕更接近。似乎全部帛書的摺疊尺寸是在20×10釐米左右，正與蔡書所記竹笈的大小相適。

同子彈庫帛書相比，馬王堆帛書的尺寸大小和存放方式很值得注意。它們分爲兩種形式。一



圖六　子彈庫第一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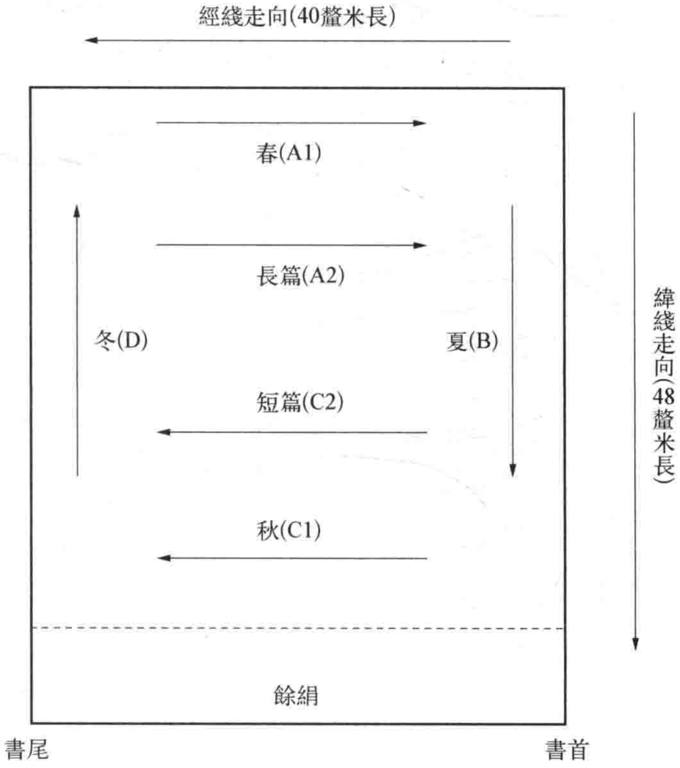
圖七　第一帛書的摺疊情況

種爲幅廣約24釐米的半幅帛，是像布店賣布那樣卷在竹木片上，不摺疊，不僅尺寸比子彈庫第一帛書小，而且存放形式也不同。另一種爲幅廣約48釐米的整幅帛，與我們估計的子彈庫第一帛書原來的橫長相同，是摺疊放置〔六四〕。其摺疊方式尚無報道，但從照片推測，摺疊後的尺寸約爲25×18釐米〔六五〕，似乎是按幅廣的方向上下對摺（即摺痕順經綫），然後再左右對摺（即摺痕順緯綫）。

這裏我們提到的幅廣，是指古代布帛的寬度，從編織技術的角度講，也就是緯綫的長度。古代布帛的長寬經規格化，有所謂「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之説（《漢書・食貨志下》）〔六六〕。帛書裁製，多是利用原來的幅度，上下寬度比較固定，左右長度則隨字數多少，沿幅長即經綫的方向向左沿伸。書寫順序一般是從幅端或臨近幅端的一方開始，沿着緯綫，從上到下，從右到左書寫。它與竹簡制度有明顯的對應性〔六七〕，其幅度相當簡長。出土漢代簡册有長短兩種，長簡約合漢尺二尺四寸，短簡約合漢尺一尺二寸或一尺。馬王堆帛書的整幅帛是二尺帛，半幅帛是一尺帛，與兩種簡長相當。子彈庫帛書和馬王堆帛書都有帶欄格的一種，形式也是模仿簡册的編聯。這種尺度和版面設計，後來都被紙書所沿襲。

過去，梅蕾（Jean Mailey）女士曾推測，子彈庫第一帛書的橫長與漢代的「匹」相近，這點很值得注意。但古代的幅廣是縱寬，她説此書縱寬可能缺損三又二分之一吋，推測原帛爲47×47釐米的正方形〔六八〕，却很勉强。況且巴納也指出，47釐米與漢代的「匹」並不完全吻合〔六九〕。近來研究這一問題，我很懷疑，現在此書的「橫長」其實是縱寬，最後請專家目驗經緯〔七〇〕，果然如此。也就是説，通常按南北方向放置的所謂「橫長」纔是真正的幅廣。此書是旋轉書寫，行款比較複雜（有四個方向），但從幅面的走向來判斷，其邊文的書寫順序是：(1)先在幅面上端自左向右寫春三月（東方）和它左邊的長篇；(2)然後在幅面右端自上向下寫夏三月（南方）；(3)然後在幅面下端自右向左寫秋三月（西方）和它左邊的短篇；(4)最後在幅面的左端自下向上寫冬三月（北方）（圖八）。這樣安排正符合中國傳統先上後下、先右後左的書寫習慣。古代帛書的裁製，上下緣比較固定；左右

緣，右緣是書首，左緣是書尾。若書寫之前右緣並非恰好就是帛端，則應是從另一帛書後裁下，以裁得的一邊爲開端，左緣則是寫完以後，順最後一行裁下。其書寫，從馬王堆帛書看，形式與竹簡類似，往往左右貼邊，而上下略有餘地，相當簡端簡尾的空白（後世紙書稱爲「天頭地脚」）。而此書則把餘地留在下面，情況略有不同。此書幅度，現在衹剩47釐米，但據破損情況修正，應與馬王堆帛書的二尺帛相近，恐怕原來也有48釐米長，要比二尺二寸長的「匹」略小〔案：帛書書寫順序如此，並不妨礙它在閱讀時仍可按南北方向放置，這正像《管子》中的《幼（玄）官（宫）》和《幼（玄）官（宫）圖》兩篇，一述布圖順序，一述讀圖順序，並不一樣，參看拙作《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已收入本書）〕。



圖八 第一件帛書的書寫順序

子彈庫帛書衹有摺疊式，而馬王堆帛書則有摺疊和纏卷兩種，這對古代書籍保存形式的研究很重要。因爲古代書籍的保存形式一直是分兩大類型，一種是手卷式，一種是摺疊式。前者包括竹簡和手卷式的帛書和紙書（案：繪畫中的卷軸和現代的膠卷、録音録像帶也屬這一類型）；後者是帛書更有特色的地方，除摺疊式帛書，還包括用各種方式摺疊裁製的經摺裝、旋風裝、蝴蝶裝、包背裝、綫裝等不同形式的紙書（案：繪畫中的册頁、摺疊式地圖，以及現代用印張裁訂的報紙和書籍也

屬這一類型）。帛書著録多以卷稱，從道理上講，卷是追隨竹書，應當更爲古老。但早期的「卷」到底是什麼樣？是否除通常認爲的卷軸〔七一〕，還有以板爲芯的一種？摺疊式的古書是否也可稱卷？稱卷的話，同纏卷式的古書有什麼對應關係？規格是否有定制？很多問題還值得探討。雖然目前我們還不能確知帛書究竟發明於何時〔七二〕，但這兩批現存最早的帛書却顯示出它們已是相當發達和成熟的帛書，後世書籍的許多特點在它們身上比竹書顯得更爲充分。

四、楚帛書的圖像

現代漢語中有「圖書」一詞，主要指書。但在古代漢語中，「圖書」却是兼指圖畫和書籍。例如漢代的圖書目録《别録》、《七略》和《漢書·藝文志》就是兼收圖、書。當時的書主要是用竹簡書寫（取材易而造價廉），多以篇或卷稱，但圖則率以卷計。特别是當時的實用書籍，如數術方技之書和兵書，更是往往附圖，可以説明「圖」、「書」有密切關係。

現已出土的簡帛書籍，竹簡一般祇有文字没有圖書，因爲竹簡是一條一條的，畫圖不太方便，效果也不好。但個别竹簡情况也有例外。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就附有《艮山圖》、《視羅圖》、《人字圖》、《置室門圖》，乙種也附有類似的《視羅圖》〔七三〕。另外，古人也常以木方繪製地圖（如放馬灘秦地圖）〔七四〕，稱爲「版圖」〔七五〕。這些圖都是用簡單的墨綫勾勒，從藝術效果講，根本無法同帛書相比。當時的圖主要還是畫在帛上。

現在出土的帛畫，像陳家大山、子彈庫、馬王堆、金雀山所出那種圖繪墓主形象，覆於棺椁或張於墓壁者都是葬儀用具（詳下第六節），和一般帛書明顯有别（所用帛幅的尺寸也完全是另一套），但馬王堆出土發現於漆盒中的那些既有圖畫又有文字的絲織品，現在則被統稱爲「馬王堆帛書」〔七六〕。其實嚴格講，它們是「馬王堆圖書」。

「馬王堆圖書」包括許多色彩豐富、綫條生動的圖畫，這不僅對書史的研究很重要，而且對理解

「書畫同源」的中國繪畫傳統也很有啓發。它包括五種形式：

(1) 純粹的圖，完全没有文字。如《城邑圖》（或題《園寢圖》）和《卦象圖》（或題《符録》）〔七七〕。

(2) 純粹的書，完全没有圖畫。如《老子》、《春秋事語》、《戰國縱横家書》和《周易》〔七八〕。

(3) 圖是插圖，主體是文字。如《養生方》結尾所附的《牝户圖》（案：原無題，此名是筆者補加）、《胎産書》所附《人字圖》和《禹藏圖》〔七九〕。

(4) 文爲圖注，主體是圖畫。如《導引圖》、《地形圖》和《駐軍圖》〔八〇〕。

(5) 圖文互注，難分主次。如《避兵圖》（原題《社神圖》）、《喪制圖》（或題《喪服圖》）、《陰陽五行》、《刑德》和《天文氣象雜占》〔八一〕。

同馬王堆帛書相似，子彈庫帛書也有圖。這裏面，除第一帛書有圖，上面所説硃欄墨書的一種也有圖。至於林巳奈夫所摹的「第二帛書」〔八二〕，在文字當中夾着一隻鳥，因印痕模糊，還不能肯定是不是可靠。這裏我們衹著重談一下第一帛書的圖像含義。

第一帛書的圖像含義是什麽，久爲學者關心。過去中國的神話學是以《山海經》爲主要史料，研究帛書圖像，大家馬上想到的就是《山海經》〔八三〕。《山海經》這本書當然很重要，比如殷墟卜辭中的「四方風」就可從中得到印證〔八四〕。但麻煩的是，它的系統非常複雜。如果系統不明，僅憑描述想象，隨便對號入座，那是很危險的。關於第一帛書的十二神，我一直有個看法，就是對比一定要有系統〔八五〕。你講十二神就得拿出十二個神來，不能對上一個，其他不管。所以我想從圖像的整體來解釋它的含義。

下面講一下我的理解：

（一）楚帛書的圖像與文字是相互説明的。

此書從蔡氏以來多稱爲書，但早期也有學者視爲圖畫〔八六〕，其實兩種看法並無矛盾。因爲上

已説明，古代的書、畫可以是結合在一起的。特别是按「馬王堆圖書」的分類，我以爲它是屬於最後一種，即文、圖結合比較緊密，難以分出主次的一類。它的圖像是按四方八位和十二度而劃分，代表歲、時、月、日的陰陽消長；文字是講順令知歲，四時之產生，以及各月的宜忌（詳下節），二者是相互説明的關係。特别是它的文字，邊文不僅是圖注，還按順時針方向排列，代表斗建（斗行左旋），與帛書四木皆按逆時針方向排列，代表歲徙（歲行右旋）形成對照；中心的兩篇文字處於北斗、太一所在的位置，顛倒書寫，也是象其陰陽順逆、轉位加臨，本身也是圖的組成部分。故稱圖稱書皆無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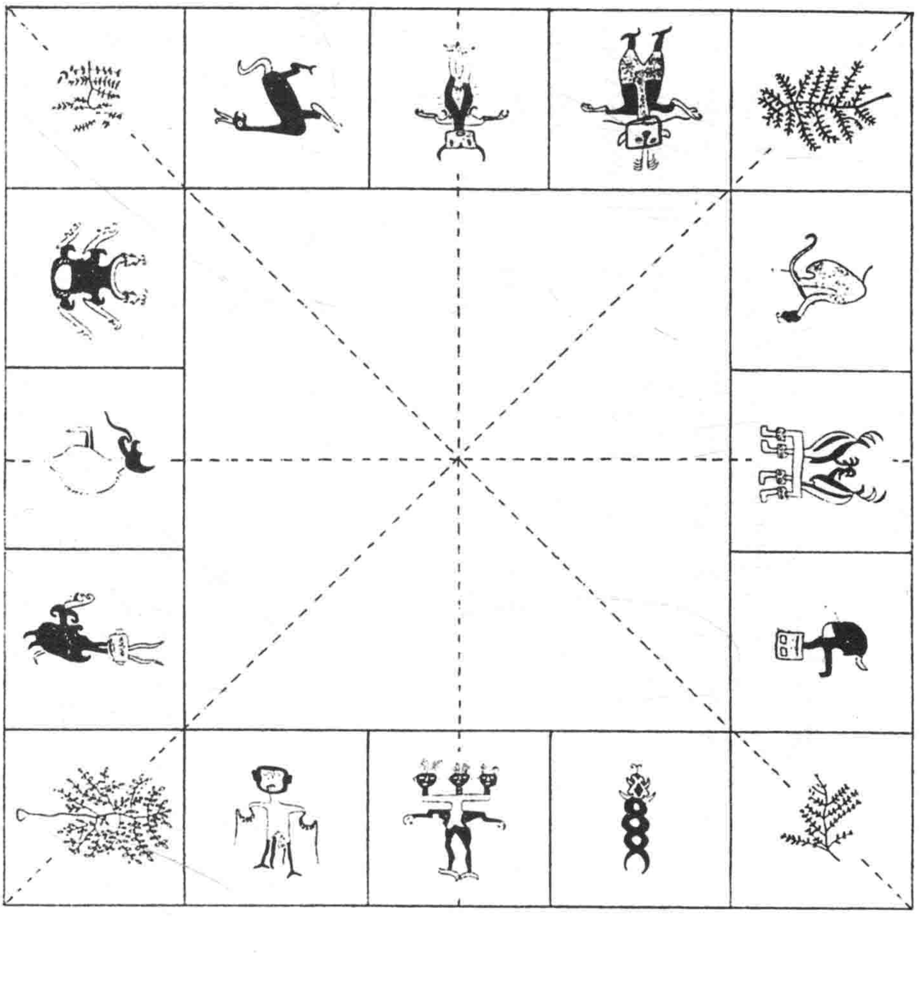
（二）楚帛書的圖式是來源於式的圖式。

研究楚帛書，過去我們不摸門徑，衹是模模糊糊覺得它與天文好像有點關係〔八七〕，以後仔細研究，纔漸漸弄清它主要是與古代流行的一種占卜工具即式直接有關。對式，近來我有專文論述，可以參看〔八八〕，這裏衹講一下楚帛書與式的關係。

案：式的設計是模仿蓋天式的宇宙模式。這種模擬是來源於星象觀察和曆術推步，但用於占卜，形式被簡化、抽象化和固定下來。它有天、地二盤（或天、地、人三盤），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形式類似鐘表。據出土實例和文獻記載，我們把古代的式分爲兩大類型：一種是「表盤」四分再八分，加上中點（有綫形和塊狀兩種表示法），共九位（九宫圖），標九神、十六神於各位；一種是「表盤」四分、八分再十二分，共十二位（十二度），標十二神於各位（圖九）。它們的「指針」也不同，九宫類的一種是以太一或招摇（斗樞）爲「指針」，而十二位的一種是以北斗爲「指針」。前者屬於太乙、遁甲、九宫等類的式，而後者則是六壬式的特點。另外，這種式還是「宇宙鐘」，它的「表針」旋轉不僅代表一日之内的時辰循環，還代表四時十二月和流年的循環，年、月、日、時有着類似的劃分。《禹藏圖》把它表現爲「大鐘」套「小鐘」的形式。

楚帛書以三個神物爲一組分居四方，分别代表四時的孟、仲、季月，古人把仲月所在叫「四正」。

帛書四方的夾角還有青、赤、白、黑四木，是代表天地四維，古人叫「四隅」。二者合成「八位」。而帛書的十二神按斗行方嚮排列，則代表「十二位」。這都與式的圖式安排十分相似。帛書中間没畫太一、北斗，但兩篇文字一正一反，正是象征「太一行九宫」（太一居中，由天一代行九宫）或「斗建十二月」（斗柄依次順指十二月）。古代宇宙理論把天庭分爲整齊的區位，總是將太一或北斗安排在宇宙中心，認爲其指向可以决定吉凶。例如湖北荆門漳河車橋出土的「兵避太歲」戈和馬王堆帛書《避兵圖》〔八九〕，其圖像表現的就是《史記·封禪書》記載的「太一鋒」。「太一鋒」是由四顆星組成的星座（見《史記·天官書》、《漢書·郊祀志》晋灼注），即太一星在中間爲樞（圖中作戎裝鶡冠、「大」字狀人形），前面有三顆星即天一（即太歲）圍着它旋轉（圖中作三條龍）。古人把太一和天一組成的星座比作一把以



圖九　楚帛書的圖像安排

「太一三星」即天一爲鋒的寶劍，認爲太一之鋒所指者兵敗，故漢武帝伐南越，繪其圖形於軍旗，號曰「靈旗」(《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另外，太一居於中宮，這個位置是土位。而古代的北斗，不僅出土漢代六壬式照例都在天盤中心畫有北斗，作爲戰國時期的實例也有曾侯乙墓出土漆箱蓋上的圖畫[九〇]。此圖四周爲二十八宿，中心爲北斗，與式相似。不僅如此，它的北斗是由土、斗二字構成，也合於雙古堆漢墓出土六壬式於地門位置書寫的「土斗戌」(斗亦居土位)。兩者都是處於衆星所拱的地位。

古代數術，凡屬時日選擇或曆忌、月令性質的古書都與式法有密切關係，《漢志・數術略》的五行類就是屬於這一類古書。出土發現，像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刑德》都附有相關的式類圖式。正在揭開的子彈庫帛書，其中硃欄墨書的殘片也有這類圖式，可見這是一種有規律的現象。

總之，從各方面看，第一帛書的圖式來源於式，這點是沒有問題的。

(三) 楚帛書的十二神應與式的配神和演禽有關。

楚帛書的十二神是十二月之神。這十二月的名稱即《爾雅・釋天》的十二月名[九一]。現在既然我們已經指出楚帛書的圖式是屬於式的圖式，那麼從式法的角度想問題，我們會很自然地想到，它與六壬式的十二神有些相似[九二]。例如雙古堆漢墓出土的六壬式就是以正月到十二月的月名表示式神的轉位加臨[九三]。《漢志・數術略》五行類也有《轉位十二神》一書。古代六壬式的配神分兩套，一套是徵明、神后、大吉、功曹、太沖、天剛、太乙、勝先、小吉、傳送、從魁、魁(從亥到子)，一套是玄武、天后、太乙、青龍、六合、勾陳、螣蛇、朱雀、太常、白虎、太陰、天空(從亥到子)(《五行大義・論諸神》和《景祐六壬神定經・釋天官》)。另外，與此相似，放馬灘秦簡和睡虎地秦簡中的《日書》還有好幾套建除十二客或叢辰十二客[九四]，名稱各不相同。可見古人表示十二辰位的名稱有很多種，我們不知道的名稱可能還有許多。

上面我們說過，式的圖式分爲兩大類型，一種是以太一爲「指針」，一種是以北斗爲「指針」。

六壬式的兩種十二神有不少名稱都是取自天象，如第一種的魁是斗魁一星，從魁是斗魁二、四星，傳送是斗魁三星，天剛是斗勺七星，太冲是斗勺五、六星，這些是取自北斗七星；太乙則是天一的別名。而第二種的太乙、青龍、太陰也是天一的別名（青龍應即天一三龍中的青龍），其他各星也多在太一、北斗附近。青龍、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並主二十八宿。其他種類的式，也都有許多複雜的配神。

與式的配神有關，有一個問題很值得注意，這就是古代式法與演禽的關係。中國古代的演禽和西方的占星術（Astrology）有些相似，也是以星象與動物相配，測算年命。其比較簡單的一種是「十二屬相」或「十二生肖」，現在仍廣爲人知，即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辰位配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鷄、狗、猪十二種動物。而另一種是在前者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包括三十六種動物，叫「三十六禽」。過去人們對演禽的追溯，講十二生肖衹能追溯到東漢（見於蔡邕《月令章句》）；講三十六禽，文獻記載也主要是唐以來，有人甚至懷疑它是從印度來的（參看《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演禽通纂》提要）。但隨着有關考古發現的增多，現在我們知道，不但十二生肖的年代可以早到戰國末年，而且三十六禽的年代也要大大提前。如放馬灘秦簡和睡虎地秦簡《日書》講抓强盜，其中有以日辰卜盜名一法，所述不僅有十二生肖，而且有許多十二生肖以外的動物，即使十二生肖也與後世有差異[九五]。

據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五《論三十六禽》引《春秋運斗樞》，十二生肖全部都是由斗星散出，即天樞（斗魁一星）變龍、馬，天璇（斗魁二星）變虎，天璣（斗魁三星）變狗，天權（斗魁四星）變蛇，玉衡（斗勺五星）變鷄、兔、鼠，開陽（斗勺六星）變羊、牛，搖光（斗勺七星）變猴、猪。並且從出土的秦簡《日書》看，古代屬相還可按複雜的衝破關係互相換位，有「指鹿爲馬」一類現象。古代的三十六禽，出土六朝銅式和隋唐文獻的記載也頗有差異[九六]。禽星相配，似乎有多種可能。

與這種可能安排有關，值得注意的是，帛書十二神往往是以動物（包括人）的誇張變形來表現。

如正月爲鼠（？）的變形，二月爲某種鳥的變形（四頭），三月是犬（？）的變形，四月是蛇的變形（雙尾），五月是人的變形（三首），六月是猴的變形，七月是鹿（？）的變形，八月是豕（？）的變形，九月是龍或黿的變形（雙頭），十月是鷄（？）的變形，十一月是牛（水牛）的變形（作人身站立），十二月是人的變形。這些動物，很多都屬於十二生肖之內。據蕭吉解釋，十二生肖的辰位很多都是按生肖生月的對衝來安排。這種生肖生月見於《淮南子·墬形》、《大戴禮·易本命》和《孔子家語·執轡》等書，其中還包括人的生月和今十二生肖以外的動物（如鹿）。而且睡虎地秦簡《日書》也有用鹿代替馬的實例〔九七〕，説明古代的禽辰相配也有多種可能。從這些迹象，我們推測，帛書十二神的圖像可能是楚地流行的一種演禽系統。

（四）帛書四木是代表四維和太一所行。

帛書四維是以青、赤、白、黑四木表現。它和模仿式的博局鏡常常是以花瓣或草葉來表現有相似性，但又不太一樣。後者一般都位於四角的平分綫上，瓣葉的尖端兩兩相對，和式的地盤上的四維完全一致〔九八〕。而帛書四木，其每棵樹的樹冠都是朝向它右邊的一棵樹，作右旋排列。中國古代天文學講究斗建左行，太一右行，它所表現的應是太一右行，和帛書各月題記作左旋排列正好相反。

帛書的設計從圖畫到書法都非常講究。它的文字經復原，每一「塊」都行款整齊，除最後一行，容字皆相同。圖文相配也巧具心思，沒有事先的周密考慮是不可想象的。

五、楚帛書的文字

這裏我們主要談一下第一帛書和第一帛書上的印痕。

（一）第一帛書。

過去學者對這一帛書的討論很多。僅據粗略統計，到目前爲止，已經發表的論著就有將近七

十種。帛書的研究歷久不衰，究其原因，一是帛書複製本從蔡氏摹本到弗利爾美術館的照片到巴納監製的紅外綫照片不斷改進，二是人們對楚文字的認識從四五十年代的篳路藍縷到六七十年代的初成體系到八十年代的臻於成熟，也是不斷提高。但即使到今天，帛書的研究也還遠没有山窮水盡，值得討論的東西仍然很多。特别是對内容的理解，也許還衹是剛剛開始。

現在討論帛書，國内學者的關注點主要是文字。由於國内出土楚簡日漸增多，如天星觀、包山、石板村所出〔九九〕，都是文字數量很大的材料，一出就能解決一大批字。我們可以估計，很多楚帛書中的難字都會因此有新的突破〔一〇〇〕。另外，除去文字本身，我覺得行款的問題也很重要。因爲衹有對行款估計正確，纔能對缺字有正確估計，並直接影響到斷讀和理解。在這方面，我覺得巴納發明的網格處理是個不小的貢獻〔一〇一〕。其不足在於中間較短的一篇，最後三行也應補字對齊，邊文的個别地方裝裱時有扭曲或誤植，也可略做修正〔一〇二〕。特别是還有一點也應指出，即一九八七年賽克勒美術館對帛書做去霉處理後又拍了一幅新的照片。這一照片在去霉後的部分又有一些新字顯現，一九九〇年我已對這些新發現的字，根據目驗原物做了簡短介紹〔一〇三〕。楚帛書的文字，經學者多年研究已可大致通讀，下面把近來我對帛書文字内容的理解介紹一下：

（甲）中間的長篇。

重點是講順令知歲的重要性。其中第一章是説月行固有度數，如果遲速失當，就會造成春夏秋冬節令反常，日月星辰運行混亂，以至造成各種凶咎，如草木無常（違反原有的生長周期），天棓星（一種灾星）降灾於下，山陵崩墮，泉水上湧，雷鳴電閃，下霜雨土，兵禍四起。第二章是講歲有「德慝」，天有賞罰。民人知歲，天則降福；民人不知歲，天則降禍。第三章是講民人應對天地山川諸神虔誠恭敬，以時奉享。如果民人不知歲，祭祀不周，天帝就會降以上述凶咎，使農事不順。全篇内容是圍繞着「歲」。

（乙）中間的短篇。

主要是講「四時」產生的神話。第一章是講最原始的「四時」，即遠古時代，未有日月，全靠包戲（伏犧）和女填（虞遲□子之子）所生的四子即「四神」分守四方，互相換位，用步行來表示「四時」。第二章是講經過「千有百歲」，日月終於產生，但天不寧，地不平，炎帝乃命祝融率「四神」奠定「三天」和「四極」，恢復宇宙的和諧，從此纔有了用日月之行表示的「四時」。第三章是講「共工夸步十日四時」，從此除一年分爲「四時」，還有了一日之內的「四時」，即宵、朝、晝、夕。全篇內容是圍繞着「四時」（案：此章所述「四神」應即《堯典》所述羲和四子。它屬於數術家講曆術推步的源流，而非楚人述其祖先傳說）。

（丙）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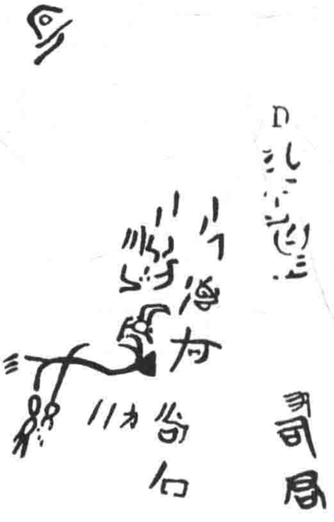
內容是講各月的舉事宜忌。如正月（「取」月）忌壬子、丙子日，忌作事（？）和北向征伐；二月（「女」月）可以出師征伐和修築城邑，不可嫁女和買進臣妾（奴隸）。全篇內容是圍繞着「月」。

「歲」、「時」（四時）、「月」三者在書中是一個整體。

（二）第一帛書上的印痕。

這一印痕，祇有早期弗利爾美術館拍攝的照片比較清楚，現在從紅外綫照片反而看不清，原物也祇有模糊不清的紅斑。過去林巳奈夫據早期照片做過摹本（圖一〇），上面祇有「司君」和「絲」字可辨，難以推測其內容。最近李學勤先生寫了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這件「第二帛書」[一〇四]。因爲影響比較大，應當說明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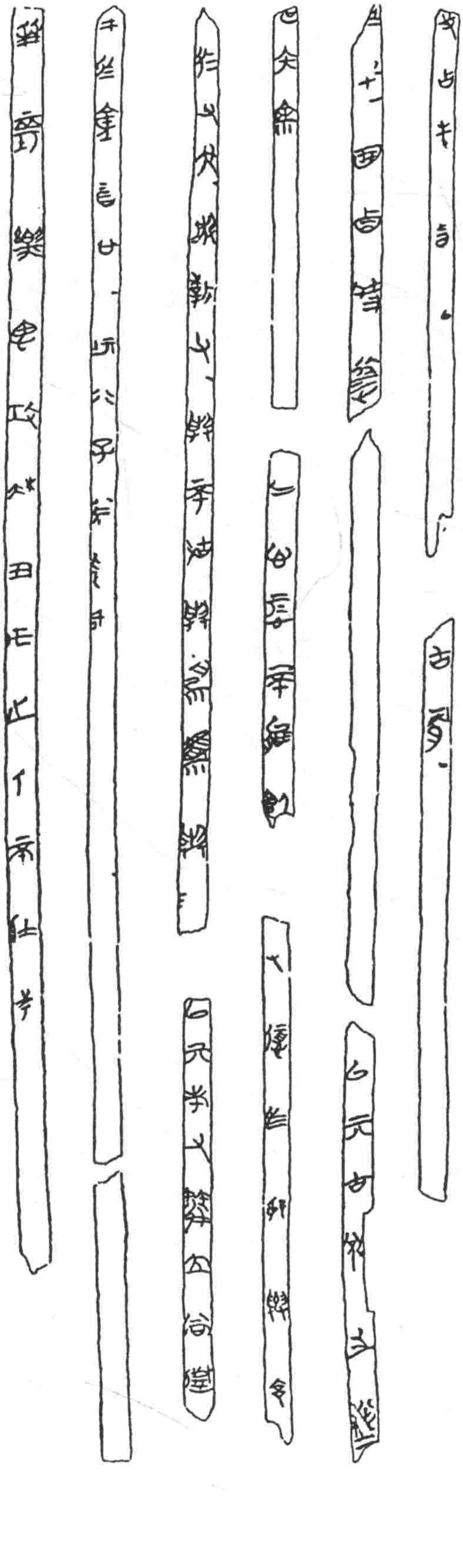
李先生對帛書研究有很多貢獻，又是我學古文字的老師，對他的意見，我一向特別尊重。他給「第二帛書」寫了個釋文，認爲這一帛書與楚占卜竹簡相似，應是占卜後記在絲帛上的卜辭。此點如能落實，當然非常重要。一九九〇年四月，我們一



圖一〇　林巳奈夫摹「第二帛書」

起在華盛頓開會，李先生曾問蘇芳淑博士還能不能找到「第二帛書」的原物，回答是没有。七月，我到華盛頓看弗利爾美術館照片的底版，覺得怎麼也讀不出他所講的那些内容。後來，《中國考古學年鑒》約我寫稿〔一〇五〕，涉及這篇文章，我簡直没法下筆。打電話給李先生，他客氣地説衹是推測，我也不好意思再問，交差時衹好説看不出。當時我還以爲我的眼睛有問題。

這次到美國來，我又重讀了巴納的大作。有一天終於恍然大悟：原來李先生根據的並不是上述照片摹本，而是巴納一九七一年書第十三頁圖4：5的示意圖〔一〇六〕。這個圖，經我查對，實際上是以《文物》一九六六年第五期第五十一頁圖三二發表的望山一號墓出土占卜簡的文字（圖一一）爲主，加上原書的「司君」和「絲」三字，以及從第一帛書中挑出的幾個字拼湊而成（圖一二）。由



圖一一　望山一號墓出土楚占卜簡的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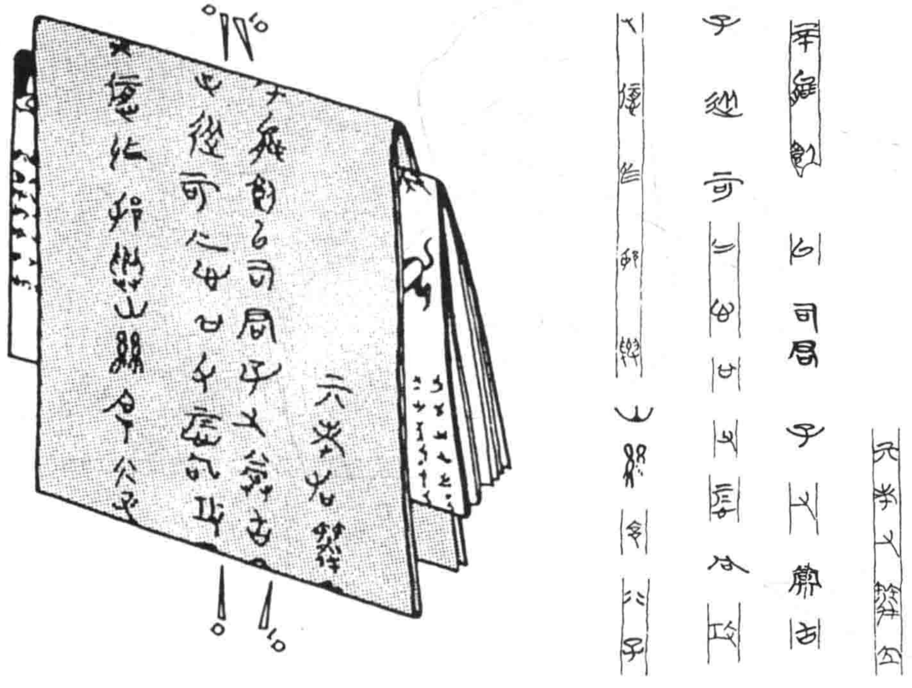
於巴納認爲帛書印痕有正、反二體，還特意把其中的兩個「子」字寫成反字。他這個圖與照片和摹本相去千里，但没有作必要的交代和說明，以致李先生上當不淺。現在我們既然明白它是怎麼做出來的，當然也就不難理解爲什麽李先生會說它和楚占卜簡十分相像了〔一〇七〕。

這裏提到巴納書中的復原圖，我還想順便說兩句。他把帛書的摺疊方式想象成文字朝外摺疊，並且推測第一帛書是夾在第二帛書內，這點恐怕缺乏根據，因爲馬王堆帛書都是文字朝内對摺，往往留有反印文，然而這一印痕，可以辨認的字都是正印文，是不是有反印文難以肯定。

如是反印文，當是貼印；正印文，則是滲印。兩者都得貼得比較近纔行。像示意圖上那樣文字在最外一層，隔着一厚疊，這是不太對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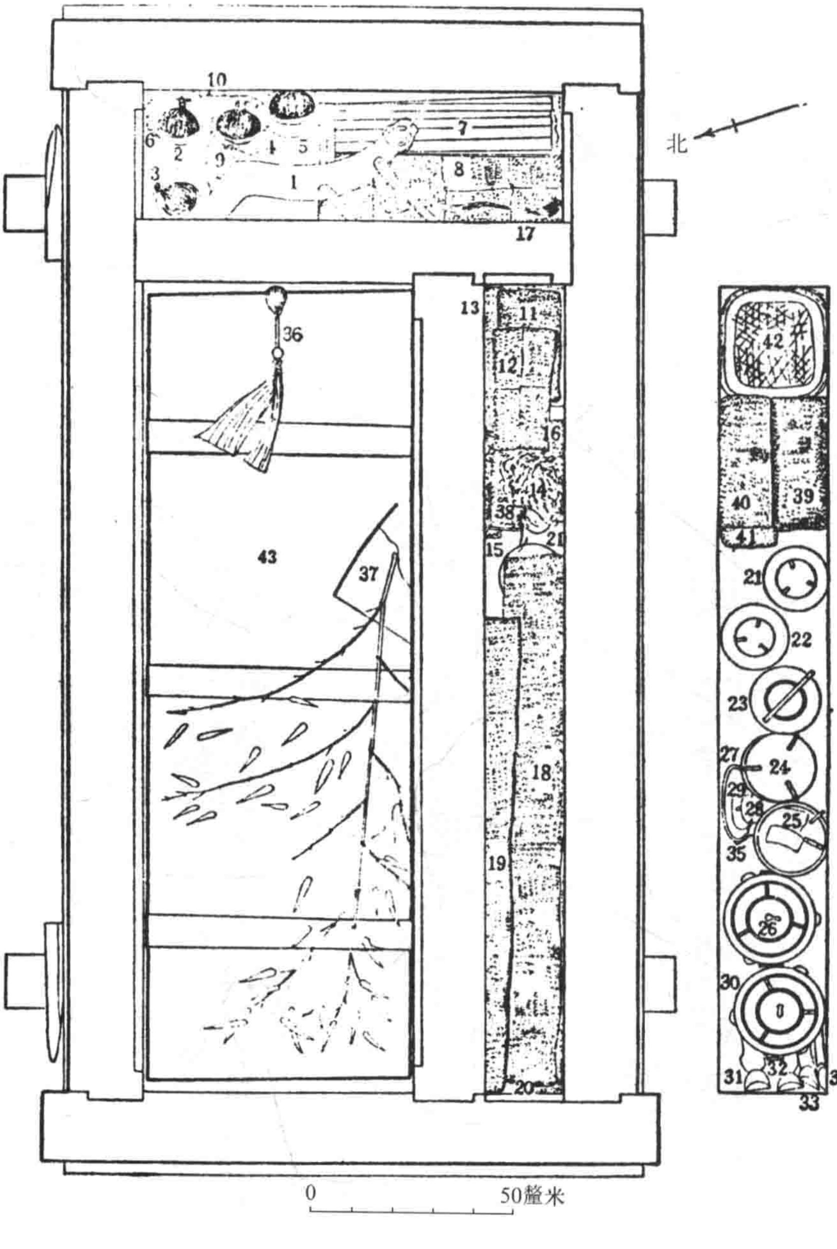
六、附論：子彈庫帛畫

上文講到子彈庫楚墓除出土了一批帛書外，一九七三年重掘此墓，還發現了一件珍貴的帛畫（圖一三）。類似這件帛畫，過去還有蔡季襄舊藏的一件長沙陳家大山出土的帛畫〔一〇八〕，也很出名。因爲這是



圖一二　巴納復原圖的還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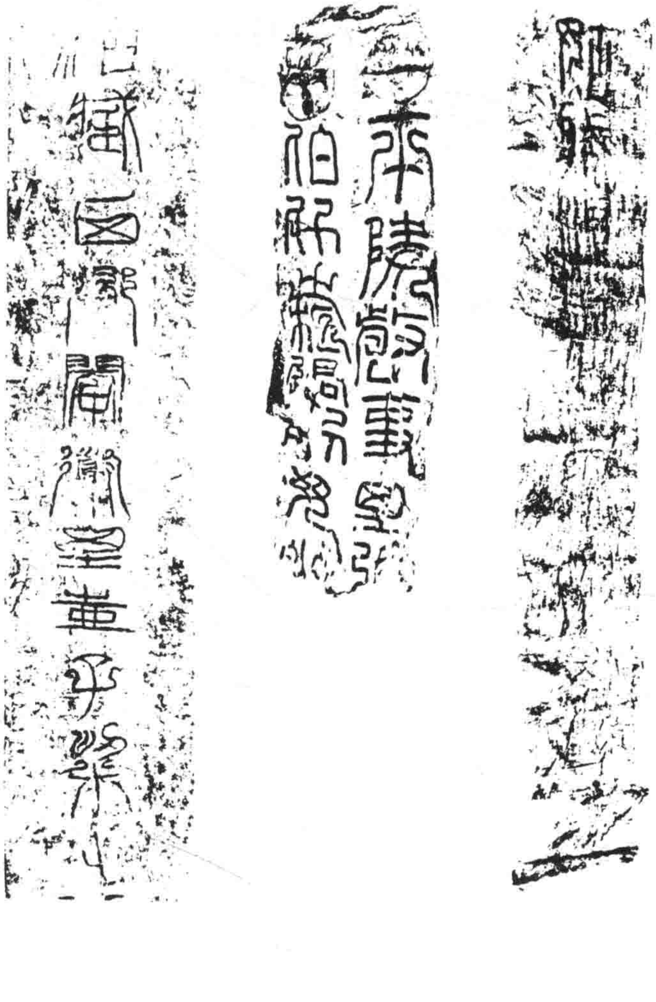
圖一三　子彈庫帛畫摹本



圖一四 放在棺蓋上的馬山帛畫

僅有的戰國帛畫，美術史的研究者都很重視，中國的郵電部還發行了印有這兩件帛畫的郵票。另外，近年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也發現過一幅帛畫（圖一四）〔一〇九〕。因殘損嚴重，圖像不清，注意的人比較少。

子彈庫帛畫出土時是平放於椁蓋板和下面的隔板之間。陳家大山帛畫，一說是出土於陶敦内〔一一〇〕，一說是出土於竹笥内〔一一一〕，不一定可靠。而馬山帛畫則是發現於内棺的蓋上〔一一二〕。其形式一般作長方形（但馬山帛畫殘），並有上竿和懸繩（但陳家大山帛畫失之），所繪人物，推測皆墓主形象。類似的晚期例子，還有馬王堆一號、三號漢墓和金雀山九號漢墓發現的T形帛畫〔一一三〕。漢代的這類帛畫，皆發現於内棺蓋上，位置同馬山帛畫，也有上竿和懸繩，也是墓主「肖象」，但畫幅作T形長幡，「焦距」不同，墓主縮小，背景增大，更適於表現其登假的過程。另外，馬王堆三號墓除這種外，還出有一種張挂於墓室東西兩壁的帛畫，内容是表現宴享遊樂〔一一四〕。漢代的T形帛畫，學者多以爲即古書中的「銘旌」。但古書中的「銘旌」，嚴格講，應像一九五九年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所出，是書有墓主之名的那種（圖一五）〔一一五〕。這類「銘旌」，形



圖一五　武威銘旌

式亦作長幡(但非T形)，有的還在幅端畫有類似的日月之象，是其沿襲之迹，但它的重要不同點是以死者之名代替了他(或她)的「肖像」，在功能上更接近碑碣墓志。而前者既然陳於棺椁頂部，又伴以椁壁所張的其他帛畫，則使我們聯想到後世洞室墓的壁畫設計。

中國古代的洞室墓沿續甚久，設計變化差異很大，但有些基本考慮總是蘊含其中。如以圓隆的穹頂象天，四方的墓壁象地，往往圖繪天文星象於穹頂，並畫四季宴享遊樂之景於四壁。有時還在墓室四壁或墓志蓋上飾以十二生肖，或以生肖俑或生肖鏡等物隨葬(案：漢代許多銅鏡是模仿式，也有類似的意義)。其設計都和古代式法以及與式法有關的數術有關。這類墓起源於何時，現在還不清楚。過去照文獻記載，秦始皇的陵墓就是「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洞室墓(《史記·秦始皇本紀》)。但此墓尚未發掘，還無法證實。現在年代比較早的一個例子是新近在西安交通大學發掘的西漢壁畫墓〔一一六〕。這一壁畫墓，在穹頂畫有一個圓圈，沿圓圈一周是用人物和動物等形象表現的二十八宿，如蒼龍七宿作一長龍，角宿即龍角，尾宿即龍尾，七宿全在龍身之上；牛宿作人牽牛，箕宿作人持箕。圓圈當中是左日右月。日中有金烏，月中有玉兔、蟾蜍，畫法與上述T形帛畫酷爲相似。

子彈庫楚墓是個衹出陶器，不出銅禮器(銅器衹有戈、矛、劍)，規格不高的楚墓，但墓中出土的帛書、帛畫却是數一數二。它出的帛書，多與選擇、曆忌一類內容有關，可以視爲秦漢墓葬隨葬日書之風的嚆矢。同樣，子彈庫帛畫和秦漢時期的帛畫也有聯繫。這些帛書、帛畫有類似的知識背景和思想主題，在葬俗方面都有開啓風氣之先的重要意義。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寫於美國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改定於北京薊門里寓所

補記：八月十二日，陳松長先生又從長沙寄來重要材料，包括蔡季襄所述帛書流美的具體經過，以及吴柱存爲蔡、柯傳遞消息的信件。據蔡説，帛書入美是由柯强夥同上海古董商設下圈套，僞稱借去照相，不日即還，然第三天却擅自托人携往美國。不得已，他纔簽約，托柯代售。而吴的追憶與信相核，也略有出入。由於這一故事細節很多，衹能將來另文介紹。

注　釋

〔一〕現在中國設有考古系的大學已經很多。

〔二〕祁延霈《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銅器調查記》，《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册，一六七—一六八頁。

〔三〕盧連成、胡智生《寶鷄强國墓地》，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四〕《美帝掠奪我國文物罪行一斑》，《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〇年十一期，六十—六十四頁；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下簡稱「商承祚文」），《文物》一九六四年九期，八—二十頁。

〔五〕金式《繒書，得而復失的國寶》，《湖南日報》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三版。

〔六〕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子彈庫戰國木椁墓》（下簡稱「簡報」），《文物》一九七四年二期，三十六—四十頁；商承祚文；以及下文所述調查。案：湖南考古學家和商承祚的説法都是來源於盗墓者和蔡季襄。盗墓者説見簡報附録，蔡説見下所述蔡氏致商氏信。

〔七〕梅原末治《近時出現の戰國資料》，下中彌三郎《書道全集》（平凡社一九五四年）卷一，三十二—三十七頁；T. H. Tsien（錢存訓），*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下簡稱「錢書」），p. 122；Noel Barnard，*The Chu Silk Manuscript —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nberra 1973（下簡稱「巴納書（一九七三）」），pp. 1－4.

〔八〕巴納書（一九七三）第一頁。目前作者仍堅信此説（見他三月七日致筆者信）。

〔九〕見簡報的附録（第四十頁）。

〔一〇〕見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石印本，一九四五年；又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二年重印本，下簡作「蔡書」），繒書考證

第一頁。

〔一一〕見巴納書(一九七三),第三頁。

〔一二〕見簡報(第三十六頁)。

〔一三〕蔡書說「墓位於長沙東郊之杜家坡」(繒書考證第一頁),商承祚文據盜墓者說正爲「子彈庫的紙源冲(又名王家祖山)」(第八頁)。

〔一四〕見湖南省博物館《新發現的長沙戰國楚墓帛畫》(《文物》一九七三年七期,三—四頁)和《長沙楚墓帛畫》(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又《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一(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圖五一。

〔一五〕見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一—十頁。下簡稱「《子彈庫》」。

〔一六〕《美帝掠奪我國文物罪行一斑》說蔡是把帛書「賣給了」柯強,不確,實際上是托賣。

〔一七〕蔣玄佁《長沙》第二卷(上海今古出版社一九五〇年)和《美帝掠奪我國文物罪行一斑》都提到這一收據。

〔一八〕見《子彈庫》第八頁。

〔一九〕Reuben Holdden, *Yale-in-China, the Mainland, 1901-1950*, New Haven, Yale-in-China Association Inc., 1964.

〔二〇〕John H. Cox, 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ntiquities from Changsha, Lent by John Hadley Cox (March 26 - May 7, 1939), Gallery of Fine Arts,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39.

〔二一〕見巴納書(一九七三),第四頁。目前作者已放棄此說(見他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致筆者的信)。

〔二二〕《文物》一九九二年十一期,三十二—三十九頁:商志醰《記商承祚教授藏長沙子彈庫楚國殘帛書》,饒宗頤《長沙子彈庫殘帛文字小記》,李學勤《試論長沙子彈庫楚帛書殘片》。又商志醰《商承祚教授藏長沙子彈庫楚帛書殘片》,《文物天地》一九九二年六期,二十九—三十頁。

〔二三〕商承祚文也說帛書是從上海流美。此信年代見注〔二二〕引商志醰文,內容則承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先生告。

〔二四〕蒙羅覃先生示柯强一九九三年四月三十日寫給他的信。

〔二五〕關於雅禮中學的校史,可參看《蘭林》(湘鄂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三七年)和雅禮校友會編《雅禮中學建校八十周年紀念册》(非賣品,一九八六年)。

〔二六〕見蔡書。

〔二七〕一九九三年四月三十日柯强致羅覃信説，他是在與蔡季襄會面後纔得到蔡書，並以若干本寄送弗利爾美術館、大都會博物館等單位。

〔二八〕其第一封信的年數「49」寫的如同「45」，但從内容看應與下一封信是同一年的同一月，前後衹差三天。

〔二九〕見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柯强信。

〔三〇〕見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柯强信和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九日、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普瑞斯特信和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和十三日柯强提取帛書的文件。

〔三一〕見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普瑞斯特信。

〔三二〕見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柯强信。關於弗利爾美術館的照片攝於何時，目前從該館檔案查不到。賽克勒美術館新獲柯强所藏早期玻璃版幻燈片中有一套帛書照片，似乎與此是同一套照片。

〔三三〕見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柯强信。

〔三四〕Paul Singer,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prepared for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r. Arthur M. Sackler, 1987.

〔三五〕美國收藏家重「皮毛」而輕文字，所以帛書老是賣不動。據辛格説，戴氏購入柯氏所藏(存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所有文物)轉售賽氏，本想匿此不出，被他偶然發現，打電話給賽氏，説「哪怕把你的藏品全都扔進哈得遜河，得此一物亦已足矣」，此物纔爲賽氏所得。

〔三六〕辛格在文中曾預言，楚帛書也許會在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藝術博物館開放之際歸還中國，並説「我肯定他的願望會實現，並且也許這個老頭將會親臨該地一睹盛況」。又*Studio* Vol. 200, Supplement 1, 1987 (Dr. Arthur M. Sackler Special Issue)刊載了兩篇文章：(1) Lois Katz,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p. 36–61)；(2) Miranda McClintic,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t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pp. 70–76)，他們也都提到了賽氏生前的這一願望。

〔三七〕他們解放後都在湖南省博物館工作。

〔三八〕他的學生總是懷着敬意談起這位啓發引導過他們的老師。但王宗石説長沙的雅禮同學寫信給他，他從不回信。我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寫信給他，亦無回信。

〔三九〕見蔡書繒書考證第一頁，商承祚文(第九頁)。

〔四〇〕林巳奈夫《長沙出土戰國帛書考》，《東方學報》三十六卷(一九六四)(下簡稱「林巳奈夫文」)，五十三—九十七頁；Noel Barnard, *Scientific Examination of an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 as a Prelude to Deciphermen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cal Assessmen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71〔下簡稱「巴納書」(一九七一)〕，pp. 11—12；李學勤《長沙子彈庫第二帛書探要》，《江漢考古》一九九〇年第一期，五十八—六十一頁(又收入其新著《周易經傳溯源》，長春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九七—二〇三頁)。

〔四一〕這些殘帛，衹有最大的一片被找出，重新用紅外綫照片拍攝，其他衹有一九六四年文物出版社史敬如拍的黑白照片。

〔四二〕這一工作正由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紡織品研究專家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進行。據她檢驗，這批新獲帛書也像第一帛書一樣，都是絹質，並沿緯綫書寫。

〔四三〕承弗利爾美術館實驗室的温特(John Winter)博士告，經檢驗，硃書是用硃砂書寫。

〔四四〕商承祚文説帛書初歸唐氏，後歸蔡氏，但文中引沈筠蒼信提到的唐氏所藏皆殘片，並非完整的那件。商氏藏帛是出自徐氏，徐氏又得自蔡氏，他們和唐氏所藏是何關係，尚不清楚。

〔四五〕見錢書。

〔四六〕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册制度》，收入《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五十三—五十七頁。

〔四七〕包括種類，見曉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九期，四〇—四四頁)和李學勤《記在美國舉行的馬王堆帛書工作會議》(《文物》一九七九年十一期，七十一—七十三頁)。已公布的正式整理本是《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叁〕、〔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一九八三、一九八五年)。

〔四八〕馬王堆帛書中之年代較早者在秦漢之際，即公元前二二一年左右，下限不晚於墓葬年代，即公元前一六八年。

〔四九〕簡報定墓葬年代爲戰國中晚期之交，參照年代相近的楚墓，應在公元前三〇〇年左右。

〔五〇〕見蔡書圖版第三頁和繒書考證第十七頁。

〔五一〕見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四年七期，三十九—四十八頁)圖版七：一。

〔五二〕見商承祚文(第九頁)。

〔五三〕見簡報附録(第四十頁)。

〔五四〕陳夢家《戰國楚帛書考》，《考古學報》一九八四年二期，一三七頁。下簡稱「陳夢家文」。

〔五五〕承湖南省博物館陳松長先生告。

〔五六〕見蔡書繒書考證第一頁。

〔五七〕見商承祚文（第九頁）。

〔五八〕見陳夢家文一三七頁。

〔五九〕見巴納書（一九七二）第十一頁。

〔六〇〕見巴納書（一九七二）第十一頁。

〔六一〕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一日和二十四日由諾曼（Jane Norman）女士測量。

〔六二〕見巴納書（一九七二）第十一頁。

〔六三〕承巴拉德女士告。

〔六四〕見曉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第四十頁）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館寫作小組《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的主要收穫》（《考古》一九七五年一期，四十七—五十七轉六十一頁）。其已公布的詳細數據則見《馬王堆漢墓帛書》各册及《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案敦煌紙卷的古紙也有二尺和一尺兩種，見錢書一五三—一五五頁。

〔六五〕帛書摺疊後的長度約爲二十五釐米，可以從兩點估計，一是帛書對摺後的長度約爲二十五釐米（案：帛書尺寸有的略大於四十八釐米，如其中的《刑德》乙本幅廣爲五十釐米），二是漆盒此格横長約二十九釐米，從照片看，放入帛書仍略有餘地。帛書摺疊後的寬度約爲十八釐米，見《長沙馬王堆二、三號墓發掘簡報》（第四十二頁）。

〔六六〕參看佐藤武敏《中國古代絹織物史研究》（上），（風間書房一九七七年），三三二—三三八頁。

〔六七〕注〔六二〕引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館寫作小組文。

〔六八〕Jean Mailey,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Ground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in Relation to the Silk-Weaving in Pre-Han and Han China,"收入巴納主編的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Vol. 1, Intercultural Arts Press, New York 1972, pp. 103 – 112。

〔六九〕見巴納書（一九七二）第二十五頁。

〔七〇〕由巴拉德女士和弗利爾美術館實驗室的顧祥美女士檢驗。

〔七一〕商承祚《長沙古物聞見記》（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三九年）第四十六頁提到孤兒院楚墓出土束帛，「中有木軸，朱漆兩端，長約四十四公分」，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卷軸。

〔七二〕錢存訓據文獻記載，認爲縑帛用於書寫，至遲當在公元前六或前七世紀，見錢書一一六頁。

〔七三〕《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七四〕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古地圖初探》，《文物》一九八九年二期，十二—二十二頁。

〔七五〕見錢書一二八—一二九頁。

〔七六〕《馬王堆漢墓帛書》就是兼收圖、書，並包括竹簡。

〔七七〕《馬王堆漢墓文物》一五三、一六二頁。

〔七八〕《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叁〕和《馬王堆漢墓文物》一〇六—一一七頁。

〔七九〕《馬王堆漢墓帛書》〔肆〕。

〔八〇〕《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和《古地圖》（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八一〕《馬王堆漢墓文物》三十五、三十六、一三二—一四五、一五四—一六〇頁。

〔八二〕見林巳奈夫文所附摹本上面覆有這一印痕的透明紙摹本。

〔八三〕見蔡書繒書圖説十一至十三頁；陳槃《先秦兩漢帛書考》附録《長沙楚墓絹質彩繪照片小記》（《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册，一九五三年三月，一九三—一九五頁）；饒宗頤《楚繒書之摹本及圖象（三首神、肥遺與印度古神話之比較）》（《故宮季刊》三卷二期，一九六八年十月，一—二十六頁）。

〔八四〕有關研究，可參看李學勤《商代的四風與四時》（收入《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八五〕拙作《楚帛書與「式圖」》，《江漢考古》一九九一年一期，五十九—六十二頁。

〔八六〕見蔣玄佁《長沙》。又上引柯强信亦稱之爲「圖書」。

〔八七〕見《子彈庫》三十五—三十六頁。

〔八八〕李零《「式」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國文化》四期（一九九一年春季號），一至三十頁。

〔八九〕李零《湖北荆門「兵避太歲」戈》，《文物天地》一九九二年三期，二十二—二十四頁；《馬王堆帛書「神祇圖」應屬辟兵圖》，《考古》一九九一年十期，九四〇—九四二頁。

〔九〇〕王健民、梁柱、王勝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龍白虎圖象》，《文物》一九七九年七期，四十—四十五頁。

〔九一〕李學勤《補論戰國題銘的一些問題》，《文物》一九六〇年七期，六十七—六十八頁。

〔九二〕李學勤《再論帛書十二神》，《湖南考古輯刊》四集（一九八二年），一一〇—一一四頁；成家徹郎《中國古代的占星術和古星盤》（萇嵐譯），《文博》一九八九年六期六十七—七十八頁。

〔九三〕注〔九一〕引成家徹郎文；拙作《楚帛書與「式圖」》。

〔九四〕見《睡虎地秦墓竹簡》一八〇—一八六、二三一—二三五頁。

〔九五〕放馬灘秦簡整理小組《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收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六頁)和《睡虎地秦墓竹簡》二一九—二二〇頁。

〔九六〕李零《中國方術考》(人民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章第三節。

〔九七〕放馬灘秦簡《日書》午位仍作馬，可見是代替關係。

〔九八〕參看 M. A. N. Loewe, *Ways to Paradise*, London 1979, Chapter three。

〔九九〕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考古學報》一九八二年一期，七十一—一一六頁；《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慈利石板村 36 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九〇年十期，三十七—四十七頁。

〔一〇〇〕最近我們又認出一些新字，如帛書有「熱氣寒氣」一語，其中「熱」字寫法比較怪，現在是從包山楚簡的綫索認出。

〔一〇一〕巴納書(一九七一)四—八頁和巴納書(一九七三)五十五—五十六頁。

〔一〇二〕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輯。

〔一〇三〕李零《楚帛書目驗記》，《文物天地》一九九〇年六期，二十九—三十頁。

〔一〇四〕李學勤《長沙子彈庫第二帛書探要》。

〔一〇五〕李零《簡牘帛書研究》，收入《中國考古學年鑒(一九九一)》(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〇八—一一七頁。

〔一〇六〕見巴納書(一九七一)。

〔一〇七〕李先生釋文作「亓朱左篆□……1……不能飤，以司君子又赏古□……2……□從，可忐□忑，尚攻……3又憂於躬與山絲邑大子」。案：第一行出望山簡(應釋「亓(其)未又(有)雀(爵)立(位)」)；第二行「不能飤(食)」和下面「以」、「又」、「古」出望山簡，「司君」是原有，「子」、「赏」出第一帛書；第三行前三字出第一帛書(第一字爲「子」字反書)，以下五字(前三字應釋「以心」、「父」)和最後的「攻」字出望山簡，倒數第二字(應釋「冋」)出第一帛書；第四行的前五字和最後三字(「邑」字原從宀旁)出望山簡，「山」字出第一帛書，「絲」字是原有。

〔一〇八〕據高至喜先生説帛畫是由蔡捐獻。

〔一〇九〕見《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九頁，第十頁圖十二，圖版肆貳。

〔一一〇〕郭沫若《關於晚周帛畫的考察》，《人民文學》一九五三年十一期，一一三頁。

〔一一一〕夏鼐《關於晚周帛畫的補充説明》，《人民文學》一九五三年十二期，二九八頁。

〔一一二〕見《江陵馬山一號楚墓》第九頁，第十頁圖十二，圖版肆貳。

〔一一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馬王堆二、三號墓發掘簡報》；臨沂金雀山漢墓發掘組《山東臨沂金雀山九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七年十一期，二十四—二十七頁。

〔一一四〕《馬王堆漢墓文物》二十六—三十四頁。

〔一一五〕見《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一九六四年）摹本二五和圖版貳叁。

〔一一六〕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原載《中國文化》第十輯（一九九四年八月），第四十二至六十二頁。

Translation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Introduction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is the only published and complete manuscript among several discovered in 1942 by tomb robbers in Zidanku, Changsha, Hunan. In 1946 the owner, Cai Jixiang, asked John H. Cox to carry these manuscrip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 are now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in Washington DC. The manuscript dated to about 300 BCE and was buried with a man approximately forty years old. The small size of the tomb and the apparent lack of bronze vessels in it suggested that the man was not an important official.

The Zidanku manuscripts can be compared to the Mawangdui Silk Manuscripts, dating to 168 BCE and also from Changsha. Both sets of manuscripts were found inside containers — the Zidanku manuscripts in a woven bamboo box and the Mawangdui manuscripts in a lacquer box. The latter also contained flutes, bamboo strips in rolls, oyster shells, and branches of plants. Some of the Mawangdui manuscripts were folded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Other Mawangdui manuscripts were rolled around wooden tablets. The former were approximately the same size as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with a width of about forty-eight centimeters; the latter were much smaller, about twenty-four centimeters in width.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consists of both illustrations and texts; it is designed to resemble a divination board (*shi*; also sometimes called a diviner's board or cosmograph), which is itself a model of the cosmos.[①] This type of instrument, of which several have been found in Han tombs, consists of a round board symbolizing heaven that can rotate on a pivot on top of a square board representing the earth. There are essentially two types of divination board: one has a dial plate divided into the four directions, with eight degree markers, or points, indicated along with a central point called the Ninth Palace. In this palace and along the points are arranged the nine celestial gods. The second type

of divination board has an additional set of twelve degree markers indicated to represent twelve divisions of time (such as hours or months) and the twelve matching gods. The central controlling god of the first type is Grand Unity (*Taiyi*); that of the second type is the Northern Dipper (*Beidou*).[2] In some examples, instead of degrees or points there are twelve blocks indicating the months, which are further marked into twelve smaller units.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is ringed with pictures of twelve gods representing the months. Each side represents a season, and each god is accompanied by a corresponding text of do's and don'ts for that month (much like the "Yueling" or "Monthly Rules" chapter of the *Liji*). In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manuscript are pictures of trees which represent the pillars holding up the heavens mentioned in Section B in the translation below. In the center of the manuscript, instead of Grand Unity or the Northern Dipper, is the main text. The main text is divided into two large sections, one twice as long as the other and each written upside-down relative to the other.

Each section of the text involves some aspect of the calendar. The Inner Long Text (positioned with winter on top, spring to the right, and summer below) concerns the year. The Inner Short Text (with summer on top, autumn to the right, and winter below) concerns the seasons. The brief texts around the rim, as indicated above, concern the months.

Generally, the writer of the manuscript was concerned that the calendar be used with proper respect and knowledge. Otherwise, the text threatens, cosmic collapse and evil catastrophic events would occur. The Inner Long Text consists of three tales or subsections: section A warns about unnatural events and demonic influences should the year be improperly calibrated or the calendar contravened (thus offending the [High] God). Section B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a proper calendar in receiving a good and auspicious year from the gods. Section C warns that if the people are not respectful in their sacrifices to the God, they will run into trouble.

The Inner Short Text describes the divine creation of the calendar and how it brought order out of chaos. It also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ubsections: section A describes how the gods separated heaven and earth, regulated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hot and cold *qi* (i. e., yang and yin), and determined the four seasons by pacing out their boundaries. Section B describes how the gods supported the heavens with five pillars of different colors, and how the sun

and the moon emerged. Section C describes the division of time into days (and into groups of ten days) and of days into four time periods.

Translation

Chapter I: Year (Inner Long Text)

Section A

If [... 3]③ and the length of the lunar months becomes too long or too short, then they will not fit the proper degree and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will [not] be [... 1] regular; the sun, moon, stars, and planets will erratically overstep their paths. When (the months) are too long, too short, contrary, or chaotic, (the growth of) the grasses and trees have no regularity. This is [called] *yao*, "demonic" (influences or omens). When heaven and earth create calamities, the Heaven's Cudgel (*Tianpou*) star creates (sweeping) destruction, sending (the destruction) down throughout all four regions (of the earth). Mountains collapse, springs gush forth geysers. This is called "contravention." If you contravene the years (and) the months, then upon entering the seventh or eighth day of the month there will be fog, frost, and clouds of dust, and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function according (to heaven's plan). When heaven rains [... 3], it is a contrary month; keep still. ④ If it is the first, second, or third month, it is called *nizhongwang*, "death by a contrary end." [... 3] their country. If it is the fourth or fifth month, it is called *luanjiwang*, "death by a disordered cycle" [... 3]. In such a year, there will be trouble in the western territories, and if the sun and the moon get out of order, there will be halos surrounding (them) and trouble in the eastern territories. All under heaven will be at war and harm will come to the king.

Section B

Among the years, one is *deni*, "Favor and Affection," when if [... 6] the orbit of the five demonic (influences), then the grass, the trees, and the people will thereby [... 1(achieve?)] regularity in the pace of the four [periods (of days, months, or years)]. When [... 2] demonic (influences) from above, the three seasons (spring, summer, and autumn) will thus proceed. In the year of Favor and Affection after three seasons have passed [... 1], [... 4] will fall. It is by numerical layout that the months are corrected to be only twelve [... 1]. If one disrupts a Favor and Affection (year), then there will emerge from the

(underground) Yellow Pool [a ... 4 (something evil)] which, moving in and out of [... 1 *tong* (some kind of channel)], will create misfortune for those below. When both the sun and the moon are in disorder, the stars and constellations will not shine. Once the sun and the moon have fallen into disorder, the division of the year will then [... 1], and the seasonal rains will come and go without regularity or constancy. One fears that the common people do not yet understand and take the (layout of) the calendar [... 1] (to be) invariable and unadaptable. The people consider [... 1] that the three constancies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stars?] will be destroyed, and the four risings [the four seasons?] will be ruined, thereby [... 1 (disrupting?)] the cosmic regularity. Only when the gods, the Five Governors [of the Five Phases], and the four risings are without problems and the reliable (calendrical) constancies guide the people will the Five Governors be illuminated and the Hundred Spirits be thus presented with sacrificial feasts. This is what is called *deni*, "Favor and Affection," when the many spirits are favorable. The God said: "Extend your respect to them! Never be disrespectful. When heaven creates good fortune, the spirits will then bring it to you. When heaven creates demonic (influences), the gods will (likewise) provide you with them. Be attentive and respectful in (your) preparations and the heavenly pattern will thus be the guiding standard. In the end, the heavenly [... 1 (pattern?)] will be the model for the people below. Respect it without fail!"

Section C

If the people do not use [... 2] and travel along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streams and valleys without respect, then their sacrifices are not accepted and the God will bring them chaos. If the people can obtain enough provisions, they will not make trouble for each other. If they do not see [... 2], the halos will come. If the people do not understand the year, they will not offer sacrifices. If [... 1], it will be unfavorable for the people, there will be some [... 1 (trouble?)]. Affairs involving earth [such as plowing or building] will not be satisfactory; it will be inauspicious.

Chapter II: Seasons (Inner Short Text)

Section A

Long, long ago, Bao Xi of [... 2] came from [... 2] and lived in [... 2]. His [... 1] was [... 2] and [... 3] woman. It was confusing and dark,

without [... 3], [... 2] water [... 1] wind and rain were thus obstructed. He then married Zuwei [... 1]'s granddaughter, named Nü Tian. She gave birth to four [... 1 (children)] who then helped put things in motion making the transformations arrive according (to Heaven's plan). Relinquishing (this) duty, they then rested and acted (in turn) controlling the sidewalls (of the calendrical plan); they helped calculate time by steps. They separated (heaven) above and (earth) below. Since the mountains were out of order, they then named the mountains, rivers, and four seas. They arranged (themselves) by [... 1] hot and cold *qi*. ⑤ In order to cross mountains, rivers, and streams (of various types) when there was as yet no sun or moon (for a guide), when the people traveled across mountains and rivers, the four gods stepped in succession to indicate the year; these are the four seasons.

Section B

The elder spirit is called Qing-[... 1]-gan (Green-? -Pillar), the second is Zhusidan (Red-Four-?), the third is Liuhuangnan (? -Yellow-?), and the fourth is [... 1]-mogan (? -Black-Pillar). After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the sun and the moon were finally born, (but) the Nine Continents were not level so the mountains [... 2 (collapsed?)]. Therefore the gods created [... 1] to cover (the Nine Continents). When the skydome shook, they used green, red, yellow, white, and black trees as supporting poles. Yan Di thereupon ordered Zhu Rong to make the four gods descend to set up the Three Heavens and with [... 2] distribute the four poles. He said: "If it is not a case of the Nine Heavens⑥ crashing down, do not disturb(?) the heavenly powers." The God then finally made the movement of the sun and the moon.

Section C

Gong Gong calculated and set in motion the Ten Days [the Heavenly Stems] and the Four Times [periods, of a day, month, or year]. [... 4] spirits then stood still⑦ making four [... 1] without resting. When the hundred spirits and the wind and rain became calendrically incorrect and disordered, he made the sun and the moon take turns working and resting. Thus we have the divisions of late night and morning, afternoon and evening.

Chapter III: Months (Surrounding Text)

Section A [First Month]

[The first month is called] Qu. (During this month) Yi will come. Do not

[... 1] kill (living beings). *Renzi* and *bingzi* are inauspicious (days). If you make [... 1] and attack to the north, the general will come to evil, [... 5]. [The month's complete title is] Quyuxia, "Pick from Below."

Section B [Second Month]

[The second month is called] Ru. (During this month) you can send out an army and build a city, but you cannot marry off a daughter or take in slaves. Don't regret if you cannot accomplish both. [The month's complete title is] Ruciwu, "Such Is Military."

Section C [Third Month]

[The third month is called Bing.] (During this month) [... 5] marry, raise domestic animals, [... 3]. [The month's complete title is] Bingsichun, "Bing Controls Spring."

Section D [Fourth Month]

[The fourth month is called] Yü. (During this month) you cannot engage in any major affair. Shao Han [... 6]. If you take a wife, you will be the laughingstock of the country. [The month's complete title is] Yuqunü, "I Take a Wife."

Section E [Fifth Month]

[The fifth month is called] Gao. (During this month) the leader of the thieves will be [... 1(un)] able to hide. If you do not see the moon at [... 2], you cannot offer sacrifices, for it is inauspicious. You can take [... 2] as slaves. [The month's complete title is] Gaochudu, "Gao Goes out and Is Visible."

Section F [Sixth Month]

[The sixth month is called] Qie. (During this month) you cannot send out the army The navy will not [... 2]; it will be defeated and overturned. When you come to [... 3], you cannot offer sacrificial feasts. [The month's complete title is] Qiesixia, "Monkey[8] Controls Summer."

Section G [Seventh Month]

[The seventh month is called] Cang. (During this month) you cannot make an opening[9] [... 1]. It will be greatly unfavorable to the country. There will be a bird flying between the sky and the land. [The month's complete title is] Cangmode, "Cang Is to Attain Nothing."

Section H [Eighth Month]

[The eighth month is called] Zang. (During this month) you cannot build a

house or commence (projects). Do not [... 1] or [... 1], for there will be great disorder in the country. To take a woman (as a wife) is inauspicious. [The month's complete title is] Zangtu [... 1], "(?)."

Section I [Ninth Month]

[The ninth month is called] Xüan. (During this month) you can build a house, [... 3] moving, and then [... 4]. [The month's complete title is] Xüansiqiu, "Xüan Controls Autumn."

Section J [Tenth Month]

[The tenth month is called] Yang. (During this month) you (can) not engage in destructive affairs, (but) you can [... 2] and rout evildoers in (all) four [directions]. [The month's complete title is] Yang ... yang, "(?)."

Section K [Eleventh Month]

[The eleventh month is called] Gu. (During this month) it is beneficial to invade and punish other countries. You can attack cities, gather together people (to be soldiers), meet with lords (of other countries), execute the chief criminals, and slaughter evildoers. [The month's complete title is] Gufenchang, "Gu Is Beneficial for Territorial Expansion."

Section L [Twelfth Month]

[The twelfth month is called] Tu. (During this month) you cannot attack cities, [... 8]. [The month's complete title is] Tusidong, "Tu Controls Winter."

Notes

① For more on the *shi*, see Major, chapter 8. See also Li Ling 1991b; Field 1992; and Major 1993, 39-43.

② *Beidou* is the familiar Big Dipper constellation in Ursa Major. For the Dipper as the "hand" of a celestial "clock," see Major 1993, 88-94, 106-108.

③ Obliterated or untranslatable text is marked in the translation with ellipses. The numbers following the ellipses indicate the number of missing graphs. Words with unclear or debated meanings are marked with question marks. Words not in the Chinese text (missing but obvious from the context) are bracketed, as are words or phrases added in English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text. Words or phrases added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the Chinese text read smoothly in English are placed in parentheses. For detailed annotations of the text, readers are referred to Li Ling 1985 and additional comments in a forthcoming article by Li Ling in *Guwenzi yanjiu*.

④ Li Ling follows Li Xueqin'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d *run*, used here as a verb (and therefore not in the sense of the adjective, which when modifying the word "month" refers to "an

intercalary month" [i. e., an extra month in a leap year]); see Li Xueqin 1982. (eds.)

⑤ This is a reference to the sequential growth and waning of yin and yang.

⑥ The Nine Heavens, like the Nine Continents of Earth, were envisioned as being divided into nine equal regions, not as nine tiers (as commonly conceived). See *Huainanzi*, ch. 3, "The Treatise on the Patterns of Heaven"; and Major 1993, 69–71.

⑦ See n. 4 abov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run* as a verb meaning "to keep still"; that sense, however, does not necessarily seem appropriate here. This sentence is fragmentary and difficult to interpret. (eds.)

⑧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qie* as "monkey", see Cook 1994, 6.

⑨ An opening would include such activities as the digging of a well or the making of doors or windows.

寫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五日，先後經 Michael Puett, Constance Cook 和 John Major 修訂。

熱氣寒氣，以爲其序

子彈庫帛書，中間的短篇是講「四時」創造的神話，其中有兩句迄無確解。它們是：

寘既寍既，㠯爲亓斌。

上面八個字，第二、四兩字應釋「氣」，第五至七字是「以爲其」，這都很清楚。但第一、三和八字卻值得討論。

一、第一字

此字舊釋「寮」，字形相似，但並不吻合。饒宗頤先生以爲「熏」字的異構（案：參看《金文編》0062 録番生簋「熏」字）〔一〕，現在看來也有問題。

近讀《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我發現一個與此有關的字，作以下不同寫法：

(1) （簡 82），原釋「鼅」。

(2) （簡 97），原釋「槊」。

(3) （簡 103），原釋「鼈」。

(4) （簡 115），原釋「鼉」。

(5) （簡 124），原釋「鼉」。

(6) （簡 125），原釋「鼉」。

(7) （簡 194），原釋「鼉」。

這些例子都是人名用字。另外簡 139 還有「戭」字〔辭例作「大脰尹公雺與～卅＝（三十）」〕，簡 179

還有「鄭」字〔辭例作「～人登（鄧）蒼」〕，也都含有類似的偏旁。

上述各例，(1)—(7)都是由三部分組成，左上爲「⿱山火」〔(2)、(3)〕或「炅」〔(1)、(4)、(5)、(6)〕，右上除(3)、(4)作糸或系，其他還有待研究，下半爲「黽」〔除(2)作糸〕。其左上所从偏旁的「⿱山火」即這裏討論的第一字所含，可以證明「⿱山火」往往省體作「炅」。由這一綫索我們還可推論，《古璽文編》頁一八七的「⿱宀炅」字（作「⿱宀炅」或「⿱宀炅」）與帛書此字是同一字。

現在我們都已知道秦漢隸書往往把「熱」字寫成「炅」〔二〕。如馬王堆帛書《老子·德經》，甲、乙兩本的「静勝熱」，「熱」均作「炅」。但更早一點的「熱」字是作什麼樣呢？這個問題卻值得探討。《説文》卷十上火部「熱」字是从火埶聲。但宋代的古文字書「熱」字卻作「⿰埶炅」（《汗簡》頁六十六背和《古文四聲韻》卷五頁十四正引《義雲章》），黄錫全《汗簡注釋》（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四二二認爲「⿱山火」是「⿱山火」之訛，字應隸定作「爇」。其左半與「⿱山火」極爲相似，使我們產生懷疑，「熱」字作「炅」可能是一種字形訛變，即由「⿱山火」演變成「⿱山火」或「⿱山火」，再演變成「炅」。總之，帛書「⿱宀炅」字應分析爲从宀熱聲大概是没有什麼問題的。

上揭例(1)至(7)，字从黽，我們懷疑即古書表示灼龜之義的「熱」字。如《周禮·春官·菙氏》：「凡卜，以明火爇燋。」爇燋均指灼龜。燋，《説文》卷十上有「⿱龜火」字，釋爲「灼龜不兆也」，亦燋龜之燋的專字。後者爲「龝」（秋）字所从。秋字的戰國寫法往往作「⿰禾炅」、「⿰炅禾」（參看《古璽文編》頁一七八），現在看來是从禾从熱字的省體。例(1)、(2)、(5)、(6)、(7)的右半現在還不易確定，我們懷疑例(1)、(7)也許是丮旁的省略（參看《金文編》0444「埶」字，0723「箕」字所附「⿰耳炅」字，1135「⿰歹凡」字）。

當然這裏應當説明的是，秦漢用爲「熱」字的「炅」雖然字形與《説文》卷十上釋爲「見也」的「炅」字相同，但卻並不是同一個字〔三〕。還有秦公簋「⿰金炅静不廷」，第一字亦从炅，學者釋爲「鎮」。如此説可靠，則「炅」與「真」讀音應相同或相近，也不會是這個字。《説文》「炅」字，唐代切音爲古迥切，於上古音爲見母耕部，「真」字是章母真部，都和「熱」字的讀音（日母月部）相距甚遠。我們

在上文已説明，「埶」字作「炅」恐怕並非原形，乃是「⿱山炅」的省體，它與這兩個例子衹是湊巧同形罷了。另外，過去學者認爲「炅」字是从火日聲[四]，現在也值得重新考慮。

上面提到的包山楚簡中的「戭」字不詳何物，「鄍」字是地名也無法確指，但這兩個字並非从尞是可以肯定的。

二、第三字

此字，我曾疑爲「害」[五]，曾憲通先生採之，讀爲「百」[六]，現在從文例看，應是「寒」字。「寒」字，金文寫法與小篆相近，是作「□」、「□」〔參看《金文編》1714「寒」字和附録下335（應釋「𩠁」）〕。此字作「□」，與之相似。

三、第八字

饒宗頤先生舊釋「㽰」（即「疏」的本字），但後來又改釋「殽」，以爲淆亂之義。今案帛書此字仍以釋「㽰」爲妥，讀爲「序」（古書中的「疏」、「敘」、「序」三字均有條理之義，音同義通）。帛書此篇的上文有「山陵不斌，乃命山川四𣫭（海）」兩句，饒先生指出這裏所述與《書・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相似，「命」是命名之義，至確。但下句既然是説爲山川四海命名，照理説上句應是講山川未經命名時的情況。山陵未有其名則亂，「不斌」應指無序而不是有序，也是很明顯的。可見以淆亂釋「斌」字正好是把意思搞反了。

在古代數術之學中，四時之序是以陰陽二氣的消長來解釋，如《管子・乘馬》「春夏秋冬，陰陽之推移也。時之長短，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陰陽」的另一種表達是「寒暑」，如《易・繫辭下》「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過去《千字文》稱之爲「寒來暑往，秋收冬藏」）。古代有三十節氣（《管子》的《幼（玄）官（宮）》和《幼（玄）官（宮）圖》）和

二十四節氣（《漢書·律曆志下》），它們都是從陰陽二氣或寒暑二氣析分。這裏的「熱氣寒氣，以爲其序」對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很重要，因爲它説明了，楚帛書中不但有「五行」的概念（如「青、赤、黃、白、墨木之精」和「五正」）〔七〕，而且也有「陰陽」的概念。

注釋

〔一〕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七—十八頁。

〔二〕〔三〕〔四〕朱德熙、裘錫圭《七十年代中國出土的秦漢簡册和帛書》，《中國語文研究》第六期（一九八四年），一—十二頁。

〔五〕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六十八頁。

〔六〕注〔一〕引書二七一頁。

〔七〕李學勤《長沙楚帛書通論》，收入《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六六—二七三頁。

寫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原載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二六七至二六九頁。

中國古代的墓主畫像

——考古藝術史筆記

一

最近，首都博物館舉辦了「中國記憶——五千年文化瑰寶展」，展品中有兩幅帛畫彌足珍貴〔一〕：

(1)「人物御龍帛畫」，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湖南省博物館藏。

(2)「T形帛畫」，一九七二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M1出土，湖南省博物館藏。

這兩幅畫，都是圖繪墓主，在性質上不同於長沙出土的其他帛畫，比如馬王堆M3出土的地圖，城郭、宮室、墓葬的平面圖，數術用途或其他用途的圖，以及子彈庫帛書和馬王堆帛書的插圖。這是專門一類。

中國繪墓主像的戰國帛畫，目前衹出過兩件，一件是陳家大山帛畫，一九四九年湖南長沙陳家大山楚墓出土，蔡季襄捐獻；一件是這件子彈庫帛畫。兩件都是長沙所出。這兩幅畫，名氣很大，郵電部專門出過郵票。漢代與此用途相似的帛畫，馬王堆漢墓也出過兩件，都是T形帛畫，另一件出自M3。

這四件帛畫都是出自長沙，都是湖南省博物館的藏品。

歷年出土屬於這一類的其他帛畫還有十來件，聽上去好像不少，其實，它們絕大多數都是殘件，比較完好的衹有金雀山M9出土的一件〔二〕。

中國的帛書，目前衹有兩批，都是與帛畫同出：

一批是子彈庫帛書，與子彈庫帛畫同出。它們除商志𩡶先生捐獻的一些殘片，現存湖南省博物館，其他都保存在美國賽克勒美術館。

一批是馬王堆帛書，也與馬王堆帛畫同出。

研究帛書帛畫，長沙是重鎮。

二

關於早期帛畫，十五年前，我做過一點討論[三]。這次目驗展品，又有一些想法，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一）子彈庫帛畫。

出土位置：畫面朝下，平鋪在槨蓋板和它下面的襯板之間。若把墓室比作房屋，就是發現於天花板上。一九四六年，任全生等人盜掘此墓，盜洞打在帛畫的旁邊，没有傷到帛畫。當時，没拆槨板，不可能發現帛畫。一九七三年，湖南省博物館重啓此墓，帛畫出土，保存完好，很幸運。

形制：這幅帛畫是畫在一幅長約37.5釐米、寬約28釐米的長方形的帛上，衹比八開本的書稍微大一點；和馬王堆帛畫相比，小得多，但兩者是同一類東西。這次觀察原物，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上緣卷着擔杆，有可供懸挂的擔繩；右邊是織邊；左邊和下邊經過裁切，還留着毛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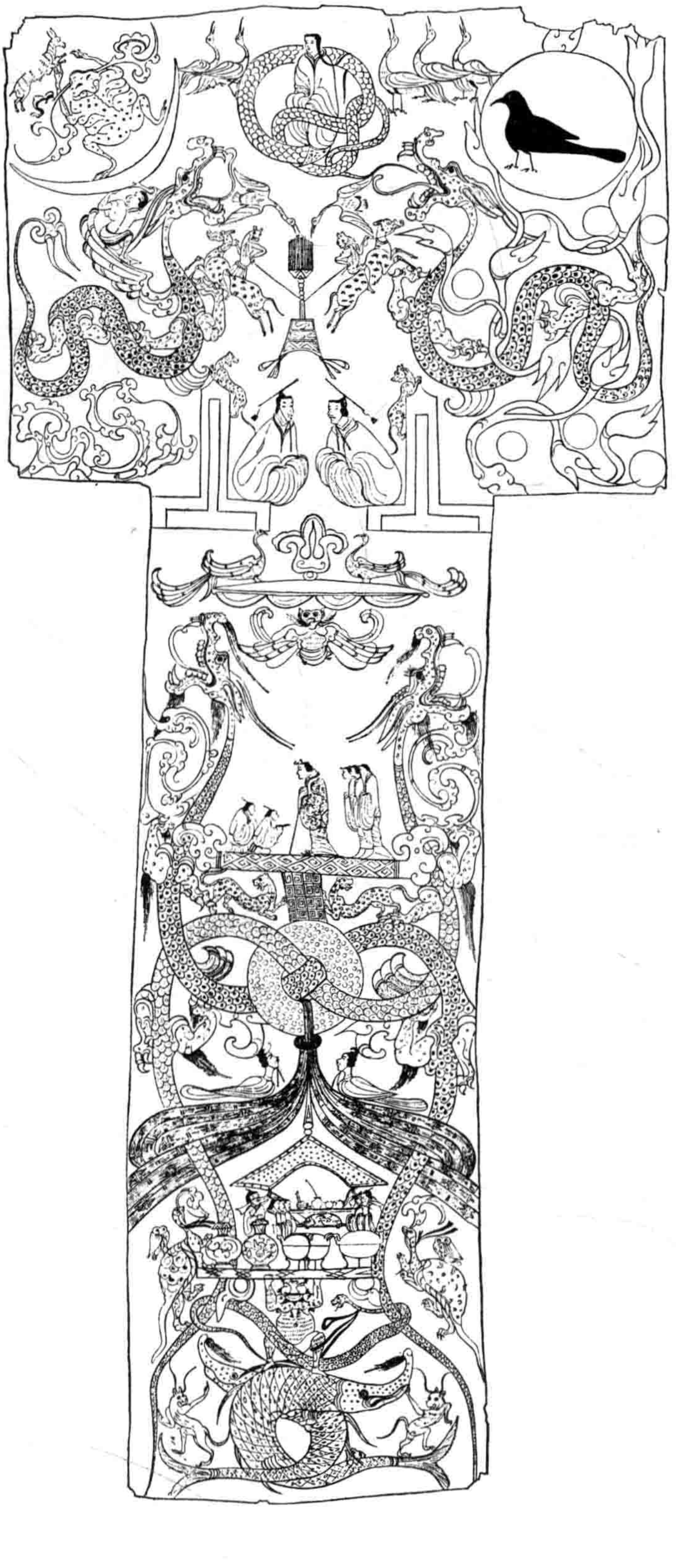
構圖：畫面上的男子是子彈庫楚墓的墓主。墓主佩劍，手執繮繩，駕龍作水上遊。畫面上的龍，不是一般的龍，而是彎曲如舟狀，等於龍舟。龍舟上方有柄傘，傘柄被略去，虛懸於上方；水，什麼都没畫，衹在船頭的下方畫條魚，船尾的上方畫個水鳥。這種手法，古人常用，比如青銅器上的水陸攻戰圖，就是用魚鱉表示水。作者表現船行，想法很巧妙，傘蓋上的三個流蘇，還有墓主的冠纓，全都朝後飄，很有動感。這裏，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臉和其他帛畫一樣，都是朝

向畫面的左方。

(二) 馬王堆 M1 的帛畫(圖一)。

一九七二年出土，早於子彈庫楚墓的發掘。

出土位置：畫面朝下，平鋪在内棺的蓋上。它也在死者的頂上，等於放在小天花板上。



圖一　馬王堆 M1 出土的 T 形帛畫(摹本)

形制：長205釐米，上寬92釐米，下寬47.7釐米。它是從一塊長約273釐米的整幅帛上横截下四分之一長（長約68釐米，寬約47釐米），再從中一裁兩半，然後一左一右，縫在這幅帛的上端。目驗原物，縫的痕迹很明顯。畫幅上端有擔繩，畫幅下端有兩個穗，兩翼下端也有兩個穗。

構圖：左右畫日月星辰，太陽在東（觀者的右邊，被觀者的左邊），月亮在西（觀者的左邊，被觀者的右邊），八顆星星在太陽的下邊〔四〕。中間，從上到下分爲若干層，好像一個電梯井。墓主是站在中間一層，我們要注意，她的臉也是朝向畫面的左邊。畫面的左邊，從被觀者的角度講是右邊，正好相反。

古人畫日月，都是「左日右月」或「東日西月」，北京的日月壇就是這麼安排。畫面上的日月，日所在是東方〔五〕，月所在是西方。毫無疑問，墓主是立於東，面朝西，古人叫「西面」。禮書上的講法，這是主人的位子。漢畫像石，孔子見老子，老子爲主，孔子爲客，往往也是這麼站。

這幅畫怎麼分層，每層代表什麼，學者有各種猜測，我想把比較可靠、能够肯定的東西儘量肯定下來。

研究這幅畫，一定要與M3的帛畫對比。M3所出，是把畫面整齊地分爲五層，它是分爲四層，第一層相當於M3所出的前兩層。

(1) 第一層，分左、中、右三區。右區，上爲日，日中有金烏，下有扶桑木、八個星星和一條龍。中區，上爲五鳥和一赤蛇盤繞的女子，女子下有雙鳥和兩個騎鹿人，共牽繩懸鐘。懸鐘下爲天門，天門闕頂，上伏小豹，天門内側，有兩個對坐的守門人，頭戴冠冕。左區，上爲月，月中有玉兔和蟾蜍，下有一條龍，龍有翼，翼上有人。

(2) 第二層，是墓主所在的一層。墓主前面有兩人下跪，後面有三人侍立，他們脚下是一個兩頭翹起的檯子。這一層的兩側各有一龍，龍頭伸於此，龍身、龍尾垂於下。

(3) 第三層，在上述檯子下「斜置一個劃分爲十六格的方板」，不明何物。方板兩側各有一豹，

下面有二龍穿璧。璧組下垂斜分，左右各伏一鳥，中有一繩，懸璜於下。懸璜下是宴享場面，左右各三人對坐，中有几案，前陳鼎壺，一人侍立，他們的脚下是地面。這一層的兩側正好是龍身。

(4) 第四層，上爲雙手托地的裸人，裸人下有一蛇二魚和兩個頭上長角的怪獸。這一層的兩側正好是龍尾，龍尾的兩側還有二龜，二龜的背上各立一鴞。

這四層，第一層是天上，第二層和第三層是人間，第四層是地下。後面三層，兩側有飛龍升騰，當即所謂「龍升」。

中國早期，是把宇宙空間分爲天、地、人三界。《淮南子》有《天文》、《墜形》、《人間》三篇，就是講這三界。三界往來，有天門、地户，有人門、鬼門(六壬式盤上標有這四個術語)。上天，要通過天門；入地，要通過地户。天門以上是蒼天，地户以下是黄泉。黄泉是地層深處的地下水。這是古書的説法，它不等於後世所説的天堂、地獄和人間。

學者爲帛畫分層，或把第一層叫「天府」，第二層叫「人間」，第三層叫「陰間」，第四層叫「水府」。這四個詞，除去「人間」，都有問題。「天府」，見《周禮》、《莊子》等書，從不指天；「陰間」當地下世界，更是後起；「水府」是河海一類水下世界(投龍簡中的水簡經常提到「水府」)，也不是黄泉。我們講古代，還是要用古代的概念。

古人認爲，魂是托於神，輕清如氣，死後升於天；魄是附於體，死後和尸體一起葬於地下。所謂「龍升」，就是這種魂飛魄散的過程。

帛畫表現的是空間概念，不是時間概念。所謂空間，就是天、地、人三界，不是從地底升到人間再升到天上。

三

研究這兩幅帛畫，應該做一點同期比較：子彈庫的帛畫要和陳家大山的比；馬王堆的帛畫，

M1的帛畫要和M3的帛畫比。

這裏講一下對比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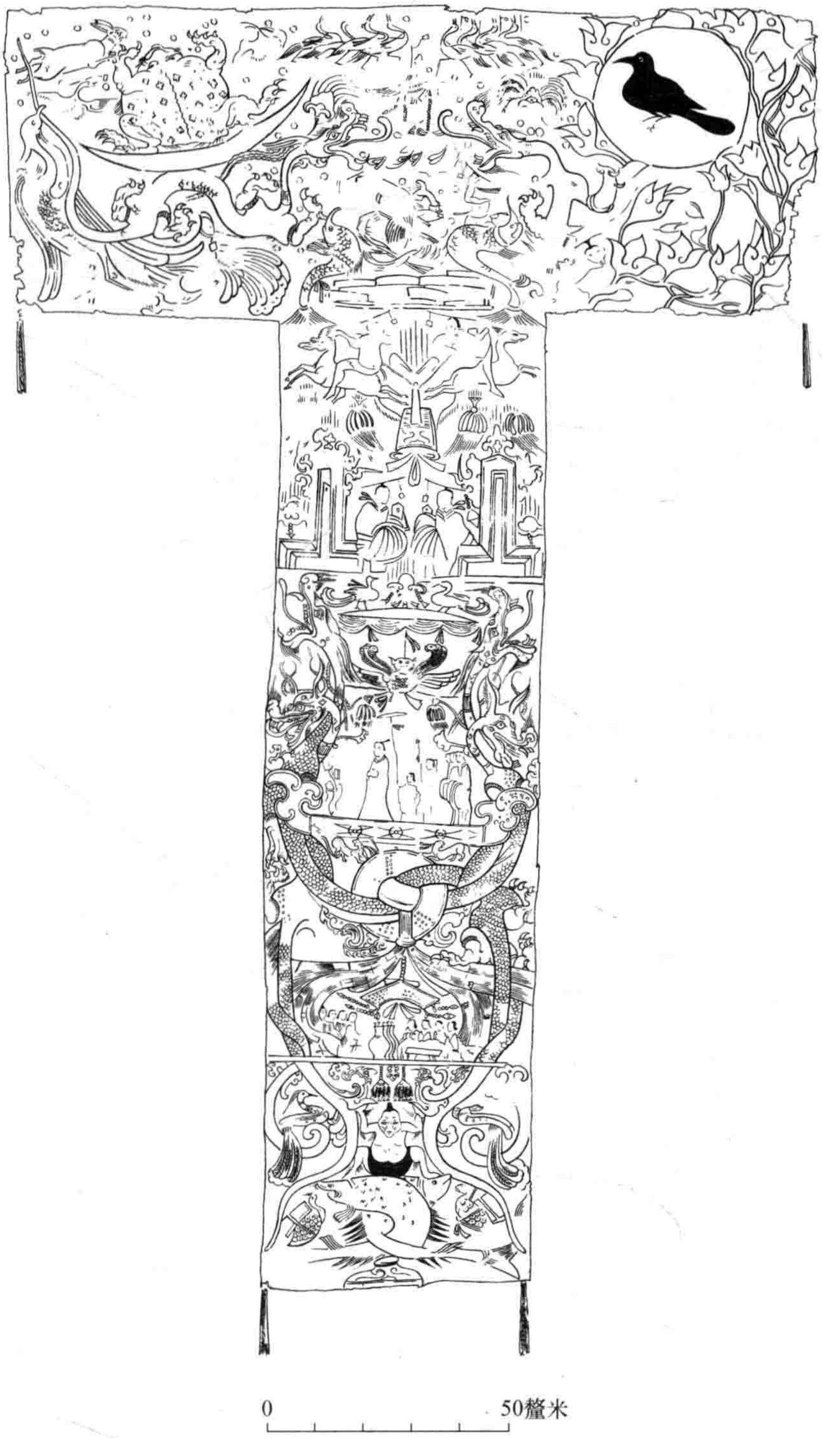
(1) 陳家大山帛畫。一九四九年盗掘出土，沒有可靠記録。出土位置，有三種傳説，一説疊放在陶敦内，一説疊放在竹笥内，一説疊放在竹笥上，都不可靠。我很懷疑，它是出在棺蓋上，和馬山帛畫出土的一樣，而不是像子彈庫帛畫那樣，放在椁室頂部的夾層内。如果是像子彈庫帛畫那樣，盗墓者很難發現。這幅畫，長約30釐米，寬約20釐米，從八開變十六開，比子彈庫帛畫更小。畫面上的人物是女子，也是背東面西。畫面左上，是一龍一鳳。

(2) 馬王堆M3的T形帛畫（圖二）。一九七三年底出土，也是畫面朝下，平鋪在内棺的蓋上。這幅畫，長234.6釐米，上寬141.6釐米，下寬50釐米，比馬王堆M1所出長一點，也寬一點。它是從一塊長約343釐米的整幅帛上横截下約三分之一長（長約108釐米，寬約50釐米），再横截爲兩塊，縫在這幅帛的上端。它也有四個穗，但我們從報告中的照片和綫圖却看不見擔繩的存在。其構圖與馬王堆M1所出大同小異，但畫面是整齊地分成五層，分層更清楚：第一層在兩翼之間的横幅内，畫日月星辰、八鳥、雙龍、雙魚，下面有一道界標；第二層在這道界標下，畫雙人騎鹿、懸鐘和天門，天門内側有雙人對坐，守之；第三層在天門下，畫雙鳥和華蓋，華蓋下有一怪鳥，怪鳥下是墓主和侍從，他們站在一個兩頭翹起的平臺上；第四層在此平臺下，平臺下畫雙豹，雙豹下畫雙龍穿璧，璧組下垂，左右分披，中有一繩懸璜，懸璜下畫宴享的場面，八人對坐，設几案、酒壺等，下面是地面；地面下畫雙手托地的裸人、雙魚和雙龜，龜背馱負某物，用繩子綁縛，下面畫一器物。畫面的中心人物是男子，也是背東面西。後面三層，兩側也有龍。

值得注意的是，馬王堆M3，除T形帛畫，還出了另外兩幅帛畫：

(1)《車馬儀仗圖》（掛在西壁）。

(2)《行樂圖》（掛在東壁）。



圖二一　馬王堆M3出土的T形帛畫（摹本）

上述帛畫，陳家大山帛畫和子彈庫帛畫是戰國帛畫，馬王堆的T形帛畫是西漢帛畫。

前兩幅與後兩幅相比，不同點是：

(1) 位置不同：子彈庫帛畫是放在椁蓋板的夾層內，馬王堆的T形帛畫是平鋪在棺蓋上。

(2) 形狀不同：陳家大山帛畫和子彈庫帛畫都是長方形，比較小；馬王堆帛畫是作T形，相當大。

(3) 構圖不同：陳家大山帛畫和子彈庫帛畫都是背景小，人物大，墓主本人的形象很突出，背景比較簡單；馬王堆帛畫都是背景大，人物小，畫面的構成要素非常複雜，上下分四五層。兩者的「焦距」不一樣。

但兩者的差異祇是表面上的，從功能考慮，還是一類東西。

上述墓葬，陳家大山楚墓，因係盜掘，墓主的性別已不得而知，其他三座，都有尸體或遺骨在。經鑒定，子彈庫楚墓，墓主是四十歲左右的男子；馬王堆M1，墓主是五十歲左右的女子（有軑尸）；馬王堆M3，墓主是三四十歲的男子。他們的性別與畫面符合。由此，我們可以反推，陳家大山楚墓，墓主一定是女性。

所有這類帛畫，它們的共同點是：

(1) 都是葬儀用具。

(2) 都是圖繪墓主。

(3) 墓主都是背東面西。

我曾指出，連接這兩類，有一個綫索很重要，即馬山M1的帛畫。帛畫已殘，但是發現於棺蓋上。它說明，戰國時期，這類帛畫也有放在棺蓋上的。

四

這種畫叫什麼？過去有四説：「非衣」説，「畫荒」説，「銘旌」説，「魂幡」説〔六〕。哪種説法對，我發表過意見，這裏再説得詳細一點。

(1)「非衣」説，出自唐蘭等人。這種説法是根據隨葬遣册，認爲遣册上的「非衣」就是T形帛畫，T形帛畫像雙袖展開的衣袍。這一説法有兩個疑點。第一，馬王堆M1和M3的T形帛畫，尺寸不一樣，但遣册都作「非衣一，長丈二尺」，顯然不合理。第二，西漢的一丈二尺，等於今天的277.2釐米，不但比一般的衣服長很多，就是比這兩幅帛畫，也長出42.6或72.2釐米。馬王堆M1的報告説，遣册「非衣」當讀「裴衣」〔七〕。《説文・衣部》對「裴」字的解釋是「長衣」。這個字，古書或作姓氏，或讀爲「徘徊」之「徘」，好像没有當「長衣」講的例子。我懷疑，「裴」就是「被」，所謂「非衣」，實指寢衣，既不是指墓中出土的T形帛畫，也不是指墓中出土的衣服，而是包裹尸體的衾被。寢衣是古代的被子，有袖，古人也叫衣。所謂被，是取其覆蓋之義。被子衹是晚上睡覺，蓋在身上的長衣。《論語・鄉黨》説寢衣「長一身有半」，許慎解釋「被」字就是引這句話。比如身高170釐米，被子就要長255釐米；身高180釐米，被子就要長270釐米。這是大概的標準。277釐米長，衹有被子最合適。我們要注意，「非」是幫母微部字，「被」是並母歌部字，古音相近，可以通假，它們很可能是通假字〔八〕。「非衣」和帛畫没有關係。

(2)「畫荒」説，出自陳直等人。這個詞，見於《禮記・喪大記》，是荒帷的别名。荒帷是棺罩，當然覆於棺蓋，但這不等於説，覆於棺蓋的就一定是荒帷。荒帷什麼樣？過去缺乏實證，現在很清楚，根本不是這種東西。最近發掘的横水大墓M1（畢姬墓），有鳳鳥紋荒帷（衹有印痕保留），就是證明。

(3)「銘旌」説，出自顧鐵符等人，主要靠與武威銘旌比較。這種説法，比較靠譜。

(4)「魂幡」說，出自孫作雲等人。主要著眼點，是它類似後世的魂幡。這種說法也有一定道理，因爲子彈庫帛畫有擔繩，說明這類帛畫，原來是用於張挂，類似旗幡。馬王堆的T形帛畫、金雀山M9出土的帛畫，從形制看，也是幡。這種說法，與銘旌說並不矛盾。銘旌叫旌，也是一種幡。

過去，我的看法是，上述帛畫最接近古書說的「銘旌」，但同嚴格意義上的「銘旌」還有區別。這裏也補充一下。

「銘旌」見於《周禮・春官・司常》，禮書也簡稱「銘」。如：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上。（《儀禮・士喪禮第十二》）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録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禮記・檀弓下第四》）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禮記・喪服小記第十五》）

這種東西的特點是有銘，即有文字書寫的墓主名。這是嚴格意義上的「銘旌」。

銘旌是什麽樣？也有出土實物，比如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的銘旌。

武威銘旌（圖三），其銘文一般是作：某鄉＋某里＋死者名＋之＋柩。如：

(1)「姑臧西鄉閹道里壺子梁之〔柩〕」（M4所出）。

(2)「姑臧渠門里張□□之柩」（M22所出）。

(3)「平陵敬事里張伯仟之柩。過所毋哭」（M23所出）。

(4)「姑臧東鄉利居里土（？）□〔□之柩〕」（M54所出）。

這種銘例正合於《儀禮・士喪禮》說的「某氏某之柩」，肯定是銘旌，毫無疑問。

圖三　武威銘旌(M54出土)

我們拿武威銘旌與馬王堆出土的T形帛畫相比，有相同點，有不同點。

相同點是：

(1) 武威銘旌也是長幡，幡的上端也有擔杆和擔繩。

(2) 武威銘旌也在長幡的頂端畫日月，日月的畫法和日月的位置也大同小異。

不同點是：

(1) 武威銘旌沒有上端縫綴的兩翼。

(2) 武威銘旌沒有日月以下的圖繪，既沒有墓主畫像，也沒有其他東西。

銘旌，從文獻看，戰國就有，但沒有發現。類似銘旌的帛畫，不寫字，光畫像，是不是也可以叫銘旌，恐怕是個問題。這裏，最最重要的差異是，銘旌要寫墓主名，我們討論的帛畫，衹畫墓主像。

從馬王堆帛畫到武威銘旌，中間有一個過渡環節，是金雀山M9出土的帛畫(圖四)。

這幅畫是長幡，和馬王堆帛畫一樣，也是上面畫日月，下面畫墓主，構圖相似。但它們有兩點不一樣：

(1) 馬王堆帛畫是T形，而它祇有長幅，没有兩翼，這點反而和武威銘旌一樣。

(2) 馬王堆帛畫分五層，對天上兩層和地下兩層比較强調，一頭一尾，佔了畫面的五分之四。而它突出的是人間部分，華屋之下，墓主和墓主的隨從，男男女女，分五層，佔了畫面的絶大部分。天，祇畫日月在上，代表天；地，祇畫二龍在下，代表地。

圖四　金雀山 M9 出土帛畫（摹本）

上述帛畫墓，馬王堆 M1、M3，是漢文帝時期的墓葬；金雀山 M9，是漢武帝時期的墓葬；磨咀子 M4、M22、M23、M54，是東漢時期的墓葬。

金雀山 M9 的帛畫，年代正好在中間，是個過渡環節。

五

最後，讓我們總結一下，這些發現的意義在哪里。

我想講兩點：

(一)這種帛畫，繪有墓主形象，對判斷墓主的性別、年齡和身份很重要，是墓主的身份證明。早期人物畫，它們也是最重要的標本。

繪畫史，人物畫像是單獨一類。古代沒照相術，但有畫像。早期畫像多半是全身像，這種畫上的人物也是，而且一律是側身，背東面西。

畫像，不止圖形，還要傳神。形的背後，藏着人的靈魂。對古人來說，有特殊含義(比如扎小人，是傷害巫術)。

古代，生者懷念死者，想得不得了，怎麽辦?有兩個辦法。一個法子是像如今的「模仿秀」，找個模樣差不多的當替身，比如他的子孫，這叫「尸」。還有一個法子，更聰明，就是畫張畫，或塑個像，用以寄托哀思，用以慎終追遠。

現在的墓地，墳前立碑，碑上刻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代，有時還有照片或畫像，甚至雕像，道理是一樣的。

上述帛畫和銘旌，原來是葬禮上打的旗幡，上面畫着墓主像，或寫着墓主名。棺材放進墓室，最後是把這種東西放在棺蓋上，就像現在，陣亡將士的棺材上面蓋國旗一樣。所謂「某某之柩」，已經説明最後的位置是在棺材上。

帛畫相當於墓碑上的照片或畫像，銘旌相當於墓碑、墓志上的銘文。東漢魏晉，有墓上樹碑和墓中埋墓志的習慣，或與此有關。

(二)我們要注意，這種帛畫，除了人物，還有背景，背景可以畫得很大，人是擺在這個宏大背景中。特别是馬王堆的T形帛畫。這種大背景的繪畫，對理解壁畫墓的起源很重要。

我們都知道，馬王堆M3，除T形帛畫，還有兩幅帛畫：一幅挂在墓室西壁，一幅挂在墓室東壁。

馬王堆M3的第一種帛畫，畫日月星辰，是放在棺蓋上。它的前身，戰國帛畫，還放在椁室

的頂部。這些都讓人聯想到漢代壁畫墓的穹頂（多畫日月和二十八宿）。

馬王堆M3的第二種帛畫，是畫人間宴樂，也讓人聯想到壁畫墓的四壁（多畫人間宴樂）。中國的壁畫墓，多在北方，屬於洞室墓。南方的木槨墓，没有壁畫，衹有這種東西。它們之間，恐怕存在類似的想法。

壁畫墓是個兩千多年的大傳統，上述帛畫是一個開端。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四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補記：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承湖南省博物館慨允，我有機會在他們的庫房目驗了從未展出的陳家大山帛畫和馬王堆M3的T形帛畫。這次目驗有一些新的印象，值得補充。

（一）陳家大山帛畫

原畫較小，平托鑲邊。據館藏記録，「一九七二年王啓初移交時已裝裱」，估計是捐獻此畫的蔡季襄所裱。帛畫四邊比較整齊，没有發現織邊和毛邊，也未見擔杆和擔繩，可能經過處理，不是原大。這幅畫，外間所見照片偏紅偏暗，今見原物，實爲灰色，比較明亮。畫面上的龍，左邊有兩處殘破，塗色，下邊掩着龍的左腿。左腿衹剩貼身的兩筆，比起右腿要低一點。此龍衹有兩條腿，比較奇怪。畫幅下緣，似乎未到底，墓主裙裾的後擺，下面壓着一鋭角形物，單綫勾勒，上有花紋，可能延伸於下。

（二）馬王堆M3的T形帛畫

原畫很大，裝裱成卷軸。看原物時，曾與報告中的摹本對照。我發現，這個摹本比較粗疏，很多細節都被漏掉。

打開畫卷，從上往下看：

1. 第一層，可分爲三區：

右區：上爲太陽、金烏和扶桑，下有一條龍和一個頭戴冠冕（前後皆有飾物）的人。人的身體沒有畫出。

中區：有一大片紅色和黑色的痕迹，明顯可以看出，是右邊太陽和金烏的反印紋。上有八隻鳥（左右兩組各四隻）和懸璜（兩件）。懸璜漏掉。下爲跪坐的女子，女子的前方陳放七件食盒。左右兩邊是兩個頭戴冠冕的騎魚人，右邊一人，赤裸上身，左邊一人不太清楚。

左區：上爲月亮、玉兔和蟾蜍，下有一龍一鳳，鳳銜龍尾。鳳尾有一頭戴冠冕的人，摹本漏掉。

案：與M1所出第一層的上部對應，大體相同。但M1所出，上方衹畫五隻鳥，加上下面的兩隻，比這裏少一隻；左右二龍，衹有左邊的龍翼上有人，右邊的龍沒有人。這裏的跪坐女子相當於M1所出赤蛇盤繞的女子，但是否有蛇盤繞，看不清。騎魚人，M1所出也未見。

2. 第二層

上爲兩個騎鹿人（左右各一組），皆頭戴冠冕，中爲懸鐘，下爲天門。天門内側的兩個守門人，頭戴冠冕，執圭相向，圭上有孔繫組。

案：與M1所出第一層的下部對應，大體相同。

3. 第三層

上爲雙鳥和華蓋，蓋下懸一怪鳥。傘蓋和怪鳥之間有一連通的直綫，摹本斷開。下爲墓主和侍從。衆人站在一個兩頭翹起的檯子上。

案：與M1所出的第二層對應，大體相同。這一部分，人物比例與子彈庫帛畫、陳家大山帛畫接近，真正擴大的衹是上面的兩段和下面的兩段。

4. 第四層

檯子下面有兩隻豹子，豹的下面是二龍穿璧，璧組下垂，左右分披，中有一繩懸璜，下爲宴享場面，八人對坐，設几案和酒壺，下面是地面。

案：與M1所出第三層對應，大體相同，唯人數略多，没有鼎。

5. 第五層

上爲托地的裸人，中爲雙魚雙龜，龜背馱負某物（圖書？），用繩子綁縛，下爲一榼狀器物。器物兩旁各有一人跪坐，以棰狀物擊之，摹本漏掉。

案：與M1所出第四層對應，大體相同，唯缺人、魚之間的蛇，多出二人擊器的部分。

注釋

〔一〕首都博物館：《中國記憶——五千年文化瑰寶》，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圖版一〇一、一四〇。

〔二〕陳鍠：《古代帛畫》，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五十一—八十四頁。有關材料，有關討論，此書收集較全，極便參考，除個別地方，均請查見此書，本文不再一一注明。據陳書統計，類似出土物，除上面四件外，還有馬山M1（戰國楚墓）出土的帛畫一件，金雀山漢墓（漢武帝前後的墓葬）出土的帛畫十餘件，南越王墓（漢武帝前後的墓葬）出土的帛畫一件，武威磨咀子漢墓（兩漢之際的墓葬）出土的銘旌六件。

〔三〕李零：《楚帛書的再認識》（寫於一九九三年），收入《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二二七—二六二頁。

〔四〕八顆星星作紅圓點，或以爲太陽，不妥。參看湖南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一〇四頁。

〔五〕前面提到，這類帛畫是畫面朝下放，畫面的左右正好相反。

〔六〕參看陳鍠《古代帛畫》，第十八—二十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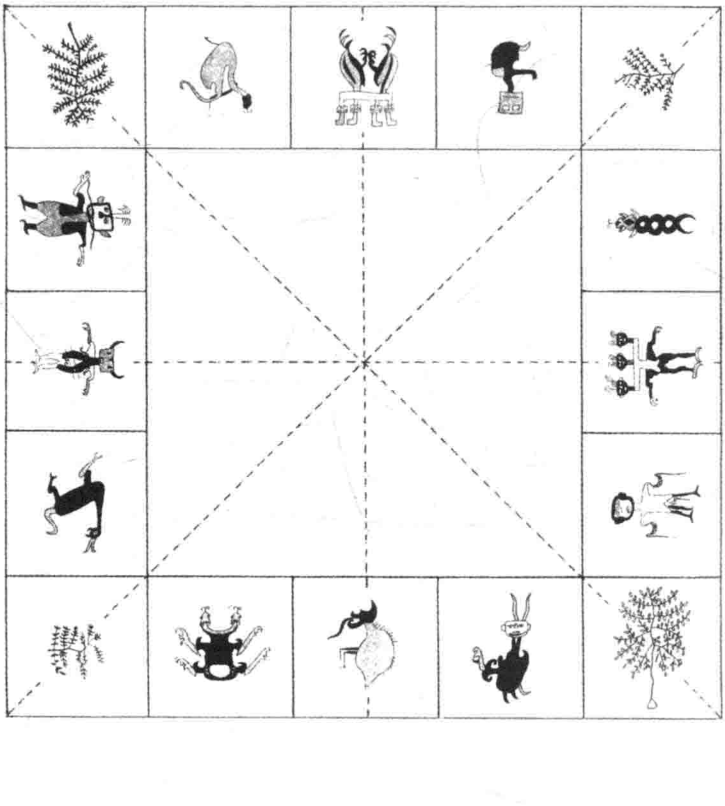
〔七〕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上册第一四九頁。案：報告整理者説「出土物中無與此尺寸近似者」。

〔八〕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一九八〇年，第六九〇頁「彼與匪」條。

原載《中國歷史文物》二〇〇九年第二期，第十二至二十頁。

楚帛書與日書：古日者之説

現已發現年代最早的日者之書是由賽克勒醫生（Dr. Arthur M. Sackler，一九一三—一九八七年）收藏，借存於美國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的楚帛書。此書是側置書寫在一幅高度（指經綫長度）略大於寬度（指緯綫長度）（47×38.7 釐米）的方形絲織物上。整個幅面分爲内外兩層，外層繪有十二個神像，上下左右，每邊各三個，爲一至十二月之神，其中除標有「昜□羕」的神像是側置，頭皆朝内，每個神像皆有題記，作左旋排列，依次轉圈讀；四方交角還有用青、赤、白、黑四色畫成的樹木，從樹冠的方向看，是作右旋排列（圖一）。中心無圖像，只有一左一右、方向顛倒的兩篇文字，一篇十三行，一篇八行。全書既無書題也無篇題，但外層十二段文字，每段結尾都有一個分章的符號（用朱色的方塊表示），後面另外書寫含有神像名稱的章題；中心兩篇文字也各有三個分章的符號（形式與邊文相同）。織物原是



圖一　楚帛書的圖像

摺疊存放於竹笈內，留下兩套折痕：一套年代較早，包括縱向的折斷痕迹三道和橫向的折斷痕迹一道，痕迹較深，分帛書爲八塊；另一套年代較晚，包括縱向的折斷痕迹五道和橫向的折斷痕迹一道，痕迹較淺，分帛書爲十二塊（「縱」指窄面，「橫」指寬面）。左右邊緣比較整齊，但上下邊緣殘破，裝裱時有若干部位發生錯位。幅面原爲淺灰色，年久變爲深褐色，使圖像文字難以辨認。

此書是賽克勒美術館的「鎮庫之寶」〔一〕，久已聞名於世，海內外研究之作甚多，這裏先將有關研究背景作簡短介紹：

一、楚帛書的出土與收藏

楚帛書並非科學發掘品，而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在舊湖南長沙城東郊一個叫子彈庫的小地方（位置在今省林勘院內），由一伙「土夫子」盜掘出土。帛書經盜掘出土，令人惋惜，但一九七三年五月，湖南省博物館對出土帛書的墓葬進行了二次發掘〔二〕，還是爲我們提供了許多重要信息。由於有這一補救性發掘，現在按考古學界命名竹簡帛書的慣例，人們也稱此書爲「子彈庫楚帛書」。

出土楚帛書的墓是一座規模不大，帶斜坡墓道，用青灰色膏泥密封的常見楚墓。葬具爲一槨雙棺，槨室大小爲長 3.06 米、寬 1.85 米、高 1.33 米。墓主，經尸骨鑒定，是一四十歲左右的男子。墓中隨葬物，據盜掘者追憶和發掘出的剩餘物看，包括鼎、敦、壺等陶器，竹木漆器、絲麻織品、玉璧和帛書、帛畫。墓葬年代約在戰國中晚期之交。

這座墓從隨葬物不含青銅禮器看，規格很低，但該墓出土的帛書、帛畫却十分珍貴。帛書原先是放在一件長約二十、寬約十、高約四至五釐米的竹笈內，除衆所周知的這一件，還有其他幾件殘片〔三〕。而帛畫，是一九七三年才出土（發現於槨蓋板與其下的隔板之間）〔四〕。子彈庫楚帛書是現已發現年代最早的帛書，晚於它，目前有著名的馬王堆帛書，二者都出土於長沙地區。子彈庫楚帛畫，性質屬於葬儀用具〔五〕。同樣例子還有一九四九年長沙陳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一件〔六〕。前者所繪

爲一馭龍男子，而後者所繪爲一蜂腰女子和龍鳳，推測都是墓主本人的形象。這種性質的帛畫也見於馬王堆漢墓，是作T形平鋪於内棺的蓋上〔七〕，也是在長沙地區首次發現〔八〕。

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最初是由長沙地區的收藏家蔡季襄收藏。一九四六年，蔡氏在上海與抗戰前在長沙雅禮中學任教（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的美國人柯强（John H. Cox）以一萬美元成交（據説是被迫成交），議定由柯强代他在美兜售，留下押金一千美元，餘款待付〔九〕。帛書因而流美。

楚帛書流入美國後的情況，外界還很少瞭解。衹是最近我們才弄清，它在美國長期是處於「無主」狀態，一九六四年後始售出。具體情況是：一、一九四九年以前，柯强曾游説美國各大博物館，均告失敗（即使把價錢壓低到七千五百美元也無人購買）；二、一九四九年，他把楚帛書中比較完整的一件寄存於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而其他帛書殘片和書笈是存放在華盛頓的一家庫房；三、一九六四年，他把存期已滿的那件比較完整的帛書從大都會博物館取出，售與紐約古董商戴潤齋（J. T. Tai）；四、一九六六年，戴氏又把這件帛書售與賽克勒：一九六六—一九八七年是存放於大都會博物館，一九八七年到現在是存放於賽克勒美術館；五、最近，柯强還把他存放於華盛頓的其他帛書殘片和書笈一併售與賽克勒美術館〔一〇〕。

另外，應當補充的是，不久前商志䃅公布了商承祚收藏的十三枚子彈庫帛書的殘片〔一一〕。這些殘片可能與長沙古董商唐鑒泉（人呼「唐裁縫」）有關〔一二〕，是目前所知惟一保留於國内的殘片。現在，由於美國方面保存的楚帛書殘片正在整理，尚未公布〔一三〕，商氏殘片應與前者放在一起研究，這裏我們討論的楚帛書衹是通常所説的那件楚帛書，即子彈庫帛書中比較完整的那一件。

二、楚帛書的三種複製本和有關研究

楚帛書的第一個複製本是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一九四四年石印本，一九七二年臺灣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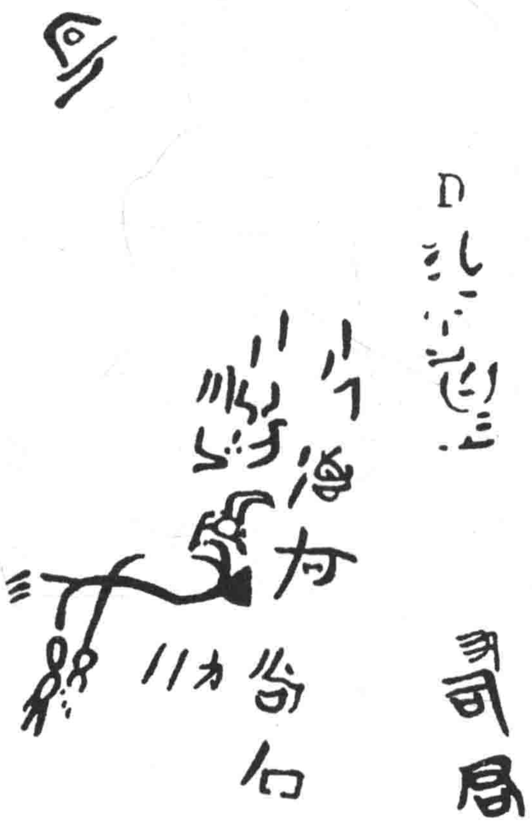
印書館又再版了該書)所附的臨寫本(出蔡氏長子蔡修渙之手)。作者是帛書的早期收藏者，與盜掘者有直接接觸，不但所述出土情況值得重視，而且書中所附插圖也是寶貴資料。蔡氏之書發表後，有不少學者曾以蔡氏臨寫本爲依據，對帛書做初步討論〔一四〕，內容涉及帛書的閱讀順序、圖像理解和性質等。如臺灣學者陳槃提出帛書十二神像應與《山海經》所述神物有關，帛書四木應與五行配色有關〔一五〕；香港學者饒宗頤提出帛書應是占驗時日所用(後棄此說，定帛書爲「天官書」)〔一六〕；臺灣學者董作賓提出帛書邊文應按春、夏、秋、冬的順序閱讀〔一七〕，都對後來的研究很有影響。但是由於蔡氏臨寫本缺字和誤摹較多，整個研究還難以深入。

比起蔡氏臨寫本，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間(準確時間不詳)弗利爾美術館拍攝的全色照片是更好的複製本(見《書道全集》，平凡社，一九六五年)。借助這一照片，許多研究者，如日本學者梅原末治、香港學者饒宗頤、澳大利亞學者巴納(Noel Barnard)、日本學者林巳奈夫和中國大陸學者商承祚先後做有臨寫本和摹本，把整個研究推到一個新的階段〔一八〕。這一時期，最有突破性的研究是，一九六〇年李學勤首先論定帛書邊文的十二月名即《爾雅·釋天》的十二月名〔一九〕；一九六二年陳夢家首先以帛書與傳世文獻做系統比較，指出帛書與月令類文獻最接近〔二〇〕。另外，應當指出的是，弗利爾美術館拍攝的這一照片雖已過時，但它在某些方面却保存了帛書的原始面貌。例如在「玄司秋」章附近印有另一帛書的字迹(用朱色寫成，圖二)，就比現在的紅外綫照片和原物更爲清晰〔二一〕。它本身也成了一件珍貴文物。

楚帛書的研究取得全面突破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後。一九六六年，帛書既歸賽克勒所有，當時存放帛書的大都會博物館聘請巴納博士指導，用先進的紅外綫攝影技術拍成黑白和彩色兩種照片〔二二〕，使許多肉眼看不到的字迹和圖案顯現出來，爲學者的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次年，賽克勒基金會還出資贊助，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考古系舉辦了題爲「中國古代藝術及其在太平洋地區之影響」的學術討論會，這是帛書新照片的一次「亮相」。會上發表巴納、梅萊(Jean E. Mailey,

美國學者）、饒宗頤、林巳奈夫等的論文，就都是以此爲依據〔二三〕。會議對楚帛書的研究起了明顯的推動作用。

一九六六—一九七三年可以説是楚帛書研究的一個鼎盛時期〔二四〕。除上述論文，臺灣學者嚴一萍和金祥恒在《中國文字》上先後撰文〔二五〕，考證帛書所述傳説人物的頭兩位就是古書常見的伏犧和女媧，「女媧」之釋雖不能肯定，但「伏犧」之釋已獲普遍承認。還有饒宗頤的帛書考釋和巴納的系列論著也都是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作品〔二六〕。可是由於這一時期正值「文革」，大陸學者没有參加這一討論熱潮，也很少有人知道國外有新的帛書照片和各種摹本（如饒宗頤和巴納的摹本）發表。



圖二　楚帛書上的另一帛書印痕

一九八〇年，筆者有感於這種信息上的隔絶，開始搜集國内外的有關論著對楚帛書做重新研究，寫成《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先以單篇油印稿發表於該年的兩次學術會議，並於五年後出版了正式的書（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這是中國大陸第一部以紅外綫照片爲依據的論著。此後新作品驟然增多，如李學勤寫成的系列論文〔二七〕，不但做有帛書的新釋文，還對帛書的放置方向、内容結構、思想性質以及圖像含義提出許多新穎見解。特別是他指出帛書十二神可能與式法中的六壬十二神有關，可以説是帛書研究中的又一突破。此外，曹錦炎、高明、何琳儀、朱德熙等學者也參加了新一輪的帛書討論〔二八〕。這一時期，除大陸學者的作品，一九八五年饒宗頤、曾憲通也

在香港發表了《楚帛書》一書（香港：中華書局），對帛書研究做系統總結。一九八七年，筆者曾搜集上述作品，對楚帛書做再次討論〔二九〕。這以後，中國大陸也仍然新作不斷〔三〇〕。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美國賽克勒美術館舉辦東周楚文化討論會，曾展出楚帛書。借便開會，我有幸目睹帛書原物，發現帛書經去霉處理，又有若干字迹暴露，是原來紅外綫照片所未見，回國後寫成短文介紹〔三一〕。另外，會議還邀請饒宗頤和我發表對帛書性質的理解，收入會議論文集中〔三二〕。還有，李學勤討論「子彈庫第二帛書」（上述另一帛書的印痕）〔三三〕，饒宗頤討論楚帛書的天象〔三四〕，也是這一年發表的作品。

到目前爲止，國内外學者對楚帛書的研究已有近半個世紀，發表論著已達六十八種〔三五〕。儘管人們一次次試圖對帛書做最後總結，但其研究却遠沒有「山窮水盡」，反而顯得好像初被開發，還有許多「不毛之地」。特別是從式法來重新認識帛書，以及與日書一類書籍做比較研究，這類問題的研究還僅僅是開始〔三六〕。

下面我們就從這一角度對楚帛書本身做一簡短介紹。

首先，與式法有關，我們應講一下楚帛書的圖式。楚帛書是一部與圖相配的書，而不是單純用文字寫成的書。這是研究其内容不能忽略的問題。

古代的書傳於後世大多衹有文字，但原來往往是圖文相配，著録時要寫明圖多少卷，古人泛稱爲「圖書」〔三七〕。這一術語沿用至今含義已經變化，側重的是「書」而不是「圖」。古代的「圖書」分兩種，一種是以圖附文，「圖」和「書」是分開的；一種是以文附圖，「書」是鈔在「圖」上。如馬王堆帛書《養生方》所附的《牝户圖》（此題是筆者所加），《胎産書》所附的《人字圖》和《禹藏圖》，《天文氣象雜占》的附圖即屬前一種〔三八〕，其中的圖都是插圖性質；而馬王堆帛書中的《陰陽五行》、《避兵圖》（此題是筆者所加）、《地形圖》、《駐軍圖》和《導引圖》則屬後一種〔三九〕，其中的文字都帶有題記性質或圖注性質。這裏討論的楚帛書是屬於後一種。它的圖式是來源於六壬

式的式圖。

楚帛書的圖式是由五部分組成：

(1) 帛書是以春、夏、秋、冬分居東、南、西、北四方；

(2) 帛書是以青、赤、白、黑四木表示東北、東南、西南、西北四維，與前者構成「四方八位」；

(3) 帛書十二神是一種與六壬十二神作用相似的「轉位十二神」，各有所當辰位：取、女、秉當寅、卯、辰，余、欱、䖒當巳、午、未，倉、臧、玄當申、酉、戌，昜、姑、荼當亥、子、丑。每個「值神」皆有題記，題記按左旋排列，以象斗旋；

(4) 帛書四木按右旋排列，以象歲徙（太歲右旋）；

(5) 帛書中心的兩篇文字是處於北斗、太一的位置，它們顛倒書寫，正是象其陰陽順逆，轉位加臨。

下面是我們對帛書各篇的介紹（釋文用寬式，□表示缺文，▨表示殘文，」表示換行，合文、重文一律直接用兩字寫出）：

（一）甲篇（居中，十三行）

隹（惟）□□▨，月則絽（嬴）絀，不得其祟（當）；春夏秋冬，□又（有）▨尚（常）；日月星辰，亂遊（失）其行。絽（嬴）絀遊（失）▨，卉木亡」尚（常），是（？）［謂］夭（妖）。天地乍（作）羕（祥），天梧（棓）將（將）乍（作）𤅊（湯），降于其［四］方。山陵其發（廢），又（有）淵（淵）厥汨（汨），是胃（謂）孛。孛歲▨月，內（入）月」七日、八日，□又（有）雺（霧）䨒（霜）雨土，不得其參職。天雨▨，▨▨是遊（失）月，閏之勿行：一月、二月、三月，是胃（謂）遊（失）終亡，」奉▨□其邦；四月、五月，是胃（謂）亂紀亡，厎▨望（？）。其（？）歲：西䎽（國）又（有）吝，女（如）日月既亂，乃又（有）

鼠方；東〔或戈〕（國）又（有）」吝，天（?·）下（?·）乃兵，𡫴（害）于其王。■（案：·屬陽部；△屬月、物合韻；▲屬之、職通韻。）

凡歲德匿，女（如）⍁⍁⍁隹（?·）邦所五（?·）夭之行，卉木民人以⍁四淺之」尚（常）。⍁⍁上天，三寺（時）是行。隹（惟）德匿之歲，三寺（時）既（?·）⍁，繫之以𣓀降。是月以婁曆爲之正，隹（惟）十又（有）」二⍁。隹（惟）孛德匿，出自黃𣶒（淵），土身亡⍁，出内（入）□△同，乍（作）其下△凶。日月皆亂，星辰不△问（炯）。日月既亂，歲季」乃⍁，寺（時）雨進退，亡又（有）尚（常）△恒。恭（恐）民未智（知），曆以爲則毋△童（動），羣民以⍁，三恒發（廢），四興鼠，以⍁天尚（常）。」羣神五正，四興堯羊。𨑓（建）恒𤕌（屬）民，五正乃明，百（?·）神是享，是胃（謂）德▲匿，羣神乃▲德。帝曰：繇，敬（?·）之▲哉！」毋弗或▲敬。隹（惟）天乍（作）▲福，神則各（格）▲之；隹（惟）天乍（作）夭（妖），神則惠▲之。欽（?·）敬隹（惟）▲備，天像（象）是▲惻（賊）。成隹（惟）天⍁，下民」之戜（式），敬之毋△戈（忒）！」■（案：·屬陽部；△屬東部和耕部、蒸部合韻；▲屬之、職、蒸通韻。）

民勿用⍁⍁，百神山川澫（瀨）浴（谷），不欽敬（?·）行。民祀不㫐（莊），帝𤄚（將）繇以亂⍁之行。」民則又（有）穀，亡又（有）相𧉫（擾），不見陵⍁。是則鼠至，民人弗智（知）歲，則無𦀚祭。⍁則返民，少又（有）⍁，土事」勿△從，△凶。」■（案：·屬陽部；△屬東部。）

【大意】

以上三章主要是講順令和知歲的重要性。第一章是講月行固有度數，如果過快過慢，不得其

當，就會造成春、夏、秋、冬節令失常，日月星辰運行混亂，以至造成各種凶咎，如草木無常（違反原有的生長周期），天棓星（一種妖星）降灾於下，山陵崩墮，泉水上涌，霜霧雨土，兵禍四起。第二章是講歲有德匿，天有賞罰。民人知歲，天則降福；民人不知歲，天則降禍。第三章是講民人應對天地山川諸神虔誠恭敬，以時奉享。如果民人不知歲，祭祀不恭，天帝便會降以上述凶咎，使農事不順。

（二）乙篇（居中，八行）

曰（粤）故（古）⧄贏䨺（包）䖒（戲），出自帀䨖，凥（處）於𦒻⧄。厥⧄僬僬，⧄⧄⧄女，夢夢墨墨，亡章弼弼，⧄⧄水⧄，風雨是於。乃取（娶）」虘遟□子之子，曰女瑱，是生子四⧄，是（？）襄而㦮，是各（格）参柰。虐逃，爲思（？）爲萬，以司堵襄，咎而步達。」乃上下朕逷（斷），山陵不𥨔。乃命山川四𣶒（海），⧄寘（熱）既（氣）寒既（氣），以爲其𥨔。以涉山陵，瀧汩凼澫（瀨）。未又（有）日月，四神」相弋（代），乃𣥺（恃）以爲歲，是隹（惟）四寺（時）。■（案：•屬魚部；△屬歌、月、元通韵；▲屬之、職通韵。）

倀（長）曰青□榦（榦），二曰未（朱）四（？）單，三曰翏黄難，四曰㴬墨榦（榦）。千又（有）百歲，日月」夋（允）生，九州不坪（平），山陵備鉠，四神乃乍（作）□至于逿（覆）。天旁（方）違（動），攼（扞）𢿨（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以］⧄思敦（敷）奠四亟（極），曰：非九天則大鉠，則毋敢蔑天霝（靈）。帝夋（允）乃」爲日月之行。■（案：•

屬元部；△屬耕部。)

共攻(工)夸(?)步十日四寺(時)，⧄□⧄神則閏四⧄毋思(息)，百神風雨辰禕(違)亂乍(作)，乃⧄日月以遡(轉)相」土(?)思(息)。又(有)宵又(有)朝，又(有)晝又(有)夕。■」(案：屬之部。)

【大意】

以上三章是講「四時」的產生。第一章是講在遠古時代，包戲(即伏犧)娶「虘遲□子」的女兒「女填」，生下四個兒子，是爲「四神」。當時没有日月，是靠「四神」分守四方，互相換位，來推算時間，以表示「四時」。這是最原始的「四時」。第二章是講分掌「四時」的包戲四子，長子叫「青□榦」，次子叫「朱四單」，三子叫「翏黃難」，四子叫「㵄墨榦」。經過「千有百歲」，日月終於產生，但天不寧，地不平，炎帝命祝融率「四神」奠定「三天」、「四極」，恢復宇宙和諧，從此才有了由日月之行表示的「四時」。第三章是講「共工夸步十日四時」，後來才有了一日之内的「四時」劃分，即宵、朝、晝、夕。

(三) 丙篇(邊文)

曰：取，云則至，不可以」⧄殺。壬子、丙子凶。乍(作)」⧄北征，率又(有)咎，武⧄」⧄其歇。■」取于下」

曰：女，可以出帀(師)築邑。」不可以豢(嫁)女取臣妾，」不夾得不成(憾)，■」女朼(必)武」

[曰：秉，□□□□□]」妻、畜生(牲)、分女⧄。■」秉司春」

曰：余，不可以乍(作)大事。少旱其」⧄，⧄龍其⧄，取女爲邦芺(笑)。■」余取女」

曰：欲，䱷率▨得以匿。不」見月才（在）▨▨，不可以享」祀，凶。取▨▨爲臣妾。■」欲出睹」

曰：虘，不可出帀（師）。水帀（師）不逡（复），其敗（？）」其逡（覆），至于其下▨，不可以享。

■」虘司夏」

曰：倉，不可以川▨，大不」訓（順）于邦，又（有）鳥内（入）于上下。■」倉莫（？）得」

曰：臧，不可以築室，不」可以乍（作），不脨不逡（復），其」邦又（有）大亂。取女，凶。■」臧杢（？）▨」

曰：玄，可以築（？）室（？）……」吁（可？）▨遈（徙），乃▨……。■」玄司秋」

曰：昜，不［可］燬（毀）事，可［以□］折，敓（除）故（去）不義于四［方］。■」昜▨羕」

曰：姑，利戠（侵）伐，可以攻城，」可以聚衆，會者（諸）侯，型（刑）首（？）」事，殄（戮）不義。

■」姑分長」

曰：𢻭，不可以攻［城］，□」▨□□□□▨▨。■」荼司冬」

【大意】

以上十二章是講帛書十二神所主的各月宜忌，順序是按正月到十二月排列。每章開頭「曰」字後的第一字是月名，經考即《爾雅・釋天》表示正月到十二月的一套名稱：陬、如、寎、余、皋、且、相、壯、玄、陽、辜、涂。這些月名的原義還不很清楚，但作用應是表示十二神所當的辰位，情況與雙古堆六壬式用正月到十二月表示各月值神相似。其所述各月宜忌分別是：取月（正月），忌殺，忌壬子、丙子日，忌作事（？）和北向征伐；女月（二月），可以出師征伐和修築城邑，不可以嫁女和買進臣妾（奴隸）；秉月（三月），可以（或不可以）……娶妻（？）、畜養牲畜等；余月（四月），不可以作大事（祭祀、征伐）……娶婦則爲「邦笑」；欲月（五月）……不見月在某宿（？），不可以祭享，祭享則

凶……；虞月（六月），忌出師，特别是水師……不可以祭享；倉月（七月），忌穿門户（？）……；臧月（八月），忌起蓋屋室和娶婦；玄月（九月），可以起蓋屋室……可以（？）移徙……；昜月（十月），不可毀事（與「作事」相反，指拆屋毀墻一類事），可以……和除去不義之人；姑月（十一月），利侵伐，可以攻城、聚衆、會諸侯，用兵刑除去不義之人；敘月（十二月），忌攻城……。各章的章題，第一字是月名，第二、三字，或隱括該章内容（如女月利出師，題作「女必武」；余月「取女爲邦笑」，題作「余取女」），或表示季節（如春、夏、秋、冬的最後一月作「秉司春」、「虞司夏」、「玄司秋」、「荼司冬」）。

上述内容是一個整體，甲篇側重於「歲」，乙篇側重於「時」（四時），丙篇側重於「月」，彼此呼應。帛書所述包戲四子，我們曾推測應即《書·堯典》當中的羲和四子〔四〇〕。四子相代，「恃以爲歲」，是表示四時變换；而帛書十二神的「轉位」，則表示十二月的循環。它與六壬式的配神有相似之處。六壬式也有「四神」和「十二神」。「四神」即青龍、朱雀、白虎、玄武；「十二神」分兩種，一種包含「四神」，另一種即徵明、魁等十二神。秦漢日書中的建除十二客和叢辰十二客也有好幾套名稱。它們雖是表示日辰的「轉位」，但與上述十二神也是相似的。

我們在前面講過，楚帛書的内容應是原始禁忌的遺存。這類東西在古代有很大影響，無論一般子書還是儒籍都有不少反映。如很多學者都已指出，楚帛書與古代月令類文獻（如《周書·月令》佚文、《王居明堂禮》佚文，《大戴禮·夏小正》，《禮記·月令》，《管子》的《玄宮》、《玄宮圖》，《吕氏春秋》十二紀）存在密切關係〔四一〕。特别是《管子》的《玄宮》、《玄宮圖》，甚至連圖式也與楚帛書相像。雖然仔細比較，二者也有差别，即楚帛書是以列述宜忌爲主，不像月令類文獻是以明堂（或玄宮）十二室爲核心，有非常整齊的五行配數、配物系統，帶有濃厚的説禮色彩〔四二〕。但這適足説明前者有更多的原始性，此種形式的文獻很可能就是月令類文獻的取材所自。

羲和四子的神話在數術家言當中始終是被視爲源頭性的東西，而明堂之説也與上述古書有直

接關係，所以《漢志·數術略》要説「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

注釋

〔一〕哈尼《亞瑟·姆·賽克勒及其中國藝術品的收藏》，《文物天地》一九九〇年六期。

〔二〕《長沙子彈庫戰國木椁墓》，《文物》一九七四年二期。

〔三〕參看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石印本，一九四四年（又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二年翻印本）；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文物》一九六四年九期。

〔四〕《長沙子彈庫戰國木椁墓》，《文物》一九七四年二期；《長沙楚墓帛畫》，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五〕性質與「銘旌」相似。如《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圖版貳拾叁所收即東漢銘旌。但不同點是後者以題銘代替了肖像。

〔六〕《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一，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圖五一；《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十頁圖十二和圖版肆；繪畫編二也收有一件覆於内棺蓋上的帛畫，惜已殘破。

〔七〕《西漢帛畫》，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四年七期。又馬王堆三號漢墓除T形帛畫，還出土了兩幅張挂於墓壁的方形帛畫，見《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十六—三十四頁。

〔八〕但山東臨沂金雀山九號漢墓也出土過類似帛畫，見《山東臨沂金雀山九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七年十一期）。

〔九〕見湖南省博物館保存的蔡氏檔案。

〔一〇〕據筆者在美所做調查，詳見拙作《楚帛書的再認識》，《中國文化》第十期，四十二—六十二頁。

〔一一〕《文物》一九九二年十一期，三十二—三十九頁：商志𩡝《記商承祚教授藏長沙子彈庫楚國殘帛書》，饒宗頤《長沙子彈庫殘帛文字小記》，李學勤《試論長沙子彈庫楚帛書殘片》。又商志𩡝《商承祚教授藏長沙子彈庫帛書殘片》，《文物天地》一九九二年六期，二十九—三十頁。

〔一二〕參看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文物》一九六四年九期。

〔一三〕一九九三年一至五月，筆者在美參加了這一整理工作。

〔一四〕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二至十五頁。

〔一五〕陳槃《先秦兩漢帛書考》附録《長沙楚墓絹質彩繪照片小記》，《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册(一九五三年)。

〔一六〕饒宗頤《長沙楚墓時占神物圖卷考釋》，《東方文化》一卷一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五四年。

〔一七〕董作賓《論長沙出土之繒書》，《大陸雜志》十卷六期(一九五五年)。

〔一八〕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十五—二十頁。

〔一九〕李學勤《補論戰國題銘的一些問題》，《文物》一九六〇年七期。

〔二〇〕陳夢家《戰國楚帛書考》，《考古學報》一九八四年二期。

〔二一〕一九九〇年夏，我曾在賽克勒美術館目驗這一照片的底版原物(玻璃干板)。

〔二二〕彩色照片有單頁複製本 *Ch'u Silk Manuscript, from the Sackler Collections*，黑白照片見巴納書。

〔二三〕見 Barnard 主編的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Intercultural Arts Press, New York, 1972。

〔二四〕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二十至二十七頁。

〔二五〕嚴一萍《楚繒書新考》(上、中、下)，《中國文字》二十六—二十八册(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金祥恒《楚繒書「雹虘」解》，《中國文字》二十八册(一九六八年)。

〔二六〕饒宗頤《楚繒書疏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十册上(一九六八年)；巴納書分兩部，一部是 *Scientific Examination of an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 as a Prelude to Deciphermen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cal Assessment-The Ch'u Silk Manuscript, Revised and Enlarged*,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72，一部是 *The Ch'u Silk Manuscript-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73。

〔二七〕李學勤《論楚帛書中的天象》，《湖南考古輯刊》第一集，一九八二年；《楚帛書中的古史與宇宙觀》，《楚史論叢》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再論帛書十二神》，《湖南考古輯刊》第四集，一九八七年；《長沙楚帛書通論》，《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集，荊楚書社一九八七年。

〔二八〕曹錦炎《楚帛書〈月令〉篇考釋》，《江漢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一期；高明《楚繒書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何琳儀《長沙帛書通釋》，《江漢考古》一九八六年一、二期；朱德熙《長沙帛書考釋》(五篇)，發表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六次會議(長春，一九八六年)。

〔二九〕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發表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六次會議（長春，一九八六年）。

〔三〇〕如蔡成鼎《〈帛書・四時篇〉讀後》，《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一期；陳秉新《長沙楚帛書文字考釋之辨正》，《文物研究》第四輯，一九八八年；何琳儀《長沙帛書通釋校補》，《江漢考古》一九八九年四期；連劭名《長沙楚帛書與卦氣説》，《考古》一九九〇年九期；徐山《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行款問題質疑》，《考古與文物》一九九〇年五期。

〔三一〕李零《楚帛書目驗記》，《文物天地》一九九〇年六期。

〔三二〕參看 *New Perspectives on Chu Culture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edited by Thomas Law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76–183。拙文中文稿以《楚帛書與「式圖」》爲題，發表於《江漢考古》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三三〕李學勤《長沙子彈庫第二帛書探要》，《江漢考古》一九九〇年一期。

〔三四〕饒宗頤《楚帛書天象再議》，《中國文化》三期（一九九〇年）。

〔三五〕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共列三十五種，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增加七種，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又增十四種，加上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李零《楚帛書目驗記》三種和前引蔡成鼎文、陳秉新文、何琳儀文、連劭名文、徐山文和前引《東周楚文化討論會》上的饒宗頤文和拙作、李學勤《長沙子彈庫第二帛書探要》、饒宗頤《楚帛書天象再議》九種，共六十八種。

〔三六〕李零《楚帛書與「式圖」》，《江漢考古》一九九一年一期。

〔三七〕《史記・蕭相國世家》：「沛公至咸陽……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

〔三八〕見《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六十七、八十三、八十四、一三三、一三四頁和《中國文物》第一集（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三九〕見《考古》一九九〇年十期，九二六頁圖一；《古地圖》，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七年；《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四十九—五十二頁。《陰陽五行》尚未發表。

〔四〇〕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六十六—六十七頁。

〔四一〕陳夢家《戰國楚帛書考》，《考古學報》一九八四年二期。

〔四二〕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四十六頁。

原載《中國方術正考》（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五月，第一四一至一五六頁。

上架建議 考古/文獻

ISBN 978-7-5475-0396-6

9 787547 503966 >

定價: 90.00元